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新编世界当代史



## 绪 论

世界当代史是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历史。这是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中的一个阶段。众所周知，这一过渡开始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代。所以，世界当代史也是世界现代史的第二个时期。由于战后四十多年来的历史发展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且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极为密切，所以，中外学者便把这段历史作为独立的新学科对待，称为世界当代史或战后世界史。

战后世界历史的发展与战前相比，有许多新的特点：首先，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来看，战后是科学技术革命空前高涨的年代。在世界近代史上曾经历过以纺织机和蒸汽机的应用为标志的第一次技术革命和以电力、内燃机的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科学技术成就，基本上是第二次技术革命的继续和第三次技术革命的理论准备。从 1945 年起，原子能利用的成功、电子计算机的问世和随后空间技术的发展标志着第三次技术革命开始了。这次技术革命的成果在 50 年代逐步应用于生产，60 年代发展到高潮，70 年代后期又开始了以微电子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的应用为主要内容的新技术革命。所以，战后的四十年，从世界范围来看，一直是处于技术大革命之中。

科学技术作为直接和间接的生产力，推动着社会的进步，是历史发展的有力杠杆。特别是电子计算机的问世，大大推动了生产的自动化，并为人类智力的解放开辟了新的道路。人造卫星的上天和载人航天飞船的试验成功，不仅将人类的活动范围扩大到宇宙，也提高了人类对地球的考察能力。核能的利用是人类在使用能源方面的质的飞跃。新能源、新技术带来了生产结构的变化和劳动生产率的空前提高。生产力的发展使人类在短时期内能创造出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物质财富。战后二十多年中，仅资本主义国家所生产的产品就超过了以往二百多年生产的产品的总和，人们的物质生活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其二，就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而论，战后存在着两种体系、三类国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世界近代史的内容。十月革命的胜利创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打破了资本主义制度一统天下的局面。但世界的绝大部分仍然处于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只有从二战以后，社会主义才越出一国范围，在欧亚美洲先后出现十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与资本主义体系相对立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两个体系同时并存，相互矛盾，又相互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历来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战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巨浪冲垮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堤坝，诞生了 130 多个民族独立国家，他们奉行发展民族经济、维护民族权益和不结盟的政策，被称为发展中国家。

三种类型的国家在战后都走过了十分崎岖的道路。社会主义国家在最初

的十多年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社会主义建设在人类历史上毕竟是刚刚开始实践的新事物，挫折和失败是难以避免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发生了分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各国共产党积极独立思考，实事求是地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特点，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先后掀起改革的浪潮，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现了新的局面。

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建设同样是前所未有的。虽然步履维艰，经常遇到政变、内战、饥荒、外债等困难，但团结合作、争取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仍然是他们发展的主流。

资本主义各国经过世界大战的冲击，除美国外，几乎普遍地都受到了削弱，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之中。然而，由于战后的科学技术革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实施福利制度和新殖民主义政策，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暂时地得到缓和，社会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如果说战前曾有过一个“相对稳定”的短时期，战后则出现过一个长达二十年之久的“黄金时代”。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各种危机不断发生，“滞胀”已取代了经济繁荣，从发展趋势来看，仍处于动荡和衰退之中。

其三，就国际关系而论，战后的特点是打破了近三百年来以维持欧洲大国均势为中心的传统国际关系格局。战前的英法德日等大国都沦为二等或三等国，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左右着国际局势，这是历史上所罕见的。战后初期出现了以苏美矛盾为核心的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局面，60年代以后，国际关系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苏美对抗仍然是造成国际紧张局势的根源。

第三世界的崛起是当代史上的头等大事，是打破两大阵营对峙局面的重要因素之一。从亚非会议到不结盟运动，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彻底改变了几个世纪来帝国主义大国任意宰割亚非国家的局面。

战后世界多元化的发展并没有排斥世界统一性的加强。随着通讯技术和交通事业的发展，地球在“缩小”，各国人民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虽然存在着两种对立的经济体系，但是现代工业造成的国际分工的存在、世界性的科技革命以及和平共处的政治局面，使传统的世界统一市场不仅没有瓦解，而且有所扩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首次建立的普遍性国际组织——国际联盟，只有60多个成员国，而二战后建立的联合国拥有159个成员国，形成了真正的国际社会，它在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中所起的作用是国联所无法比拟的。

其四，战后世界文化的发展在世界历史上也占有特殊的地位。人们认识自然和社会的能力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代。在宏观认识方面已扩展到一百亿光年的宇宙空间，知道了许多新型天体，在微观认识方面早已突破原子核的屏障而深入到基本粒子。两种体系、三类国家的社会实践也进一步丰富了人

们的社会知识。尤其是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成倍增长。据科学家们估计，人类科学知识在 19 世纪是每五十年增加一倍，但在战后是每十年增加一倍，到 70 年代是每五年增加一倍。科学家们还估计，现有的物理、化学、工程、生物等学科的知识，有 90% 是 1950 年以来积累起来的。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大特点是学派林立，边缘学科、新兴学科层出不穷，综合性研究的趋势在增长，许多全球性问题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在研究方法上越来越多地借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特别是运用数学和电子计算机进行资料整理和定量分析。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补充，使人类科学知识整体化呈现了新局面。

其五，战后世界的发展还面临着许多全球性新问题的挑战。如人口问题：上世纪初，世界人口为 10 亿，大约经过 100 多年，才又增长 10 亿；二战后初期为 25 亿，1960 年为 30 亿，1974 年突破 40 亿，1987 年又达到 50 亿。世界人口的增长速度令人担心，照此下去，地球的资源将很快耗尽。加之，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生态平衡与环境问题、能源问题等也都成为当代世界面临的突出问题。

关于世界当代史的分期是一个正在探讨的问题，有“两分法”和“三分法”之争。本书采用前者，划为两大时期，主要着眼于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即战后初期形成的两大阵营从 60 年代起演变为三个世界。在每一时期我们以地区划章，着重讲述具有世界影响的重大事件，在叙述中为了说明事件的来龙去脉，可以前伸后延。本书力图通过对基本史实和基本线索的如实叙述来揭示当代世界的发展特点，从而使读者对我们所处的时代能有一个概括而生动的了解。

（张象）

## 编写说明

国家教委于 1986 年 12 月制定的《全日制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对全国普通中学的世界历史教学作了新的安排，这就是：（1）在高中阶段世界历史教学课时暂时不变的情况下，初中阶段新增加了世界历史的教学内容；（2）明确规定：“世界历史从人类历史的开端叙述至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

国家教委的新安排是为适应普及 9 年制义务教育的艰巨任务而作出的。为了使初中教育能授予学生比较完整的基础知识，历史教学将改变初中只学中国史，不学世界史的情况。以往高中的世界历史教学，只讲到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学生对战后 40 多年的历史一无所知，这个问题也将得到解决。根据新教学大纲规定，今后中学的世界史教学，无论高中还是初中，必须包括世界当代史（指二次大战后到目前的世界史）的内容。中学历史教学的改变直接影响到高等院校，特别是大专师范院校的历史课教学，世界当代史成为各种历史专业都必须开设的一门新课程。

为了适应世界历史教学形势的这一变化，为了满足广大中学教师和大专文科学生对世界当代史的教学需要，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华北地区分会在呼和浩特举行了世界当代史教学问题研讨会，倡议发挥集体力量，尽快地编写出一本简明的教学用书。会后该地区的一些高等院校世界现代史教师和相关研究人员，仔细研究了国家教委制定的历史教学大纲，并参考了一些高等院校现行的该课程的教学大纲，在此基础上，拟出了一个初步体系，通过协作方式，编写了这本《新编世界当代史》。

世界当代史的特点是政治敏感性极强，与当前的国际形势、我国的对外政策，有紧密的联系，所以进行世界当代史教学，可以使学生对当代世界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意义是很大的。但是也正因如此，教学中遇到的难题也比较多，可以说它是世界史领域中最年轻的学科。这段历史虽然离我们的现实最近，但许多问题的研究恰恰是很不够的，所以对这段历史的教学难度很大，对于刚充实历史教师队伍的新教师如此，对于已有多年世界史教学经验的老教师也如此，因为对他们来说，许多内容也全是新的。大家都需要有一个由浅入深、由简到繁的学习过程。本书编写充分考虑到这一特点，尽量做到分期明确、重点突出、叙述扼要，便于读者掌握这段历史的基本线索和基本史实。

本书讲到的重大历史事件包括了国家教委新教学大纲规定的所有知识点，并作了适当的补充和扩展。特别是本书改变了以往编写世界现代史只讲经济、政治和阶级斗争的片面做法，对于当代世界科学文化的发展给予了充分的注意，做了大胆的尝试，这方面内容为全书三大部分之一。

编写中我们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尽量吸收世界当代史的当今研究成果。我们力求多写史实，少发空论。这样做既利于教师在备课中参

考和使用，也利于发挥学生的独立思考，让他们根据史实做出自己的判断。正因为本书以写基本史实为主，所以本书也可以作为各大专院校非历史专业的国际政治、各国概况、国际关系史等课程的参考书。本书的作者中就有国际大学、外语学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高等院校从事国际政治经济教学与研究的教师。此外，本书对于社会上有志于了解当代世界的广大干部和青年人也会有帮助。

由于我们水平限制，缺点、疏漏在所难免，恳请广大教师和学员批评指正。

编者  
1987年12月

## 新编世界当代史

## 第一编 1945年至60年代

### 第一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国际关系

#### 1. 联合国的建立

联合国的建立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产物，是在战时反法西斯联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长期以来，人们总是把维护世界持久和平的问题与建立普遍性的国际组织联系在一起。早在1941年美英发表的“大西洋宪章”和苏联公布的“苏波友好互助宣言”都提出了建立新型国际组织的设想。1919年建立的“国际联盟”辜负了人们对它的期望，没有起到维护世界和平的作用。反法西斯国家，特别是美苏都反对恢复国际联盟。1942年1月1日，21个反法西斯国家在华盛顿签署同盟宣言时，罗斯福就竭力避免“联盟”一词，而提出“联合国家”的概念。所以，《联合国家宣言》的发表应视为筹建联合国的起点。

随着战争形势的转变，如何安排战后的世界秩序，如何把战时反法西斯国家的合作关系延续到战后，就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了。1943年10月19—30日，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根据美国的建议讨论建立国际组织的问题。中苏英美四国代表共同签署了《普遍安全宣言》。罗斯福为了避免重蹈国联的覆辙，为了保证美国在未来的国际组织中起领导作用，特别强调这个组织要具有真正的世界性，必须要有苏联参加，并将中国列入大国行列。他提出了“四警察”的设想，要让美英苏中四大国在未来的国际组织中处于核心地位。经过战争的打击，英国受到严重削弱，处处依靠美国；中国蒋介石政府更是俯首贴耳地听命于美国，因此，在“四警察中”，美国对苏联就可保持3:1的优势，从而达到通过这一国际组织领导世界的目的。所以，罗斯福非常希望能充当“联合国之父”的角色。

1944年7月18日，美国政府把国务院起草的《普遍国际组织暂定草案》交给中苏英三国政府。1944年8月21日—9月28日，苏美英三国在华盛顿一所叫做敦巴顿橡树园的花园里举行会议，讨论和草拟战后国际组织的章程，9月28日至10月7日为第二阶段会议，由美英中磋商。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普遍性国际组织的建议案”，实际上为未来的联合国宪章奠定了基础。会议在未来联合国的核心机构——安理会的表决程序问题和创始会员国资格问题上发生了分歧。美英认为，在决定实质性问题时，常任理事国如为争端一方，不能行使否决权，苏联则坚持可以行使。当时战争尚在进行，双方都不愿因此分歧而影响同盟关系和普遍性国际组织的建立。

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举行了雅尔塔会议。会议就否决权问题，通过了妥协性的方案，即“雅尔塔公式”。主要内容是：安理会理事国关于程序问题的决议只需简单多数票通过即可，关于实质性问



题的决议，理事国的多数票中必须包括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同意票方为有效；当常任理事国是争端当事国时，如果决议是采取和平手段解决争端，或是安理会为审议争端而进行调查时，不得行使否决权，如作出决定，考虑采取出兵、断交等手段时，可以行使否决权。这就是“大国一致原则”，或“大国否决权”。英美对苏联提出的额外投票权问题，即允许乌克兰、白俄罗斯作为创始会员国问题表示谅解和支持。会议决定邀请 1945 年 2 月 8 日以前在“联合国宣言”上签字的国家和 1945 年 3 月 1 日以前向法西斯宣战的国家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

1945 年 4 月 25 日，成立会议在旧金山歌剧院隆重开幕。中国派了一个有中共代表董必武同志参加的代表团出席会议。苏美英法中的首席代表分别为莫洛托夫、斯退汀纽斯、艾登、皮杜尔、宋子文。经过两个多月的讨论，于 1945 年 6 月 25 日通过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院规约。第二天，51 国代表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了字（波兰是后来补签的）。这 51 国就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10 月 24 日联合国宪章正式生效的这一天定为联合国日。联合国总部最初设在英国伦敦教堂大厦，1946 年 1 月 10 日至 2 月 14 日在此举行第一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接受美国国会的邀请，将总部永远设于纽约东河之畔。

联合国宪章规定联合国的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进行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经济、社会、文化和人道主义性质的问题，并促进对于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作为协调各国行动的中心以达到上述共同目的。”联合国还规定它本身及会员国应遵守的原则是：会员国主权平等，履行宪章义务；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禁止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集体协助；确使非会员国遵守宪章原则；不干涉内政。这些宗旨、原则基本上反映了世界人民的心愿。

联合国的主要机构有：1、大会。由全体会员国组成，是主要的审议机构，每年 9 月份第三个星期二开幕。大会之外，还可举行特别会议。2、安全理事会。负有维护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在联合国中占有首要的政治地位。3、经社理事会。在大会的权力之下，负责协调经济和社会活动，并附有许多专门机构。4、托管理事会。负责监督对十一处托管领土的行政管理。5、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司法机构。6、秘书处。是为其他机构服务、执行其计划和政策的常设机构，最初两任秘书长是挪威的吕格耳·赖伊（1946—1953）和瑞典的达格·哈马舍尔德（1953—1961）。

总之，联合国是一个崭新的国际组织，是国际社会的集中表现。它虽不是一个世界政府，但却要对国际政治中的许多问题及时作出反应，有义务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当和平手段不能奏效时，有权采取强制行动，直至派出维持和平的部队。它不仅关心政治问题，还十分重视社会经济、文教卫生等方面的问题，在这方面进行的大量工作是有积极意义的。尽管联合国建立后，在美国操纵下，使联合国宪章和各项决议不能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甚至曾

有过许多失误，但联合国的建立毕竟还是反映了世界人民爱好和平的心愿，是全世界人民的伟大胜利。

（黄若迟）

## 2. 对德国问题的处置

1945年5月8日，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美、英、法、苏四国对德国实行分区军事占领。关于如何处置战后德国的问题，欧洲反法西斯盟国，从各自的不同利益出发，经历了一个从主张分割德国到放弃分割协议、确定分区占领，实行政治、经济管制的时期。最后，在各占领区变成彼此独立的政治实体的形势下，德国走上了建立两个国家的道路。

早在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举行的苏美英三国首脑德黑兰会议上，就已提出了如何处置德国的问题。罗斯福提出一个分割德国的方案，设想把德国分割为五部分，每一部分都各自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此外还提出把基尔运河及汉堡、鲁尔、萨尔等地区置于联合国家管制之下。英国和苏联也都表示可以研究这个分割德国的方案。但是，随着苏联红军反击纳粹德军胜利形势的发展，美英苏根据各自的战略利益，开始重新考虑对德政策，把以前的分割、肢解、削弱德国的政策，转变为分区占领的政策，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三国正式通过了德国的分区占领与管制的决议。德国投降后，1945年6月5日，苏、美、英、法四国在柏林发表关于管制德国的联合声明（包括《关于击败德国并在德国承担最高权力的宣言》、《关于德国管制机构的声明》、《关于6德国占领区的声明》），正式接管了德国的最高权力。四国宣布分区占领德国，即在1937年12月31日以前的德国边境内分成如下四个占领区：东区归苏联，约占德领土的1/3；西北区归英国；西南区归美国；西区归法国；大柏林区（包括柏林市及市郊）将由四国共同占领。由四国占领军总司令组成盟国管制委员会，为占领期间德国境内最高权力机构。同年8月，苏、美、英三国首脑举行波茨坦会议，重申“德国军国主义及纳粹主义将予根除”，并详细规定了管制初期关于处置德国的政治和经济原则。

在对德国实行分区占领的同时，四国采取了一些共同行动，但也在各自占领区内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自己的措施，逐渐使各占领区变成了互相隔断的政治实体。根据战时协议，反法西斯同盟国组成国际军事法庭，从1945年11月20日至1946年10月1日，对24名纳粹战犯进行了“纽伦堡审判”。最后判处戈林、里宾特洛甫、凯特尔等12名首要战犯绞刑，赫斯等3名无期徒刑，另外4名10至20年有期徒刑，3名被赦免。根据波茨坦会议决定，各占领国可从本占领区内拆迁部分工业设备和工业产品作赔偿，总数为200亿美元，苏联应取得一半。据苏方公布，到1950年底苏联得到76.58亿美

元的赔偿（西方估算为 120 亿美元）。西方三国也通过掠夺德国黄金、煤及其它产品，拆迁自己占领区内工业设备，得到许多赔偿。在三国协议的基础上，东普鲁士的一部分划入苏联，并以奥得—尼斯线为德、波的边界线。根据波茨坦协定，新的德国边境以东的 1200 万至 1300 万德国人被遣送回国。在肃清法西斯势力、铲除军国主义及实行民主化等措施方面，苏占区相当彻底；而西方三个占领区，则多流于形式。随着美国和苏联之间“冷战”的进行，双方在统一德国的问题上，分歧越来越难以调和。1947 年 11 月举行的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伦敦会议，就德国统一的问题发生公开分裂。1948 年 3 月 20 日，苏联代表退出盟国管制委员会，管制德国的最高机构停止了活动。德国分裂的形势已经不可逆转。

分裂德国的第一个严重步骤是，美、英、法三个占领区的合并。1947 年 1 月 1 日美英正式签订“德国美占区和英占区经济合作协定”。该协定规定：“对所有经济目的来说，两个占领区应视作一个单一的地区”。以后，在 1948 年 2 月 23 日至 3 月 6 日和 4 月 20 日至 6 月 1 日举行的美、英、法、比、荷、卢六国伦敦会议上，在美国的压力下，法国同意建立“三占区”的决定。就在伦敦会议上，美、英、法“建议”，西德应是联邦制国家，立法机构由上、下两院组成，政府首脑（联邦总理）由两院选举产生。分裂德国的第二个严重步骤是，三占区（西占区）实行的币制改革。六国伦敦会议结束后半个多月，6 月 18 日美、英、法占领当局宣布，从 6 月 21 日起在西占区实行单独币制改革，发行西德马克。这一行动，从经济上开始把德国分成了两部分。

针对西方三国分裂德国的行动，1948 年 6 月 19 日，苏联声明为了“保护苏占区居民和该区利益，防止对苏占区货币流通的破坏”，决定对西方进入柏林的通道实行水陆交通管制，但留下三条空中走廊。6 月 22 日，苏联宣布在苏占区和大柏林发行新马克，美国当夜则在西柏林发行了西德马克。6 月 24 日，西占区与柏林之间的水陆运输中断，从此开始了苏联对柏林的封锁。美英出动数千架运输机，飞行 27.7 万余次，运送物资 200 余万吨。1949 年 5 月 12 日，双方宣布取消一切封锁。

1949 年 5 月 23 日西德通过《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波恩宪法），8 月 14 日西占区举行联邦议院选举，9 月 20 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正式成立，临时首都设在波恩。同年 5 月 30 日，东占区德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10 月 7 日正式组成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首都设在柏林。从此，德国分裂为两个国家。

（侯振彤）

### 3. 战后初期的远东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使远东形势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人民取

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力量空前强大。朝鲜人民在苏联军队的帮助下解放了自己的祖国。经受了战争考验的社会主义苏联的威望和影响日益提高。日本被迫投降，成为战败国。在大战期间实力增强了的美国企图称霸远东。美国支持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企图消灭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把中国变成美国控制亚洲的主要基地。美国在朝鲜南部扶植李承晚傀儡政权，制造了朝鲜的分裂。

对战败国日本的处理是战后初期远东问题的焦点之一。大战期间，反法西斯联盟曾就如何处理战败的日本问题达成了《联合国宣言》、《开罗宣言》、《雅尔塔协定》、《波茨坦公告》等协议，规定了一些反映世界人民愿望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一、解除日本武装，严惩战犯，肃清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二、实现日本民主化，使日本走上独立、民主、和平的道路；三、消除日本战争工业，保留和平工业；四、日本必须支付赔偿；五、取消日本的殖民地，归还被日本掠夺的亚洲各国的领土；六、对日作战的盟国必须共同对日缔结和约，不得单独媾和。在这些协议中也包含着把日本的千岛群岛交予苏联、苏联恢复被日本从沙俄手中夺去的在中国东北的许多特权等霸权主义的内容。

美国战后初期的对日方针是彻底削弱这个远东的主要竞争对手，使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而依附于美国，充当美国称霸亚洲的工具。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日本投降后美国以盟军的名义对日本实行了单独占领。美国政府规定，盟军最高统帅由美国太平洋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担任，日本的天皇和政府处于最高统帅领导之下，各主要盟国发生意见分歧时，美国政策应居主导地位。由于苏联等国反对美国单独制定和实施对日政策，在1946年相继成立盟国对日政策的最高决策机关——远东委员会和咨询机构——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但这两个机构并不能发挥作用。在美国占领日本本土的同时，苏联出兵占领了千岛群岛，包括南千岛的国后、择捉岛和本来属于日本北海道的齿午、色丹岛。

美国单独占领日本后，一方面从削弱日本的目的出发，一方面在战时反法西斯联盟的制约和世界人民的压力下，在日本采取了一些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措施，主要包括：解除日本武装，解散了日本近600万军队；取消日本军事工业，禁止武器、弹药、军用器材、军舰、飞机的生产；逮捕和审判战犯，对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分别处以绞刑和徒刑，另外还审判了乙、丙级战犯5,700人；政治整肃，解散一切军国主义团体，开除法西斯团体、政党领导人物和职业军人的公职；拟定赔偿方案，规定日本的工业可以维持在1931年“9.18”事变前的水平上，超出部分的设备作为战争赔偿予以拆迁；限制日本领土，规定日本的主权只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地区及由开罗宣言和美国已加入或将要加入的其它协定所决定的周围诸小岛。此外，占领当局还进行了其它战后改革。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这些措施并没有得到认真彻底的执行。

1947年下半年中国革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蒋家王朝复灭局面已定。美国利用蒋介石政府称霸亚洲的希望破灭了，开始改变对日政策，放弃削弱日本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措施，企图扶植日本，使日本成为冷战反共、称霸亚洲的基地和主要帮凶。美国逐渐放宽、最后停止了拆迁赔偿，实际拆迁的设备仅为1亿6千多万美元。美国向日本提供了大量的援助，1947—1951年总数达18亿美元，制定了恢复日本经济的原则并派总统特使、底特律银行董事长道奇亲赴日本监督实施。

中国革命胜利后，美国加快了扶植日本的速度。1950年侵朝战争爆发后，美国公开重新武装日本，成立了拥有75,000人的名为警察预备队的军队，海上保安厅增加8,000人，美国还加强对日本军需工业的扶植，从日本大量采购侵朝战争所需的军事物资。1951年美国授意日本政府解除整肃，使以前开除公职者陆续重返政界。

为了使对日本的长期占领和扶植合法化，美国策划单独对日媾和。1951年8月4日—8日，美国悍然不顾中苏两国人民及世界民主和平力量的坚决反对，召开了旧金山对日媾和会议，缔结了对日和约，日本吉田茂政府在和约上签了字。和约的主要内容有：

领土问题。和约规定日本承认朝鲜独立，放弃对台湾及澎湖列岛、千岛群岛的一切权利和要求，但避而不谈台湾等地的归属问题，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蓄意制造“两个中国”。在和约中日本同意将琉球群岛、小笠原群岛等岛屿置于美国的托管之下，为美国提供侵略亚洲的重要军事基地。

军事问题。和约承认日本有单独或集体自卫权利，与日本缔结协定的国家可以在日本驻军。和约签字的当天，日美签订了安全条约，在条约中美国公开同意日本重整军备，日本同意美国在日本驻军，允许驻日美军出动镇压日本的“内乱”，两国结成侵略性军事同盟。

赔偿问题。和约宣布日本的资源不足以全部赔偿，规定除向遭到日本侵略的国家提供劳务等形式外，放弃一切赔偿。

旧金山和约是一个片面的、非法的和约，完全背弃了战时盟国达成的处理日本问题的主要原则，在击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中遭受牺牲最大、所做贡献最多的中国被排除在会议之外，印度、缅甸等国拒绝参加会议，苏联、波兰等国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缔结和约后，日本没有取得真正的独立，仍然处于美国的半占领状态之下。

旧金山和约生效后，日本先后和印度等国单独缔结了和约，利用赔偿向东南亚进行经济渗透，1955—1977年期间，向缅甸、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支付了6,352亿日元赔偿。1956年日苏恢复邦交，至今仍未缔结和约。1972年中日两国关系实现了邦交正常化，1978年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1972年美国把冲绳的行政权归还给日本。

（杨宁一）

#### 4. 五国和约与巴黎和会

对德国法西斯的欧洲盟国——意大利、芬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处置，是通过缔结五国和约来完成的。战争后期军事的进展所造成的两个不同势力范围，是五国和约的基础。1944年9月—10月和1945年1月，苏军与罗马尼亚、芬兰、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分别签订了停战协定。在这之前，欧洲的另一法西斯盟国意大利投降后，英美也曾于1943年9月与意签订了停战协定。上述停战协定是对罗芬保匈意五国和约谈判的重要依据。

1945年7月波茨坦会议决定设立一个专门机构——外长会议，来处理对战败国和约谈判的问题，并决定该机构由英、苏、美、法、中五国外长组成，同时还规定“外长会议将分别由在各敌国投降书上签字之国家组成”。参加该机构的首席代表有：英国外相贝文，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法国外长皮杜尔和中国国民党政府外长王世杰。

谈判过程为三个阶段：1945年9月在伦敦召开第一次外长会议和12月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为第一阶段。由于波茨坦会议通过了有两种解释的有关外长会议组成的决议，外长们在伦敦会议上对此进行争论，至使这一阶段的谈判走了弯路，待莫斯科会议确定了外长会议的组成并决定了准备和约的程序之后，谈判进入第二阶段。

1946年春夏在巴黎召开第二次外长会议和7月29日召开的巴黎和会为谈判第二阶段。经过四、五个月的讨论，基本上制定了和约草案，对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也进行了充分讨论。

1946年11月在纽约召开第三次外长会议和1947年2月10日在巴黎举行的签字仪式为谈判的第三阶段。和约草案文本经过审定之后，终于形成正式文件。

谈判过程中，各方存有种种矛盾，并有霸权主义和大国主义的表现，如和约的起草工作完全由美苏英法控制，只是在巴黎和会和签字仪式上才要求有关国家出席。争论的主要问题有：

意大利殖民地问题。战前意属非洲大陆殖民地有昔兰尼加、的黎波里塔尼亚、费赞（三处后合为利比亚于1952年独立）、厄立特里亚和意属索马里。意战败时，这些殖民地均被英所控制。战后英想继续独占意属殖民地，美建议由联合国托管，苏提出大国分别托管，并要求将的黎波里塔尼亚交苏托管。这是第一次外长会议争论不下的一个问题，但是外长们一致同意让意

---

由于中国不是敌国投降书上的签字国，因而仅参加了第一次外长会议，之后被排除在外长会议之外。

据《雅尔塔会议公报》中“外长会商”一项而成立的常设机构，也称“外长会议”，其成员只有美英苏三国。

大利放弃其在非洲殖民地的一切权利。第二次外长会议再次争论后，通过了延缓处理意属殖民地的决议。1947年对意和约规定将该问题交联合国大会解决。

关于的里雅斯特和意南边界问题。的里雅斯特港原属奥匈帝国，1920年意南签订“拉巴洛条约”后归意管辖，1943年被德军所占，1945年5月又分别被南军和西方盟军收复，6月9日双方达成一项“摩根线”的临时协议。

第一次外长会议商定的里雅斯特港辟为自由港，置于国际共管之下，并组成“意南边界委员会”进行具体调查。第二次外长会议各国分别提出自己制定的意南国界线，争论之后，采纳了“法国线”为意南边界，并决定设立的里雅斯特港自由区，划分甲乙两区分别由美英军队和南军管辖。该决定后载于1947年对意和约中。

关于罗保政府改组问题。第一次外长会议上，美国不承认罗马尼亚格罗查政府和保加利亚祖国阵线政府，要求罗、保实行自由选举。莫斯科会议美再次提出罗、保两国要先改组、后缔约，经过争论之后，苏同意美国的建议。

关于多瑙河问题。1856年根据巴黎条约设立“欧洲多瑙河委员会”，负责管理多瑙河下游的航务。1921年包括英法等非多瑙河国家十二国签订了多瑙河公约，由英、法、意、罗组成“欧洲委员会”并成立“国际多瑙河委员会”。德国在二战中召开维也纳会议，撤销委员会。战后西方国家要求恢复多瑙河航行自由，苏则坚持要由多瑙河沿岸国家自己解决。这是第二次外长会议上争论的问题之一。第三次外长会议上美英法主张将多瑙河问题列入和约，苏反对。最后双方同意该问题不列入和约，但规定一切国家的国民、商船和货物均可在多瑙河上自由航行。

关于罗、匈、保、芬领土的变动。巴黎和会确认了停战书的规定。苏联割取了罗的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芬兰的贝柴摩和卡累利阿，以及捷的外喀尔巴阡。比萨拉比亚的割让使苏成为多瑙河沿岸国家，外喀尔巴阡的割让使苏匈有了共同的边界。

关于赔偿问题。在巴黎和会上，经过争论做出了最后规定：战败五国分别向苏、南、捷、希、埃、阿六国赔偿十三亿三千万美元，其中苏获取赔偿九亿美元。

在上述问题上，尽管大国之间存有争议，但最终还是签署了一项有利于欧洲和平的和约。对战败五国分别签署的和约的结构大体相同，有关限制战败国军备、赔款、盟军撤退期限、审判战犯等等都作了比较实际的规定，对战败国的要求并不十分苛刻。谈判中争论的问题，经相互妥协后基本解决。经美、苏、英、法各自的政府批准后，于1947年9月15日生效。

五国和约得以缔结，一方面是战争结束前后，形成了有利于解决五国问

---

盟军地中海战区最高司令的参谋长摩根与南斯拉夫方面划定的一条分界线，即从的里雅斯特的海岸线往北直达奥地利边境的菲拉赫。线西由盟军占领，线东由南军占领。

题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大国之间战时的合作余热未散，因此，仍引用和平的（而不是对抗的）方式商讨战后欧洲的问题。这对于战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具有借鉴意义。然而，五国和约的缔结却是盟国合作的最后一次妥协和成果，冷战的出现结束了盟国共同战胜法西斯的时期。

五国和约的缔结结束了欧洲大部分国家的战争状态，维持了四十年的和平局面，而且对于战后世界格局（均势）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刘龙喜）



## 第二章 1945 年至 60 年代的美国、西欧与日本

### 1. 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由于有两大洋作为天然屏障，战争远离本土，除损失 40 万士兵外，成为参战的大国中唯一没有遭受破坏的国家，相反，美国经济由于受到世界范围内大量军火与粮食需求的刺激而急剧地增长，爬上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顶峰，成为世界头号强国。

大战爆发前，美国资本主义经济一直陷于 30 年代危机与萧条的困境。罗斯福“新政”虽然对缓和危机、刺激生产起了一定作用，却未能使美国经济摆脱“特种萧条”。1937 年美国又爆发了新的危机。同 1937 年相比，1938 年加工工业开工率降低为 64.9%，失业工人超过 1000 万。罗斯福政府尽管增加对公共工程等项目的拨款，亦未能根本挽救局势。正在这时，1939 年 9 月二次大战爆发了。这对美国经济而言真如天赐良机，一下子“把美国从由于 1937 年大战萧条而陷入的经济困境中解救出来”，“而且给了美国经济以新的活力”。

大战爆发不久，1939 年 11 月 4 日，美国国会通过了罗斯福总统提出的“现购自运”原则，即规定允许交战国在美国购买武器，但须付现款并以不得用美国船只载运为条件。1941 年 3 月美国国会通过“租借法案”，规定美国总统有权向任何一个国家出租军械和其它物资，只要他认为这个国家的防备对于美国的安全是必不可少的。从 1941 年 3 月到 1945 年 12 月，美国根据这一法案共供应英、苏等国约 491 亿美元的军火、设备、粮食、原材料等，其价值大大超过 1933—1939 年联邦政府全部开销的总数。“现购自运”原则，特别是“租借法案”对反法西斯战争起了一定作用，同时也为美国工业品、军火和过剩农产品打开了广阔的市场。30 年代连绵不绝的经济危机和萧条立刻让位给“生产奇迹”。从 1939 年到 1942 年 12 月间，工业生产将近增加一倍，钢、煤、各类汽车都大幅度增长，大批失业者参加工作，使失业人数在战时降到最低点，1943—1945 年平均每年不到 100 万人。

大战促进了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的高速发展。到大战结束的 1945 年，美国整个工业的生产能力同 1939 年相比，扩大了约 40%。战时工业景气的特征之一，是军事工业部门的发展速度占绝对优势。武器军火在工业总产量中的比重，由 1939 年的 2%，上升为 1943 年的 66%。重工业产品的 81% 均为军用品。五年期间，用于运送战争物资的商船增加了 3 倍，海军火力增加了 10 倍。据估计，仅 1942 年，美国生产的战争物资的总产值即达 302 亿美元，等于德、意、日三国总产值之和。

大战也促进了农业的迅速发展和农业机械化的基本实现。国内外对美国农产品需求的不断增加成了农业迅速发展的直接推动力。以战时最高农业产量或牲畜数量与 1939 年水平相比，各种主要作物及牲畜头数增长的百分比

是：小麦——49.5%，玉米——20.1%，牛——29.6%，猪——67.5%等等。战时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与农村劳动力的缺乏，促进了对农业机械的运用。1940—1945年，拖拉机、载重汽车、联合收割机等各种机器增加的数量，约相当于过去10多年乃至30年间增加的总量。至此，美国基本上实现了农业机械化。

美国经济的发展与科技发展直接有关，而科技发展又在极大程度上受到战争的推动。战争期间美国科研经费每年达6亿美元，在当时敌对双方激烈竞争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几乎是不惜工本不计代价地投入某些关系到军事实力的技术研究。结果，全世界一场影响深远的科技革命，即第三次科技革命就由美国为发源地而开始了。

1942年夏，美国在英国、加拿大的合作下，全面开展了代号为“曼哈顿工程区”的大规模原子能计划，1942年12月首次实现了人工控制的链式反应，1945年7月16日试验成功第一颗原子弹，从而标志了人类大规模利用原子能时代的开始。大战期间美国还加速研制电子计算机，1945年底，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埃尼阿克”在美国制成，成了世界应用电子计算机的开端。战时美国和英国最先使用雷达探测技术导致了战后电视的发展。战争后期美国加强了火箭筒的制造，美军进入德境后，即极力搜罗德国火箭专家，把他们大批送往美国，有力地加强了战后美国对火箭的研制工作，从而为航天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战后初期，当战时科研成果转入和平时时期民用轨道时，美国凭借其拥有的巨大财力、物力，加上从欧洲等地吸引来的大批科学技术人材，将战时科技成果汇集起来，加以综合研究，率先用于国民经济中，使美国科学技术在战后处在世界领先地位，成为世界科学技术的中心。

战时美国还利用“租借法案”大举打入各国市场。战时美国出口实物量增加了近二倍，进口增加20%。美国大搞贵卖贱买，战时在进出口贸易中榨取了各国人民135亿美元血汗。美国资本输出也有增加，1945年达153亿美元，比1939年增加34.1%。六年战争期间，美国从外国取得价值170亿美元的原料和驻外美军所需的军需品。

结果，在各资本主义交战国弄得民穷财尽的情况下，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经济地位进一步提高。战后初期，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取得了政治上、军事上的霸主地位和经济上的绝对优势。它拥有资本主义世界工业产量的53.4%（1948年），出口贸易的32.4%（1947年），黄金储备的74.5%（1948年）。美国靠战争的输血而空前肥大起来。

在军事力量方面，1939年美国军队总数只有335,000人，国防预算不过10亿美元，到1945年军队总数达到1,200万人，国防预算达到800亿美元。到二战结束时，美国已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和最有威力的空军，海军也首屈一指，拥有1,200艘战舰，50,000艘供应和登陆艇。它一手挥舞着原子弹，一手拿着美元，两手并用，称王称霸。它不仅剥削着亚非拉人民，

甚至对它在西欧、北美、大洋洲的盟国，也实行“弱肉强食”政策，力图把它们踩在脚下，成为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当时，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狂妄地宣称，二十世纪是“美国世纪”。

（张宏毅）

## 2. 美国与“冷战”

“冷战”是战后初期国际关系格局的特点，也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方针。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病逝，副总统杜鲁门接任总统职务。他继承了罗斯福的“世界主义思想”，推行全球战略，所不同的是他比罗斯福更明目张胆地推行扩张主义，对战时盟国苏联采取敌对政策。他通过政治、经济、军事等手段遏制苏联，并以此为烟幕，控制处于美苏之间的广大中间地带，其中首先控制欧洲，达到称霸世界的战略目的。

美国“冷战”政策的提出与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有关，共同敌人——德、日、意法西斯被击溃，使得美苏联盟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了。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越战越强，成了美帝国主义称霸世界的严重障碍。因此，苏美矛盾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日益突出起来。再加上美国本身存在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迫使它采取新的侵略扩张政策。美国战后控制的新的势力范围远离国境4300多公里，美国已取代英国成为包括东地中海在内的海洋统治者。1946年美军仍驻扎在56个国家，遍及各洲，到1947年，美国在国外先后建立的军事基地达484个。在国内，由于战争结束，军事订货大幅度减少，使生产严重过剩；而随着战争结束，在强大舆论压力下，杜鲁门政府不得不把1,200万军队迅速减少到1947年的150万，因而使劳动力大大过剩；国外市场也由于西欧还处于“瓦砾一堆”，东欧各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大大缩小。美国遍及世界各洲的驻军和军事基地，引起各国人民争取独立、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高涨。

二次大战结束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公开表示：“我已厌倦笼络苏联人”。在此思想的指导下美国“冷战”政策逐步形成，1946年美苏在伊朗问题上首先开始激烈的斗争。根据波茨坦会议期间的决定，在对日战争胜利后半年内，撤走在伊朗的一切外国军队。1946年元旦，驻伊朗美军撤完，英军重申同年3月2日前撤完。苏军未撤，且于1945年12月16日在其占领区正式成立“阿塞拜疆民族政府”。美国为争夺伊朗石油资源，控制这一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国家，便利用此次争端在国际上大造“苏联扩张”的舆论，并支

---

“冷战”一词是美国资产阶级政论家赫伯特·斯沃普在1946年初为美国参议员伯纳德·巴鲁克起草的一篇公开演说稿中首先提出的。1947年4月16日，巴鲁克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哥伦比亚发表演说时公开采用了“冷战”一词。

持伊朗向联合国提出控告，迫使苏军于5月全部撤出伊朗，从而使美国在中东扩张势力范围的野心如愿以偿。

同期，苏联与土耳其因领土纠纷关系日益恶化。苏联曾在1945年6月7日向土耳其提出下列要求：归还卡尔斯和阿达尔汉两个边境地区；在达达尼尔海峡地区给予苏联以陆海军基地；修改关于海峡的蒙特勒国际公约。对此，土耳其政府态度强硬。美国又趁机在1946年2月28日派遣舰队开往地中海支持土耳其与苏对抗，这支舰队即成为常驻地中海的第六舰队。这样，土耳其和地中海也成了美国的势力范围。

根据上述事件，美国务院立即致电当时美驻苏使馆代办乔治·凯南，分析苏联一些行动的原因。于是在1946年2月22日凯南向美国务院发回一份长达8千字的电报。在电报中说：“布尔什维克有一种天生的外部世界的恐惧心理”，具体分析了苏联的对外政策，认为苏联“在确切认为适时和有希望的地方，努力扩大苏联的势力范围。目前，这种努力仅限于某些邻近地区，如伊朗北部，土耳其……。在这些地方作出努力据认为是出于紧迫的战略需要”。基于这种判断，凯南提出，苏联“对理智的逻辑性无动于衷，但对武力的逻辑十分敏感”，“因此，如果对方掌握足够的武力，并表明准备使用武力时，实际上几乎用不着真的动武。如果正确地处理形势，就不需要有影响威望的摊牌”。凯南这份电报对战后苏联的“理论、意图、政策和做法”以及美国应采取的对策，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主张美国应采取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政治颠覆、局部武装干涉和持续政治“冷战”的办法来遏制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凯南的电报为杜鲁门政府制定冷战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继凯南电报之后，美国政府便假邱吉尔之口，为其冷战政策的出台大造声势。

由于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大大削弱，在欧洲战争快结束之时，邱吉尔就担心英国在欧洲的利益将因苏军的长驱直入而受影响，曾向美国政府表示这种忧虑，企图借助美国在欧洲抗衡苏联。但是，在德国投降之前，美国不愿为英国的利益而得罪苏联。到1945年底，美国感到可以利用英国日趋没落而恐惧苏联的心理，在国际上进一步施放反苏烟幕。在这种企图支配下，美国便主动邀请邱吉尔访美。

1946年3月5日，在杜鲁门陪同下邱吉尔在富尔顿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和平砥柱”的演说。邱吉尔耸人听闻地提出“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他声称“美国此刻正高踞于世界权力的高峰。……如果拒绝、忽视或糟蹋这个机会，我们将受到后世长期的责备”。因此，邱吉尔主张美英在军事政治上结盟，以反对所谓“铁幕”后的国家。邱吉尔的富尔顿演说为美国“冷战”政策的出台起了鸣锣开道的作用。

1947年3月6日，杜鲁门在贝勒大学发表演说，宣称“我们是经济世界的巨人，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未来的（国际）经济关系格局将取决于我们”。

杜鲁门的贝勒演说是“冷战”政策出台的信号。

六天后（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的咨文中，一方面宣称“希腊受到共产党领导的几千名武装人员恐怖主义的威胁”“对土耳其的影响将是直接的严重的”……“很可能扩及整个中东地区”；另一方面，杜鲁门宣称世界已分成两个敌对营垒，“极权主义”“危害着美国的安全”，要立即采取果断的行动作为“美国对共产主义暴君扩张浪潮的回答”。因此，他请求国会在1948年4月30日以前，向希腊、土耳其提供4亿美元的援助，采取一切经济和军事手段控制希、土。这篇咨文被称为杜鲁门主义，它的公诸于世标志着美国“冷战”政策的确定。从此，美苏“冷战”年代开始了。

继杜鲁门主义之后，6月5日美国又抛出以“援助”欧洲复兴为名，行控制欧洲为实的“马歇尔计划”。“马歇尔计划”的实施促使美苏“冷战”关系进一步发展。

面对美国杜鲁门政府的“冷战”政策，苏联被迫作出反映。为抵销杜鲁门主义的影响，于9月22日—27日在波兰成立了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苏、波、罗、南、捷、保、匈、法、意等国），发表了《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第一次公开提出有两个阵营的存在：一个是帝国主义阵营，一个是反帝国主义阵营。这样，以杜鲁门主义和共产党情报局宣言两大政治文件的公开发表为标志，形成了战后初期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对抗的政治格局。

美苏冷战表现在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经济方面，由于苏联和东欧国家拒绝参加“马歇尔计划”，美国就迫使受援国对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实行经济封锁。苏联和东欧国家为加强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合作，打破帝国主义经济封锁和歧视政策，于1949年1月5日至8日，由苏、波、匈、罗、捷、保等国在莫斯科举行会议，成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阿尔巴尼亚（1949年2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50年9月）也先后加入。经互会的成立大大加强了东欧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合作。

在军事上，美国为实现对西欧的全面控制，便策划建立以美为主导的军事政治集团。美国于1949年4月4日，与英、法、加拿大等12国签订了《北大西洋公约》，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55年5月5日《巴黎协定》正式生效后，联邦德国加入北约，联邦德国正式建立军队。至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军事政治集团最终形成了。

面对这一局面，以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为保障欧洲的和平与安全，于1955年5月14日，由苏、波、罗、保、匈、捷、阿尔巴尼亚和民主德国八国缔结了《华沙条约》，成立了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相抗衡的军事政治集团——华沙条约组织。

（赵菊玲）

### 3. 杜鲁门时期的美国内政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对美国国内政治生活的重大影响，使战后初期的美国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政治民主和自由权利的斗争高涨起来；美国工人阶级为提高工资，改善福利待遇掀起了大规模群众性罢工运动；黑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广泛展开。国内政治斗争十分激烈。

杜鲁门政府出于对战后出现的民主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恐惧，在国际上推行“遏制共产主义扩张”战略的同时，对内推行反共反民主政策，通过反劳工立法，镇压工人运动；以“联邦忠诚法”、“麦卡伦法”对美国共产党和进步人士进行政治迫害，反映了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但是，杜鲁门的国内政策又有两面性。在经济危机和强大的工人运动、黑人运动的打击下，1948年杜鲁门连任总统之后，提出“公平施政”纲领，采取了一些改良措施。

杜鲁门政府为镇压工人运动，在1947年6月由国会通过“塔夫脱——哈特莱法案”（1947年劳资关系法），这一法案于同年6月23日生效。该法取消了华格纳法案（1935年），所赋予的工人可以组织工会、集体谈判和签订合同等权利，限制工人参加工会的权利，禁止全国性同业工人集体谈判；工会须置于政府控制之下，禁止工会中容纳共产党员，禁止将工会会费用于政治目的；劳资发生纠纷时，规定有60天“冷却期”静候政府调查，禁止举行同情罢工。法院有权宣布罢工禁令，企业主有权对工会提出诉讼，要求因“非法”罢工而赔偿造成的损失。这一法案的目的在于进一步限制工人的权力，扩大企业主权力，分化工人的团结，阻止和镇压罢工运动。

1947年3月21日，杜鲁门颁布“联邦忠诚法令”。法令规定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和各地成立特别委员会，对190万公务人员是否对美国政府忠诚进行调查；规定政府机关中所有职员、高等学校教师和学术机关的研究员必须宣誓“效忠政府”，如被发现“不忠诚”者，即强迫辞职。该法在实施的5年里，联邦调查局审查了400万左右的政府雇员和政府工作人员，对1万人进行了全面调查，对9,077人提出初步控告，其中2,961人由地方忠诚委员会传讯，378人被解职。1947年11月在巴尔的摩和华盛顿大批逮捕共产党员，1948年6月又逮捕了美共12名领导人，1949年10月法院对其中的10名以“阴谋煽动暴力推翻美国政府”的罪名，判处罚款和监禁。进步作家史沫特莱被诬陷为“苏联间谍”，被迫迁居伦敦。

杜鲁门政府实施“联邦忠诚法”的目的为在国内制造反共气氛，打击民主进步力量，具有明显的反民主性质，为极端反动的麦卡锡主义的泛滥准备了条件。

1950年9月23日，杜鲁门政府颁布“1950年国内安全法”即麦卡伦法。该法强迫共产主义组织向司法部登记，并提供其成员名单和财务报告；禁止共产党员在政府机关任职，不准在工会和国防企业中工作，不准领取出国护照；违者判处5年以下徒刑或罚款1万美元。该法还规定，在紧急情况下，

司法部长有权拘禁“可疑分子”，授权总统在“非常时期”可将“共产主义组织”成员无限期地关进集中营。

杜鲁门政府制定的“麦卡伦法”目的在于对共产党实行高压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使美国共产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1945年9月6日杜鲁门向国会提出第一个包括内政立法21点的咨文，作为他“公平施政”的基础。这项咨文的内容是尽快取消战时订货合同；为制止通货膨胀，冻结物价和房租；维持工资现有水平；充分就业和支持农产品价格；扩大自然资源的开发；公平雇用工人，失业补助由联邦政府负责管理等等。但这些规划由于两党分歧，除采取复员军队的一些措施外，均未能讨论。

1946年2月20日，通过了公平施政的第一项重要立法《就业法》。法案规定：联邦政府必须负责促进最大限度的就业，同时授权美国政府制订出旨在防止经济衰退，保持最大限度就业的财政和金融政策，并成立经济顾问委员会，向国会提交年度经济报告。《就业法》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保证人民充分就业的立法，具有进步意义。

在黑人运动的强大压力下，杜鲁门不得不对种族歧视有所限制。1946年12月任命一个由黑人教育工作者、牧师等组成的民族委员会，会同司法部门设立的民权司，制订反对私刑和反人头税的法律，设立常设公平就业实施委员会，支持黑人扩大就业与争取选票的公民权力。1948年7月杜鲁门颁布两个行政命令，要求在联邦各部门和武装部队中废除种族隔离。1949年还任命了第一个黑人为维尔京群岛总督和第一个黑人联邦法官。但杜鲁门的民权纲领没有通过任何法案。

1948年总统大选时，杜鲁门提出的包括一系列社会改革的竞选纲领，才形成了较完整的“公平施政”纲领。1949年1月5日杜鲁门总统发表就职演说中第一次明确称其国内方针为“公平施政”。

自1949年至1952年杜鲁门政府先后通过一些法案。1949年的《全国住房法》规定要在今后6年中改造81万套费用低廉的住房，其中还规定要为清除贫民窟和建造农村住房提供贷款与补助金。同年，国会修订了“公平劳动标准法”（1938年）把每小时最低工资提高到75美分。1950年扩大“社会保险法”（1935年），使保险总人数增加1,000万，养老金增加75%以上。1952年该法又将养老金再增加12.5%。1950年的“战时流民法”把难民限额提高到41.5万人。

杜鲁门的公平施政并未提出创新的国内措施，但维护了新政的社会立法并在某些方面有所发展。其理论基础仍是凯恩斯主义，它企图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扩大社会福利，扩大社会消费需求，达到“充分就业”和消除经济危机，实质上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在新的国际条件和国内工人斗争、民主运动的强大压力下，采取的缓和阶级矛盾，阻止社会革命，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政策。

(赵菊玲)

#### 4. 战后初期的西欧与马歇尔计划

战后的西欧，由于战争的破坏，满目疮痍，工业凋敝，农田荒芜，几乎所有的运输线陷于紊乱，许多城市成为一堆瓦砾。战争期间，西欧国家黄金外汇储备已经枯竭，战后各国经济恢复面临着重重困难。加之 1946 年底又突然遇上了百年罕见的严寒，燃料和粮食严重匮乏。1947 年 1 月 13 日，英国政府决定把煤的配给量削减一半。政府发表的白皮书公开承认不列颠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这场严寒的袭击使法国损失了约 130 万公顷的小麦。德国的生产水平，1947 年 1 月仅为 1936 年的 31%，2 月再降为 29%。西占区物价飞涨，黑市猖獗，货币发行额已达天文数字。

西欧各国严重的经济困难，使人民群众对现政府的不满和反抗情绪有增无减。经济上的绝望情绪把各阶层人民推向左倾。1947 年 4 月，法国雷诺汽车厂工人首先掀起罢工运动，随后在 5、6 月间又发展为遍及各行各业的全国性罢工浪潮。英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的工人运动也风起云涌。与此同时，因参加抵抗运动斗争胜利而意气风发的共产党，第一次作为一支重要力量出现在西欧政治舞台上。西欧各国政府既无力摆脱因战争而带来的经济困境，在政治上也动荡不安，资产阶级感到难于维持统治。

正当西欧呈现一派残破衰败的景象，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时，在战争中大发横财的美国，已达到它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经济军事实力的顶点。美国统治集团清楚地知道，世界经济是相互依靠的，在现代，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长期指望不增加对外贸易而保持经济繁荣。美国需要扩大贸易，保持繁荣，而美国的传统市场西欧却是“瓦砾一堆”、穷如乞丐，美国无法与之做买卖。因此，杜鲁门政府需要通过对外“援助”来恢复西欧各国的生产能力和贸易能力，防止 30 年代经济萧条的重演。同时，只有以美“援”作为工具，给困顿不堪的西欧经济“输血”，才能维持西欧各国资本主义的统治，遏制共产主义势力的增长，防止西欧发生不利于美国的变化。也只有以“美援”为手段，才能加强对西欧的控制和奴役，把它纳入美国全球的战略轨道。

美国国务卿马歇尔于 1947 年 4 月 29 日指示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任凯南，火速进行美国援助欧洲的研究工作，并尽快提出报告。凯南建议欧洲接受“美援”不应采取美国主动赐予的方式，而应采取请君入瓮的策略，即在美国示意下，由欧洲各国共同向美国提出求援报告。他还建议把欧洲作为一个整体来“援助”。马歇尔于 5 月 28 日召开了国务院会议，讨论了“援欧”计划的宗旨与具体作法，决定了马歇尔“援欧”演说的基调。

1947 年 6 月 5 日，马歇尔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大会上向八千多听众发表演说，概述了美国“援欧”计划的总方针。他说，由于欧洲的经济困难，它



所需要的进口量远远超过它的支付能力，如果没有大量额外援助，它们就会“面临性质非常严重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的变化”。因此，美国应该尽力帮助世界恢复正常的经济状态，“恢复世界上行之有效的经济制度，从而使自由制度赖以存在的政治和社会条件能够出现”。他提出，美国的援助决不能放在零星付给的基础上。为了使美国的援助能够收到应有的效果，欧洲必须首先提出倡议，然后美国在可能的范围内，对于这项欧洲计划（它必须是联合性质的）“给予友好的协助”。这项援欧计划被人们称为“马歇尔计划”。

“马歇尔计划”迎合了西欧统治阶级通过美国的援助重振实力，稳定政局的心愿，受到他们的欢迎。英国外交大臣贝文称马歇尔的演说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演说之一”。法国外长皮杜尔也频频表示对马歇尔建议的热心。6月17日，贝文和皮杜尔在巴黎举行会谈，决定邀请苏联商讨欧洲响应马歇尔建议的预备会。6月22日，苏联表示接受邀请。6月27日，英、法、苏三国外长会议在巴黎举行。会上英法主张先由各大国代表组成一个指导委员会，在欧洲各国提出各自国内资源报告的基础上，拟就欧洲国家统一的经济“复兴”计划大纲，然后再由美国讲清援助的方式和条件。而莫洛托夫认为，制定欧洲统一的经济计划，会要求各国泄露本国的经济情报，从而造成“某些国家干涉另一些国家的内部事务”。由于英法坚持自己的立场，莫洛托夫退席，会议破裂。苏联退出会议正是英、法、美三国所期望的。7月3日，贝文和皮杜尔通过公报邀请除西班牙、德国以外的所有欧洲国家派代表参加在巴黎举行的经济专家会议。

7月12日，16个欧洲国家，即奥地利、比利时、丹麦、法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挪威、冰岛、葡萄牙、瑞典、瑞士、土耳其和英国在巴黎举行欧洲经济会议，讨论向美国申请援助的报告。德国西占区虽然没有正式参加，但它的需要仍在会议考虑范围之内。苏联和东欧国家以及芬兰均未派代表出席。会议自始至终都是在美国的控制下进行的。依照美国的旨意，会议成立了一个常设联合机构——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9月22日，参加会议的16国代表签署了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的总报告。报告在对美国的慷慨解囊表示一番阿谀之后，规定了“欧洲复兴计划”的四项原则：（一）各参加国努力发展生产；（二）建立和维持国内的财政稳定；（三）在参加国之间发展经济合作；（四）采取措施解决“马歇尔计划”参加国与美洲大陆之间来往的赤字。报告向美国提出了在四年内提供224亿美元援助的要求。

正当西欧各国根据“马歇尔计划”讨论向美国提出申请援助的报告时，杜鲁门政府也在紧张地活动。6月22日成立了一个隶属于总统的对外援助委员会，它具体负责研究对外援助的原则和政策。该委员会由20人组成，由当时的商务部长哈里曼任主席，故又称“哈里曼委员会”。11月7日，“哈里曼委员会”发表了“欧洲复兴和美国援助”的报告。报告认为，美国对欧洲的援助不仅有经济上的利益，而且具有“战略上和政治上的利益”。报告

提出了“援欧”的四项原则：帮助欧洲国家恢复预算平衡；鼓励私人资本向欧洲投资；对欧援助的主要方式应是贷款而不是赠予；必须保证美国经济稳定。这些原则明显地道出了美国垄断资本控制欧洲的意图。

经过谋士们的精心策划，杜鲁门于1947年12月19日向国会提出了《美国支持欧洲复兴计划》的咨文，要求国会同意在1948—1952年间共拨款170亿美元。经过一番辩论，美国国会于1948年4月2日通过了《1948年对外援助法》。次日经杜鲁门签署，“马歇尔计划”正式开始执行。

对外援助法指出，由于美国国内各州间没有贸易壁垒，规模巨大的国内市场使美国经济飞跃发展起来。欧洲各国间也应象美国各州间那样消除贸易壁垒。法案明文警告说，在任何情况下，美国继续提供援助均取决于参加本计划的国家的继续合作。这就是说，欧洲各国应对美国的经济扩张敞开大门，否则美国将取消其援助。

根据该法规定，设立了隶属于总统的经济合作署，负责监督“马歇尔计划”的执行。杜鲁门任命保尔·霍夫曼为署长。另外还向欧洲派遣代表一人，由哈里曼担任。经济合作署的成立乃是美国方面通过“美援”控制西欧的组织保证。

该法案批准头15个月拨款53亿美元，以后逐年审批援助额。具体援助方法是：美国政府通过财政预算将援助款项拨给经济合作署，由该署向美国企业采购西欧“复兴”所需要的物资。这些物资交给受援国时，美国政府把包括运费在内的所有花费单独立帐，受援国拿到这些物资后把销货所得也单独立帐，双方各自持有的这两本帐即称为“对等基金”。经济合作署同意后，受援国可以使用该基金的95%，其余5%由美国支配，用于购买美国所需物资。

“马歇尔计划”从1948年4月执行到1951年12月，后被《共同安全计划》所取代。实施“马歇尔计划”的结果，从1948年4月至1952年6月，美国国会为“援欧”拨款131亿5千万美元。

无疑，“马歇尔计划”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欧的复兴。从1947年到1950年底，马歇尔计划所有受援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25%，工业生产增长64%，农业生产增长24%。

执行“马歇尔计划”获利最多的当然是美国。由于马歇尔援助向西欧更多地提供信贷而不是现金，所需货物全部来自美国，所以它带来美国历史上和平时代最大的经济繁荣。由于根据“马歇尔计划”，各受援国要“提供它们经济情况的统计数字，允许美国对它们的内部预算作某种程度的控制”，经济合作署署长可以决定美援的分配和使用情况，有权停止对某国的援助，所以它使美国暂时控制了西欧经济、政治的发展。此外，经济合作署通过与受援国签订双边和多边协定，削弱了西欧国家的关税壁垒，取消了大部分贸易限额，打开了西欧市场的大门。例如：在美国的压力下，欧洲经济合作组织于1949年11月20日宣布取消50%的贸易进口数量限制，次年1月31日，

又宣布取消 60% 的进口数量限制，并考虑到 1950 年底取消 75% 的进口限额。美国还趁机迫使西欧国家及其殖民地，以对待本国居民的同等条件，向美国投资者开放。上述情况严重地侵犯了西欧各国的经济利益和主权。“马歇尔计划”的主要执行人保尔·霍夫曼在解释这个计划时直言不讳地承认“这完全不是援助，这是冒险，是创业。我们不应该说是对外国政府的援助，而应该说是在‘全世界的投资’”。当时的西欧国家，由于战争破坏，国力衰弱，不得不在经济上依靠美国，听任美国的摆布。

(王祥玉)

## 5.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

为了把西欧国家纳入遏制苏联的战略体系，美国政府在讨论“马歇尔计划”的同时，也着手策划建立欧洲军事同盟组织。美国的这种活动是从幕后导演“布鲁塞尔条约”开始的。当时英国企图在西欧组成一个军事同盟，但元气大伤的英国，事事仰赖美国的鼻息。于是，外交大臣贝文于 1948 年 1 月 13 日将这一打算禀报美国。杜鲁门政府了解英国想当西欧盟主又力不从心的处境，认清这是美国在军事上插手欧洲的良机，可以利用英国在欧洲的传统影响，支持英国把西欧组织起来，然后把它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于是，对贝文的打算深表赞许。贝文在征得美国的同意后，正式提出西欧盟盟的建议。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四国对贝文的建议表示响应。1948 年 3 月 5 日，五国代表在布鲁塞尔举行缔约谈判。3 月 17 日签署了“布鲁塞尔条约”，并建立了“布鲁塞尔条约组织”。

“布鲁塞尔条约组织”建立后，贝文多次请求美国在欧洲防务上承担义务。这种要求虽然正合杜鲁门之意，但他不敢违背美国和平时期的传统外交政策，不敢绕开国会直接介入欧洲事务，与西欧国家结盟。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积极争取国会的合作。

杜鲁门政府努力的结果就是副国务卿罗维特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老资格的孤立主义者范登堡一起，拟定了一个国会政策宣言。该宣言于 1948 年 6 月 11 日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即参议院第 239 号决议案，亦称“范登堡决议案”。决议赞成美国“在经常的和有效的自助和互援的基础上”缔结区域性协定。这就为美国建立北大西洋联盟敞开了大门。

7 月 2 日，杜鲁门发表政策声明，声称“范登堡决议”应尽可能地加以执行。7 月 6 日，美国和加拿大同布鲁塞尔条约五国在华盛顿开始会谈。9 月 9 日，与会代表制定出“华盛顿文件”。文件对即将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性质、范围、缔约国承担的义务，及其与欧洲其它组织的关系等，作了详尽的规定。文件侈谈苏联对西欧地区安全的威胁，声称这种威胁也波及北美，建议拟议中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应将丹麦、挪威、冰岛、葡萄牙和爱

尔兰等国包括在内，并认为意大利、西班牙、联邦德国最终也应加入该组织。“华盛顿文件”为大西洋联盟奠定了组织基础。

1949年4月4日，美、加、英、法、比、荷、卢、丹、挪、冰、葡、意十二国外长在华盛顿正式签署了《北大西洋公约》。公约共十四条，主要内容为：各缔约国应“维持并发展其单独及集体抵抗武装攻击之能力”；“对于欧洲或北美之一个或数个缔约国之武装攻击，应视为对缔约国全体之攻击”，在这种情况下，缔约国“应单独并会同其他缔约国采取视为必要之行动，包括武力之使用”。8月24日，各缔约国均按照公约第十一条规定，按照本国宪法程序完成批准手续。至此，《北大西洋公约》正式生效。

“北约”生效后，筹建“北约”机构的工作基本上由美、英、法三国包办。“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设有下述主要机构。

(1) 北大西洋理事会：北约最高权力机构，由各成员国外交部长组成，必要时由国防部长和财政部长参加，每年至少开会一次。

(2) 防务委员会：由缔约国防务部长组成，负责制定统一的防务计划。

(3) 防务委员会下设各国参谋长组成的军事委员会，负责向美、英、法三国代表组成的常设小组提供政策指导。

(4) 美、英、法三国代表在军事委员会内组成常设小组。

在部长理事会和防务委员会休会期间，由成员国各派一名代表组成常设代表委员会，处理日常事务。“北约”组织还设有国际秘书处，由秘书长领导，他同时也是部长理事会、防务委员会的主席。“北约”总部原设在伦敦，1951年迁到巴黎，1967年又迁至布鲁塞尔。

“北约”组织在军事委员会下逐步建立了统一的军事指挥系统，设有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大西洋盟军最高司令部、海峡盟军总司令部和加拿大——美国区域计划委员会。其中，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为最大的军事指挥机构，下设中欧、北欧、南欧和地中海四个盟军司令部。

1949年12月，“北约”防务委员会巴黎会议接受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特利的计划。根据该计划，美国和西欧大大加强了在欧洲的军事力量。1951年美国在西欧驻军两个师的基础上又增派去四个师，并委任艾森豪威尔为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到1956年12月，“北约”在欧洲的军事力量从1949年的十几个非满员师增加到35个师，3000架飞机，700艘舰艇。1953年美国利用其核优势，为“北约”制定了大规模报复战略，以全面核战争威胁苏联。1954年“北约”就着手按大规模报复战略制定作战计划，并多次举行以使用原子武器为主题的军事演习。

“北约”名义上是北大西洋国家的条约组织，但出于在欧洲南翼包围苏联的需要，1952年2月，美国把不是北大西洋国家的希腊和土耳其拉入“北约”组织。美国还不顾欧洲人民对德国法西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暴行记忆犹新，一意孤行地策划吸收联邦德国加入北约，终于使它于1955年5月成为北约成员国。

美国控制着“北约”“一体化”军事机构。“北约”欧洲盟军司令部的指挥人员中,美国军官占47%,最高司令全部由美国人担任。美国还通过“北约”向盟国发号施令,干预盟国防务计划的制定,有权要求盟国按其意图扩充军备、决定兵役期限、武装力量的发展和军工生产等等。

在“北约”内部,美国与其盟国的关系是主从关系。当时西欧国家在经济和军事上都依赖美国,只得屈从美国的压力,把自己拴在美国的战车上。

(王祥玉)

## 6. 联邦德国成为主权国家

在德意志土地上出现两个德国是在“冷战”格局下出现的现象。

1949年5月联邦德国成立,9月21日,由美、英、法三国制订的对德《占领法规》亦即生效。根据《占领法规》,美、英、法三国保持在联邦德国的最高权利,包括管制联邦德国的外交、国防、外汇及外贸的权力;监督联邦和各州行使立法、行政、司法的权力;对联邦和各州发布命令和否决其立法、行政决定的直接行动权力等,由三国政府的代表组成“盟国高级专员公署”来行使这种权力。占领军仍留驻在联邦德国。这就使联邦德国的主权受到极大的限制。

50年代初,联邦德国的经济已得到恢复,加之“欧洲煤钢联营”等西欧经济一体化的进展,使联邦德国要求恢复行使其主权、增强其国际地位和作用的愿望日益强烈。同时,美国从其全球战略出发,竭力主张尽快使联邦德国恢复主权和重新武装,并将它拉入“北约”,这样既可增强“北约”实力,又可在“北约”内使它牵制其它成员国,特别是法国。美国的政策主张为联邦德国争取恢复主权的努力提供了外部条件。1951年3月,美、英、法修改对联邦德国的《占领法规》,准许联邦德国政府建立“联邦外交部”,由阿登纳兼任外交部长,并允许它与其它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同时放松了对它的经济控制,取消对钢产量的限制。1952年5月26日,美、英、法三国又与联邦德国在波恩签订《一般性条约》(又称“波恩条约”),规定给联邦德国恢复主权,但三国军队继续留驻联邦德国。由于翌日在巴黎签订、旨在重新武装联邦德国并将它纳入大西洋防务体系的《欧洲防务集团条约》,于1954年8月被法国否决,(因上述两条约必须同时生效)联邦德国恢复主权的努力遇到了挫折。为此,美国曾多次要挟法国。在美国的积极策动和高压下,最后在1954年9月底至10月初的伦敦外长会议上,各方达成妥协;接着又在10月21日到23日的巴黎外长会议上签订了一系列文件,两个会议达成的协议通称为《伦敦——巴黎协定》。其主要内容包括:美、英、法承认联邦德国政府,恢复它的主权,但仍在联邦德国驻军;联邦德国得以重新武装并加入“北约”,同时对它的军备水平作出限制;扩大联邦德国和意大利为

布鲁塞尔条约成员，并将布鲁塞尔条约组织改建为“西欧联盟”，其宗旨由“防止德国侵略复活”改为“促进欧洲的团结并鼓励其逐步统一”，其主要职能，即联合防务问题转由“北约”处理。1955年5月5日，《伦敦——巴黎协定》全部生效。从此联邦德国获得独立的主权国家的地位。

联邦德国虽已成为主权国家，但它并未放弃企图在联邦德国的基础上来统一德国的目标。在它正式成立之前所制定的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根本大法叫做“基本法”，而不称“宪法”，就为今后重新统一德国留下了余地。

按基本法规定，联邦德国是一个联邦制共和国，其外交、国防、货币、海关、铁路、航空、邮电等属联邦政府管辖，经济、环境保护、核能的生产 and 利用、住宅建设等由联邦和州共同管理，各州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其权力远比中央集权制国家各省的权力大得多。从1949年联邦德国成立起就由保守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它与基督教社会联盟通称为“联盟党”）长期执政，其主席康拉德·阿登纳亦担任联邦总理，直到1963年10月才下台。

康拉德·阿登纳在二次大战前就长期担任科隆市长并兼任普鲁士议会议长。希特勒统治时期被停止全部政治职务，并曾被关进集中营。战后复任科隆市长，并参加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建党工作。按基本法规定，联邦总理享有广泛的权力，加之他长期任职，一手把持党政大权，建立了显赫的个人地位，“联盟党”也曾被称为“阿登纳的党”。他作为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在执政期间，采取了坚决反共、同时也打击和限制极右反动势力的政策。德国共产党被禁止活动，也取缔了变种的法西斯政党“社会帝国党”。在经济上，联邦德国在五十年代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7.5%，在资本主义世界仅次于日本，居第二位。从1952年起外贸连年顺差。联邦德国经济的迅速崛起，除了加强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剥削和美国的扶植等因素之外，与联邦政府信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及它执行相应的政策措施紧密相关。政府和垄断资本紧密结合，通过国家制定法律，保护竞争，同时国家又用税收、投资、财政、信贷、收入分配等方面的政策措施甚至直接参与企业活动，进行干预，从而保障和促进了垄断资本的迅速恢复和扩展。

在50年代中期以前，阿登纳的联盟党政府的对外政策，基本上是对美国一边倒，谋求在美国扶植下恢复联邦德国的国际地位。50年代中期以平等资格参加了西欧联盟和“北约”组织，其后逐渐表现出独立倾向，强调欧洲的作用。它主张欧洲联合和德法和解，参与了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创立。

（王持明）

## 7. 被占领下的日本

日本投降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盟国和遭受日本侵略战争灾害的亚洲

人民及日本人民，都强烈要求实施《波茨坦公告》等国际协议，永远铲除日本军国主义，使日本成为一个和平、民主的国家。日本各界人民在战后初期，纷纷举行示威、游行、集会、罢工、罢课，要求实现“政治民主化”，废除军国主义制度。

美国派出 15 万军队占领了全部日本国土。1945 年 9 月 22 日发表《占领初期美国对日本政策基本原则》，宣称：“美国对日本的最终目的是：（一）保证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不再成为世界安全与和平的威胁。（二）最终建立一个和平与负责的政府，此政府应尊重其他国家的权利，并应支持联合国宪章的理想与原则中所显示的目标”。美国的目的在于削弱和控制日本，使日本政府“支持美国的目标”，为它的政策效劳。为此，美国控制了“同盟国占领军”的指挥权，任命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为盟军总司令，成立“盟军”总部，并由美国人担任总部的所有重要官员，使盟军总部成为美国控制日本的“太上皇政府”。

在国际反法西斯运动的影响下，在盟国国际协议的牵制下，以及在日本和亚洲人民的强烈要求下，美国为了打击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扫除美国独霸亚洲的障碍，在战后初期发布一系列命令，推行了日本的“民主改革”。例如：“盟军”总部命令 1945 年 8 月 16 日成立的皇族东久迩稔彦内阁解散日本全部军队；1945 年 10 月 11 日又指示 10 月 5 日新上台的币原内阁，立即执行“五大改革”，即：（一）妇女的解放与参政；（二）奖励工会的建立；（三）教育的民主化；（四）废除秘密审讯的司法制度；（五）经济机构的民主化。与此同时，币原内阁还执行了释放包括日共领袖德田球一等在内的全部政治犯，撤销法西斯法令“治安维持法”、“治安警察法”，解散特高警察机构等措施。1946 年元旦，美国占领军当局促使日本天皇发表《否定神格宣言》。1946 年 1 月，“盟军”总部发布两项政治整肃令，规定取缔所有军国主义、国家主义政党和社会团体（至 1951 年 12 月，被解除的国家主义团体为 233 个），解除上述政党、社团领导人和职业军官的公职（至 1948 年 5 月，有 21 万余人被解职）。1946 年 6 月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审讯主要战犯，并于 1948 年 11 月 12 日判处东条英机等 7 人绞刑、木户幸一等 16 人无期徒刑、东乡茂德与重光葵分别为有期徒刑 20 年及 7 年。

“盟军”总部还在日本推行了“宪法民主化”、“农地改革”、“解散旧财阀”等较重大的政治经济改革。日本投降后，日本许多政党和社会人士主张修改 1889 年的《帝国宪法》，实行民主共和制，废除天皇制。1945 年 10 月，美国占领当局暗示币原喜重郎，必须修改宪法。币原政府设立以国务相松本蒸治为首的宪法问题调查委员会，1946 年 1 月提出所谓“松本方案”，企图继续保留“天皇主权”原则及日本拥有军队等权利，2 月 8 日向占领军当局提交后被否决。2 月 13 日占领军当局将美军人员起草的《总司令部方案》下达日本政府，令其据此制订新宪法草案。美国的目的是，为防止盟国远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1946 年 3 月 7 日）的干预，必须抢先把日本宪法特别是

关于保留天皇制的问题决定下来。于是，3月6日公布了新宪法草案，经日本国会两院通过后于11月3日公布，1947年5月3日起施行。新宪法改战前的天皇集权制为议会内阁制，国民的民主权利在条文上有所增加，在第九条特别规定了日本将“放弃战争”权。新宪法比战前的《帝国宪法》有原则上的改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胜国和日本人民对日本民主化的要求。

在盟国和日本农民强烈要求铲除封建地主制度的形势下，美国占领当局从1946年10月至1950年7月，实行了日本的“农地改革”。规定不在乡地主的全部土地及在乡地主超过一町步（约14.88市亩）以上的出租地，由政府收买并转售给佃农；自耕及佃耕地总共不得超过三町步；将实物地租改为货币地租；地租额不得超过农产品收获总值的20%。结果在560多万农户中，约400万户农民承购了土地，使约150万户的地主卖掉了土地。使得在改革前占耕地总面积46%的佃耕地下降到10%以下，导致了大部分农民变成了自耕农，而佃耕农则几乎绝迹，从而基本上消灭了封建地主制。日本农村开始了以自耕农为主的新的土地所有制时期，为战后日本工业的迅速发展开拓了重要的国内市场及劳动力来源。

战后初期，解散财阀也是盟国和日本人民的共同要求。日本旧财阀是军国主义的社会经济基础，其主要特点是封建性和排外性。美国占领当局实行“解散财阀”的目的，是对日本垄断资本进行一次改组，“重新安排”日本经济，以便控制日本经济。为此，1945年12月2日，盟军发布冻结15个大财阀资产的指令；1946年4月成立“持股公司整理委员会”；1947年4月公布“禁止私人垄断和确保公正交易法”；1947年12月制定了“排除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法”。通过上述措施，解散了三井、住友、安田、三菱四大财阀和其他一些财阀企业及持股公司共四十二家，解除了财阀家族成员公职并限制其经济活动。在原指定改组的财阀公司325家当中，实际改组的仅11家。从1948年开始，美国逐步放松了对日本垄断资本的限制，并进行了大力扶植。尽管如此，“解散财阀”铲除了日本财阀的封建统治形式，取消了财阀家族会议，代之以董事会，实现了经营的现代化。

1947年随着远东和国际形式的变化，美国越来越重视利用日本为其亚洲战略服务。美国陆军部长罗亚尔在1948年1月于旧金山发表演说，提出“日本必须成为远东兵工厂”。自此美国从削弱日本的政策改为扶植政策。1948年12月18日，美国提出“稳定日本经济九原则”，派道奇协助日本稳定了经济。1950年4月日本派大藏相池田赴美，6月美国派杜勒斯访日，开始了对日单独媾和活动。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通过“特需”定货，刺激了日本经济的恢复。美国以加强日本的“自卫”为由，驻日美军总司令于1950年7月8日指令日本政府建立了“警察预备队”，此后于1952年改称“保安队”，1954年7月又更名为“自卫队”。1951年9月4日至8日，美国在旧金山召开对日媾和会议，签订了片面的“旧金山和约”。同一天美日又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之后并签订“日美行政协定”。1952年



4月28日，上述条约及协定同时生效。从此，盟国对日本的全面占领结束，盟国占领机构取消，日本被缔约国承认为独立国家。美国军队继续驻在日本，对日本保持着半占领地位。日本的政局进入了“安保体制”时期。这一体制维持到1960年1月19日“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即新“日美安全条约”的签订。

在“安保体制”下，日本的政局及经济都有了新的发展。旧金山对日和约签订后，日本各阶层人民掀起要求全面媾和、反对片面“和约”、反对美军基地、反对侵略朝鲜、反对重新武装日本的群众运动。日本社会党因内部对“和约”问题发生分歧，1952年8月正式分裂为左右两派社会党，后又在群众运动推动下，于1955年1月统一起来。面对社会党的统一，日本垄断资产阶级的两大政党自由党及民主党，于1955年11月合并为自由民主党，从而开始了自民党的长期执政时期。为了“重新回到国际社会”，日苏两国政府于1956年10月19日签订“联合宣言”，宣布了日苏关系正常化，同年12月日本加入了联合国。

战后日本经济，从1945年至1955年，经历了“经济重建期”，1953年国民生产总值恢复到了1939年的“战前”最高水平。自1955年至1965年，进入了“高度成长期”，十年中每年的经济平均增长率为10%。至1960年，日本国民收入人均达417美元，居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第28位。经济的恢复和初步增长，为战后第三时期（1965年至1970年的“再高度成长期”）和第四时期（1971年以后）的经济增长打下了基础。

（侯振彤）

## 8. 艾森豪威尔时期的美国

1952年11月5日，艾森豪威尔以共和党候选人的身份，当选美国总统，翌年1月20日就任。尼克松任副总统。1956年艾森豪威尔再次当选连任，直至1961年。

艾森豪威尔执政后，继续进行杜鲁门政府搞的“忠诚调查”，并扩大到“调查”与“国家安全利益不适合”的人员。在“忠诚调查”的逆流中，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操纵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罗列黑名单，迫害民主和进步力量，形成当时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1950年麦卡锡为竞选连任，危言耸听地说什么美国政府的要害部门“渗入了”数百名共产党人，他的攻击得到了美国极右势力的支持。一时在美国掀起一股造谣诬告的逆流，弄得人人自危。这股政治潮流在艾森豪威尔执政的头两年里猖獗到了极点。

1953年麦卡锡把攻击矛头从一般的知名人士、国会议员转向艾森豪威尔

政府。这一年麦卡锡及其追随者先后对“美国之音”、美国政府驻欧洲的外交官和美国陆军进行了所谓的调查。1953年2月，麦卡锡根据告密者提供的材料，声称“美国之音”的反共宣传已被冲淡，该机构的工作人员全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他便派了两名年龄都是26岁的助手对上述人员开始调查。然而，这些莫须有的指控根据是荒唐可笑的，其中没有什么证据证明“美国之音”里有共产党，但却在“美国之音”引起了一片混乱，其领导人和数十名雇员被迫辞职，全世界听众为之震惊。

过了两个月，还是那两个年轻人，对美国驻西欧国家的外交官又开始了“调查”。在短短的18天调查中，他们到了许多国家，每个地方停留时间不足一天，仅仅靠听汇报和向告密者了解情况，并检查美国驻外机关图书馆的书籍，便得出了“图书馆有三万多种图书是共产党人或同情者所写”的结论，一时搞得人心惶惶。在这种压力下许多人辞职，许多地方发生了焚书事件。

同年8月份，麦卡锡及其追随者又对陆军进行调查，他们声称陆军内部有共产主义分子，并说共产党人盗窃了秘密文件，他们的指控引起军方的愤怒，并予以反驳。

此外，麦卡锡还攻击反对他的报纸和教会，并攻击艾森豪威尔政府，插手外交事务，这一切引起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不满。

1954年6月，参议院就陆军和麦卡锡互相指责的问题举行听证会。在历时一个多月的公开辩论中，美国人民逐渐认识到麦卡锡的卑鄙伎俩和迫害狂的真实面目。支持他的人急剧减少，麦卡锡也被迫停止了调查。当年12月，参议院以压倒多数通过谴责麦卡锡的决议案。从此，麦卡锡主义声名狼藉，很快在美国政治生活中销声匿迹。麦卡锡也成了投机和造谣诽谤的代名词。

面对民主党人执政末期存在的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艾森豪威尔执政后试图采用新的社会经济政策，通过削减某些政府开支以平衡预算；主张分散权力，把一些企业和公共工程交给地方或私人资本举办，但在必要时还要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赤字财政，由政府举办公共工程和社会福利设施。实际上，这种政策是企图在“新政”式的国家干预和传统的自由放任主义之间走一条中间道路，被称为“自由保守主义”或“新共和主义”。然而，它的实行并没有解决美国的社会经济问题。到艾森豪威尔执政后期，也就是50年代末期，美国的经济危机加剧。1957—1958年爆发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1960年又爆发了另一次经济危机，并发生了战后的第一次美元危机。预算平衡的目标也没有达到。在他执政的8年中，有5个年头是赤字财政年，累计赤字达200多亿美元，在社会福利方面也没有太多的作为。事实证明，“新共和主义”的实行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美国黑人运动开始高涨，政府也在反种族隔离方面做了些事情。50年代，美国经济开始高速发展，科学技术也处于领先的地位。但与此同时，美国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紧密结合起来，与军事工业有关

的垄断组织空前膨胀，以至艾森豪威尔最后在告别演说中呼吁，要警惕“军事——工业集团有意无意地要取得不恰当的势力”。

在对外政策方面，艾森豪威尔执政后，虽然结束了朝鲜战争，但是，为了防止新中国成长壮大，仍然把“遏制共产主义”的重点放在亚洲。1954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纽约外交学会发表演说称：“目前的基本决定，主要依靠一支庞大的报复力量，它能够使我们选择的武器与我们选择的地方马上进行报复”，这被视为“大规模报复战略”。

“大规模报复战略”代替了杜鲁门政府的“遏制战略”，它富有进攻性和冒险性。1954年艾森豪威尔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声称：如果东南亚发生革命，美国有必要投入战争。美国还宣扬共产主义威胁东南亚，要仆从国和同盟国也准备参加战争，一旦打起仗来美国则提供海军、空军和后勤的支援。

中东有丰富的石油资源，独霸其石油资源是美国垄断资本的利益所在。中东地处亚、欧、非三洲的交通枢纽，又是欧洲的重要侧翼，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控制中东是美国经济军事利益所必需的。1956年埃及收回了苏伊士运河，英、法在中东的势力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中东采取了新的政策。1958年1月艾森豪威尔向美国国会提出有关中东政策的特别咨文，许诺向为抵御共产主义侵略而需要帮助的中东国家提供军事或经济援助。并宣布说，任何中东国家如果寻求美国的帮助，美国将用武力保护其“独立”。这被称之为“艾森豪威尔主义”，它的提出就是要填补英法在中东留下的“真空”。

根据“艾森豪威尔主义”，美国对中东一些国家提供了援助，并应黎巴嫩政府的请求，于1958年7月派海军陆战队在黎登陆，协助黎巴嫩政府镇压共产党所组织的“叛乱”。美国对黎巴嫩的入侵激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强烈抗议和阿拉伯国家的坚决反对，美国被迫在同年10月从黎巴嫩撤走了军队。

（孟超）

### 第三章 1945年至60年代的苏联、东欧

#### 1. 战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苏联在人力和物力方面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从列宁格勒、莫斯科、斯大林格勒（现伏尔加格勒）、高加索山麓一直到西部边境的广大地区被夷为一片废墟。2,000多万军民牺牲了生命；1,710座城市、7万多个村镇、3.2万个工业企业、6.5万公里铁路、4,000多个火车站遭到破坏；9.8万个集体农庄、1,876个国营农场、2,890个农业机器拖拉机站遭到洗劫；被侵略者掠夺和毁坏的直接物质损失总计为6,790亿卢布（按1941年的价格计算）。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成为战后初期苏联人民的一项严峻任务。

1946年3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四个五年计划（1946~1950）。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重建国家受害的地区，使工农业达到并大大超过战前水平。计划规定，到1950年，工业总产值、国民收入、农业总产值应分别比战前1940年增加48%、38%和27%。

在工业战线，苏联人民展开了以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四·五”计划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1946年基本上完成了工业改组，使相当一部分军工企业改组为生产民用产品。改组任务的完成，为工业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在“四·五”计划期间，工业产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3.6%。1950年的工业产值比1940年增加了73%，大大超过原定计划48%的指标。工业的五年计划只用了四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

和前三个五年计划相比，“四·五”计划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乙类工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快于甲类工业，前者为15.7%，后者为12.8%。但是消费品的生产仍然落后于社会的需要。这主要是由于农业发展缓慢造成的。其次，苏联在战前长期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战时又进一步压低了消费品的生产。因此，1950年的消费品生产虽然超过1945年水平一倍多，但和战前比较起来只增加了23%，医疗工业、食品工业和棉织品还没有达到战前水平。

在科学技术方面，苏联在工业部门开始应用电子技术，发展了生产过程的电气化、自动化和综合机械化。1946年建成了第一座原子能反应堆。1949年成功地试验了第一颗原子弹，打破了美国对原子弹的垄断地位。1950年第一台电子计算机投入运转。

在“四·五”计划期间，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农业的措施。1946年9月作出了《关于消除集体农庄中违反农业劳动组合章程的现象的办法》的决定，要求政府机关、社会团体及个人非法侵占的农庄土地和财产一律归还，指出农庄中行政管理人员编制庞大、非生产人员过多的现象必须纠正。根据这一决定，到1947年初，归还集体农庄的土

地达 470 万公顷，牲畜 14 万余头，有 45 万多非生产人员转入生产第一线。“四·五”计划期间，国家向农业提供拖拉机 53.6 万台（每台按 15 匹马力计算），谷物联合收割机 9.3 万台。农业物质技术基础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此期间，还完成了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西部地区以及在战争前夕加入苏联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但是在战后初期，苏联在农业政策上仍然没有兼顾好国家、集体、农民这三方面的利益，农民的负担仍然很重，义务交售的农产品不仅数量大，而且价格低。据统计，1953 年义务交售的谷物，其价格只相当于成本的 10%，交售的肉只相当于成本的 5~6%。三十年代初期建立起来的那种集中劳动，统一分配的集体农庄制度不能充分调动庄员的劳动积极性。高度集中的农业管理体制使农庄和农场没有经营自主权，因而扼杀了生产者的积极性，窒息了农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因此，战后初期，苏联在农业战线上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一些重要的指标没有完成计划。1950 年，苏联农业总产值只及战前 1940 年的 99%，播种面积只及 1940 年的 97%。1950 年谷物总产量为 8,120 万吨，比战前 1940 年少 1,440 万吨，没有完成计划规定的 12,700 万吨的任务。农业仍然是苏联国民经济中的薄弱环节。

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提高。1950 年，国民收入比 1940 年增加 64%，超过原定计划 38% 的指标。1947 年取消了粮食和工业品的配给制。五年中城市建造住宅 1 亿多平方米，农村修建住宅 270 万幢。高等学校学生人数由 1940 年的 81 万多人增至 1950 年的 124 万多人。同一时期，技术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学生人数由 97 万多人增至 129 万多人，电影院由 2.8 万个增至 4.2 万个。但是，由于苏联长期实行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因此工业发展虽然迅速，而人民生活水平却提高不快，某些方面还有所降低。1953 年全苏人均粮食 432 公斤，低于 1913 年的 540 公斤；1953 年的人均肉产量为 30 公斤，也低于 1913 年的 31.4 公斤。城市中，居民住房紧张，副食品供应不足，一些消费品质量低劣。农村情况更差，有些农庄的工分只有几戈比。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所处的历史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客观形势要求对三十年代形成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进行重大的改革。可是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却采取一系列巩固和加强集权的措施。例如：继续强化高度集中的部门管理体制，中央各部从战前 1941 年的 41 个增至 1947 年的 59 个，后来虽有减少，但到 1952 年仍有 50 多个。虽然肯定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货币关系，但是否定生产资料是商品，否认价值规律对生产有调节作用，仍然坚持以行政手段为主管理经济。不仅如此，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还把这种模式神圣化，把它视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遵从的唯一模式。1947 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沃兹涅先斯基著文提出自己对苏联经济的看法，南斯拉夫的铁托公开批评斯大林模式，但是这些批评均被视为反马列主义的异端，遭到批判讨伐。

战后初期，联共（布）中央进一步加强了政治思想战线的工作。1945年决定设立高级党校，负责培养党政领导干部。1946年8月，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决议对这两份文艺杂志刊登许多思想性差、艺术质量低劣的作品表示强烈不满，决定《列宁格勒》停刊，撤换《星》的主编。这年8月还作出了《关于话剧剧院剧目及其改进办法》的决议。决议批评了剧院排挤现代主题剧本，以及上演了一些下流低级的外国戏剧作品的缺点、错误，要求在短期内纠正这种现象。接着，在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学、生物学、语言学、政治经济学等领域开展了思想批判运动。每一学科领域都有一个或几个代表人物受到批判。联共（布）中央在战后初期加强政治思想战线的工作是必要的，但是在思想批判运动中，有的混淆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有些文艺工作者、专家受到不公正的指责，有些作品受到过于苛刻的评价，造成不良的后果。

这一时期，苏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也存在一些不正常的现象。按党章规定，每三年一次的党代表大会，从1939年联共（布）十八大后一直没有召开；每四个月一次的党中央全会，从1947年2月起也没有按时召开；政治局很少召开正式会议。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受到破坏，权力更加高度集中。1949~1950年发生了闻名的“列宁格勒案件”，沃兹涅先斯基等一些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被无辜处决。

1952年10月，联共（布）召开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马林科夫在会上作了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赫鲁晓夫作了修改党章的报告，斯大林在闭幕式发表了简短的演说。大会批准了关于1951~1955年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五个五年计划的指示，规定到1955年，工业总产值、国民收入、谷物总产量应分别比1950年增加70%、60%、40~50%。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和更改党的名称的决定。鉴于孟什维克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党无须再保留双重名称，大会决定把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改称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

（段炳麟）

## 2. 铁托与南斯拉夫人民政权的建立

1945年11月29日，南斯拉夫人民在解放了的土地上宣布成立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并把这一天作为自己的国庆节。

南斯拉夫是个多民族国家，主要有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马其顿、黑山、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等民族。1918年成为统一的国家，统治者是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王国政府。由于南斯拉夫是中欧通往地中海的通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是帝国主义争夺的一块肥肉，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从这里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不久，1941年4月6日，德意

法西斯侵入南斯拉夫，王国政府仓惶外逃。南斯拉夫领土被德、意、保、匈等国瓜分。以约瑟普·布罗兹·铁托（1892—1980）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开始了争取祖国解放的斗争。

铁托生于克罗地亚库姆罗韦茨村的贫苦农民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当过五金工人，加入社会民主党，战争初期被征在奥匈帝国军队中服役，后被俄军俘虏。1917年参加俄国十月革命的活动，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1919年南共成立。1920年铁托回国入党，积极投身革命运动，多次被捕。1935年赴莫斯科任共产国际巴尔干书记处成员，出席共产国际“七大”。1936年回国任中央组织书记，1937年任总书记。南共党内形成了以铁托、卡德尔等人为首的坚强的领导核心。法西斯侵入南斯拉夫后，1941年6月27日，南共中央决定在贝尔格莱德成立民族解放游击队总司令部，7月4日确定了全国武装起义的方针。7月7日塞尔维亚起义者打响了全南斯拉夫武装起义的第一枪，武装抵抗的烈火很快燃遍了整个国土。

1941年底，在游击队的基础上建立了第一支反法西斯的正规部队——第一无产阶级旅，约8万多人，这支部队在战斗中屡建功勋。1942年成立了人民解放军。它的成立——12月22日成为南斯拉夫人民建军节。原南斯拉夫王国政府参谋部军官米哈伊洛维奇上校也组织起一支5000人的部队，称之为“切特尼克”（意为“参加队伍的人”）。它虽然以抗战为旗号，实际上与法西斯勾结反对人民解放军。

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南斯拉夫人民热情支援自己的队伍。距贝尔格莱德市200公里的乌日策（现名铁托乌日策）市及其周围山区，是当时南斯拉夫人民建立的第一个解放区。此后，佛查镇、亚伊策、德瓦尔、维斯岛都先后作为中央基地。从1941年7月至1943年5月，解放区军民先后粉碎了敌人五次进攻。1943年5月苏捷斯卡战役的胜利是南斯拉夫解放战争的转折点，从此人民武装力量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盟国也开始承认这一事实，英美和苏联先后派来了军事小组，表示支持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发展到了30万人，不但有陆军而且还有空军和海军。

1943年11月29日，在亚伊策召开了第二次人民解放反法西斯会议，宣布建立全国临时政权机关——全国解放委员会，剥夺南斯拉夫王国政府的权力，表示了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要求建立新国家的愿望。但盟国方面建议铁托与王国流亡政府会谈，1944年6月达成了建立统一的南斯拉夫政府的协议。1944年10月20日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解放贝尔格莱德的战役。在苏军帮助下，接着又发动了北线战役，解放北部沿海地区，1945年5月全国解放。“切特尼克”也随之完全崩溃，米哈伊洛维奇被俘。人民解放军已成长为有80多万人的队伍。南斯拉夫人民主要靠自己的力量赢得了祖国的解放，170万优秀儿女献出自己的生命。

1945年11月11日举行国民议会选举，以南共为领导核心的人民阵线获得绝大多数选票。29日，南斯拉夫立宪会议宣布废除君主制，成立南斯拉夫

联邦人民共和国，铁托任联邦总理兼国防部长。1946年1月通过联邦宪法，参加联邦的六个共和国和自治省均享有民族主权和平等地位。

解放后，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加强团结，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发展工农业生产和科技文教事业，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有着长期农村武装斗争经历的南共领导，把农民看成是新国家大厦赖以存在的基础。对贫苦农民的生活首先给予极大的关心。1945年8月通过土地改革法，规定农户最高土地限额为35公顷，没收大地主和富农土地。用1.566万公顷建立“国有化土地基金”，其中的51%分给了贫苦农民，18.3%建国营农场，2.6%分给农业合作社，2.5%分给国营企业。劳动农民摆脱了高利贷资本的债务和压力。1946年和1948年两次实行国有化法令。和其它马列主义政党一样，南共也是把“剥夺剥削者”作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第一个步骤。首先没收外国资本和法西斯代理人的财产，然后是一般大私营资本的企业。到1948年全国的工矿、交通、银行、商业等部门都实行国有化，从而奠定了社会主义的国有经济的基础。由于群众的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工农业生产增长很快。国家的国民总收入，1939年是2642亿第纳尔，但到1948年增长到4411亿第纳尔。

战后初期的南斯拉夫和苏联一样建立起“中央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这不仅是因为缺乏经验而不能不仿照苏联模式，而且也是革命后特殊历史条件的需要。战争的巨大破坏、物力人力的匮乏，广大管理干部年轻，敌对势力的反抗，使得新政府不得不用中央集权的管理，来保证经济恢复的顺利进行。但南共领导一开始就注意根据本国国情摸索自己的道路。1946年铁托谈到运用苏联的经验时指出：“不必要，也不可能所有国家都象伟大十月革命中所记载的那样。……它们的道路可以有共同的相吻合之处，也确实有。但是，每个国家内部发展的特殊条件和性质决定了到达和实现更美好社会制度所走的道路的特殊性。”

（张象）

### 3. 季米特洛夫与保加利亚人民政权的建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保加利亚王国经济落后，生产力发展缓慢，是一个贫穷的农业国。1940年以国王鲍里斯三世为首的反动统治者对外怀有领土野心，曾向罗马尼亚提出领土要求，并企图从希腊获得进入爱琴海的通道。希特勒法西斯利用保加利亚统治者的扩张欲望，于1941年2月8日同保签订让德军过境的协议。28日德军进占保。3月1日保加入了轴心国，成为德国的附属国，对英法宣战。但保加利亚一直未派兵与苏作战。

---

转引[南]杜尚·比兰吉奇著：《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史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7页。



苏德战争爆发后，保人民在以季米特洛夫为首的工人党领导下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许多游击小组，同德国法西斯和国内反动派进行顽强的斗争。

格奥尔基·米哈伊洛维奇·季米特洛夫（1882—1949年）出生在保加利亚拉多尔米县的一位工人家庭里。他12岁时做印刷排字工人，15岁就参加革命活动。1902年，他加入工人社会民主党。当该党分裂后，季米特洛夫同左派“紧密派”站在一起，1909年当选为中央委员。1919年“紧密派”改组为保加利亚共产党，他继续担任领导工作。1922年出席共产国际三大，当选为执委会委员。1923年季米特洛夫领导了保加利亚九月起义，起义被镇压而失败。此后，他流亡至德国，保反动当局缺席判处他死刑。1933年2月，希特勒法西斯制造震惊世界的“国会纵火案”，大肆逮捕共产党人。季米特洛夫等三名保共党人以“纵火犯”罪名被戈林所逮捕。在莱比锡审判的法庭上，季米特洛夫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无情揭露法西斯的阴谋，他的辩护词铿锵有力。纳粹法庭理屈词穷，被迫宣布他无罪。1934年2月，苏联接受季米特洛夫为苏公民。1935年起，季米特洛夫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的活动家，反法西斯杰出的战士。

季米特洛夫一直领导、关心着保加利亚人民反法西斯斗争。1942年在他的领导下建立起有工人党、社会民主党、农民联盟、“环节”联盟等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保加利亚祖国阵线。7月17日宣布祖国阵线纲领，提出反法西斯、建立民主制度的政治主张。1943年又组成祖国阵线全国委员会，统一抗敌力量，展开了反法西斯游击战争。这一年全国已经形成12个游击战区，人民武装发展到3万余人，牵制敌军十几万兵力，为整个欧洲反法西斯战争做出贡献，有力地支援了苏联的卫国战争。

1944年8月底，苏联红军进抵保加利亚边境。保加利亚工人党乘此有利时机，立即发出举行武装起义的通知。9月8日，苏红军进入保加利亚。9日，保加利亚工人党和祖国阵线领导人民在首都索菲亚等重要城市举行武装起义。首都的起义队伍迅速攻占了政府要害部门，逮捕了政府和摄政会议成员，推翻了保加利亚王国反动政府的统治，宣告祖国阵线政府成立。保加利亚人民终于在苏红军的有力配合下，通过本国人民的武装起义建立了人民政权。9月9日这一天成为保加利亚国庆日。10月28日，保加利亚与盟国签订停战协定，随后反戈一击宣布对德作战。

1945年6月，遵照祖国阵线代表会议的建议，通过国民议会选举法，规定年满19岁公民享有选举权。11月4日季米特洛夫结束多年国外流亡生活后回国。11月18日，保加利亚举行普选，有85%以上选民参加了选举，其中88%的投票者赞成祖国阵线候选人、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瓦西里·科拉罗夫当选为国民议会主席。国民议会不断实行革命改革，使人民政权得到巩

---

在保加利亚法西斯猖獗时期，保加利亚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1927年在保共领导下，建立了进行合法活动的工人党。

固。

1946年7月,季米特洛夫在保加利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消灭君主政体,举行大国民议会选举,建立人民共和国的方针,得到了祖国阵线政府的赞同。同年9月8日保全国就国家政体问题进行公民投票。9月15日,国民议会遵照人民的意志,庄严宣告废除君主政体,成立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10月27日,大国民议会选举,工人党取得278个席位,占席位总数的60%。11月22日,组成新一届祖国阵线政府,季米特洛夫担任第一任部长会议主席。

祖国阵线新政府积极实行恢复、改造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两年计划(1947—1948年)。1947年12月4日大国民议会通过新宪法,规定保加利亚为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来自人民,属于人民;全民所有制是国家的主要支柱;实现耕者有其田;私有财产要受到限制;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等。根据宪法精神及两年计划的要求,保加利亚进行土地改革,制订对私人企业、矿山和银行实行国有化法令,实现了工商业的国有化,使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占了绝对优势。两年计划完成后,1948年的工业生产已达到1939年的171.5%,农业虽受旱灾的影响也达到1939年的95%。

随着经济的恢复,政治生活各方面也发生重大变化。根据季米特洛夫的建议,祖国阵线的使命,应该是以忠于人民民主和爱好自由的传统,以立志建设人民政权、提高人民物质和文化水平而斗争的精神去教育人民。经改组,祖国阵线成为保最广泛的群众性组织。1948年它的成员有100多万人。8月保加利亚工人党同经过清洗反社会主义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的社会民主党合并,使党的作用日益增强。12月18日,保加利亚工人党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季米特洛夫抱病为大会做了报告,全面回顾了保加利亚革命的历程,总结进行反法西斯斗争和恢复国民经济以及执行无产阶级专政职能的国家、发展人民民主制度的经验,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五大”还决定把工人党改名为共产党。这次会议标志保加利亚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的开始。为贯彻“五大”路线,大国民议会于1948年12月29日通过1949—1953年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法令,要在五年中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把保加利亚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具有初步发达的工业农业国。保加利亚人民以忘我的精神投身建设事业之中。

正当保加利亚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刚刚开始的时候,国际共运著名活动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保加利亚久经考验的领袖、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季米特洛夫在1949年7月2日病逝于莫斯科。这对保加利亚的建设事业是一重大损失。1954年改选日夫科夫为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至今。

在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下,到50年代末,顺利完成两个五年计划任务。保加利亚在社会主义道路上阔步前进。

(常凤崑)

#### 4. 罗马尼亚人民政权的建立和巩固

罗马尼亚直到 1938 年还是很落后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欧各国相继沦亡，罗马尼亚失去了英法的保护，德国法西斯趁机支持罗马尼亚法西斯分子扬·安东尼斯库发动政变，于 1940 年 9 月建立法西斯政权。9 月 20 日，安东尼斯库政府出卖民族利益，引狼入室，使德国以派“军事使团”为名，占领一些要地。10 月，德军占领罗马尼亚全境，把罗马尼亚拖入战争深渊，成为德国的附属国，参加对苏作战。

国内外法西斯的倒行逆施，激起罗马尼亚人民的不满和反抗，在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下展开了各种形式的反法西斯斗争。1941 年 9 月，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提出建立爱国统一战线、反对法西斯的斗争纲领：号召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开展武装斗争，打败法西斯，推翻国内法西斯专政，争取罗马尼亚的自由和解放，建立由一切爱国力量组成的民主政府。“纲领”推动了罗马尼亚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发展。1941 至 1944 年间，罗马尼亚人民同反动军队的冲突达 193 次，罢工斗争发生 39 次。1942 年底，在斗争中，出现了罗马尼亚人民团结战斗的组织“爱国者联盟”。1943 年夏，在罗马尼亚共产党倡议下，将联盟扩大，组成有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农民阵线、马扎尔劳动联盟等组织参加的“反希特勒爱国阵线”（1944 年 6 月，民族农民党、民族自由党参加，改名为民族民主同盟），壮大了反法西斯力量。同年 8 月，罗马尼亚共产党确立了武装起义的方针，以便推翻安东尼斯库的统治，退出反苏战争，转到反法西斯联盟一边。为实现这一方针，罗马尼亚共产党积极支持建立人民武装力量——爱国卫队，并在政府和宫廷中开展争取开明人士和爱国官兵支持起义的工作。1944 年 6 月 30 日深夜，在布加勒斯特罗共中央的秘密住所召开了共产党、宫廷和军队代表的联席会议，决定立即举行武装起义，并且成立由罗马尼亚共产党指导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从集中营中被营救出来的罗马尼亚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乔治乌—德治和尼·齐奥塞斯库等同志，负责领导起义，直接领导罗马尼亚人民反法西斯武装斗争。

1944 年 8 月下旬，苏联乌克兰第二、三方面军在黑海舰队的配合下，从雅西——基什尼奥夫一线向德罗军队发起进攻，实施第七次打击，迅速推进到罗马尼亚境内。罗马尼亚共产党抓住有利时机，于 8 月 23 日在首都布加勒斯特及其它主要城市发动了武装起义，逮捕了安东尼斯库及其政府成员，宣告法西斯政权寿终正寝。随后，起义队伍按预定计划占领了电话局、电报局、广播电台、政府大厦等战略据点。翌日，组成了以旧军官及文职活动家为多数的塞讷特斯库政府。经过六昼夜的激战，起义者歼灭了首都及近郊的德军。8 月底，罗马尼亚全国获得解放。八月起义获得了胜利，成为罗马尼亚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罗马尼亚有 52 万人参加祖国解放斗争，歼敌 7

万余人，有近7万爱国官兵和起义者为祖国的解放而献身。“8月23日”以罗马尼亚解放日载入史册。罗马尼亚新政府宣布退出战争，并反过来对德宣战。1944年9月12日罗马尼亚与盟国签订停战协定，轴心国在东欧的体系崩溃。罗马尼亚兵团在苏联最高统帅部指挥下参加了解放匈、捷的战斗，在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时刻做出了贡献。

八月起义胜利后的罗马尼亚仍然保留着国王，罗马尼亚民主政权的建立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塞讷特斯库政府是资产阶级反动分子占多数的政府，对于经济和政治的民主改革持反对态度。罗共为建立民主政权而斗争。1944年9月26日罗共联合社会民主党、农民阵线等组织，制订了民族民主阵线纲领，提出要利用一切手段支援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要实现国家的进一步民主化；要按占有五十公顷以上的土地均予没收并分配给农民的原则进行土地改革，恢复经济；要逐步改善人民生活。以这一纲领为基础，同年10月12日，组成了罗马尼亚民族民主阵线全国委员会，使塞讷特斯库政府陷入危机之中。11月4日，迫于民众的压力，国王米哈伊下令改组政府。12月6日以勒德斯库将军为首的联合政府成立。但是，新政府仍然拖延改革，拒不履行诺言。1945年1月，民族民主阵线又提出为完成夺取政权而进行革命民主斗争的纲领。2月，在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倡议下，农民阵线号召农民以强力夺取地主的土地。仅三周时间，农民夺地运动就遍及全国。全国各地纷纷举行要求建立民族民主阵线政府的强大的示威游行。2月24日布加勒斯特有60万人参加示威游行，遭到政府武力镇压，造成多人伤亡。在群众斗争的洪流中勒德斯库政府垮台，勒德斯库被迫辞职，逃往英国大使馆避难。

1945年3月6日，成立起以农民阵线领袖佩特罗·格罗查为首的政府。在政府中，民族民主阵线代表占有部长会议主席和14名部长职位，自由资产阶级只有部长会议副主席和3名部长的职位。罗马尼亚领导权已经转到以罗马尼亚共产党为核心的民主力量一边，罗马尼亚人民民主政权终于建立起来了。新政权的实质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从此，罗马尼亚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开始实施政治和经济的民主改革。

经济上，在1945年3月23日，民主政府颁布土地改革法，没收超过50公顷以上的地主的土地，没收德国人、卖国贼、战犯以及长期弃农者的土地。然后，以5公顷为一份，将没收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经过土改，没收土地146.8万公顷，其中110.9万公顷土地分配给91.8万农户。土改运动加强了工农联盟，扩大了罗马尼亚共产党在农村的影响，调动了农民劳动生产积极性。与此同时，城市里着手进行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改造，将工业企业、铁路、交通和建筑企业收归国有，宣布对外贸易由国家垄断。

政治上，罗马尼亚共产党及民主政府采取措施加速民主化进程。1945年10月，罗马尼亚共产党举行全国会议，确立党的巩固工农联盟，加强人民团结，发展同苏联的关系，深入进行民主改革的路线和方针。会议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1901—1965年）任总书记。

在此期间，国王及国内反动势力疯狂反对民主改革。1945年8月曾发生“国王罢工”事件，米哈伊一世中断同格罗查政府的来往，拒绝审阅符合法律规定的文件、法令，企图迫使政府改组。11月，国内反动派曾阴谋策划骚动。罗马尼亚共产党和人民顶住了逆流。

在罗马尼亚共产党推动和支持下，1946年11月，全国举行议会选举，以罗马尼亚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为主的民主政党联盟（1946年5月17日成立）获得绝对多数席位，使民主力量增强，民主改革不断深入。1947年12月30日议会宣布废除君主制，成立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国王被迫签署退位书，统治罗马尼亚的霍亨索伦王朝灭亡了。罗马尼亚民主政权得到巩固，民主革命结束，社会主义革命开始。

为了加强工人阶级在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罗马尼亚事业中的统一领导，1948年2月21日至23日，罗马尼亚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召开联合代表大会，成立罗马尼亚工人党。会议确定转向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方针。1948年4月，新选举产生的大国民议会通过了罗马尼亚宪法，规定罗马尼亚是劳动人民的国家，大国民议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部长会议是国家的最高执行机关。

1948年底，大国民议会通过国家第一个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两年度计划（1949至1950年）。从1951年起，开始实行五年计划经济，到1965年“三五”计划结束，奠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完成了工商业国有化，实现了农业合作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伟大胜利。

1965年3月，乔治乌—德治同志不幸逝世，齐奥塞斯库接任党中央第一书记。同年7月，罗马尼亚工人党“九大”恢复罗马尼亚共产党名称。8月，通过新宪法，改国名为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罗马尼亚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本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原则，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走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常凤崑）

## 5. 阿尔巴尼亚人民政权的建立和巩固

阿尔巴尼亚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战前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国民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被外国资本所控制，特别是意大利资本势力较大。1939年4月，由于封建和资产阶级的代表索古国王的妥协投降，意大利法西斯军队占领了阿尔巴尼亚，大肆掠夺阿尔巴尼亚的资源 and 财富，屠杀无辜的人民，实行最残酷和野蛮的统治。但是，“山鹰之国”的人民不畏强暴，展开不屈不挠的反抗侵略者的斗争。11月28日（阿尔巴尼亚民族独立日）首都地拉那发生震动全国的反意法西斯爱国示威。1940年秋季，不愿为意大利法西斯卖命的阿尔巴尼亚士兵，逃亡山中组成游击队，打击侵略者，破坏敌人交通线。

1941年11月8日，来自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15人，在首都地拉那秘密举行非常会议，成立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选举恩维尔·霍查（1908—1985年）等人组成临时中央委员会，成为阿尔巴尼亚人民革命斗争的领导核心。1942年9月16日，在距首都约十公里的贝萨村，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组织召开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会议，成立“民族解放阵线”，其中包括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妇女联盟、人民青年联盟和阿尔巴尼亚工会联合会等组织（1945年改称民主阵线）。在会上民族解放委员会产生，行使人民政权的作用。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和民族解放阵线的建立，极大地推动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反法西斯的斗争。1942年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的40多支游击队活跃在全国各地，烧毁地拉那电话局，袭击飞机场，炸毁科尔察法西斯党部，突袭斯库台监狱，炸毁发罗拉军火库，给敌人沉重的打击。为了加强对人民武装的领导，1943年7月，在诺比拉城建立了阿尔巴尼亚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游击队被改编为游击纵队。在阿尔巴尼亚人民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打击下，1943年9月意大利法西斯被迫投降。阿尔巴尼亚人民武装将意侵略者全部赶出自己的国土。但是，前门赶狼后门进虎。德国法西斯为挽救败局，继意大利法西斯之后侵入阿尔巴尼亚的所有大城市和港口。阿尔巴尼亚人民又投身于抗击德寇的斗争。1943年10月至1944年5月，阿尔巴尼亚人民先后粉碎两次敌人对解放区的大规模进攻。

1944年5月24日至28日，在南部城市帕尔梅特召开阿第一次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代表大会，选举出民族解放会议作为阿尔巴尼亚全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会议还选出民族解放委员会，作为阿尔巴尼亚临时人民政府，主持日常工作。会议决定“建立新的阿尔巴尼亚”，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废除君主制，禁止国王回国。

在全国大部分领土获得解放的大好形势下，1944年10月22日至23日，在贝拉特城召开第二次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会议，决定将民族解放委员会改为临时民主政府，霍查出任总理，阿尔巴尼亚人民民主政权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建立起来了，它有力地推动了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发展。1944年秋，阿尔巴尼亚人民解放军转入总反攻。11月17日由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主要领袖之一谢胡领导的游击队，击毙德军2000余名，缴获大量武器，解放了首都地拉那。直到11月29日，北方重镇斯库台市回到人民手中，阿尔巴尼亚全国获得解放，这一天成为阿尔巴尼亚解放日。阿尔巴尼亚是一个小国弱国。但是，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长期的艰苦卓绝的反法西斯斗争，抗击了近17万装备优良的德意军队，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有力地配合邻国的斗争，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战争胜利后，临时政府立即实施恢复国民经济，稳定局势，巩固新生政权的措施。1945年12月初，阿尔巴尼亚全国举行普选，组成了制宪会议。1946年1月11日制宪会议决定阿尔巴尼亚为人民共和国，实行一院制议会，将制宪议会改称人民议会。3月人民议会通过新宪法，规

定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全国解放后不久，阿尔巴尼亚便开始对私营工业企业实行监督。从 1945 年起至 1947 年间，先后将银行、主要工业企业、交通运输和通讯机构以及批发商店和一部分零售商店收归国有，由国家统一经营对外贸易。1946 年底，国营工业产值，已占工业总产值的 87%。1945 年 8 月 25 日阿政府通过土地改革法，规定没收和分配地主庄园和教会的地产建立一批国营农场。1946 年又实行第二次土改，彻底消灭地主阶级，打击富农经济，开始实行农业集体化。1950 年底，全国农业合作社有 90 个。（到 1960 年全国 90% 以上农户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

1948 年 11 月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确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通过了 1949 至 1950 年的恢复国民经济两年计划，决定将党的名称改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经过全国人民共同努力奋斗，两年计划顺利完成。工业总产值超过 1938 年的三倍；农业发展较慢，但总产量也比 1938 年增长 30% 多。从 1951 年起实施五年计划。“一五”和“二五”计划是要以高速度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使阿尔巴尼亚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国。由于阿尔巴尼亚原来工业基础薄弱，工业化是从发展轻工业开始。工业在工农业产值中的比例逐年增加。五年计划期间，全国已建立起钢铁、化肥、塑料、军工等新部门。到 1961 年粮食达到基本自给。

阿尔巴尼亚民主政权的巩固，经历了重重困难和斗争。早在 1945 年 1 月，阿尔巴尼亚临时政府就向联合国筹委会提出要求接纳阿尔巴尼亚为成员国。苏联支持这一合理要求。而西方大国却百般阻挠，拒绝与阿尔巴尼亚建立外交关系，还在 1946 年 9 月，策动斯库台地区的反革命叛乱。阿尔巴尼亚加强同苏联和东欧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系。但在边界问题上与南斯拉夫有分歧。1948 年情报局发起了“反铁托分子”的斗争后，1949 年 3 月 27 日至 6 月 11 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内政部长科奇·佐治以“叛徒”、“铁托代理人”等罪名，经审讯后被处死。霍查与阿尔巴尼亚党全面地、不折不扣地维护斯大林时期的路线。为此与斯大林以后的苏联领导及其它国家的共产党便发生了分歧、并中断关系，从而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独特的派别。

（常凤崑）

## 6. 波兰和匈牙利人民政权的建立与巩固

### 波兰

1943 年夏秋，由于苏军在对德国入侵者的战略反攻中取得节节胜利，波兰已经临近解放。为保证战后波兰的政权掌握在人民手中，波兰工人党于 1943 年 11 月发表了《我们为什么而斗争？》的宣言，提出了建立民主波兰

的政治纲领。12月31日夜，波兰工人党、社会党左翼、农民党、地下工会和其他民主团体的代表在华沙秘密举行了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波兰工人党领导人波列斯瓦夫·贝鲁特为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主席团主席。随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的倡议，波兰各省、县、市、村的人民代表会议和工厂企业的代表会议也相继建立起来。

1944年7月，在苏联建立的波兰第一集团军和苏军解放了波兰部分领土。7月22日，根据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和旅居苏联的波兰爱国者联盟达成的协议，在波兰小城赫乌姆建立了波兰临时政权机构——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几天后迁往卢布林），社会党左翼领导人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任该委员会主席。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在其《告波兰人民书》中指出，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是波兰政权的唯一合法基础，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是唯一合法的临时政权执行机构，其首要任务是领导人民争取彻底的民族解放，同时保证实现国内政治生活民主化和其他民主改革。后来，7月22日被定为波兰的国庆节。

在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建立后，英美两国曾施加压力，企图使在伦敦的以斯坦尼斯瓦夫·米科拉伊奇克为首的波兰流亡政府吞并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并阻止民主改革，但由于受到苏联和波兰民主力量的反对而未能得逞。

1944年8月21日，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发布命令，要求在省县两级建立受地方人民代表会议指导和监督的行政机构。从9月开始，在已解放的地区实行土地改革，把从大地主那里没收来的土地分给农民和农业工人，从而加强了工农联盟。12月31日，根据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的法令，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组为波兰临时政府，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任部长会议主席，波兰工人党总书记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任第一副主席。

波兰在1945年5月获得完全解放后，不仅国内存在着相当强大的反民主势力，在英美支持下的波兰流亡政府也仍以波兰人民代表自居而与波兰临时政府分庭抗礼。为了把处于动摇状态的那部分农民和城市中间阶层争取到民主阵线方面来，也为了缓和苏联同英美在波兰问题上的对立，1945年6月28日，根据苏、美、英三国雅尔塔会议决议，波兰临时政府代表与波兰流亡政府代表达成协议，在临时政府的基础上组成了波兰民族团结政府，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任总理，哥穆尔卡任第一副总理，米科拉伊奇克任第二副总理。但是，米科拉伊奇克及其英美后台反对波兰民族团结政府的内外政策。米科拉伊奇克于1946年8月将原在他领导之下的农民党右翼改建为波兰农民党，把更多的富农、城市资产阶级分子、地下反动组织成员和相当一部分中农拉到党内，企图用膨胀波兰农民党的办法扩大右翼势力在政治上的影响。

1946年1月，在波兰工人党的推动下，全国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了国民经济基本部门国有化的法令。根据该项法令，原属德国的企业一律收归国有；一切每班雇用五十名工人以上的企业或虽不足五十人但对国家经济生活有重要意义的企业，通过赎买实行国有化；银行和商业机构收归国有。



波茨坦会议议定书曾经规定，波兰民族团结政府应“尽速举行自由与不受束缚”的议会选举。当时，英美以为这种选举将能使米科拉伊奇克所代表的右翼势力获得议会多数席位，从而在波兰建立一个亲西方的政府。但是，由于波兰农民党领导在内政上越来越与旧有的反动势力同流合污，在外交上以扶植德国复仇势力的美英为靠山，结果遭到波兰人民的唾弃。相反，以波兰工人党为代表的民主阵线坚决主张民主改革和维护战后波兰的国家利益，因而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拥护。1947年1月的波兰议会选举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进行的。选举结果，以波兰工人党为首的民主阵线获得了巨大胜利，取得全部444个议席中的380个席位，而波兰农民党只得到议会的26席。2月5日，贝鲁特当选为波兰共和国总统，社会党领导人约瑟夫·西伦凯维茨出任政府总理。米科拉伊奇克在夺权企图失败后于1947年秋逃往国外。至此，波兰人民结束了建立和巩固人民新政权的时期。

## 匈牙利

1944年9月底，当苏军对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战略反攻进抵匈牙利边境时，匈牙利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发出文告，号召人民推翻反动派，驱逐帝国主义，建立独立民主的匈牙利。12月3日，在反法西斯、反封建和建设民主匈牙利的共同基础上，成立了有共产党、小农党、社会民主党、民族农民党、资产阶级民主党和工会等团体参加的匈牙利民族独立阵线。12月21—22日，民族独立阵线各政党代表在已获解放的德布勒森召开全国临时国民大会，成立了临时国民政府。参加临时政府的成员除民族独立阵线各党派代表外，还有一些在战争后期反对过希特勒匪帮及其匈牙利帮凶的前霍尔蒂时代的高级军官。与此同时，在已获解放的地区建立了民族独立阵线的地方委员会，这些地方委员会在1945年1月恢复国家行政机构之前曾代行地方政权机关的职能。

1945年1月20日，匈牙利临时政府同盟国在莫斯科签订了停战协定，并对德宣战。2月26日，临时政府通过决议，下令解散“箭十字团”等法西斯组织。为了维护民主秩序，解散了为旧制度效劳的王国宪兵和警察，建立了新的国民警备队和民主警察。为了审理战争罪犯案，建立了专门的人民法院。但是，此时匈牙利的一般司法机关仍沿用了旧的司法形式，并大批留用了旧的司法人员。

尽管在初建人民民主制度的阶段，匈牙利仍在相当程度上保存了旧有的国家机器，但劳动人民在实际上已经获得过去所没有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方面的民主自由权利。

1945年3月15日，在匈共的推动下，临时政府通过了关于废除大土地私有制和为劳动农民分配土地的法令。经过土改，劳动农民获得了从大地主和教会方面没收来的大约三百二十五万八千霍尔德土地，另一部分被没收的土地则交给了国营农场或充作公用林牧场。但是，富农仍保留了他们原来的

土地。

1945年4月3日，匈牙利全国获得解放。8—11月，匈牙利举行了议会选举。在选举中，因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缺乏政治经验，致使已因国家解放时吸收众多资本家、大地主、银行家和旧军官入党而变成战后匈牙利反动派主要工具的小农党获得了57%的选票。小农党在选举中获胜，鼓励了国内反动势力，他们掀起反对民主改革的逆流，其中特别想对土地进行反攻倒算。然而，这也从反面教育了广大劳动群众，有许多人摆脱了小农党的影响，并向坚决捍卫他们的利益的共产党靠拢。

1946年2月1日，匈共领导下的民主力量终于在战胜企图保持君主制政体的资产阶级教权主义集团后，迫使议会正式宣布匈牙利为共和国。但是，由于小农党是议会中的第一大党，故该党首领分别出任国家总统、议会议长和政府总理。

为了把民主改革继续推向前进，根据匈共的倡议，1946年3月5日成立了匈牙利共产党、社会民主党、民族农民党及工会组织参加的左翼联盟。左翼联盟积极领导了反对取消土改成果、清洗国家机关中的反动分子、争取实现监督银行和大工矿企业国有化的人民斗争。

1946年12月，由共产党负责的国家保安部揭露了法西斯地下组织“匈牙利兄弟会”头目和小农党右翼领导人策划的阴谋推翻人民民主制度的线索。随着调查的深入，有越来越多的小农党右翼头目被牵连进去。结果，小农党总书记科瓦奇·贝拉被捕，议长瓦尔加·贝拉出逃，总理纳吉·费伦茨则在访问瑞士后未敢回国。小农党右翼头目的倒行逆施和被捕或外逃，导致了小农党的崩溃，许多人退出了小农党。从此，匈牙利政治舞台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民主进步力量的重大转折。

1947年8月31日，匈牙利提前举行了议会选举。选举结果，匈共获得22%以上的选票，成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小农党在议会中退居第二位。但是，一些被开除或自行退出小农党的反动分子组建了几个新党并获得了相当数量的选票。这说明，反动势力在政治上仍有很大影响。9月23日，组成了以小农党领导人迪涅什·拉约什为首的新政府，但是，政府的其他主要成员大都是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代表。

1947年11月，匈牙利把银行收归国有。1948年初和同年夏，又分别把百人以上的工厂和教会控制的学校收归国有。至此，匈牙利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的阶段宣告结束。1949年8月18日，根据国民议会通过的宪法，宣布匈牙利为人民共和国。

(林和坤)

## 7.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政权的建立、巩固与“二月事件”

捷克斯洛伐克被德国占领后，贝奈斯在伦敦组成流亡临时政府，以哥特瓦尔德为首的捷共领导人在莫斯科组成捷共总部。捷克斯洛伐克国内抵抗运动分别接受捷共总部和伦敦流亡临时政府的领导。随着形势发展，1943年12月，贝奈斯访苏时曾同捷共领导人会谈，就各政党组织民族阵线问题达成协议。1945年1月，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前夕，斯大林对临时政府和捷共总部两方面都作了工作。1945年3月22日，各方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会谈，参加的有共产党、国家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等，捷共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会上争论最激烈的是关于政府组成问题。由于捷共坚持，决定总理由社会民主党人弗林格担任，无党派人士斯沃博达（后来参加捷共）任国防部长，扬·马萨里克任外交部长，捷共领导人哥特瓦尔德任民族阵线主席。1945年4月3日，在科希策市，贝奈斯根据莫斯科协议，任命弗林格为总理的新政府，5日，在一次隆重的仪式中，宣布了莫斯科通过的纲领，即科希策纲领。科希策纲领是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是参加民族阵线各政党的共同行动纲领。5月10日，布拉格解放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迁回首都。

1946年5月26日选举，捷共获得总票数的38%，成为第一大党。6月18日，共产党人萨波托茨基当选为制宪议会主席，19日制宪议会一致选举贝奈斯为总统，贝奈斯则授权哥特瓦尔德组成新政府。政府有26名成员：其中共产党占9名（包括总理、副总理各1名，部长7名）；社会民主党3名（副总理1名，部长2名）；国家社会党、人民党、斯洛伐克民主党各4名（副总理1名，部长3名）；无党派人士2名（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共产党人在政府中占多数，掌握了政府的重要部门。

1947年春夏之际，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先后抛出了“杜鲁门主义”与“马歇尔计划”，与苏联展开“冷战”，企图控制东欧，把东欧纳入亲西方的行列中。贝奈斯总统和外长马萨里克力主参加“马歇尔计划”，企图以此增强资产阶级政党在政府中地位，并且能控制共产党的势力。但由于遭到苏联反对而破灭。

1947年7月到1948年2月，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内的阶级矛盾也激化了，以国家社会党为首的资产阶级政党时刻想把共产党从政府中赶走，独掌政权。1947年7月，国家社会党头目在卡罗维发利召开秘密会议，制定反革命政变计划，准备建立一个包括人民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并争取社会民主党参加的反共阵线。

1947年夏末，国内发生了罕见的旱灾，农业歉收。资产阶级幸灾乐祸地说“情况越糟，对我们越好”。造谣说国内的经济困难完全是由于施行国有化和拒绝“马歇尔计划”而造成的结果，企图把全部责任归于共产党。为了克服困难，捷共一面请求苏联给予必要的援助，一面提高国内粮食收购价格，而粮食收购价格提高增加的国库支出，用征收“百万富翁”税来抵补等。这些积极措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却引起了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中右派分子的不满，他们积极在幕后秘密活动，聚集反革命力量，同时在群

众中制造混乱。他们为了得到国家公务人员的支持，建议普遍地大幅度地增加公务人员的工资，在社会民主党右翼支持下，在 1948 年 2 月 10 日的政府会议上得到通过。资产阶级政党以为旗开得胜，认为共产党的威信下降了。于是，加紧制造“政府危机”，企图利用提前选举，在“合乎宪法程序”的外衣掩盖下，推翻共产党占主导地位的政府。贝奈斯说，在选举中“共产党人将遭到失败，肯定会失败”。

1948 年 2 月 13 日，政府召开例会，国家社会党人、司法部长德尔蒂纳突然发言，指责内务部长（共产党人）擅自用共产党人来代替布拉格地区的 8 名警官，国家社会党纠合各资产阶级政党在会上以多数票通过决议，要求内务部长撤销调换警官命令。会后捷共立即召开主席团会议，要求全体党员提高警惕，并与内务部的保安部门和苏联大使保持直线电话联系，以便控制局势发展，粉碎资产阶级的夺权阴谋。

17 日早晨，国家社会党、人民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等经过协商，决定一致行动，向共产党发动进攻。他们奔走于美、英、法和梵蒂冈的驻捷使馆，寻求外国的支持。贝奈斯也鼓励他们，并保证说“至于我，我决不后退，你们可以指望我”。20 日上午 10 时，政府开会，国家社会党、人民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的部长没有到会，他们聚集在副总理增克尔的办公室，声称如不履行 2 月 13 日的决议，就拒绝参加会议，使会议没能开成。下午 3 时，3 个党的 12 名部长向贝奈斯递了辞呈，制造了“政府危机”。

20 日夜，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通过电台反复广播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主席团告全体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书”，严厉谴责制造政府危机的资产阶级政党，号召全体人民团结在共产党周围。同时，向基层党组织发出指示，要他们准备把反动分子清理出民族阵线，并在工厂中组织工人自卫队和民兵，党的干部们星夜出发，赶赴各地。21 日，全国各重要城市和工厂都举行了群众集会，在布拉格有 10 万人参加群众大会，会上哥特瓦尔德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演，全国各地纷纷要求总统批准 12 名部长辞职。22 日，哥特瓦尔德命令警察、保安团和军队进入紧急状态，占领了所有公共建筑物，布拉格掌握在共产党及其武装起来的军队和民兵手中。24 日中午 12 时，工厂汽笛长鸣，全国 250 万劳动者举行 1 小时总罢工，表现了人民坚决支持捷共。25 日，贝奈斯被迫同意 12 名部长的辞职，并签字同意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提出的新政府名单。1948 年 6 月 7 日，贝奈斯辞职，6 月 14 日，哥特瓦尔德为总统，共产党人萨波托茨基为总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人民在二月事件中获得了胜利。

二月事件是在美国发动“冷战”的国际形势下发生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资产阶级政党勾结西方，企图赶走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建立资产阶级政权。这是一次典型的资产阶级企图复辟的事件。结果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广大人民群众支持下，粉碎了资产阶级的阴谋，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人民取得了胜利。捷克斯洛伐克的人民民主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从此走上

了社会主义大道。

(刘士田)

## 8. 欧洲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与苏南分歧

1947年“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出笼，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严重威胁。东欧各国的反动势力蠢蠢欲动，阴谋策动反革命叛乱，企图推翻人民民主政权。斯大林与铁托等东欧党的领导人交换过意见，一致认为有必要建立一种情报机构，以便经常交流经验和作出各种决定。1947年夏，联共（布）中央写信给波兰工人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请波兰工人党出面发起召开欧洲一些党的会议，讨论加强欧洲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问题。

1947年9月22日—27日，苏、波、捷、匈、罗、保、南、意、法等九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各派两名代表，在波兰西里西亚的什克拉尔斯卡—波伦巴的小温泉场举行情报局成立会议。苏联代表日丹诺夫在会上作了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会议根据这个报告通过了《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宣言分析了战后国际形势的根本变化，指出世界已分裂为两大对立阵营，一个是帝国主义反民主阵营，另一个是反帝国主义民主阵营。宣言指出帝国主义阵营及其主导力量美国，为建立世界霸权和消灭民主制度正在进行侵略性的活动。宣言认为，各国共产党面临一项特殊任务，就是必须高举起保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旗帜。宣言号召反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必须团结自己的队伍，制订一个共同的行动纲领和策略，反对帝国主义阵营的主要力量，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英法同盟者。

会议在听取了哥穆尔卡关于各国共产党必须彼此交换经验和协同行动的报告后，决定成立情报局，由与会的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各派2名代表组成，南斯拉夫共产党派出的代表是卡德尔和吉拉斯。情报局的任务为组织经验的交流，必要时经过协商，互相采取配合活动。情报局总部设在贝尔格莱德，并创办一份机关刊物。

1948年1月，情报局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第二次会议，决定成立情报局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并常设编委会，由九国党各派一名代表组成，苏共代表帕维尔·尤金任主编。

情报局成立之初，对加强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协调各国共产党的行动，以及在争取和平反对战争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不久，由于苏南两党发生冲突，苏共通过情报局粗暴地干涉南斯拉夫内部事务，利用集体“制裁”手段把南共开除出情报局，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恶劣影响。

苏南两党分歧由来已久，早在二战期间两党就有分歧。苏联承认南斯拉夫流亡政府，不同意南共对流亡政府的政策。1943年11月，南斯拉夫成立临时政府，宣布剥夺流亡政府一切权力，禁止彼得二世国王回国。苏联外

交部下令，禁止发表这一消息，南共感到不可理解。

战后，在的里雅斯特领土归属问题上，苏南有分歧。二战结束时，英美看到的里雅斯特战略位置重要，派遣军队抢占这一地区，但南人民解放军先于它两天占领了该地，于是英美准备武力解决。当时苏联政府保持缄默，没有表示支持南斯拉夫。1946年4月，苏、美、英、法四国在巴黎召开外长会议，苏联事前不与南斯拉夫领导人商量，就独自做主，接受了法国关于的里雅斯特问题的提案。南斯拉夫对苏联的大国主义很不满。

在战后经济援助和合作问题上，苏南也有分歧。1946年，铁托访问莫斯科，就经济援助问题，同苏联领导人举行会谈。苏联希望南变成它的农产品和原料供应国，对南斯拉夫的工业化计划不感兴趣。在谈判建立苏南联合股份公司时，苏联坚持要在南斯拉夫工业和其他经济部门实行垄断权，同时要求苏南公司享有治外法权。双方经过长期争论，直到1947年2月，才达成建立两个苏南公司的协定：一是尤斯塔空运公司，一是尤斯帕德河运公司。协定的条款对南斯拉夫极为苛刻，南斯拉夫称它为“吃亏有份，沾光无缘”的典型样板。不平等的合营公司，自然引起南斯拉夫人民的气忿。

1948年1月，苏联《真理报》编辑部发表声明，宣布苏联政府不赞成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等国建立巴尔干联邦的计划，从而使南苏矛盾公开化。

1948年2月底，苏联外贸部部长助理通知南斯拉夫代表说，南没有必要再派贸易代表团来莫斯科。这意味着苏联同南斯拉夫断绝贸易关系。3月中旬，苏联决定撤走在南斯拉夫的全部军事顾问、教官和全部文职专家。

从1948年3月20日—5月22日，苏共中央和南共中央相互交换了一系列信件，阐明了各自的观点。苏共对南共提出多方面的指责：南斯拉夫有反苏情绪，迫使苏联撤走军事顾问和文职专家；南共放弃了领导作用，在建设中没有贯彻阶级斗争原则；南共党内生活不正常，民主气息不浓；南外交部有英国间谍等等。南共不同意这些指责，并一一进行解释，提出请苏共派一些中央委员到南进行调查研究，以解决双方的分歧。苏共不同意南共的解释，并拒绝了南共的要求，提议召开情报局会议讨论南共问题。

1948年6月20日—28日，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召开情报局第三次会议。除南共拒绝出席会议外，其他八个党都派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了《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决议指责南共在内政外交上执行一条脱离“马列主义的路线”，对外背离国际主义，走上民族主义道路，对内“放弃了马克思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修改了“马列主义关于党的学说”，已成为“富农党”。决议指出，南共已“处于情报局的队伍之外”。

6月29日，南共中央发表声明，对决议提出的各点进行了反驳，并指出情报局对南共的指责是不公正的，因而南共不承担任何责任。7月，铁托在南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作了长篇报告，进一步反驳了情报局的决议，同时还表示南共将竭尽全力改善与苏共的关系。

但是，情报局并未因南共的团结愿望而停止对南共的制裁。1949年11月，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情报局第四次会议，作出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在杀人犯和间谍的掌握中》的决议。决议指责南共“已由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完全变成了法西斯主义”；南共是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工具”，是人民的公敌；南斯拉夫已把“国家经济置于资本主义垄断资本的控制之下”等等。

情报局对南斯拉夫的决议公布后，引起一系列的反应，给南斯拉夫造成了经济、政治上的严重困难。由于苏联和东欧国家中断了同南斯拉夫的贸易，使南的经济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接着，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相继废除了同南的友好条约，苏联的坦克师开始出现在与南接壤的某些东欧国家，向南斯拉夫施加外交和军事压力。从此，南斯拉夫与苏联、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断绝了关系。

斯大林逝世后，在1955年5月27日—6月2日，苏南两党在贝尔格莱德进行会谈，发表了《贝尔格莱德宣言》，两国关系才恢复正常化。1956年4月17日，情报局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公布了八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结束情报局活动的公报。从此，情报局的历史便告终结。

（刘建）

## 9.1956年的“波匈事件”

### 波兹南事件和十月事件

战后初期在“冷战”形势下，苏联要求东欧各国按照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模式加速改造自己的国家，以保持与苏联的一致。对于苏联的要求，当时的波兰工人党总书记哥穆尔卡是反对的，他主张波兰应根据自己的国情建设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结果，哥穆尔卡被加上了右倾民族主义罪名，先被开除中央委员会，后又被捕入狱。与此同时，苏联派波兰出生的苏军元帅罗科索夫斯基参加波兰统一工人党（1948年12月由波兰工人党与波兰社会党左翼合并而成）中央委员会并担任波兰国防部长，加强对波兰的控制。

由于贝鲁特等波党领导人照搬苏联经验，致使波兰经济出现严重困难，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民主和法制也受到严重破坏。此外，苏联经常干涉波兰内政，并迫使波兰进行不平等交换。所有这一切都引起了波兰人民的不满。

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这是有利于波兰开始独立自主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但是，赫鲁晓夫在大会闭幕后随即作的攻击和丑化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又在波兰引起了思想混乱。面对这种形势，波党新领导人奥哈布（原波党总书记贝鲁特于参加苏共“二十大”后单独滞留莫斯科时猝然去世）曾对波兰的对内对外政策作了某些调整，如为哥穆尔卡恢复名誉，表示在对苏共关系上奉

行维护波兰独立自主的政策。但是，波兰领导人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改革旧有体制，也没有充分注意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

1956年6月上旬，波兹南斯大林机车车辆制造厂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和减少纳税。由于波兹南省地方政府无权就此做出决定，所以该厂便派代表团赴华沙找机械工业部请愿。部长表示，适当减税可以考虑，增加工资则是不可能的。当代表团把请愿失败的消息用电话告知本厂工人后，工人便按照事先做出的安排，于6月28日实行罢工和上街游行，并再次向市政当局提出增资减税的要求，但市政领导拒绝接见群众。这时，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乘机发难，在群众中散布去华沙的代表团已经被捕的谣言。于是，一场和平示威即刻变成骚乱。一部分人冲进人民会议、市委、军事检查署、广播电台，有的人打开监狱释放犯人，甚至有人向公安局发动了攻击，用轻武器向保安人员开枪。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出动了保安部队和坦克，对极端分子实行镇压。据事后公布的材料，在冲突中有5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323人被捕。这就是“波兹南事件”。

波兹南事件后，波党召开了二届七中全会。奥哈布在会议发言中把引起这一事件的主要责任归结为中央和地方领导者的官僚主义与愚昧无知。在革新派的努力下，会议通过了推行政治民主化与经济合理化的决议。8月，波党政治局决定将由哥穆尔卡出任党的第一书记，并建议罗科索夫斯基离职返苏。

苏联领导人鉴于对波兰政局失控，决定直接出面干涉。10月17日，苏军奉命向华沙方向移动。10月19日，是波党二届八中全会开幕日。是日晨，未被邀请的赫鲁晓夫突然率领一个由苏联党政军要人组成的代表团飞抵华沙。在这种情况下，波党领导人决定暂停召开八中全会，由政治局全体成员和哥穆尔卡同苏联代表团举行谈判。

在谈判中，赫鲁晓夫对波党领导大加指责，干预波党政治局人选，并以苏军正向华沙逼近进行威胁。对此，哥穆尔卡等人进行了坚决抵制。当时，华沙工人和学生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表示坚决支持哥穆尔卡，波兰武装力量也准备为保卫国家进行战斗。为换取波党领导人让步，赫鲁晓夫还曾以提供更多的经济援助进行诱惑，但也未能奏效。最后，赫鲁晓夫被迫承认波党政治局的组成是波党内部事务，波党领导人则表示愿同苏联继续保持友好合作关系。20日晨，苏联代表团返国。

苏联代表团离开华沙后，波党八中全会继续举行，哥穆尔卡当选为党的第一书记，罗科索夫斯基等保守分子被排除在政治局之外。11月，波苏双方举行了莫斯科谈判。经谈判，苏联承担了在相互平等的原则基础上发展波苏关系的义务。

## 匈牙利事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匈牙利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但是，由于拉科



西等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主要领导人在领导工作上一切都照斯大林的要求和苏联的方式去做，结果造成一系列严重失误。在 1948 年苏南关系破裂后，拉科西紧随苏联的指挥棒，在匈牙利大搞肃清“铁托分子”运动，致使匈党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拉伊克等一大批优秀共产主义战士成为这场运动的牺牲品，社会主义法制受到严重破坏。在国家建设方面，拉科西等人盲目照搬苏联模式，给匈牙利经济造成严重困难，人民生活水平明显下降。此外，拉科西及其支持者为博得苏联领导的信任，规定俄语为学生必修课，军队从建制到服装完全苏化。所有这一切，都引起了匈牙利人民的不满。

斯大林逝世后，因苏联开始清除个人迷信，拉科西被迫于 1953 年 7 月把政府总理的职位交给早就主张调整国民经济计划的纳吉·伊姆雷。但到 1955 年 3 月，拉科西又在匈党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指责纳吉搞修正主义和宗派活动。结果，纳吉先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随后又被开除出党。

苏共“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这时纳吉认为自己的政策是正确的，要求恢复党籍和工作。一些支持纳吉的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组成裴多菲俱乐部，揭露拉科西一伙的种种错误，要求纳吉执政。赫鲁晓夫看到拉科西已成众矢之的，为有利于苏联控制匈牙利政局，迫使拉科西辞去匈党第一书记职务，由受人批评较少、实际上却是拉科西的最亲密伙伴格罗取而代之。1956 年 10 月 6 日，匈政府为拉伊克等四名原匈牙利党政领导人的遗骸举行了国葬。10 月 14 日，匈党政治局为纳吉恢复了党籍。当时，匈牙利各地都效法中央，为过去的受害者平反昭雪和恢复名誉，人民情绪异常激动。

10 月 21 日，电波传来波党八中全会决议和哥穆尔卡当选第一书记的消息，给急速发展的匈牙利事态以巨大推动力。次日，裴多菲俱乐部向匈党中央提出包括开除拉科西党籍、让纳吉参加党中央工作、修改第二个五年计划、保证社会主义民主和实行工人自治等内容在内的“十项要求”。同日晚，布达佩斯大专院校学生团体联席会议决定向政府提出“十六点要求”，并约定 23 日举行声援波兰的游行示威。

23 日上午，几千名首都大学生走上街头，并很快增加到十多万人。游行群众一路涌向国会大厦广场，一路则前往电台大厦。在国会大厦广场上，纳吉在群众的一再要求下发表了讲话，但并没有使人们的情绪缓和下来。在广播电台大厦发生了更加严重的情况。由于在晚八时电台播送了格罗指责群众游行是“民族沙文主义骚动”的讲话，甚至扬言要进行反击，这就更加激怒了示威群众。在反动分子的挑动下，有人向电台警卫战士开枪射击，和平示威于是演变成反革命骚乱。

在布达佩斯街头发生武装暴动的同时，匈党中央和政府成员在中央大楼召开了紧急会议，改组了匈党政治局，纳吉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并在当夜被任命为政府总理。

将近 24 日中午，纳吉在电台向全国发表了讲话，称首都发生的暴动事

件是反革命事件，并宣布请求苏军协助平息叛乱，但也表示将实行政治和经济生活民主化。纳吉的这一讲话，更便利了反动分子乘混乱进行煽动，加速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反动势力在西方国家的支持下，在全国各地都采取了行动，造成严重的反革命恐怖局面。反革命分子和被释放出狱的罪犯到处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红衣主教明曾蒂公开号召推翻人民政权，实现反革命复辟。

面对来势汹汹的社会动乱，纳吉未能在政治上作出正确判断，竟把发生的动乱混同于他与拉科西集团之间的路线斗争。于是，他对反动势力作出了越来越多的让步，最后甚至宣布退出华约组织和请求西方国家保证匈牙利“中立”。

就在国家命运陷于极端危险之中的时候，在苏联支持下，卡达尔宣布解散业已失去信誉和实际上已在暴乱中瓦解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另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11月4日，以卡达尔为首的工农革命政府成立。在苏军的帮助下，镇压了叛乱。在苏军开始进攻布达佩斯后，纳吉及其支持者曾逃到南斯拉夫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后转赴罗马尼亚。1958年6月18日，经匈牙利当局审讯后被处绞刑。

在匈牙利事件中，死亡上万人，全年国民收入的1/4在动乱中被毁，国家受到了巨大政治经济损失。

（林和坤）

## 10. 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6日马林科夫继任党中央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等人被确定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不久，3月14日苏共中央全会决定，接受马林科夫解除他中央书记职务的请求，并选举赫鲁晓夫、苏斯洛夫等5人组成中央书记处。赫鲁晓夫作为党中央书记开始了他的活跃的政治生涯。

当时，斯大林逝世后，贝利亚掌管内务部。这个部在苏联具有特殊的地位，拥有从逮捕、侦察、审判到判决的全权。赫鲁晓夫感到贝利亚正利用这个部阴谋夺取最高权力，于是串连其他主席团委员，于1953年6月28日逮捕了贝利亚，把他作为“共产党和苏维埃人民的敌人”交法庭审判。12月，贝利亚等7人被处决。赫鲁晓夫解散了内务部，成立了隶属于部长会议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克格勃”）。

1953年9月，赫鲁晓夫被苏共中央全会选为党中央第一书记。1955年2月，马林科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申请”辞去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会议批准了这一“申请”，并选举布尔加宁为部长会议主席。

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对苏联的国内外政策进行了一些调整。为了发

展农业生产，解决粮食产量不足的问题，他提出了物质利益原则，以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同时掀起了大规模的垦荒和播种玉米运动。在对外关系方面，苏联于 1955 年恢复了与南斯拉夫的国家关系。

1956 年 2 月苏共召开“二十大”，提出了发展国民经济的“六五”计划的建议。赫鲁晓夫在他向大会作的报告的理论部分，谈到世界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的论点，实行缓和世界局势的对外政策。代表大会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并选举赫鲁晓夫为党中央第一书记，然后正式宣布闭幕。

从大会闭幕到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产生的短暂时间（至多只有一夜），是第一书记具有无限权力、独自工作的时间。赫鲁晓夫利用这个时机采取了重大行动。2 月 24 日大会闭幕的当天深夜，他突然通知代表再次开会，向他们作了长达 4 小时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即所谓《秘密报告》），任何一个外国代表团都没有被邀请出席。赫鲁晓夫谈到了斯大林破坏法制，批准大规模逮捕、镇压的“罪行”，还说斯大林应对农业危机和对外政策的失误承担“罪责”，他要人们肃清“个人崇拜”“在各个领域里的流毒”。

“二十大”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先后传达到党的积极分子、党员、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大学生当中。报告在苏联国内受到了多数知识分子的拥护，但也有某些地区，对斯大林的谴责不受欢迎，在格鲁吉亚爆发了反赫鲁晓夫的骚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要求苏联放弃非斯大林化的做法。

在苏共中央主席团内部，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和莫洛托夫，也对非斯大林化的新路线持公开的反对态度。赫鲁晓夫的报告，在人们感情上引起的反应太强烈了，以致赫鲁晓夫不得不暂时控制一下非斯大林化运动。在以后的几年里，他所实行的政策的特点是时放时收。1956 年 6 月，苏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决议肯定了斯大林对党、国家和国际工人运动所做的贡献，说明他的错误、罪过只是误入歧途、滥用权力造成的，而且对他滥用权力的程度也降低了调子。

“二十大”后，苏联在哲学、政治经济学、文学艺术、历史、教育等领域，逐步展开了对“个人崇拜”的批判。同时，进行大规模的平反活动，在“二十大”以后的几个月里，就有八九百万人得到平反昭雪。

1957 年，苏共党内斗争十分激烈。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等人组成反对派，决心将赫鲁晓夫赶下第一书记的位子。赫鲁晓夫访问芬兰回到莫斯科的第二天，他不得不面对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的一次会议。会议进行了三天，经过激烈的辩论，8 票对 4 票，赫鲁晓夫被撤销第一书记的职务。赫鲁晓夫拒绝接受这个决定，坚持要求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这个要求是合法的，因为党章规定，第一书记由中央委员会，而不是由中央主席团选举或撤换。反对派竭力阻挠中央全会的召开，并准备逮捕赫鲁晓夫。但是反

对派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克里姆林宫的保卫工作由 A·谢洛夫管，军队的领导人是朱可夫元帅，他们站在赫鲁晓夫一边。为了使更多的中央委员能到莫斯科来，朱可夫下令动用军队的飞机，结果有 100 多名中央委员集合在克里姆林宫，造成了不能不开中央全会的局面，因为到会的中央委员人数已经符合党章关于 1/3 以上中央委员即可召开例行全会的规定。中央全会于 6 月 22 日召开，几乎是不间断地持续了 30 多个小时。结果赫鲁晓夫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全会通过了《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他们被开除出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这次全会大大巩固了赫鲁晓夫的地位。1958 年 2 月，布尔加宁因参加“反党集团”而被解除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赫鲁晓夫兼任政府首脑。苏联的党政大权集中在赫鲁晓夫一人之手了。

在经历了斯大林的作风之后，很多人喜欢赫鲁晓夫的平易近人，并且十分欣赏他在国内来往穿梭般的短期视察和引人注目的出国访问，以及连续不断的、频繁的讲话。这时期，政治空气较有生气，工人农民的生活水平也有提高，住房建筑有所发展，赫鲁晓夫的威望增高了，到 50 年代末，围绕赫鲁晓夫形成了新的“个人崇拜”。赫鲁晓夫自恃地位巩固，大权在掌，威望空前，越来越不谨慎。他在国内政策和外交事务上，都随心所欲地行使全权。由于新的“个人崇拜”，他的身上笼罩着一贯正确的光环。同时，对高级干部的接二连三的迅速更换和重新任命，防止了反对派集团的形成。他推行其计划的速度，常常不给任何人以时间预测或估价可能产生的后果。

赫鲁晓夫在国内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其中许多项改革缺乏周密的考虑。他强行撤消中央 40 个部中的 27 个部，把全国划分为 105 个经济区，每区设国民经济委员会，直接管理所属企业；命令农业部、中央农业机构、农业学院由城市搬到农村；取消农业机器拖拉机站，要集体农庄必须在一年内把机械买过来；1958 年取消农产品的义务交售制，实行国家收购制。赫鲁晓夫还认为，核武器的出现使常规部队失去了它过去的意义，因此大规模裁军。上述改革，速度之快十分惊人，但其效果却极不理想。赫鲁晓夫时期，虽然苏联的工业和科学技术有很大发展，尤其在 1957 年还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但是农业问题仍很严重。谷物产量在 1958 年达到 1.3 亿吨，1963 年降为 1.07 亿吨。1961—1964 年每人平均的粮食产量甚至低于 1913 年的水平。一年生产的全部粮食，当年就消耗完了，没有剩余可供国家建立粮食储备。赫鲁晓夫不得不一面恢复配给制，一面动用黄金储蓄，向国外购买大批粮食。凡此种种，引起了各阶层人民的不满。

在对外政策方面，赫鲁晓夫逐步推行霸权主义政策，造成了中苏关系的恶化。1958 年，苏联领导人无理要求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企图从军事上控制中国，遭到了我国政府的拒绝。1969 年，苏联政府片面撕毁了中苏关于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妄图阻止我国掌握核武器。1960 年，赫鲁晓夫以典型的突然袭击

的方式，擅自撤走在中国工作的上万名苏联专家，撕毁了几百个协议和合同，使中国的经济受到破坏。1962年，苏联在我国新疆伊犁地区进行颠覆活动，胁迫6万多公民去苏联。

在与西方的关系上，赫鲁晓夫在“二十大”制定了和平共处的外交总路线，推行缓和政策。但是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赫鲁晓夫自恃苏联经济、军事力量的增强，企图与美国共同主宰世界。为此，赫鲁晓夫于1959年9月访问美国，在戴维营和艾森豪威尔总统举行了战后美苏首脑的首次会谈。苏联此后大肆宣扬的“戴维营精神”，实际上是“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一次勾结。美苏之间出现了既勾结又争夺的局面。1962年10月发生的古巴导弹事件，证明了当时美苏争霸的局面，战略优势在美国方面。

赫鲁晓夫掌握全权后的不成功的国内外政策，及其独断的、有时极其粗鲁的作风，使他于1953年至1958年间成功地建立起来的威望，在1961年至1962年间骤然下降。对公众舆论变化的寒流十分敏感的赫鲁晓夫，这时又一次乞灵于谴责斯大林。在1961年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又公布了斯大林一些令人震惊的反人道主义的“罪行”材料。斯大林的经过防腐处理的尸体被从红场的陵墓中移出，葬在克里姆林宫墙附近的一座小陵墓里。与此同时，在全国各地销毁了这位前领袖所有的肖像和纪念碑，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地方全改了名字，斯大林格勒改称为伏尔加格勒。

非斯大林化再也帮不了赫鲁晓夫的忙，正是他自己的错误、轻率使他失去了权位。1964年10月14日，苏共中央全会决议：解除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中央主席团委员兼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全会选举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次日，柯西金接替赫鲁晓夫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

(严志梁)

## 第四章 1945年至60年代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 1. 战后初期的中外关系

经过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成为世界五大国之一。这是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血战而赢得的国际地位，也是战争后期反法西斯阵线内部国际冲突的产物。美国领导集团考虑到战后与苏联、英国抗衡，需要一个亲美的中国站在美国一方，于是便支持中国取得大国地位。而中国的蒋介石政府为了“反共”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也把投靠美国作为基本国策。中美关系问题在战后初期的中外关系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

美国为了确保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永远听命美国，它的对华政策方针是扶蒋反共。赫尔利于1944年9月以总统私人代表身份来华，年底任驻华大使。他的使命就是执行这一方针，声称“支持蒋介石作中华民国的主席与军队的委员长”；“统一中国境内一切军事力量”。他途经莫斯科，与莫洛托夫会谈，取得了苏联的保证，接着他便在国共两党之间进行活动，要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为取得苏联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美国还促成了蒋介石派代表两次去莫斯科谈判，结果于1945年8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时签订了有关大连、旅顺口、长春铁路租借给苏联使用的协定，以及关于外蒙古问题的换文等。

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美国又支持蒋介石包揽接受日伪投降的权利。美国还大规模地运送国民党军队到东北、华北抢占战略要地。美军还公然进入天津、青岛、北平、上海、南京、唐山、开平、秦皇岛、静海等地。蒋介石密令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解放区，遭到解放区军民迎头痛击。赫尔利以和平方式诱骗共产党交出军队的活动完全破产，被迫于1945年12月27日辞职。杜鲁门立即又任命马歇尔为总统驻华特使，以所谓“调停”来继续执行扶蒋反共政策。

1946年初，国共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建立了由国共双方及美方各派一名代表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停战协定的实施。在马歇尔“调处”的同时，美国还从各方面加强蒋介石集团。1946年3月，成立了美国派驻国民党政府的军事顾问团，协助蒋介石加紧部署全面内战，把大批国民党军队运往东北。至6月底，已用美国飞机和军舰将54万多国民党军队运到进攻解放区的前线。此外，还装备了国民党军队55个师，为国民党训练陆、海、空军以及特务、交通警察、参谋、军医、军需等军事人员15万人。1946年6月底，蒋介石终于发动了全面内战。

7月初，美国又以长期在中国居住的前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出任驻华大使，参与“调处”活动。接着把9亿美元的“剩余物资”卖给国民党政府，其中有许多军事物资，足够蒋介石打两年内战之用。并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条约》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协定，既加强对国

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又在中国取得了领土权、领空权、内河航行权、商业特权以及内政、外交、司法等方面的特权。

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攻占早已由人民武装从日军手中解放的张家口。蒋介石立即下令片面召开由国民党一党操纵的伪“国大”，国共两党间已无谈判的基础。1947年1月8日，马歇尔承认“调处”失败，离华返美，放手让蒋介石打内战。马歇尔所谓力争政治解决的“调处”事实上成了掩护蒋介石“假和谈真备战”的烟幕。

由于解放区军民节节胜利，在如何挽救国民党政府免遭崩溃的问题上，美国统治集团内众说纷云，莫衷一是。他们不甘心放弃国民党政府，经过一番争吵后，1948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1949年援华法案》，给国民党政府5.7亿美元的援助。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后，美国统治集团看到国民党败局已定，在积极扶植“第三势力”的同时，又策划蒋介石退居幕后，由李宗仁出面进行“和谈”。但这一切都挽救不了国民党政府的崩溃。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蒋介石集团逃到台湾省。8月2日，司徒雷登悄然离开中国。杜鲁门为了推卸“失掉中国”的责任，指使国务卿艾奇逊于8月5日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把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原因归之为国民党的腐败黑暗，同时也透露了一些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的真相。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它得到全世界人民的支持和关注。新中国从一开始就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共同纲领》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最先承认新中国的有苏联和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亚洲的朝鲜、越南、和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印度尼西亚等。西欧、北欧国家有瑞典、丹麦、瑞士、芬兰、荷兰及英国等。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莫斯科签订，同时签订的还有关于长春铁路、大连、旅顺口移交中国和苏联贷款给中国的协定。条约中曾提出了“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这些原则后来被中国政府发展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政府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对我国封锁禁运；冻结我国在美资产；继续支持台湾蒋介石集团。最后，中美双方在朝鲜战争中交锋。

（李凡）

## 2. 朝鲜的分裂与北方人民政权的建立

《开罗宣言》曾指出：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期间，美苏达成战后由中美英苏四国对朝鲜实行托管的非正式谅解。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苏联红军即开进朝鲜，配合金日成领导的朝鲜人民革命军，进行解放祖国的斗争。美国为独霸朝鲜，急于堵住苏军南下。杜鲁门和斯大林通过绝密信件于8月15日商定，在朝鲜以北纬38度线为界，美、苏军队分别接受日军投降。于是，苏军退回“三八线”以北，美军在“三八线”以南登陆。这条为接受日军投降而临时划分的界线，后来却变成美苏两国军事占领区的分界线。

朝鲜人民迫切要求建立独立统一的国家。8月17日，各方面爱国民主人士在汉城成立了朝鲜独立筹备委员会，各地也纷纷建立人民委员会。9月6日，各地人民委员会的代表在汉城聚会，决定建立“朝鲜人民共和国”。可是，第二天美国驻太平洋地区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却宣布：暂由他本人行使“三八线”以南的一切政府权力；原日本殖民政府人员继续留职履行公务。随后，在美军到达地区，立即解散了当地已建立的人民委员会，复活了日本的殖民统治机构。

12月，莫斯科三外长会议决议，中美英苏四国托管朝鲜五年，尽快地建成独立统一的国家，决定设立“临时朝鲜民主政府”。为组成临时民主政府，由朝鲜南北的美苏司令部的代表组成“联合委员会”。

1946年3月20日，美苏联合委员会开始在汉城讨论同朝鲜各民主组织协商建立临时民主政府问题。由于美国蓄意独霸朝鲜，直至4月18日才决定，必须以拥护莫斯科外长会议协议为参加协商的民主政党和社会组织的条件。随后双方分别提出南北朝鲜参加协商的组织名单，由于美方故意在民主组织的解释上纠缠不清，会议休会一年多才于1947年5月21日复会，在审定协商组织名单时，双方严重对立，未取得进展。10月18日，美国单方在第二届联合国大会上提议终止美苏联合委员会的工作。建立临时民主政府的工作因美国干扰而失败。

早在联合委员会召开之前，美国占领军当局在朝鲜南部建立的军政府就加紧纠集反共力量。1945年10月5日，设立了由亲日派头目金性洙等组成的“顾问会议”。把“76年中在美国混了37年”的李承晚接回朝鲜。1946年2月，组成以李承晚为议长的所谓“民主议院”。8月，设立所谓朝鲜民事行政机关。12月12日，美国军政府又下令成立“立法议院”。

经过以上准备之后，美国于1947年11月操纵第二届联合国大会通过成立“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948年1月到朝鲜“监督选举”。5月10日，美李集团不顾朝鲜人民的反对，在朝鲜南方非法选举“国民议会”。投票前，美国军政府大肆迫害爱国进步人士；投票时，戒备森严，出动大批军警特务，胁迫居民投票。结果只有30%的选民参加投票。7月12日，伪“国民议会”通过“大韩民国宪法”，8月15日成立“大韩民国”傀儡政府，李承晚当了傀儡“总统”。由美国一手操纵分裂了朝鲜。



南朝鲜人民反对美李集团的倒行逆施，要求祖国统一的斗争不断高涨。工人罢工，人民起义，游击队出击，甚至伪军也发动起义。南朝鲜人民要求独立和统一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美李集团的反动统治。

针对美国的分裂活动，1946年2月9日，朝鲜北方人民选举产生了以金日成为首的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1946年3月5日，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土地改革法，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1946年8月10日，又颁布了国有化法令，铲除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使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占据领导地位。还颁布和实行劳动法令以改善劳动人民的状况。对教育、文化、保健等部门也进行了民主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1947年2月，正式选举产生了北朝鲜人民会议。2月21日，成立北朝鲜人民委员会，金日成再次当选为委员长。1948年2月8日建立了朝鲜人民军。

在美李集团悍然宣布成立“大韩民国”傀儡政府的10天后，即1948年8月25日，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劳动党团结全国各民主党派联合宣布在全朝鲜举行普选，建立统一的朝鲜政权。北朝鲜有99.97%的选民参加投票。美李集团虽在南朝鲜残暴阻挠破坏，仍有77.52%的选民通过一定方式参加投票。南北合计，参加投票者占全部选民的85.2%。选举产生的最高人民会议于9月2日开幕，会议通过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宪法，选出了常任委员会，批准并成立了以金日成为首相的朝鲜中央政府。9月9日正式宣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使北方走上了独立自主建设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成为强有力的革命民主基地，使美国独霸朝鲜的野心遭到沉重的打击。

(李凡)

### 3. 朝鲜战争

朝鲜分裂后，南北两方形成鲜明对照。美国扶植起李承晚傀儡政权后，与之签订了《韩美军事协定》、《韩美财政及财产协定》、《韩美经济援助协定》等一系列支持和控制李承晚集团的条约。派去大规模的军事顾问团，把朝鲜南方纳入美国的殖民经济和军事体系之中。李承晚集团在对外卖国的同时，对内变本加厉地实行法西斯统治，仅1949年就以违反所谓“国家保安法”的罪名逮捕了118,621人。傀儡军还以“讨伐游击队”为名，大肆屠杀爱国人民，南朝鲜人民坚决反抗美李集团的法西斯统治。1948年4月，济州岛人民举行武装起义。同年10月，驻丽水伪军一千多人宣布起义，得到市民和学生的支持，驻光州、大丘的伪军也奋起响应。1949年7月，汉城爆发总罢工。同年11月，全罗南道又爆发起义。各地人民还组织游击队，不断出击。到1949年秋，游击队已发展到可以正面进攻大城市并能和伪军

师一级兵力作战的规模。美李集团的统治岌岌可危，就企图以“北伐”来“摧毁”人民反抗斗争的革命基地，达到独霸朝鲜的目的。为进行舆论准备，李承晚不断鼓吹“北伐”，为进行军事试探，仅 1949 年一年就沿“三八线”挑起军事冲突 2,600 多次。

1950 年，美国全国加强军备。1 月，美李签署所谓“美韩共同防御合作协定”，使李承晚敢于挑起内战。2 月，李承晚访日，同麦克阿瑟进行密谈。6 月 17 日，杜勒斯访日，随即到朝鲜“三八线”“视察”，并在南朝鲜“议会”鼓励反共，22 日再返日本同麦克阿瑟会谈。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长约翰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也于 4 月 18 日赴日同麦克阿瑟密谈。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了。当天，美国迅速利用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不在场的机会，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侵略者”的决议，暴露了美李集团早有预谋。

战争过程可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0 年 6 月 25 日至 9 月 15 日，即战争爆发到美军在仁川登陆之前。战争爆发当天，朝鲜人民军即迅速粉碎了李伪军的进攻，并越过“三八线”进行追击。6 月 27 日，杜鲁门发表声明，声称美国决定干涉朝鲜内战，宣布派美国的海空军侵朝。同时，命令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阻挠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6 月 28 日，朝鲜人民军解放汉城。6 月 30 日，美国命令陆军侵朝，三天后即进入朝鲜。7 月 7 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项使美国盗用联合国旗帜掩盖其武装侵略的决议，授权美国组织“联合国军”干涉朝鲜，麦克阿瑟被任命为“联合国军”总司令。以后，美国纠集英、法、土、加、澳、希、菲、荷、新西兰、南非、比、卢和埃塞俄比亚等十五国参加侵朝战争。美李集团虽然作了长期的战争准备，但在朝鲜人民军的反攻下，短时期内就一败涂地。到 9 月 15 日为止，朝鲜人民军已解放了南朝鲜 92% 以上的人口和 90% 以上的地区，把美李军压缩到以大邱、釜山为中心的东南沿海一小块地区之内。

第二阶段，1950 年 9 月 15 日至 10 月 25 日。即美军在仁川登陆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美国为了挽救败局纠集了它在远东所能使用的兵力，甚至非法使用了日本的一部分舰艇和军队，共达 500 架飞机、300 艘军舰和 5 万多军队，于 9 月 15 日在朝鲜中部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由于主力南下，受到从后方包围的威胁，便决定从前线作有计划的后撤。战场形势恶化，战争进入艰苦时期。9 月 28 日，美军占领汉城。10 月 20 日，侵占平壤，并把战火烧到中朝边界鸭绿江和图们江边。美国的飞机不断越过国境对我国东北地区进行轰炸扫射。美国的好战分子还叫嚣“在历史上鸭绿江并不是两国截然划分的不可逾越的障碍”。我国的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

第三阶段，1950 年 10 月 25 日至 1951 年 7 月 10 日，即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到朝鲜停战谈判开始。面对美国的侵略威胁，为了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中国人民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在麦克阿瑟所宣称的“南北

朝鲜各地的正式抵抗都将告终” 的日期前十天，以彭德怀为司令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于 1950 年 10 月 25 日跨过鸭绿江，同朝鲜人民军并肩战斗。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扭转了朝鲜战局。1950 年 10 月 25 日至 1951 年 5 月下旬，朝中人民军队取得了五大战役的胜利，歼敌 23 万余人，把美军及其帮凶军赶回到“三八线”附近，并一度解放汉城。美军在战场上的失败，引起美国统治集团内部争吵，当麦克阿瑟扬言要将侵略战争扩大到中国东北及沿海地区时，杜鲁门下令免去麦克阿瑟总司令职务，由李奇微继任。此后，朝中人民军队采取积极防御的阵地战，形成以坑道为骨干的防御体系，使战线逐步稳定下来。美国在军事失败、国内矛盾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下，被迫同朝中方面进行停战谈判。

第四阶段，1951 年 7 月 10 日至 1953 年 7 月 27 日，即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到停战协定签字，是边谈边打阶段。1951 年 6 月 23 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提出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6 月 30 日，美国表示愿意和朝中方面举行谈判停战的会议。1951 年 7 月 10 日，朝鲜停战谈判在“三八线”附近的开城开始。但由于美方缺乏诚意，在军事分界线、战俘遣返等问题上提出许多无理要求，并发动大规模攻势，妄图造成有利于他的谈判形势，致使谈判经常中断，只是在进攻被粉碎时才不得不回到谈判桌上来。1951 年 10 月 25 日，在美李军“秋季攻势”失败后，停战谈判在开城附近的板门店复会。11 月 27 日，双方就军事分界线问题达成协议。1952 年 1 月 28 日，美国在朝鲜北部和我国东北，开始大规模的细菌战，也被中朝人民粉碎。2 月 27 日，双方就关于召开高一政治会议来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达成协议。5 月 2 日，双方解决了停战的具体安排的各项问题，只剩下战俘问题由于美方故意阻挠，未能达成协议。此后，美国飞机轰炸鸭绿江发电厂和我国丹东市，美军又于 1952 年 10 月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控制的上甘岭阵地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再度使谈判中断。战役进行了 43 天，以美国损兵折将 25,000 余人告终，使上甘岭成为美军的“伤心岭”。1952 年 11 月，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以许诺设法尽速结束朝鲜战争而获胜。1953 年 3 月 30 日，周恩来总理发表了关于停战谈判的声明，提出遣返战俘的新建议。中断了六个月的谈判正式复会。6 月 8 日，双方就遣返战俘问题达成协议。当停战协定即将签字生效时，美李集团节外生枝，制造了劫走我方战俘 27,000 人的事件，破坏停战。为打击侵略者，朝中人民军队发动金城反击战，一举歼敌 12 万多人，将战线大大向南推进。1953 年 7 月 27 日，美国侵朝军总司令克拉克急忙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克拉克哀叹：“我是美国第一个在没有胜利的协定上签字的将军”。协定签字后 12 小时，全线实现停火。

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标志着朝鲜祖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在历时三年的战争中，朝中人民军队用劣势装备打败了优势装备的敌人，歼敌 109 万多人，其中美军 39 万多人，击落击伤敌机 12,200 多架，击沉击伤敌舰 564 艘，击毁击伤坦克 3,000 多辆，把侵略军赶回到“三八线”附近，粉碎了美国

独霸全朝鲜的阴谋，保障了朝中两国的安全，维护了远东和世界和平。

朝鲜战争打乱了美国称霸全球的战略部署，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承认：美国是在一个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敌人进行的一个错误的战争。

朝鲜战争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

（李凡）

#### 4. 越南独立与抗法战争

在反法西斯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形势下，1945年8月13日至15日，印度支那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发动全国总起义夺取政权的决议，成立了总起义委员会，发布了总起义命令。

1945年8月16日至17日，越南国民大会通过了“夺取政权，在完全独立的基础上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等十大政纲，选出了以胡志明为主席的民族解放委员会——越南临时政府。

8月17日和18日，首都河内数十万群众举行总罢工和示威游行，由工人和学生组成的起义军占领了国家机关、邮电局和车站，解除了部分日军武装，19日，河内解放。不久，全国各地人民纷纷起义，建立了人民革命政权。8月24日，阮氏王朝的末代皇帝、日本傀儡——保大被迫宣布退位，八月革命取得了胜利。

9月2日，胡志明主席在河内巴亭广场举行的50万人群众大会上向越南人民宣读了越南“独立宣言”，代表全体越南人民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光荣诞生。

越南八月革命粉碎了越南千余年来的封建制度和30年来的殖民统治枷锁，揭开了越南历史的新篇章。八月革命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亚洲的殖民体系，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特别是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

帝国主义势力不甘心退出印度支那。1945年9月23日，在美英支持下，法军占领西贡，在越南南方挑起侵略战争。法国殖民者的意图是先占领南方，再进攻北方。越南人民的顽强抵抗使法国殖民者的狂妄企图未能得逞。于是，法国殖民者玩弄和谈骗局，以便争取时机，重新部署兵力，挑起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

1946年3月6日，越法在河内签订《越法初步协定》，规定法国承认越南为一个自由的国家，拥有自己的政府、国会、军队和财政。9月14日，越法在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又签订《越法临时协定》，规定双方停止一切敌对行为和暴力行为。

但法国殖民者一再破坏协定，不断扩大侵略战争。1946年11月法军占领越南北部的海防和谅山，12月19日进攻河内。12月20日，胡志明主席发表告越南人民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坚决抗击侵略者，拯救祖国。从此，越南人民长达八年之久的抗法战争全面展开。

战争初期，法国远征军数量为9万人，到战争结束前为25万人，法国在南越的傀儡部队的数量到战争结束前为21.5万人。整个印度支那战争期间法国都得到了美国的援助，1954年美国的援助占法国在越南全部军费开支的80%。战争初期越南人民军只有2万人。法军依靠数量和装备上的优势，狂妄宣称五、六个星期就可征服越南，为此制定了速战速决战略。印度支那共产党根据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制定了持久的抗战方针，将战争分为防御、相持和反攻三个阶段。

在防御阶段（1946年12月至1947年12月）越南人民军放弃了主要城市，其中包括河内（1947年2月17日放弃）。越南人民军一部分主力在正面战场打击敌人，另一部分转移到农村、山区和森林中，深入敌后大力开展游击战争，以“保存自己的主力，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

1947年10月，法军对北越解放区发动进攻，妄图消灭人民军主力，摧毁抗战政府根据地。越南人民军在诱敌深入后，痛击法国侵略军，到12月下旬歼敌7500人，并收复大施、宣光，一直打到河内近郊，法国速战速决战略彻底破产。开战一年来法军共伤亡6万余人，法国被迫放弃战略上的全面进攻，越南人民的抗法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在相持阶段（1948年初至1950年12月）法军从大规模进攻转为在被他们占领的越南地区固守，从速决战转为利用越南的人力、物力来维持长期战争，以越南人打越南人。1948年5月，为法国效劳的保大傀儡政府和军队成立。

针对战争形势的变化，越南军民坚持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的方针，在北部山区不断扩大抗战根据地，以广大农村长期包围法军占领的城市，并巩固和扩大人民军队。1948年至1949年，越南军民胜利地进行了东北、西北、乌江、洮江战役，粉碎了法国“以越南人打越南人”的阴谋。

越南人民的抗法战争自始至终得到了中国人民的支持和援助。新中国的成立和1950年1月18日中越建交，极大地鼓舞了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新中国成为越南人民争取彻底解放的坚强后盾。

1950年9月，在中国顾问团协助下，越南军民发动边界战役，歼灭法国远征军1万人，到1950年底，解放了靠近越中边界的越南北部东溪、老街、谅山等城市，扩大了北越解放区，打通了长达750公里的中越边界线，越南军民完全掌握了越北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

反攻阶段（1951年初至1954年春）到来后，越南军民向法军连续发动进攻。1951年，越南军民发动了中游、东北、西北、宁平战役，使法军处境更为被动。

1952年冬，越南军民发动大规模攻势，解放北部重要城市义路，并渡过黑水河解放山萝。尽管法军处境困难，但仍然垂死挣扎，1953年5月，法军为挽回败局，任命纳瓦尔为印度支那总司令，并在美帝策划下制定“纳瓦尔计划”，向越南人民疯狂反扑，越南军民决定给侵略者以毁灭性打击。

1953年10月，纳瓦尔向清化、宁平解放区发动进攻，遭到越南人民沉重打击，损失3800人。1953年人民军解放西北重镇莱州。

到1953年冬，除奠边府外，越南西北地区全部解放，越南劳动党（1951年2月印度支那共产党改名为越南劳动党）决定1953年至1954年冬春对盘踞在奠边府的法军主动进攻，夺取抗法战争的全面胜利。

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全国军民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口号下动员起来。20万民工为奠边府战役服务，民工们修筑了上百公里的战略公路，挖了成百公里的交通壕，把军需物资源源不断送往前线，以确保战役的胜利。

1954年3月13日，奠边府战役打响了，驻守在奠边府的法军被越南人民军团团围住。法军在奠边府共设置49个据点，构筑了长12公里、宽6公里的强大火力网，美法将领自以为他们的钢骨水泥工事十分坚固，无法攻破。越南军民发扬决战决胜的精神，摧毁了法军一个又一个碉堡，经过55个昼夜的激战，5月7日，人民军解放奠边府，歼灭敌人1.6万余人，活捉了法军司令戴卡斯特利，这就是著名的奠边府大捷。

1954年7月初，人民军乘胜前进，又解放了南定、宁平、太平、府里，法军在印度支那战场遭到残败。在这种形势下，法国被迫同意在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内瓦协议上签字，承认越南、老挝、柬埔寨的独立。

（李昌德）

## 5. 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

1945年9月法国殖民者发动了对越南的武装进攻后，1946年10月和1947年3月又先后入侵柬埔寨和老挝，印度支那三国人民齐心协力，奋勇抗击侵略者，法军在印度支那战场遭到重大损失，从1946年12月至1954年7月法军共伤亡46.6万余人。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法国在印度支那发动的侵略战争直接威胁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包括法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各国人民强烈要求结束这场战争，恢复印度支那和平，法军在印度支那战场遭到接二连三的失败，这一切迫使法国同意召开国际会议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地区和平问题。

1954年2月，苏美英法四国外长柏林会议决定召开日内瓦会议，以讨论

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的和平问题。

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在日内瓦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苏联、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美国、英国、法国等23个国家的代表团1000多人。

日内瓦会议分两部分交叉进行。会议的第一部分4月27日至6月15日讨论了朝鲜问题。参加朝鲜问题讨论的除朝、中、苏代表外,还有侵朝的15个国家和南朝鲜李承晚集团。会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提出了恢复朝鲜统一和举行全朝鲜自由选举等方案,但由于美帝国主义的阻挠和破坏,朝鲜问题未能达成任何协议。

会议的第二部分,5月8日至7月21日讨论了印度支那问题。参加会议的有中、苏、美、英、法、越南民主共和国、柬埔寨、老挝及南越代表。

讨论一开始,法国代表团无视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民族权利,提出了一个解除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武装、破坏日内瓦会议的方案,该方案遭到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国代表团的坚决反对。5月10日,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提出了承认印度支那三国的主权与独立,撤出一切外国军队,实行人民自由普选等八条建议。该建议得到了老挝、柬埔寨及中国等国代表团的大力支持。

最初法国代表团追随美国,完全拒绝这些建议,一再阻挠恢复印度支那和平。但国际进步舆论的强大压力,法国人民反战的强烈要求,法美在印度支那的矛盾和冲突,法军在印度支那战场的惨重失败,终于导致6月12日阻挠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法国拉尼埃内阁下台。6月18日,由愿意结束印度支那战争的孟戴斯—弗朗斯组阁。法国新政府正视现实,要求摆脱美国影响,使美国处于完全孤立的境地。由于中、苏、越等国代表团坚持不懈的努力,7月21日,法国代表终于被迫在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内瓦协议上签字。

日内瓦协议包括“关于在越南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关于在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关于在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及“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

日内瓦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关于军事条款规定,在北纬17度线以南、9号公路稍北划定越南临时军事分界线,但协议指出“军事分界线是临时性界线,无论如何不能解释为政治或领土的边界”,停战协定签字后300天内,越南人民军和法国军队要分别在军事分界线以北和以南集结;在老挝和柬埔寨双方一切部队停止一切敌对行动,实现印度支那全境停火,停火后法国必须从印度支那全部撤出自己的军队。禁止任何外国向印度支那三国派遣军事人员,运送武器,但老挝、柬埔寨自己所需的武器、弹药不在此限。协议规定印度支那三国承担义务不容许任何外国建立军事基地,印度支那三国不参加任何军事同盟。

关于政治条款规定,法国政府必须尊重越南、老挝、柬埔寨的独立、主

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三国在规定的期限内进行全国自由选举，以实现统一。越南应在 1956 年 7 月实行全面的自由普选，以实现国家的统一。

关于军事监察和监督问题规定，三国都设立由双方司令部同等数量的代表组成的联合委员会协助双方执行协定的条款，保持双方联系及解决在执行协定条款中可能发生的争端，并在三国设立由波兰、印度、加拿大代表组成的国际委员会，负责监察协定的实施。

美国虽然参加了日内瓦会议，但拒绝在协议上签字，由于害怕世界舆论的谴责，美国代表团被迫发表声明，不使用武力和威胁妨碍日内瓦协议的实施。

日内瓦协议的签订，是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抗法战争的胜利成果，是包括法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日内瓦会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协议的签订，为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安排了走向和平统一的道路，为在越南北部国土上完成民主革命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条件。

美国本来不愿意恢复印度支那和平，日内瓦协议墨迹未干，美国就背弃了自己的诺言，竭力破坏日内瓦协议，取代法国，加紧对印度支那的干涉和侵略活动。

1954 年 9 月，美国同英、法、新西兰、澳大利亚、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在马尼拉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即“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第二年，条约生效时，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总部设在曼谷。宣布柬埔寨、老挝和南越是在“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所适用的范围之内，这样，美国就公开破坏了日内瓦协议关于印度支那三国不参加任何军事集团的条款。

在老挝，当富马亲王为首的老挝王国政府同寮国战斗部队进行谈判以实现统一时，美国从中破坏，老挝爱国力量不顾美国的破坏，于 1957 年 11 月成立了有寮国战斗部队人员参加的联合政府。但美国政府施展各种手段，于 1958 年 7 月搞垮了联合政府，1959 年 5 月挑起老挝内战。

在越南，在美国的指使下，1955 年 10 月 26 日，南越废黜保大，宣布成立所谓“共和国”，美国的走卒吴庭艳任伪总统，从而导致南、北越南的长期分裂。

(李昌德)

## 6. 印度、巴基斯坦的独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度人民掀起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新高潮。1946 年 1 月，孟买、加尔各答等地的工人大罢工，高呼“英帝国主义滚出印度去！”同月，英印军队中的印度籍飞行员也罢工，抗议种族歧视，要求享受平等权利。1946 年 2 月 18 日，孟买训练营的印度籍水兵爆发起义。次日，孟买港内 20 艘舰船的水兵 2 万人到市内游行示威，高呼打倒帝国主义！随即得到



了群众的支持，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卡拉奇、马德拉斯等港的水兵相继响应。到 21 日，几乎全印度的印度籍水兵都卷入了这场声势浩大的斗争。英国调集军队残酷镇压了这次起义和罢工，死伤 2000 多人，被捕者更多。同时，英于 1946 年 3 月 14 日，又向印度民族资产阶级许诺印度独立。

印度的国民大会党（简称国大党，成立于 1885 年）和穆斯林联盟（成立于 1906 年），都是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政党。国大党的成员虽以印度教派为主，但它声明是包括各教派，属于全印度的政党，它认为穆斯林不应另成立独立自主的政党，反对按宗教原则进行选举。1946 年 8 月 24 日，组成了印度临时政府，以国大党的主席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为首。该政府最初遭到穆斯林联盟的抵制，该盟定 1946 年 8 月 16 日为争取巴基斯坦斗争日，在英殖民主义者的挑动下，加尔各答等地演成了两教派流血大惨杀，直到 10 月 25 日，该盟才参加了临时政府。

1947 年 2 月 20 日，蒙巴顿子爵任印度总督。他看到，印度各地的农民起义和工农运动虽被镇压，但用暴力推翻殖民统治的趋势正在发展。于是，他积极推行“分而治之”的政策，以扑灭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烈焰。蒙巴顿的助手伊斯梅形容当时的印度像是一艘舱中载满弹药而在大洋中着了火的船，迫切的问题是要在大火烧到弹药之前把火扑灭。英国首相、工党领袖艾德礼于 1947 年 2 月 20 日慌忙发表声明：至迟在 1948 年 6 月前把印度的政权移交给“负责的印度人”。1947 年 6 月 3 日，蒙巴顿公布了《印度独立法案》（即蒙巴顿方案），它是根据居民的宗教信仰，把英属印度一分为二，即印度教徒的印度和伊斯兰教徒的巴基斯坦（意为清真之国）。至于 601 个土邦（此数字据《印度的发现》尼赫鲁著 399 页），则有权决定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或不加入而保持原来与英国的关系，但不能自治。印巴两国都享有英联邦自治领的地位。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上层领导，不顾人民的反对，都宣布接受蒙巴顿方案。

1947 年 8 月 14 日，巴基斯坦宣告独立，穆罕默德·阿里·真纳（1876—1948，1934 年起为全印穆斯林联盟永久主席）为首任总督。其领土由西旁遮普、信德、西北边境省、俾路支等组成的西巴基斯坦和由东孟加拉及阿萨姆一部分组成的东巴基斯坦组成。1956 年 3 月 23 日，颁布第一部宪法，改自治领为共和国，国名为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仍为英联邦成员国，首任总统是伊斯坎德尔·米尔扎。1972 年 1 月，巴退出英联邦。巴基斯坦首都初在卡拉奇，后建新都伊斯兰堡（迁新都前，临时首都在拉瓦尔品第）。

1947 年 8 月 15 日，印度宣告独立，为英联邦内的自治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为首任总理。其领土（包括并于它的土邦）占原英属印度的 3/4。印度自治领无论在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仍与英国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尼赫鲁政府是资产阶级与地主的联盟执政，它是用改良主义的方法逐步清除一切碍于民族资本发展的障碍，以开辟印度独立自主的道路。1950 年 1 月 26

日，成立了联邦制的印度共和国。国大党的元老拉金德拉·普拉沙德任总统，尼赫鲁任总理。印度的首都是新德里。1956年5月28日，印度收回了法属印度（本地治里、亚南、开利开尔、马埃）。1961年12月18日—19日，印军收复了葡属印度（果阿、达曼、弟乌）。

印巴分立引起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大迁徙和互相残杀。到1948年，流落在印巴各大城市的难民达800多万人。即使如此，印度境内仍有三四千万伊斯兰教徒，巴基斯坦境内还有一千万印度教徒。此外还有锡克教、佛教、基督教等教派存在，纠纷常生。印度的圣雄、国父、国大党的领袖莫汉达斯·卡尔姆昌德·甘地（1869—1948），就是因他制止教派纠纷，而于1948年1月30日被右翼教派成员刺杀身亡的。

印巴间最初的尖锐矛盾是争夺土邦。土邦在原印度境内，星罗棋布，好象大洋中的岛屿，这是古老的印度社会遗留的恶瘤之一，也是英国制造纠纷的一个温床。许多小的土邦的归属问题，印巴两国不太介意，原因是易于解决。最大的两个土邦：海得拉巴和克什米尔，则是印巴武力争夺的重点对象。

由于海得拉巴拒绝加入印度，印度遂于1948年9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除非海得拉巴加入印度自治领，否则印度将发动战争。9月11日海得拉巴向联合国发出呼吁。9月13日印军侵入海得拉巴，经过五日血战，9月17日海得拉巴被迫向印度投降，成为印度的一个邦。

克什米尔的面积（21万平方公里）略小于海得拉巴，人口约500万人，它包括谟查和克什米尔两地区，位于印度北部，夹在喜马拉雅山和兴都库什山之间，地处印、巴、中国、阿富汗之间，接近苏联，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英国想使该邦“独立”，以便继续控制。该地77%是伊斯兰教徒，20%是印度教徒，还有些锡克教徒和佛教徒。经济上克什米尔与巴基斯坦联系密切，输出入大都通过巴基斯坦地区，因它位于印度河上游，靠近巴基斯坦的北部三大城市（拉合尔、白沙瓦、拉瓦尔品第），克什米尔和巴基斯坦的总出海口都是卡拉奇。1947年10月24日，巴基斯坦在其控制区成立了“自由克什米尔政府”。印度政府利用了印度教王公所控制的克什米尔议会于1947年10月26日宣布克什米尔归属印度，违背了人口大多数为穆斯林的地区应划归巴基斯坦的原则，10月31日印度在其控制区建立了克什米尔的“非常时期政府”。印巴就此发生了武装冲突。经过两月的战斗，12月30日该争端提交于联合国，1948年1月20日联合国为此设置了调解委员会，经过一年的拖延，直至1949年1月1日，印巴才同意在克什米尔停火。7月正式划定了停火线，印度占领区面积为2/3，人口达3/4，余为巴基斯坦占领。以后还发生过多次武装冲突和边界纠纷。

印度独立后，“种姓制度”依然存在，社会的最低层是所谓的“不可接触者”（贱民），占人口的1/8。印度的官僚垄断资本、私人垄断资本和封建地主阶级同外国垄断资本（以英美为主）相勾结，控制了印度的经济命脉。

印度政府为实现工业化，曾进行了一些社会、经济改革。如为了扩大国

内市场，给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实施了和平的、自上而下的、用赎金购买地主多余土地的土地改革。印实行了几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1951.4—1956.3），着重解决长期的饥荒问题，以发展农业增加粮食生产为主要任务。国家投资（206.9 亿卢比）的比重是：农业占 38.5%，交通运输占 24%，工业占百分之 8.4%，……资金来源的 1/3 是依靠外资。印度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6.4—1961.3），总投资是 560 亿卢比，其比重是工业占 25%，建筑占 24%，农业灌溉占 17.1%，交通运输占 16.1%，电力占 8.9%……。

英国资本在印度是根深蒂固的，美国则是通过经援来控制印度。1956 年至 1968 年，美国卖给印度 43.88 亿美元的农产品，粮食达 5500 万吨，占美外销粮的 1/3。美曾掌握印度货币发行量的一半。50 年代后期以来，苏联也对印度的经济进行渗透，推销苏制军火和工业品，60 年代成了印度的第二经援国和贸易国。在接受苏联援助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印度已居首位。苏联以帮助印度发展重工业为名，把印度的几个五年计划，都纳入苏联的计划轨道，印度对苏联的依赖也逐渐超过对美的依赖。

印度人民有热爱和平的传统，尼赫鲁政府为顺应民心，曾执行和平中立的外交政策，但印度统治阶级又要继承英国的衣钵，扩张主义表现得愈来愈疯狂。

印度扩张主义者对我国领土怀有野心，它继承了英国在我国西藏的种种特权，并悄悄地蚕食我国的边境土地。中印两国边界在历史上从来没有正式划定过，但早已形成一条传统的习惯线。麦克马洪线是英国侵略政策的产物，是由英国殖民者麦克马洪划定的，它妄想把我国西藏 9 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划给英属印度。这条非法的线，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承认过，印度政府不但侵占了该线以南的中国领土，而且在 1959 年向我国提出了更狂妄的领土要求，即要割走中印边界东段、中段、西段我方的三处共计 12.5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印度政府还使用武力片面改变业已形成的边界状况，1962 年 10 月，印度军队发动了大规模的全面侵略进攻，我国军队被迫自卫反击。我国为了谋求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于 11 月停火。我国一贯主张双方维持边境现状，通过友好协商，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早日合情合理地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

（田树茂）

## 7. 东南亚各国的独立

### 缅甸

缅甸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曾组成了缅甸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主席是昂山，秘书长是缅共总书记德钦丹东。1945 年 3 月 27 日，自由同盟在全国发

动抗日武装起义，配合盟军（英军、华军）反攻，消灭了日本占领军，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英国抢夺了胜利果实，恢复了殖民统治，支持反动的官僚政客，杀害爱国民主人士，妄想解散缅甸的抗日武装，瓦解自由同盟。昂山等企图通过妥协方式争取独立。1945年9月，昂山同英国签订了《抗日军问题协定》，解散了几万抗日军，改编为由英国军官指挥的缅甸国防军。1945年12月3日，成立了没有自由同盟参加的、以亲英分子波吞爵士为首的“行政委员会”，它是英总督的御用机构。1946年1月底，自由同盟在仰光召开了第一次全缅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的临时国民政府，改善工农生活等政治纲领。

1946年8月至9月，缅甸爆发了战后最大的一次总罢工，工农、机关人员、警察都参加了。英国建立了“总督咨询政府”（联合行政委员会），英总督任主席，昂山任副主席，加强镇压缅甸共和工农群众，德钦丹东的自由同盟的总书记被撤，缅共被排挤出自由同盟。1947年1月27日，昂山与英国首相艾德礼签订协定，成立了自由同盟的临时政府。

在群众斗争的压力下，昂山提出了建立全权的国民政府的号召，要在一年内独立，还与缅共谈判，同意缅共等民主组织参加制宪会议，6月制宪会议通过了关于独立的决议。1947年7月13日，昂山在仰光群众大会上声明：“除了完全独立以外，缅甸不同意任何东西！”英国对昂山十分不满。1947年7月，昂山和临时政府的六位部长，被英国指使下的暴徒杀害，他们的葬礼成了10万人的游行示威。8月2日组成了吴努内阁，9月24日通过了缅甸联邦共和国宪法。10月17日吴努赴英签订《英缅条约》，英国承认缅甸独立，但在军事、经济上仍有控制权。1948年1月4日缅甸联邦宣告成立，吴努为首任总理，奈温任缅军总司令、总参谋长。

由于吴努政府在英国唆使下，对缅共、少数民族、民主力量实行镇压政策，1948年3月28日爆发了内战，缅共坚持反政府武装斗争。

1958年5月，自由同盟分裂为吴努为首的廉洁派和吴巴瑞为首的巩固派。巩固派亲美反共，不与缅共和谈；廉洁派愿与缅共和谈，发展国民经济。1958年10月29日，国防军总参谋长奈温上将组成了看守内阁，奈温任总理兼国防部长。

吴努和奈温对外都奉行和平中立政策，1960年与我国签订了《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和《中缅边界条约》。

1960年4月，吴努再次上台。1963年3月奈温发动了军事政变，成立了以奈温为主席的革命委员会，他还兼国防部长、总参谋长。他于1962年7月4日创立的社会主义纲领党，是全国唯一的合法政党，现正实行缅甸式的社会主义。

##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曾长期遭受荷兰殖民统治。1942 年被日军占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投降的消息大大鼓舞了印尼人民的独立要求。以印尼共产党人为核心的群众斗争，逼迫印尼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家苏加诺、哈达等人同意立即宣布独立。8 月 17 日苏加诺宣读了独立宣言，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宣告成立，由苏加诺、哈达任正副总统，右翼社会党人沙里尔任总理，共产党人沙里佛丁以社会党领导人的身份担任了国防部长、新闻部长。这就是著名的“八月革命”。

英美支持荷兰在印尼恢复殖民统治。荷兰于 1947 年 7 月发动了殖民战争，侵占了印尼许多地方。1948 年 1 月 12 日，荷、印尼在美国运输舰“伦维尔”号上签订了《伦维尔协定》，双方停火，印尼失掉了具有重要政治、战略意义和最富庶的地区，被迫迁都日惹。荷兰在雅加达成立了临时联邦政府。

在革命的危急关头，印尼共产党的领导人慕梭于 1948 年 8 月回国，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新道路》的决议，为革命指明方向。三个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劳工党、社会党）统一为印尼共产党。正当革命力量积聚时，印尼右翼势力代表哈达，接受美国提供的援助，向革命力量进行挑衅。9 月 18 日，在茉莉芬发生了军事冲突，他们借口印尼共“发动政变”，围攻茉莉芬，在全国大捕杀。印尼共总书记慕梭在战斗中牺牲，沙里佛丁等党的领导人被杀害，被捕 2.5 万人，被杀 1 万人，革命武装损失 3 万人，共产党几乎陷于瘫痪。

1948 年 12 月 18 日，荷兰发动了第二次殖民战争，占领了日惹，把苏加诺、哈达、沙里尔和大部分部长都囚禁于邦加集中营，1949 年 7 月才放出他们。荷兰与印尼谈判了三个月（1949 年 8 月至 11 月初），荷兰、印尼（代表团长哈达）、联合国“调处委员会”的美国代表和 15 个傀儡邦的代表，于 11 月 2 日签订了《海牙圆桌会议协定》。规定印尼共和国与 15 个傀儡邦组成印尼联邦共和国，再组成荷兰印尼联邦，以荷兰女王为元首，荷兰控制印尼的外交、国防、财政、文教等大权，保留外国资本在印尼的势力。民族民主的八月革命失败了，印尼由殖民地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949 年 12 月 27 日，荷兰向印尼移交了主权（仍霸占着西伊里安），傀儡邦纷纷解散。1950 年 8 月 15 日成立了统一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1956 年 4 月废除了《海牙圆桌会议协定》。苏加诺政府执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努力改变殖民经济，保护民族工业，并为收复西伊里安而斗争。

1959 年，苏加诺提出了“民族主义、宗教、共产主义三大思潮合作”，即所谓“纳、沙、贡”。他发展了资产阶级民主，使共产党得到合法的地位，却引起右翼势力的反对。印尼的政局潜伏着严重的危机。

## 菲律宾

统治菲律宾的美国为了缓和民族矛盾，同意菲律宾于 1935 年成立自治

政府，并答应十年后菲律宾完全独立。1942年日军攻占了菲律宾，1944年美军反攻登陆，菲共领导的人民抗日军积极配合美军作战。但美军占领马尼拉后，竟调转枪口镇压了人民抗日军，解除其武装，解散了民主政权。菲律宾人民异常愤怒，1945年9月23日，马尼拉爆发了6万群众的反美大示威。当时，原定的十年过渡期已到，美国不得不改变它统治菲律宾的形式。

1946年7月4日，在马尼拉的鲁尼塔公园，举行了菲律宾独立仪式，美国将菲主权移交给菲律宾共和国政府，美驻菲的最高专员公署改为驻菲大使馆。曾在日伪政府任职的罗哈斯任总统。独立后的政权落在亲美的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政治代表手中。罗哈斯政府与美国签订了《美菲贸易协定》、《美菲军事基地协定》、《美菲军事援助协定》等不平等条约，还发动了对菲共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的全面军事进攻。1953年11月，麦格赛赛任总统时，菲共领导的人民解放军遭到了严重挫折。

### 马来西亚

日本投降后，英国又恢复了对马来亚的殖民统治，1948年2月，宣布“马来亚联合邦”成立，由英王委任的高级专员掌握领导权。这年6月颁布了紧急法令，对共产党等进步组织进行残酷镇压。1955年英国允许马来亚部分自治。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联合邦在英联邦内独立。英国移交政权后，同马来亚签订了《外部防御和互助协定》，英在马保留了军事基地，马来亚的经济命脉也继续由英国垄断资本所控制。

1963年9月16日，成立了马来西亚联邦，参加者为马来亚、新加坡、沙捞越、沙巴。1965年8月9日，新加坡退出了马来西亚，成立了以李光耀为首的共和国。

(田树茂)

## 8. 巴勒斯坦问题与第一次中东战争

巴勒斯坦位于地中海东岸，是欧、亚、非三洲的交通枢纽地带，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古代腓力斯人在这里建立过国家。巴勒斯坦一词的希腊文含义就是“腓力斯人之地”。今天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就是他们的后裔。后来希伯来人进入巴勒斯坦，建立了希伯来王国，信奉犹太教，定都耶路撒冷。由于希伯来人的代首领名以色列，故希伯来人也称为以色列人。此后巴勒斯坦曾被亚述、新巴比伦、波斯、罗马等国征服和统治。罗马帝国残暴压榨和亵渎犹太教，约150余万犹太人被屠杀，幸存者几乎全部逃离或被赶出巴勒斯坦，流散到西欧等地。此后的千余年，犹太人与巴勒斯坦在政治上、经济上毫无联系。

公元638年以后，巴勒斯坦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从此阿拉伯人不

断移入该地，并和当地土著居民同化，逐渐形成现代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从 16 世纪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巴勒斯坦长达 4 个世纪。

犹太人逃往西欧后，仍遭到排挤和迫害，又大批流往东欧和美洲。到 19 世纪 80 年代，奥地利、德国、俄国等国的犹太资产阶级在受到排挤后，便发起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他们利用《圣经·旧约》中关于犹太人将回到耶路撒冷的锡安山聚居的情节，坚持要在巴勒斯坦复国的政治要求。故犹太复国主义又被称为“锡安主义”。1897 年，由在维也纳的犹太人、剧作家兼记者西奥多·赫茨尔领导，在瑞士巴塞尔召开“全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建立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并通过《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纲领》。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成了协约国的交战国。英国为了维护苏伊士以东的殖民利益，保持地中海东部海上交通和苏伊士运河畅通无阻，派兵攻占巴勒斯坦，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在 1917 年 11 月 2 日发表宣言，赞成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家园，此即“贝尔福宣言”。宣言的真实目的是不让巴勒斯坦落入他人之手。1922 年，英国从国联正式取得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权。英国在巴勒斯坦实行“扶犹抑阿”政策，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1921 年，英国以约旦河为界，把巴勒斯坦分为东西两部分，西部仍称巴勒斯坦，东部称外约旦。英国在外约旦建立了受其控制的酋长国。1946 年外约旦独立，即为现在的约旦王国。英国的委任统治范围是西部，即今巴勒斯坦地区。在英美等国的支持怂恿下，欧美地区的犹太人开始大规模向巴勒斯坦移居。到 1939 年，在巴勒斯坦 150 万人口中，犹太人已增加到 45 万。

二次大战后，美国急欲取代英国在中东的地位。美国对巴勒斯坦的政策是：利用阿犹矛盾，支犹制阿，排英反苏，控制巴勒斯坦，进而夺取中东地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方针是：反英亲美，打击阿拉伯人，发展壮大自己。他们利用美国援助，大搞武装恐怖，还大搞非法移民，为建立犹太国准备条件。英国由于在巴勒斯坦遭到阿、犹双方反对，加上美国的压力，感到委任统治难以维持，遂于 1947 年 2 月宣布将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联合国处理。1947 年 11 月 29 日，第二届联大会议通过了《巴勒斯坦将来治理（分治计划）问题的决议》，规定在巴勒斯坦建立阿拉伯（1.15 万多平方公里）、犹太（1.52 万多平方公里）两个独立国家和耶路撒冷市（176 平方公里）国际化，由联合国管理。当地阿拉伯人约有 130 多万，占总人口的 2/3，拥有土地占总面积的 93.7%；犹太人只有 60 多万，占总人口的 1/3，拥有土地仅占总面积的 6%，而联大分治决议规定划给犹太国的土地竟占总面积的 57%，显然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大大有利。

对此决议，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阿拉伯各国坚决反对，而犹太复国主义者，则乘机施用暴力，抢占地盘，造成既成事实。1948 年 5 月 14 日，以色列国宣布成立。美国在 16 分钟后即予承认。苏联在三天后也予承认。阿拉

伯联盟五国（埃及、外约旦、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为了反击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侵略，捍卫阿拉伯人民的民族权利，于5月15日集体出兵巴勒斯坦，与以军展开激战，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开战的头个月，阿军节节获胜，以军崩溃在即。此时美国马上操纵安理会安排停火四周，并压英国停止向阿拉伯联盟提供武器。而以色列却利用停火时间从美、法诸国进口先进武器，把军队由三万扩充到六万。停火结束，战争再起，以色列转败为胜。1949年2月24日，停战协定签订，持续15个月的巴勒斯坦战争结束。

以色列通过这次战争侵占了巴勒斯坦地区4/5的土地（包括耶路撒冷新城），共2万多平方公里。外约旦控制了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旧城。埃及控制了加沙地带。联合国决议要建立的阿拉伯国家始终没有建立。有96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被赶出家园，沦为难民。

巴勒斯坦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老问题和以色列的建国又人为地制造出的一系列新问题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战后国际事务中的“巴勒斯坦问题”。阿以冲突成为中东地区长期动荡不安、战祸频仍的根本原因，也为超级大国在中东谋取霸权优势，洞开方便之门。

（王文庆）

## 9. 1955年的亚非会议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是战后亚非国家举行的第一次盛会，标志着它们作为新兴力量已登上国际政治舞台。亚非国家人民有共同的历史遭遇，独立后又面临着巩固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共同任务。为了根除殖民主义的祸害，为了进行各自的经济建设和提高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亚非国家的人民都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并且日益认识到彼此支持和帮助的必要性。因此，促进亚非各国间的团结合作，建立友好关系，探讨发展经济与文化的共同问题，提高亚非国家的国际地位，进而促进世界和平，便成为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

中印、中缅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为建立崭新的国际关系奠定了基础，也为这次会议作好了思想准备。1954年4月29日中印签订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通商和交通协定》，确定了中国提出的五项国际关系准则。同年6月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和缅甸，在两个《联合声明》中将五项原则表述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并使联合国原则获得新的确认和补充，反映了亚非新兴国家和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

1954年4月，南亚五国——锡兰（现名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缅甸、印尼、印度在科伦坡举行会议，倡议召开新兴的亚非国家会议。同年12月



底，五国总理又在印度尼西亚茂物举行会议，决定由五国发起，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等 25 个亚非国家参加。

中国人民和政府热烈支持亚非会议的召开，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则千方百计破坏会议的召开。1955 年 4 月 11 日，中国代表团部分工作人员乘坐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从香港前往亚非会议途中，台湾特务用定时炸弹制造了飞机爆炸事件，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周恩来总理因应邀先到仰光，才幸免于难。为了促进亚非人民的团结，他全然不顾还存在着对他的安全的严重威胁，也不顾自己刚动过手术、健康尚未完全恢复的情况，长途跋涉，亲自参加亚非会议，表达了中国人民对亚非各国人民友好合作的愿望和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决心。

1955 年 4 月 18 日至 24 日，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市举行，有 29 个亚非国家的 340 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作了题为《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的长篇开幕词。会议议程有五项：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权、附属国问题、世界和平和促进。会议分两阶段进行，先是全体会议，然后是由各代表团团长组成的政治委员会和专门组成的经济、文化委员会进行实质性讨论。帝国主义阻挠会议召开的阴谋失败后，又力图扩大亚非国家之间的分歧，特别是挑拨亚非国家和我国的关系，使会议陷入关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争吵之中，而达不成任何协议。周总理针对这种情况，当机立断，利用会议休息的短暂时间，亲自起草补充发言，提出亚非国家应采取“求同存异”的方针，呼吁大家加强团结，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这篇仅 18 分钟的演说引起强烈反响，连以前发言攻击共产党的人，也都称赞这个演说“体现了民主精神”，这就为会议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会议讨论了反对殖民主义、争取和保障民族独立的问题，通过了谴责殖民主义、种族歧视政策、捍卫民族自决权的决议；讨论了战争与和平问题，通过了《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的决议，其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提出了十项原则作为发展各国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基础，这是会议的一项最重大的成就。接着，在十项原则基础上讨论了加强亚非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合作问题，也通过了有关的决议。七个方面的决议组成《亚非会议最后公报》，集中反映了会议的重大成就。

亚非会议的决议和公报反映了占全世界人口 1/2 以上的亚非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闭幕会上对会议的成就作了如下的评述：“会议的成就是开始了，或者增进了亚非各国之间的了解，并在某些主要问题上达成了协议，这对于我们在反对殖民主义、拥护世界和平、增进彼此之间友好合作的共同任务上将有很大帮助。这个会议相当满足了亚非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愿望。”出席会议的 29 个国家，虽然有的彼此已建立外交关系，有的还没有，有的尚存在着隔阂，但是会议促进了各国代表的广泛接触，促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找到消除隔阂、增强团结的共同基础，这是会议获

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亚非会议的召开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在没有西方殖民国家的参加，由亚非国家自己处理自己事务的会议。会议的成就表明帝国主义任意摆布亚非人民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亚非国家已日益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新的强大的政治力量，许多重大的国际问题，特别是直接有关亚非国家的问题，如果没有有关的亚非国家参加，或者漠视这些国家的意志，那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亚非会议反映了亚非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共同斗争中的战斗团结，它给予全世界日益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巨大的鼓舞和推动，加快了亚非拉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步伐，有着深远的国际影响。会议所产生的“万隆精神”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它推动许多亚非拉国家走上和平、中立和不结盟的道路，为不结盟运动的兴起揭开了序幕。

亚非会议开辟了国际合作的新的途径。中国人民与亚非拉人民的友好往来从亚非会议后大踏步地向前发展。“和平共处”是万隆精神的重要内容，它不仅是亚非拉国家处理好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也是它们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有力武器，会议呼吁和平，提倡普遍裁军，反对侵略战争，同时还谴责不平等的世界经济秩序，主张加强国际经济合作。会议对和平与发展问题的开始重视，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张象）

## 10. 埃及“七月革命”与第二次中东战争

阿拉伯国家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的失败，导致了人民的觉醒和内外矛盾的激化，特别是在埃及，广大人民，包括爱国官兵十分痛恨法鲁克王室的腐败无能。对于英国殖民主义者的虚伪和背叛阿拉伯人民利益的行为，更是感到愤慨，而不能容忍。

当时埃及虽然名义上是独立的，而实际上仍受英国统治。1950年1月，英军在伊斯梅利亚枪杀了13名埃及人，法鲁克王室对此表现出无能为力。英军占领着苏伊士运河区，并控制着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每年攫取运河收入的大部分。在这种情况下，由加麦尔·纳赛尔上校领导的、一些年轻的爱国官兵秘密建立的“自由军官组织”决定采取行动，于1952年7月22日发动政变，推翻法鲁克王朝，夺取全国政权。7月26日，前国王法鲁克被迫签署退位声明，并离开埃及。这就是著名的埃及“七月革命。”

次年5月18日，埃及共和国宣布成立。埃及政府为了发展经济，特别是农业生产，计划修建阿斯旺水坝。这项工程竣工后，将可以灌溉100万公顷的土地，使埃及国民收入增加1/4。在对外政策方面，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权益，1954年10月，埃及政府与英国政府签订开罗协定，迫使英国

同意将分批从运河区撤军。1956年6月12日，最后一批英军降下国旗，从此结束了英军对埃及74年的占领历史。埃及政府也积极同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关系。1956年5月埃及同我国建交。7月，纳赛尔、铁托和尼赫鲁会谈并重申万隆会议的原则。这一系列措施使英法美等国十分恼火。美国宣布撤回它对埃及提供援助的承诺，取消了修建阿斯旺水坝的贷款。面对帝国主义的挑战和讹诈，纳赛尔总统采取了一个重大决策，决定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然后用运河的收入来建造阿斯旺水坝，并宣布“埃及永远不会向美元和武力屈服”。1956年7月26日，在纪念埃及“7月革命胜利”四周年之际，纳赛尔总统在亚历山大港的曼奇亚广场上，向25万群众发表演说时庄严宣告，埃及决定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公司财产移交埃及，运河航运由埃及负责管理。

埃及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无疑是给了英法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因为当时西方世界从中东得到的石油和其它原料有一半以上是通过苏伊士运河的。英法为了夺回运河控制权，便对埃及实行经济制裁、政治讹诈和武力威胁。7月27日，英国成立了苏伊士委员会。8月2日，英国内阁作出了使用武力的决定，命令三军参谋长立即拟订入侵埃及的计划。此时法国也竭力主张对埃及使用武力。同时，英法宣布冻结埃及在英法的财产，并禁止运河公司的资金过户给埃及。

这时的以色列也正想利用西方大国压制埃及的机会，夺取由埃及管辖的加沙地区和西奈半岛南端。这样，英法的经济制裁，武力威胁和政治讹诈与以色列蓄谋已久的战争计划一拍即和。1956年10月29日晚，以色列首先出动4万5千名侵略军，分四路进犯埃及西奈半岛。第二次中东战争，亦称“苏伊士运河战争”正式爆发了。埃及军民立即进行了英勇的抵抗。10月30日，英法以保护运河通航为借口，给埃及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埃、以双方立即停火，并从运河两岸各后撤10哩。同时，英法无理要求暂时占领塞得港、伊斯梅利亚和苏伊士运河的重要阵地。次日，英法出动大批飞机对开罗等几个大城市和港口进行轰炸，并出动了伞兵。埃及为了集中兵力抗击英法军队，保卫运河区，避免两面夹击的危险，纳赛尔指挥埃及军队从西奈撤退，同时用沉船来封锁运河，使英法军舰无法通过。这样，以色列军队乘机占领了西奈半岛和加沙地带。

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后，阿拉伯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掀起了反对英、法、以侵略，支持埃及人民正义斗争的热潮。叙利亚、沙特阿拉伯、约旦和伊拉克等国纷纷与英法断交。叙利亚炸毁了英国控制的伊拉克石油公司的油管，切断英国的石油供应。当时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亚非拉各国人民以各种方式支援埃及人民。欧美人民包括英法两国人民也抗议英法政府对埃及的侵略政策。战争给英法两国造成了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当时的美国为了取代英法在中东的地位，极力压英法停火。11月1日，联合国大会召开紧急会议，会上许多国家代表发言，谴责英、法、以侵略行径。3日，联大以59票比5票

的绝对优势票数，通过立即停火和撤军的决议。此时，英法两国政府不仅在外交上十分孤立，军事上进展不利，而且统治集团内部意见分歧和矛盾加剧。在这种情况下，11月6日，英法被迫接受联合国关于立即停火和撤军的决议。12月22日，英法军队全部撤出埃及。次年3月18日，以色列军队也被迫撤出埃及领土。与此同时，联合国部队进驻加沙和沙姆沙伊赫地区。3月17日，埃及宣布接管加沙地带。

第二次中东战争以埃及人民的胜利而告结束。它显示了埃及人民、阿拉伯民族和全世界人民团结、战斗的力量。这次战争极大地动摇了殖民主义在中东地区的统治基础。英法老殖民主义在中东地区为所欲为的时代结束了。美国趁势插进中东事务，妄图填补因英法的失败而在中东出现的“力量真空”。它还加强了对以色列的支持。美国政府提出了“艾森豪威尔主义”。此外，苏联因为这次战争也扩大了在中东的影响。从而使中东地区的形势更加复杂化了。

（王黎）

## 11.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

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殖民地，法国实行直接统治。阿尔及利亚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先后进行了 50 多次起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戴高乐曾答应给非洲各族人民自决权，但战后法国政府背信弃义，1945 年 5 月 8 日制造了“君士坦丁大屠杀”，使 4.5 万阿尔及利亚人丧命，逼迫许多民族主义政党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1954 年 8 月以本·贝拉·贝勒卡塞姆为首的“团结与行动革命委员会”从“争取民主自由胜利党”中分离出来，并决定发动武装起义。

1954 年 11 月 1 日清晨，阿尔及利亚爱国者在东北部邻近突尼斯的奥雷斯山区的塔吉夫特村附近，惩办了一名无恶不作的当地法国殖民机构的行政长官，从而打响了武装起义的第一枪。在“团结与行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全国 30 多个地区的 3000 名爱国者发动了反法武装起义。这一革命行动得到广大人民的热烈支持，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农业工人纷纷参加起义军，成为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主力军。起义者首先在奥雷斯山区、北部的卡比利亚山区建立根据地，正式成立民族解放军。“团结与行动革命委员会”为了团结各种反法爱国力量，建立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以阿巴斯为首的“拥护阿尔及利亚宣言民主联盟”、“伊斯兰教贤哲会”等政党参加进来，形成了一个包括各阶层人士参加的民族主义统一战线组织，这是民族解放战争的领导者。1955 年上半年，起义军又在西部靠近摩洛哥的边境地区发动起义，建立了以特累姆森为中心的西部战区。1956 年 8 月，在卡比利亚根据地召开了“民族解放阵线”第一次代表大会，确定了政治纲领和解放军的编制，建立全国革命委员会作为最高权力机构，并选出“协调与

执行委员会”具体领导武装斗争。

法国殖民主义者对民族解放军控制区进行“围剿”和“扫荡”。1954年殖民侵略军只有5万人，到1958年猛增到60万人，此外还有20万宪警。他们对阿尔及利亚爱国人民进行血腥大屠杀，战争开始后的四年内，阿尔及利亚人民死亡了50多万，有10多万人被关进集中营，有1000多个村庄被毁灭，法国殖民主义者在“围剿”中还灭绝人性地使用毒气、细菌、凝固汽油弹屠杀人民。

民族解放阵线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开展从农村到城市的持久抗战，在解放区建立政治军事统一的民主政权，使民族解放军与人民保持着良好的军民关系。阿尔及利亚人民冒着生命危险为民族解放军站岗放哨，递送情报，掩护战士，破坏敌人的军事设施和交通要道。城乡居民克服重重困难，冲破敌人的封锁，保证部队粮食、药品和武器的供应。侨居欧洲的阿尔及利亚工人也从菲薄的工资中抽出一部分支持抗战。正是由于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民族解放战争才能胜利发展。

1957年初，民族解放军东、中、西三个战区连成一片，粉碎了敌人的“围剿”，10月底，民族解放军开始了北自海岸线，南至撒哈拉沙漠石油区的主动出击战，使法国殖民军遭到重大损失。特别是11月初至12月初对油田法军的进攻，对殖民者的打击最大。民族解放军从敌人手里夺来现代化武器装备自己，到1958年解放军已发展为有13万人的队伍，经常可以集中5000人以上的部队主动进攻法军阵地，武装斗争的地区扩大到全国3/4的地区。在四年多的战争中，敌人伤亡10多万人，损失的武器不计其数，平均每天要耗费20亿法郎的军费。随着解放区的扩大，敌人兵力分散，士气低落，兵源枯竭。法国殖民者把它的绝大部分陆军、60%的空军和90%的海军投入到战争中去。法军已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殖民者占领下的各大城镇的工人、学生、职员、商人、手工业者也接连举行大规模的罢工、罢课和罢市。殖民主义者的统治已摇摇欲坠了。

1958年9月19日，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在开罗宣告成立。从此，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新政府得到许多亚非拉国家的承认，得到各国人民政治上和物质上的有力支援。

1958年在第十二届联合国大会上，有17个亚非国家提出要求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提案，最后表决时只差一票就可以达到通过的标准即2/3的多数。这种情况在联合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1958年，戴高乐重新上台，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妄图通过军事进攻和政治欺骗的两手策略，继续维持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利益。他一面宣称要在阿尔及利亚实现“光荣的和平”，一面加强军事部署，任命夏耳为总司令，把法国侵略军由60万增加到80万人，加固“莫里斯防线”（在阿、突边界，长300公里，有雷达设备和电网）和“西部防线”（在阿、摩边界）。1959年5月又在莫里斯防线的东侧修建了一条辅助性的“夏耳防线”。1959

年7月夏耳集中10万大军“重点围剿”、“分段绥靖”。但民族解放军在8月3日至9月3日的激战中粉碎了“夏耳计划”。

在这种情况下，1959年9月戴高乐政府提出要搞什么“公民自决投票”，妄图借此扶植傀儡来维持法国的殖民统治。这个骗局遭到临时政府和全国人民的坚决抵制，民族解放军增大到15万人，继续展开武装进攻。这时，在阿尔及利亚的一些极端的殖民主义分子发动反戴高乐的武装暴乱。戴高乐政府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缓和国内矛盾，同时也为了改变法国在国际上孤立的处境，增强在欧洲的地位，决定于1961年5月2日与阿临时政府代表团在法国埃维昂就“停火”、“自决”等问题进行谈判。最后法国被迫在1962年3月18日签署了“埃维昂协议”。法国承认阿尔及利亚人民行使自决权利，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有完全的、充分的主权；阿尔及利亚承认法国有关开采撒哈拉石油和使用米尔斯克比尔军事基地等特权。7月3日，阿尔及利亚宣告独立，9月25日定国名为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定国庆日为“11月1日”，从此结束了法国130多年的殖民统治。阿尔及利亚坚持七年半之久的民族解放战争树立了一面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旗帜，对非洲大陆的民族解放事业做出重要贡献。

(张象)

## 12. 古巴的革命

古巴长期处于美国的奴役之下，美国控制了古巴80%的公用事业公司，90%的矿山、大农场，垄断古巴糖的出口。1952年3月10日，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军人巴蒂斯塔发动军事政变，建立了亲美独裁政府。

巴蒂斯塔解散了议会，废除了1940年以来带有资产阶级进步性质的宪法，制定了“宪法条例”和反劳工法。古巴变成一座庞大的集中营。巴蒂斯塔对美国唯命是从，允许在古巴的美国糖业公司拥有自己的警察，可以监禁和鞭笞任何敢于反抗的工人。据统计，1952年至1957年，美国垄断资本从古巴掠取了7.5亿美元的超额利润。巴蒂斯塔还允许美国在古巴军队中驻有军事代表团，直接控制古巴军队的指挥权。

古巴人民不甘心屈服于法西斯独裁统治。1953年7月26日清晨，150名革命青年在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下，袭击了奥连特省圣地亚哥东北的蒙卡达兵营。兵营中驻有装备优良的士兵约1000人，起义遭到失败，但是它揭开了古巴人民武装夺取政权的序幕，被称为“七月二十六日运动”。

菲德尔·卡斯特罗，1950年毕业于哈瓦那大学法学院，1953年开始组织革命团体。“七·二六运动”失败后，卡斯特罗被捕入狱。他的辩护词《历史将判我无罪》，成为发动革命和推翻巴蒂斯塔政权的宣言书。1955年5月他获释后，来到墨西哥，与流亡在那里的古巴爱国青年组成了“七·二六运

动”组织，准备再次发动武装斗争。

1956年11月25日清晨，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等82名青年，携带武器，乘一艘只能容纳12个乘客的“格拉玛”号游艇，从墨西哥的图克斯潘港出发，向古巴进军。他们满怀革命激情，高唱着《七·二六颂歌》，颠簸摇晃，餐风饮浪，在茫茫大海的风暴中拼搏了7天，漂过了1230多哩的航程，到12月2日才在奥连特省科洛腊多斯海滩登陆。登陆后，他们遭到了巴蒂斯塔军队的袭击和围剿，大部分起义者在战斗中牺牲，最后只剩下15个人。同年12月，卡斯特罗和他的战友们进入马埃斯特腊山区，在当地农民的帮助下，建立起武装的革命根据地，同巴蒂斯塔政权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马埃斯特腊山区是古巴最贫脊最荒野的地区。那里交通不便，人民群众生活十分艰苦，易于起义军扎根。起义军在那里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特别是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推动农民运动的发展。在同巴蒂斯塔军队进行“围剿”和“反围剿”的斗争中，起义军不断发展，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

马埃斯特腊山区的武装斗争，唤起了古巴广大爱国人民的斗争热情，推动了全国革命高潮的逐渐形成。1957年3月13日，以哈瓦那大学生联合会主席安东尼奥·埃切维里亚为首的一批爱国青年攻打总统府，失败后组成“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在拉斯维利亚省打游击。1958年3月，人民社会党（原名古巴共产党）放弃“革命和平发展”方针，发表宣言，号召推翻巴蒂斯塔政府。3月17日，古巴42个群众团体的数千名代表发表联合宣言，要求巴蒂斯塔下台。4月9日，哈瓦那工人在七·二六运动和公民抵抗运动的领导下，举行了罢工和武装暴动。由于没有得到全体工人阶级和其他反巴蒂斯塔政权力量的合作，遭到血腥镇压。

随着全国革命高潮的兴起，巴蒂斯塔慌了手脚。1958年5月，他纠集了11,000多人的军队，配备着大量美制飞机、大炮、坦克向马埃斯特腊山区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妄图一举消灭革命武装力量。经过两个半月的激战，革命根据地军民粉碎了敌人的进攻，歼敌1,000余人，俘虏450人，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自此以后，革命武装力量由防御转入反攻。

正当革命根据地军民与巴蒂斯塔反动军队浴血奋战之时，7月20日，各反独裁政权组织的代表在加拉加斯举行会议，签订了共同反对巴蒂斯塔统治的协议，要求制定“一个以武装起义来打倒独裁制度的共同战略”。会议组成了“革命民主公民阵线”，并推选卡斯特罗为总司令。这次会议加强了革命统一战线力量。

1958年底，革命武装力量在奥连特省、卡马圭省、拉斯维利亚省等广大地区发动进攻，很快控制了古巴大部分地区，并对公路和桥梁实行了系统的封锁，使龟缩在哈瓦那的敌人变成瓮中之鳖。

1959年1月1日，革命武装力量进逼哈瓦那时，人民社会党为配合起义军的进攻，发动总罢工和武装起义，加速了反动政权的崩溃。巴蒂斯塔及其

同伙已于前一天仓惶逃亡国外，他的军警也无影无踪。起义军占领了总统府，革命取得了胜利。1月1日这一天，后来被定为古巴全国“解放日”。

推翻巴蒂斯塔政权后，建立了临时政府，由从美国回国的乌鲁蒂亚任总统，卡斯特罗任武装部队司令，1959年2月任政府总理。新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征收了全国和美国大庄园主的土地，废除了一切租让地，把大批美资企业、银行收归国有。收归国有的美资企业价值共约12亿美元。

古巴革命是一场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卡斯特罗在就职演说中认为这是一个解放、爱国主义、民主、土改和进步的革命。当时巴蒂斯塔政权十分腐朽，民愤极大。美国已清楚地看到它已不是美国最合适的工具了。因此，美国对古巴革命采取了静观待变的态度，没有直接进行干涉。随着古巴新政府采取一系列维护民族利益、打击美国垄断资本控制的重大措施，美国对古巴新政权才采取了敌视立场，不断对其进行武装挑衅。由于苏联的支持，古巴政府站到苏联一边，对抗美国。

(王祥玉)

### 13. 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发展

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于1924年11月26日。历史上称为“外蒙古”，属于中国的一部分。1924年5月31日签订的《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规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古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在1945年苏美英三国首脑参加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和斯大林于2月11日就远东问题达成了协议，并邀丘吉尔共同签署了《关于日本的协定》。该协定规定“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本作战”。苏联为出兵远东提出三个先决条件，其中第一个条件就是“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到同年6月14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才指使赫尔利将上述秘密协定内容通知蒋介石。在苏、美两大国的压力下，蒋介石派宋子文两次去莫斯科，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两国代表交换了关于蒙古问题的照会。蒋介石政府表示“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据此，1945年10月20日，在中华民国政府代表“监督”下外蒙古举行了全民投票。投票结果，百分之百赞成外蒙古独立。11月10日，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乔巴山元帅将上述投票结果分别交给苏、中两国政府。12月5日苏、中两国代表在重庆交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批准书。1946年1月5日，中国政府承认了外蒙古独立。1950年2月15日，中苏两国发表公告“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地位，已因其1945年的公民投票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与其建立外交关



系而获得了充分保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 1949 年 10 月 16 日中蒙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蒙古人民革命胜利后，1924 年召开的蒙古人民革命党“三大”确定了“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总路线。到 1940 年蒙古国内基本上肃清了封建主阶级，完成了人民民主革命第一阶段的任务。

战后，蒙古的经济在苏联的援助下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1948 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1948—1952）。“一五”计划把在充分利用国家内部资源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生产力，特别是发展作为经济基础的畜牧业和提高畜产品生产率作为中心任务。为此蒙古人民革命党和共和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如废除义务驿运制度、建立马拉割草站、扩大兽医网、培养畜牧业干部等，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提高创造了有利条件。据统计 1952 年全国牲畜总头数比 1947 年增加了 8.7%。农牧业中的社会主义成分也在不断加强。在三年计划期间（1953—1956），为了顺利完成发展畜牧业的任务，蒙党和政府又进一步采取了许多措施。首先修改了关于个体牧户、牧民合作社向国家交售牲畜和畜产品的制度，实行按牧民实有牲畜头数数量交售牲畜和畜产品的新制度，同时允许以一种畜产品代替另一种畜产品。第二，在税收政策上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实行按个体牧户不同经济力量征收不同数量的牧业税收制度。在实行新税收制度的同时，国家根据实际情况，又全部免除了牧民和牧民合作社过去所欠国家的牧业税。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牧民的负担，对改善牧民的生活状况，调动牧民的积极性起了很大作用。第三，国家几次提高畜产品的收购价格，使得牧民的收入有了很大提高，同时，有力地促进了畜牧业经济的发展。由于蒙党和政府采取了这些重要措施，进一步调动了广大牧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生产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三年计划结束的时候，据统计 1957 年全国牲畜总头数比 1952 年增加了 11.6%。在 30 年代末 40 年代初兴起的工业，在这一时期也有了很大发展，建立了许多新的工业企业，工业产品产量年平均增长 10%。畜牧业经济仍然是蒙古国民经济的基础。伴随经济的发展，广大牧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也有了很大提高。

50 年代中期，蒙古在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下，国民经济发展很快。1958 年 3 月 17 日召开的蒙党“十三大”宣布“国家已经从纯粹的畜牧业国家变为农牧业—工业国”。随着畜牧业经济的发展，牧民的合作化过程也加速了。个体牧户的 35% 在 1957 年加入了合作社。在农业中，全部耕地面积的 78% 属于农牧业社会主义部门。到 1959 年末，蒙古全国实现了农牧业合作化，全国 99.3% 的牧户加入了合作社，农牧业合作社拥有的牲畜占全国牲畜总头数的 77.3%。从此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占了统治地位。

从 60 年代开始，蒙古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1962 年蒙古加入

“经互会”，成为“经互会”第八个成员国，从此蒙古经济发展纳入了“经互会”的轨道。根据“经互会”的分工，蒙古重点发展畜牧业和采矿业。从“三五”计划（1961—1965）到“七五”计划（1981—1985），蒙古加强了与“经互会”各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各成员国通过双边及多边合作形式向蒙古提供了经济技术援助。“经互会”成员国给予蒙古的贷款在蒙古国民经济投资总额中约占50%左右，其中主要是苏联提供的贷款。蒙古利用来自“经互会”的大量外资，兴建了二百多个项目。

70年代，根据“经互会”《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综合纲要》，蒙古大力发展采矿业。在《纲要》中规定“使经互会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逐渐接近与拉平的整个过程中，迅速发展蒙古人民共和国经济和提高其效益的问题占有特殊的地位”。1974年开始兴建的蒙苏联合冶金企业——额尔敦特铜钼矿，到1982年正式全部投产，这一联合企业的全部资金、技术力量及设备完全由苏联提供，目前该企业的产值在蒙古矿业总产值中占82.4%，其全部产品向苏联出口。

80年代，蒙古参加了“经互会”《长期专项合作规划》中的五十多个项目，这些合作项目对蒙古经济的发展起着主要作用。蒙古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速度由1961年至1970年的4.5%增加到1971年至1983年的7.1%，同期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由2.7%增加到6.7%，1984年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比1980年分别增长32.2%和30.1%，工业总产值增长43.6%。

1976年6月召开的蒙党“十七大”把同苏联“全面接近”作为基本方针和首要任务。与此同时，蒙古从70年代开始加强和扩大了它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文化联系。1981年5月召开的蒙党“十八大”提出“改善管理方法和管理形式，加强经济机制”的问题。1984年8月23日巴特蒙赫担任蒙党总书记以来，蒙古也在逐步对现行经济体制进行改革，进一步扩大企业的自主权。1984年12月11日召开的十八届九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改进国民经济计划工作和完善经济机制的若干措施的决议》，目前，蒙古的经济体制改革正在进行中。

随着经济的发展，蒙古的文化教育事业也有了很大发展，民族文化素质有了很大提高，现在平均每四个人中有一人在校学习，每万人中有大学生145人。每年蒙古派遣1300名大学生和1500名中学生到苏联大、中专学校留学深造。

（卢纪雨）

## 第二编 60年代至80年代

### 第五章 60年代以来的美国、西欧与日本

#### 1.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发展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指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权相溶合的资本主义。它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但全盛发展，是在战后时期，特别是60年代以后。

战后，欧洲遭受战争破坏亟待迅速恢复，私人垄断资本对此显得力不胜任，必须借助国力；而且美国用以恢复西欧经济的“马歇尔计划”也是以国家作为主要援助客体的。这就迫使西欧国家在战后初期采取了国有化政策与建立国家所有制经济等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措施。例如英国，从1945年到1951年，掀起了第一次国有化浪潮，工党的艾德礼政府用赎买方式先后将煤、钢、电力、燃料、铁路、航空等六个所谓“支配性大企业”收归国有。后来英国还在1971年至1977年掀起第二次国有化高潮，将飞机工业、造船工业等工业部门收为国营。其他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也先后实行了不同程度的国有化措施，并采用国家投资和公私混合经营等方式建立国家所有制经济。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这些手段来弥补私人垄断资本的不足，同时又帮助私人垄断资本提高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

50年代中期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随着新的科技革命浪潮的兴起，社会生产力与生产社会化迅速发展，一系列新问题又在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由于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垄断矛盾尖锐，造成生产与消费之间问题突出，市场严重不足；交通、环境保护、失业、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等社会问题急待解决；各种基础工业、新兴工业、科学研究需要大量投资，并要承担风险，私人垄断资本不愿投资也无力投资。为此，资本主义各国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几乎一切领域和环节，进行了日益广泛、规模巨大的干预与调节，投入了大量资金，这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战后发展的基本特色。在表现形式上，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以国家之力，对基础工业和新兴工业等投资多风险大的部门进行投资建设。尤其在现代，科技部门已成为高度社会化的事业，需要复杂的协调组织工作。例如美国为了实施“阿波罗”登月飞行这项综合性的超大型科研项目，从60年代起，花了10多年时间，由政府调集组织了2万多家公司、120多所大学、40多万名工程技术人员，投资300多亿美元才得以完成，真正是倾国之力！私人垄断的企业根本无力承担。美国从1983年开始进行的“战略防御计划”（即“星球大战”）也属于这种类型。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战后在科研上大量拨款。如1976年，美国政府的科研开支占全部科研经费的50.7%；1975年，西德占46.3%，法国占53.9%，英国占51.7%，意大利占41.4%，日本占29.3%。这种国家的巨

额拨款和全国范围内的协调组织保证了科学研究的顺利进行。

其二：计划化。经济计划化已成为当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干预调节国民经济的综合方式。这些计划有的是中、短期的预测性计划，例如瑞典在战后曾多次公布“经济趋势报告”，更多的则是中、长期的综合性经济计划。法国从战后至今已制定了八个五年计划，并专门成立了由政府各部并吸收各界专家和企业代表参加的“五年计划委员会”。日本的计划化也相当出色，战后曾连续推出中、长期计划。如“经济自立五年计划（1956—1960）”、“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1—1970）”、“新经济社会七年计划（1978—1985）”等。资本主义国家搞“计划化”的特点是这些计划不具有指令性与强制性，主要是确定目标，规划战略。这种有计划指导性的发展国民经济，是符合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

其三：是国家将财政收支作为调节经济的杠杆。

6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转越来越需要政府调节。

1960年，美、日、西德、法、英、意政府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27.8%、18.3%、32%、34.6%、32.6%、30.1%，到1975年分别增长为35.2%、25%、46.7%、39.4%、46.1%、48.2%，也就是说这些国家40%上下的国内生产总值为国家支配。国家用这种手段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节，并用这些开支，进行投资建设、社会福利、公共教育、减免税收、补贴企业等等，既可对社会劳动者给予一定的保障，也保证垄断资本能不断地获取高额利润。美国在这些方面更为突出，因为美国没有广泛采取国有化措施，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如西欧国家那么大，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更多地就是通过政府对经济政策和国民经济进行干预和调节而得以实现的。如美国通过大量的国家采购特别是军事采购，使垄断资本有了一个稳定而广阔的国家市场。由政府购买的商品和劳务数额，1970年为2189亿美元，1981年为5969亿美元，持续保持在全国销售总数的20%以上。

70年代中期以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结束，不少国家又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停滞膨胀”的困扰。为了寻求缓和危机，摆脱“滞胀”局面，资本主义国家除了继续国有化政策，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对社会经济干预与调节，又更进一步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的国际联合，50年代中期成立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是这种国际联合的早期雏型和典型代表。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支持垄断资本向外进行经济竞争与扩张；另一方面，又超越国家界限，组成地区性或行业性的国际联合体，进行国际调节活动。从1975年起，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举行最高级会谈，每年一届，迄今已举行了十一届。这种会谈又称经济最高级会议，主要讨论国际与各国经济形势，通过这种超国家的多边最高级经济会议，协调各国的经济政策，按各国垄断资本的

---

：首届最高级会议于1975年11月在法国举行，参加国为美、日、英、法、西德和意大利。从1976年第二届会议起增加了加拿大，成为七国经济最高级会议。现通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

共同利益和需要，进行综合性调节。

战后 40 多年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内以各种不同形式发展起来，给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它强化了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权力，由于用国家力量来干预经济，更利于灵活地采取不同的经济对策来处理不同的困难局面；政府通过将国内生产总值越来越多地化为政府财政开支，逐步建立起了强大的物质生产基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适应了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因而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一度出现了高速增长“经济越飞”、“黄金时代”。在 50 年代至 60 年代的 20 年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是 3.6%，西德 6.6%，日本 9.7%，法国 5.3%，英国 2.8%，意大利 5.5%，基本上维持了较高速增长。这种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多种原因促成的，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无疑起了显著作用。

但是，从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并不能消除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它只是促使国家政权与私人垄断资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溶合，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一些调整。事实表明这种调整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有作用的。

（吴潮）

## 2. 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制度

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相伴随，“福利国家”制度在战后尤其是 60 年代以来有了新的发展。“福利国家”制度是西方各国政党，特别是社会民主党竞选与执政的基本纲领，从而构成当代西方国家政治的组成部分。“福利国家”制度包括建立“混合经济”体制，实现“充分就业”，“公平分配”，建立所谓“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四项基本内容。其中重要的是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起源于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工业化时期的救济贫民的措施和工人自发组织的私人保险与互助制度。英国在 1601 年和 1832—1834 年间先后通过的两个“济贫法”，由地方政府和教会共同负责教区的济贫工作，济贫资金主要来源于各地区居民和房地产所有者上交的济贫税。17 到 18 世纪，英国出现了工人自己成立的“友谊社”等形式的互助组织，成员们上交一定的互助金，以便在生病时得到补助，年老时得到年金，死亡时得到一笔安葬费。当前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中的社会保险和社会救济两大项目，就是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不断高涨，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巩固资本主义的统治，西方各国政府先后通过一系列社会保障立法。德国在俾斯麦时期，通过

了疾病保险法、工伤事故保险法和老年及残废保险法。1911年英国通过了失业保险法。瑞典在1913年议会通过了老年和残废年金法案。美国在罗斯福“新政”期间，建立工资劳动者、贫困老人、病残者的养老金制度，向失业者提供保险金。不过这一阶段的社会保障的立法与计划带有一定的探索、试验的性质。

1942年英国的威廉·贝弗里奇提出《社会保险及有关服务》的报告，这对西方战后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它建议社会保障计划应包括三种方法：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自愿保险。社会保险用以满足居民的基本需要；社会救济用以满足特殊情况的需要；自愿保险则用以满足收入较多的居民较高的需要。报告还提出了有关社会保险的一些基本原则，主张社会保险应当按照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生活方式进行调整。

战后随着资本主义各国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福利国家”制度进入“黄金时代”，各发达国家都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的作用是：如果国民因失业、疾病、伤残、年老等原因，完全或部分丧失收入，或收入太低，无法维持生活时，则保证其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各国的社会保障项目名目繁多，大体上可以归为两类。一是社会保险，这是国家强制执行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只有按规定缴纳有关社会保险税的投保者才能享有的福利。主要包括退休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残废保险等。二是福利补贴，不论是否参加社会保险，凡是符合规定条件的公民都可以得到。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带有普遍性的公共福利补贴，如家庭补助、遗属年金、住房补助（房租补助）、产妇津贴、寡妇津贴、中小学免费教育与免费午餐、高等教育的低息贷款；一种是只向部分贫困者和家庭提供的带有救济性的补助，如食品券等。

社会保障费用来源于三部分：一是投保的雇员上交的社会保险捐，一般按照雇员的工资的一定比例计算，定期在其工资中扣除；二是雇主为雇员支付的社会保险捐。1982年美国工人和企业主为工人支付的保险捐各占应纳税工资的6.7%，两者相加为13.4%；三是政府的财政支出。西方各国政府补助的费用从50年代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上升到70年代的20%以上。可见社会保障制度的实质是资产阶级把工人自己创造的为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一部分价值，通过国家用社会福利的形式再分配，“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同时它也是工人阶级长期斗争的结果。尽管它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工人阶级受剥削的地位，没有消灭贫穷，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工人阶级最基本的生活水平，缓和了劳资矛盾。

“至于混合经济”、“充分就业”和“公平分配”这三项政策，尽管对西方经济的发展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西方国家的垄断资本主义的性质。“混合经济”的目标是在生产、收入与消费方面建立私人企业与国家企业、政府与私人同时对经济发生作用的双重经济与管理机制，实质上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充分就业”也不是完全消灭

失业，而是国家通过财政与货币政策将失业率大体控制在 3—6% 以下。50 年代和 60 年代，它取得一定的成效，失业现象有所缓和，70 年代以后，西方主要国家的失业率都高达 10% 左右。所谓的“公平分配”就是政府通过对遗产和收入实行高额累进税的办法，将富人的一部分收入转移到穷人的口袋里，但是富人的损失远远地少于他们的所得。

1973 年至 1975 年经济危机以后，西方国家长期被“滞胀”现象所困扰。因此，以 1979 年上台的英国撒切尔政府和 1981 年上台的美国里根政府为标志，西方的“福利国家”政策进入一个向后倒退的调整阶段。他们一方面实行有利于富人的大幅度减税政策，一方面大砍政府的福利开支。同时在西方还出现了一场关于福利与效率的大辩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不可克服的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无论西方的“福利国家”政策如何调整，都无法从根本上消灭贫穷，因而也就不会实现真正的全社会的福利。

(刘子安)

### 3. 欧美经济的高速增长

战后初期，欧美各国经济进行了调整，很快医治好战争创伤。50 年代初已恢复到战前水平，准备了足够的物质技术条件，于 60 年代出现了空前的繁荣。这是资本主义有史以来的“黄金时代”，新发明的产品超过了以往历史的总和，衣食住行的条件大为改观，人类多年来登上月球的梦想也实现了。1960 年至 1973 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 4.2%，西德为 4.8%，法国为 5.7%，英国为 3.2%。从 1950 年到 1970 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由 2,862 亿美元增加到 9,824 亿美元，西德由 981 亿马克增为 6,790 亿马克，法国由 1,017 亿法郎增为 7,386 亿法郎。

欧美国家经济的高涨是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带动下出现的。旧的、依靠大量能源、致力于机器生产商品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逐渐为知识密集型产业所代替。这时，经济的发展依赖于信息，从制造商品为主转变为提供服务为主，第三部类的服务业得到日益扩大。新的工业部门，如电子计算机、原子能、宇航工业，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工程、激光等不断涌现。在主要工业品产量方面，如精炼钢、铝、电力、小汽车、石油产品以及高科技产品中欧美国家均占世界首位。军事工业生产既是欧美国家重要的生产领域，也带动了科技和国民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增长引起了经济关系、经济结构的变革，大而全的、高度集中和集权的大企业不断缩减，中小企业越来越占优势，经济的多样性日益增多。此外，电子计算机、通信技术和控制技术相互结合，在许多领域内包括办公室和家庭中开始辅助甚至代替部分人类的劳动。

欧美国家经济高涨的另一表现是农业的迅速发展。农业不但完全实现了电气化，还采用激光技术、遥感技术、液压技术及生物工程，从而农业产量大大提高，农业人口大大减少，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归于消灭。从 1950 年到 1982 年美国的农业总产值由 200 亿美元增加到 808 亿美元，粮食总产量 1950 年为 13,480 万吨，1981 年超过 39,000 万吨，增加了将近 1.6 倍；肉类由 1950 年的 1,002 万吨，增加到 1981 年的 1,763 万吨，增长了 76%。美国每一农业劳动力所能供养的人数，战后初期不过 20 人，80 年代初达到 80 人。西德的粮食总产量 1950 年为 1,000 万吨，1980 年达 2,300 万吨，1975 年西德每一劳动力可供养 40 人。法国在二战前农业生产停滞，粮食、肉类及多种农业原料都不能自给，战后以来，农业增长比较迅速，1950 年粮食总产量为 1,400 万吨，1980 年达 4,800 万吨，肉类和牛奶产量居世界第三，农产品出口量迅速增加，1971 年已成为农产品净出口国，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个农业出口国。英国多年以来把殖民地做为自己的农业附庸，片面发展工业和外贸，忽视农业，以致耕地不断减少，本国农业产量长期不能满足自身需求，战前粮食需求 2/3 依赖进口。战后英国政府实行保证价格制度和辅助金制，使农业生产有所提高。1950 年粮食总产量为 780 万吨，1980 年达 1,928 万吨，粮食自给率已能达到 80%，乳酪自给率 54%，蛋类自给率 97%，牛肉自给率 85%。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农业就业人数 50 年代约占全国就业人数的 4—5%，70 年代降为 2% 以下。

欧美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个地区是资本主义的发源地，生产、技术一直居世界领先地位，资金雄厚、市场广阔、经验丰富，具备了高速增长的基础。战后这些国家奉行自由企业与国家调节相结合的经济制度，符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自由企业制度自发地按照市场的需求推动着经济的前进，同时国家的经济职能大大加强，担负起领导、干预、调节经济的责任。各国政府利用税收而得到的巨额收入举办公共工程，发展科研，搞福利措施，实行计划管理，用财政及金融手段来刺激经济，搞国民经济军事化，扩大国外市场，对农业则提供信贷，实行价格补贴，保证农民的收益，稳定农业生产。这种经济制度保证了经济增长所必须的资本积累、技术装备、市场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 1964 年到 1973 年，美国、英国、西德、法国的资本积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分别为 15.3%、19%、27%、26.4%。欧美的风险资本甘愿向开创新产品制造的企业投资，使许多中小企业迅速壮大，推动了经济的繁荣。同时，扩大再生产所必须的能源、原料，也得以解决。

其次，企业管理的改进也大大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本世纪以前，企业的管理主要根据资本家个人的经验、知识以及勤奋程度。20 世纪初发明了泰罗制，开始了企业的科学管理，泰罗制主要用科学方法对工人的操作进行时间和动作的分析研究，确定最经济合理的操作方法，并采用相应的刺激工资制度，从而在大大增加工人劳动强度的前提下提高了劳动生产率。40 年代



到 60 年代又出现了“现代管理”理论，它又分为“行为科学”和“管理科学”两派。“行为科学”运用社会学、心理学来研究管理，重视社会环境、人际关系、职工利益以提高工效，它反对泰罗制集权过多过严。“管理科学”重视生产的组织方面，并吸取当代科技革命的一些新成果，如运筹学、系统工程、电子计算机等形成一种组织管理科学。70 年代又产生了“系统理论”，运用系统工程来管理企业，它把每个企业看做由若干个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小系统如生产系统、物质系统、信息系统等构成的整体（系统），首先确定企业的目标（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收益），然后选择最佳方案去实现。70 年代中期又出现了把“行为科学”和“管理科学”结合起来的“决策理论”，认为管理就是决策，管理的好坏取决于决策的当否。战后以来，欧美国家不断发展管理理论，改善管理体制，使所有权与管理权相分离，集权与分权相结合，实行生产专业化，推行全面质量管理，重视计划的编制并依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以销定产，实行生产合理化，大力培养管理专家队伍，培训在职职工，采用各种巧妙的方法，如高工资高福利、“资本民主化”、“管理民主化”等剥削、统治、笼络职工的方法来增加生产。

安定的内部环境是欧美经济增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战后，欧美国家的民主制度得到进一步的改进，法西斯主义已被扫除，民权有所扩大，职工福利不断增加，罢工减少，政局稳定，经济危机程度减轻，所有这些都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战后欧美国家的教育事业加速发展，中等教育已经普及，高等教育大大发展，从 1950 年到 1973 年每 1 万人中上大学的人数：美国由 152 人增加到 456.4 人，西德由 26 人增加到 117.7 人，法国由 32 人增加到 141.4 人，英国由 25 人增加到 112 人。教育不仅培育了人材，也造就了国民的进取精神。

欧美经济的发展也是在有利的外部环境下出现的。战后迄今，局部战争虽然不断，但全球和平得以维持，这就使国际经济联系、国际贸易不断扩大，从 50 年代初到 70 年代末，国际贸易总额由 500 多亿美元增加到 16,000 多亿美元，同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由几千亿美元增长到 9—10 万亿美元，可见欧美国家的经济增长离不开世界和平和国际市场的扩大。

（王文定）

#### 4. 欧洲共同体的建立与扩大

欧洲共同体是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的统一机构。其中欧洲经济共同体最重要，由于它在组织统一市场方面进展较大，故又把它称为西欧共同市场或欧洲共同市场。

欧洲共同体建立的基础是西欧六国的“煤钢联营”。战后由于西欧各国垄断资本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为了消除以萨尔归属问题为核心的法德之间的

隔阂和矛盾，通过联合振兴西欧经济，1950年5月9日，法国外长舒曼正式提出一项提议（后来称为“舒曼计划”），把包括法德两国在内的西欧各国煤、铁、钢工业联合起来建立一个“一体化”组织。1951年4月18日，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六国在巴黎签订了“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简称《巴黎条约》），确定建立煤钢共同市场，取消有关关税限制，建立共同体的权力机构，负责协调成员国的煤钢生产。1952年7月25日，该条约正式生效。法德和解是六国煤钢联营建立的前提，是实现西欧联合的重要步骤。

1958年1月1日，欧洲共同市场正式建立，标志着欧洲一体化的全面开始。战后西欧六国在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同时，生产和资本加速集中，特别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有了迅速的发展。在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六国要求将煤钢联营的原则推广到所有的经济部门与领域，以增加同美国商品抗衡的实力。1957年3月25日，六国在罗马签订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的两个条约。这两个在1958年元旦生效的条约统称为“罗马条约”。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目标是通过建立共同市场和协调各国经济关系，促进经济发展，为建立更加紧密的欧洲联盟奠定基础。条约的内容极其广泛，其中心是建立关税同盟和农业共同市场，而且要逐步实现商品、人员、劳务和资本的自由流通。根据条约，还建立了部长理事会、执行委员会、议会、法院等机构。从1967年7月1日起，三个共同体相应的机构合并成一套统一的共同体机构，主要有部长理事会、欧洲理事会、委员会、欧洲议会和欧洲法院。

欧洲共同体建立以来，六国的经济发展，比美、英等国快得多，它们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地位也得到了相应的增强。60年代后期，随着两个超级大国在欧洲加紧争夺，六国在共同反对苏、美控制欧洲，加强政治联合方面也有了新的发展。经济与政治上的生命力使得它不断发展壮大。共同体有过两次扩大，发展成为拥有12个成员国的一支重要的国际经济与政治力量，而且目前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1973年，共同体第一次扩大。英国、爱尔兰、丹麦三国加入共同体，使它由六国扩大到九国。战后英国的经济实力与国际地位急剧下降，但是它试图通过推行“三环外交”政策，依靠美国，重振大英帝国，保持其世界大国的地位。因而在50年代初，当六国酝酿筹建共同体时，英国采取超脱的“不介入”态度。共同体成立后，它又于1960年1月联合瑞士、瑞典、丹麦、挪威、奥地利和葡萄牙等国成立与共同体对抗的“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简称“小自由贸易区”）。但是“七国”的实力毕竟敌不过“六国”。因此，从1961年至1962年，英国、爱尔兰、丹麦和挪威等四国正式提出加入共同体的申请。由于英国不愿放弃“英美特殊”关系，同时还想保留英国和其它英联邦成员国在贸易上互相优惠的“帝国特惠制”，因此两次遭到法国的否决。这样英国等国的申请被搁置了十几年。70年代初，两个超级大国在欧洲

的争夺日趋激化，法国感到在抗衡超级大国中，只有在更大的范围内联合起来，才能使欧洲成为“欧洲人的欧洲”。同时，由于西德的经济实力远远地超过法国，因此法德争夺共同体领导权的斗争也比以前激烈。法国为了“外抗苏美，内制西德”，终于在英国表示放弃英美“特殊关系”与英联邦的“帝国特惠制”时，同意接纳英国等四国加入共同体。1972年挪威的公民投票以53.9%的多数否决了挪威加入共同体。三国，特别是英国加入共同体是西欧克服经济分裂，实现一体化进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这次扩大使共同体的出口贸易和黄金外汇储备远远地超过美苏，国民生产总值仅次于美国，超过了苏联。这大大地增强了共同体同美苏抗衡的实力，使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也随之发生变化。

1981年至1986年，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先后加入共同体，这是共同体的第二次扩大。它是西欧联合反霸的必然发展趋势。南欧三国经济发展水平从总体上低于九国，这必然给共同体带来一些棘手的问题。但是共同体可以借助南欧三个新成员国在历史、文化和商务上的对外联系，进一步加强它在地中海、巴尔干、阿拉伯世界和拉美影响，从而加强它在世界上的影响。

共同体建立20年来，主要在下面四个方面不同程度地实现了一体化。首先共同体在1968年7月1日提前实现了关税同盟，它促进了共同体各国生产的专业化和协作化，为经济的进一步一体化开辟了道路。

第二，实施了共同体的农业政策。它同关税同盟构成了共同体经济一体化的两大支柱。共同体各国已逐步实现了统一的价格，取消了农产品的关税，使各国的农产品也像工业品一样自由流通。对外实行统一的农产品关税，这就限制了美国等国向共同体倾销农产品。同时还设立了共同体农业基金。尽管关税同盟和共同的农业政策是共同体一体化进程中收效最明显的两项成果，但是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各国利益冲突，它还有待于进一步巩固和完善。

第三，走向经济和货币联盟。实现经济和货币联盟是共同体走向全面经济联盟的关键性步骤。然而，这也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任务。从1971年开始计划在10年内分阶段建立全面的经济和货币联盟的尝试，由于连续发生世界性金融危机和战后很严重的1973年至1975年经济危机而被迫搁浅。从1979年3月以后，共同体朝着建立单一的欧洲货币体系的方向发展。其核心是建立欧洲货币单位（ECU），各国货币确定对它的汇率，各国向欧洲货币合作基金交存20%的黄金和外汇储备，当各国货币的汇率超出一定的幅度时，通过基金进行干预以恢复稳定。

第四，实现政治合作，开始了向政治一体化的缓慢的演变。经济一体化和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斗争必然要导致政治一体化，这是一项更为艰巨和复杂的进程。目前，政治一体化主要表现在协调各国的外交政策，努力做到在国际上“用一个声音说话”，以实现共同的外交政策。目前共同体已同100多个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1975年它同中国正式建交，它对美政策的基

本方针是既联合又斗争，对苏联则是联美抗苏。共同体十分注意同第三世界建立合作关系和政治对话，1974年同阿拉伯国家联盟开始了正式的“欧阿对话”，1976年和东盟五国建立了大使级“对话”程序，1976年生效的共同体九国同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46个发展中国家在多哥首都洛美签订的“洛美协定”给予了这些国家贸易优惠，提供了财政援助。这个协定比60年代共同体同一些非洲国家签订的“联系协定”减少了一些殖民色彩，受到发展中的国家的欢迎。

(刘子安)

## 5. 戴高乐与法国的自主政策

1958年戴高乐东山再起，建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这是战后西欧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随着法国经济的恢复，羽毛逐渐丰满的法国垄断资本要求逐步摆脱美国的控制，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但战后新建的第四共和国政局动荡，政府软弱无力，1946年至1958年间更换了25届内阁，执政时间最短的只有两天，因而很难形成和推行具有连续性的政策。同时由于连绵不断的殖民战争的负担严重影响经济发展，不仅不能充分利用西方经济“景气”所提供的机会，而且不得不依赖美援。为此，法国垄断资本需要能维护其根本利益的强有力的政治代表人物执政。戴高乐既有战时的威望，又与第四共和国的弊政没有联系，正是法国垄断资产阶级所需要的合适人选。

戴高乐一生以维护法兰西民族的尊严、独立和利益的卫士自居，法兰西至上是他的突出思想。二战期间，法国贝当政府投降德国后，他毅然发起“自由法国”运动，聚集力量抗击德国侵略者。同时机智地挫败了美、英攫取法国利益的企图，捍卫了法国的独立和主权，也为同盟国打败法西斯轴心国作出了贡献。他极不满意美、英、苏三国不让法国参加战时和战后多次重要国际会议，他力争法国同美、英、苏等大国平起平坐的地位。虽然在1946年1月他辞去了法国临时政府首脑的职务，但仍以在野身份时时关注着法国的前途和命运。1958年法国政府陷入困境之际，戴高乐于6月1日受命组阁，重新执政。戴高乐强调，法国应该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在世界上发挥伟大的作用，法国“除非站在最前列，否则法国就不能成为法国”。（《战争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第1卷上册第1页）为此，他立即就内政外交两方面制订并实施一系列新的大政方针。

在国内，他上台伊始就采取了三项重大措施。首先，修改宪法，改革政治体制，以稳定政局。1958年9月经全民投票通过了新宪法，10月5日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宣告成立，12月戴高乐被选为总统。按新宪法规定，总统不仅是国家元首、三军统帅，而且有广泛的立法和行政权，有对总理和内阁的任命权，解散国民议会权，以至撇开议会而行使“非常权力”，而议会的权

力和作用则大为缩小。总统实际上成为权力的中心。法国由议会制共和国演变成实际上的半总统制共和国，按戴高乐的说法，新体制既是议会制的又是总统制的。这一改革基本上扭转了法国政局长期不稳、政府无力的状态。其次，改革财政，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以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他先后采取了提高税收、法郎贬值、发行新币、冻结物价、限制工资增长、促进设备更新等一系列措施，其作用也是显著的。第三，结束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新宪法改法兰西联邦为法兰西共同体，1960年宪法修正案规定其成员经法国同意可以独立。经谈判并镇压了反对非殖民化的叛乱集团，于1962年3月承认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同时保留法国在阿开采石油、使用军事基地的特权。戴高乐的非殖民化政策结束了旷日持久的战争，减轻了法国的经济负担，同时也是符合历史潮流的行动。

由于新政治体制带来的相对稳定的政局及其较有力的经济政策，在戴高乐执政的12年里，法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达5.8%，仅次于日本和西德，占资本主义世界第三位；外贸出口每年增长8.5%，进口增长10%；黄金外汇储备从1958年的10.5亿美元增加到1967年底的61亿美元。法国不仅摆脱了对美援的依赖，而且有力量同美国抗衡。

戴高乐还采取了以建立独立核力量为核心的独立防务政策，他强调，法国要有自己的原子弹。1960年2月13日法国第一次核试验成功后，制订了“十年国防现代化计划”。1965年发射了人造卫星，并逐步建立了中等规模的独立核力量体系。独立核力量成了法国谋求大国地位和推行自主外交政策的极其重要的工具。

戴高乐在国际上推行以维护民族独立、力争大国地位为核心的所谓戴高乐主义的外交政策。

戴高乐强烈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称霸世界，表示决不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任何超级大国去控制。由于60年代苏联的军事实力落在美国之后，尚未发展到咄咄逼人的地步；而美国的控制则构成对法国独立的主要威胁，所以戴高乐的独立外交政策具有强烈的抗美特色。在政治上，放弃了第四共和国时期奉行的“大西洋政策”，提出“欧洲人的欧洲”的口号，同美国建立的“大西洋的欧洲”分庭抗礼。在经济上，先是对美国在法国的投资活动加以限制；续而向美元的霸主地位挑战。1965年初，法国以大量美元向美国国库兑换黄金，接着又公开宣布退出金汇兑本位制，主张恢复金本位制，并建议各国把储备中的美元兑换成黄金，这些措施使美元的霸主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动摇。特别是在军事上谋求摆脱美国控制。在戴高乐看来，无论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还是核武器，都由美国一手操纵，北约是一个从属的组织。因此，1958年9月他建议由美、英、法三国组成决定北约的安全、战略计划和核武器使用等重大问题的“指导机构”。当他想与英、美平起平坐的打算遭到拒绝后，断然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法国的民族独立和主权。如撤回受北约控制的法国地中海舰队（1959年3月），撤回大西洋舰队（1963年6月），

撤回在北约军事机构工作的法国军官（1964年4月），直至完全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1966年3月）等等。与此同时，为了行使法国对其领土的全部主权，再也不允许美国在法国境内驻军和建立军事基地，连北约欧洲盟军司令部和北约总部也被迫撤出法国。另一方面，坚决拒绝参加美国提出的“多边核力量”计划，并拒绝在部分核禁试条约上签字。戴高乐的这一系列抗美独立行动，震动了全世界。

戴高乐认为，苏联不仅是“极权主义”国家，也是超级大国，威胁着西方的安全。因此，在第二次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等重大问题上，法国旗帜鲜明地谴责苏联的行径。但是，为了抗衡美国，戴高乐率先对苏联和东欧国家采取“缓和、谅解和合作”的政策，并屡次提到建立一个“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表示了同苏联一起建设一个“大欧洲”设想。这表明戴高乐是利用苏联这张牌来对付美国，以增强法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

戴高乐明白，要抗衡美国，争取大国地位，单靠法国的力量是不够的，因此，必须推进西欧的联合，借重欧洲联合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为此，他始终坚持三项政策主张。第一，主张建立独立于美国的“欧洲政治联盟”，但不能损害法国的主权，是“各国的欧洲”，即“欧洲邦联”而不是“欧洲联邦”。第二，实行法德合作，作为欧洲联合的基础。这样即可利用法国在政治上战胜国的优势地位，抑制联邦德国重新称霸欧洲；又可利用联邦德国明显的经济优势，以增强联合起来的西欧的实力抗衡美国，1963年1月签订了《法德合作条约》。“法德轴心”的形成对于促进西欧联合的历史作用是不可磨灭的。第三，拒绝英国加入共同体。戴高乐把力图保持英美“特殊关系”的英国看作是美国在西欧的“特洛伊木马”，如果接受英国加入共同体，不仅会成为与法国争夺共同体领导权的劲敌，而且会通过英国使共同体受制于美国。因此，在60年代里，法国两次否决了英国加入共同体的申请。

此外，法国还敢于违背美国的意愿，于1964年1月毅然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同时与发展中国家建立广泛的联系。

戴高乐政府所推行的内外政策，没有也不可能解决法国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由于加强了资产阶级专政和对劳动人民的剥削，60年代中期以后法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大规模高涨，终于发展成1968年5月的群众运动风暴，迫使戴高乐于1969年4月辞去总统职务。然而应当肯定，在戴高乐执政期间，法国的政局相对稳定，实力显著增强。它的自主外交政策，既在一定程度上表露了法国垄断资本的扩张野心，又推进了西欧的联合，沉重地冲击了美国的霸权地位，则是有积极意义的。法国政府推行自主外交政策的过程，标志着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解体的过程，是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重要表现。1970年9月戴高乐逝世时，毛泽东称赞他是“反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

（王持明）

## 6. 英国经济的缓慢发展和“英国病”

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十分不平衡的。80年代前，英国经济发展相对缓慢，而就英国本身发展而论，1946—1967年间发展速度稍快。国内生产总值1950年为362.2亿美元，1965年为989.4亿美元；工业生产平均年增长率1944—1955年为4.5%，1958—1969年为3.5%；钢产量1950年为1655万吨，1965年为2744万吨。英国经济在初期发展稍快是由于取消了战时对消费品的严格配给制，刺激了生产的发展，竞争对手德意日和法国都在恢复元气，不对英国外贸和外资出口构成重大威胁；马歇尔计划的大量美元有利于英国经济的复兴；初期工业国有化和社会福利政策也显示了某些活力。此外，在英联邦的特殊地位也使英国拥有经济优势。

然而，战后整个说来特别是60年代和70年代，英国经济发展缓慢。以工业生产指数1970年为100，1980年只有105.1。钢产量1970年2832万吨，1980年只有1128万吨，煤产量70年代一直没有超过1950年水平。英国国内生产总值在西方世界的比重1960年低于美国和联邦德国，1970年又低于日本和法国，年平均增长率，1966年至1980年为2.1%，低于西方其他主要发达国家，1951年至1980年为2.4%也比其他发达国家要低。工业生产量在西方世界的比重1970年占7.4%，低于英、日、德，1976年只占4.5%，年平均增长率，1951年至1980年为2.4%，其中1966年至1980年为1.5%，而同期其他主要西方国家都在3.3%以上。主要工业品在西方世界的地位也明显下降。钢产量50年代占第2位，1980年退居第6位。商船下水吨位1950年为西方之冠，1980年退居第9位。出口和黄金外汇储备的比重也下降。人们把这种在西方发达国家中长期相对缓慢发展，国力相对削弱现象叫作“英国病”。

“英国病”是一种综合症，病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殖民体系的彻底瓦解对最大的殖民帝国打击是致命的。英国逐步丧失了了在殖民地的政治经济特权，极大地削弱了英国的竞争力。特别是长期以来英国的殖民政策自食苦果，加速了本土农业的衰落和国内巨资的外流，客观上又扶植了竞争对手，长期的殖民扩张带来大量海外开支也使英国背上沉重的包袱。由于长期以来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偏少，对技术革新和新兴工业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1951年至1973年英国年平均投资率为5.4%，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如果资本投资指数以1970年为100，意大利106，美国119，联邦德国124，法国129，日本155，而英国仅98。

其次，在推行福利国家制度和工业国有化政策中，某些弊端也带来沉重负担和消极影响。战后初期，英国工党政府颁布了社会保险、国民健康福利、国民医疗等社会保障立法。1948年艾德礼首相宣布英国是福利国家，其后上

台的保守党政府也把社会福利作为争取民心的旗帜，英国政府以完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自诩。到了60年代，社会福利范围进一步扩大，它既是一百多年来英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又是统治阶级为稳定统治进行收入再分配的一种改良性调整。但是福利开支的增加和经济缓慢发展不相协调，1961年至1974年各种福利开支在国民支出中的比重由37%增加到53%，从而使英国这个经济增长缓慢的“穷国”连年超负社会保障“富国”的重担，其结果不仅导致了财政赤字，经济形势的恶化，而且福利制度弊端的发展也使低效率经济愈益明显。

英国工业国有化在战后4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后期的两次高潮，主要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公用事业的国有化。历届工党政府宣称奉行国有化政策，30年代大危机和世界战争的打击使不少有识之士感到有必要发展“混合经济”以补充资本主义的私人经济。这种有条件的国有化政策并未打击原有企业主的根本利益，也未把他们排除在国有化企业管理之外，产品价格政策上也有利于垄断资本，因此英国的国有化政策没有削弱垄断资本。它一方面促进了某些部门的技术改造和进步，而另一方面又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和纳税人负担。随着国有化的推行，管理体制上的弊端招致不少国有企业连年亏损，企业缺乏灵活性、主动性，经济效益低，竞争力弱。

第三，英国某些“传统精神”对经济发展带来的消极作用。英国的“传统精神”从本质上说是封建意识和资本主义意识的混合物。它突出表现为社会门第观念的消极影响。长期以来，由于社会门第等级造成职业上的高低贵贱及上层社会的强烈排他性，从而加重了英国资本和人才的外流，造成人才的跨国界水平流动而不是国内不拘等级的垂直流动。其结果挫伤了国内中下层民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不少人为自己及其子女所处社会地位的改变机遇极小而消沉，另一方面某些上层社会等级的职业受惠者并不称职，而导致素质的下降。另一个突出表现是在各阶层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安于现状、不爭变革的保守思想，它成为英国社会经济改革的思想障碍和绊脚石。

二战后由于英国殖民体系的彻底瓦解，新独立的原英属殖民地和附属国有57个，占全世界新独立国家的一半以上。迄今英国殖民地主要分散在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上一些零星岛屿不到10个。英联邦制度在殖民体系瓦解中也相应发生了重大变化。1931年12月11日，英国国会通过的威斯敏斯特法，肯定了英王是英联邦成员国自由联合的象征。确认了自治领独立解决内外政策能力的法律地位。当时的成员国包括联合王国、澳大利亚联邦、爱尔兰自由邦、纽芬兰、新西兰和南非联邦。1947年印度、巴基斯坦分治独立带来了英王地位的难题。1949年在英联邦总理伦敦会议上，印度宣布保留英联邦成员国身份，接受英王作为英联邦首脑。其后，许多新独立的原英殖民地国家援引印度为例，宣布独立而留在英联邦内。当时英联邦成员国有联合王国、加拿大（1949年纽芬兰并入）、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联邦、印度、巴基斯坦、锡兰（1948年2月为自治领）。1949年4月爱尔兰共和国



法生效，不再成为英联邦成员国。在英联邦内，英王是英联邦的国家元首和各独立成员国自由联合的象征。所有成员国公民承认为“英联邦臣民”，英联邦各成员国总理定期开会磋商，成员国间互派高级专员而不派大使。1965年起建立了英联邦秘书处。1966年英国把英殖民地事务部和联邦关系部（1947年由自治领事务部改称）合并为联邦事务部，该部大臣负责处理联邦成员国、非正式成员国及与其他殖民地、保护国的关系。1971年英联邦总理会议宣言声明“英联邦是独立主权国家的志愿联合组织，每个国家都对其自己的政府负责”。

战后英联邦逐渐衰落，英联邦各国间的政治联系削弱，英国特权地位丧失。1944年以来每两年一次的总理会议，前16次都在伦敦召开，其后在各成员国首都轮流举行，1979年首次在非洲国家赞比亚的卢萨卡召开。在1966年召开的英联邦首脑会议上，32个成员国中有9国没有参加。在英联邦成员国中几乎所有非洲成员国都参加了非洲国家首脑会议，参加不结盟国家会议的英联邦成员国也愈来愈多，绝大多数成员国还参加了发展中国家的77国集团。因此，在英联邦中离心倾向加强，英国的控制作用减弱。另一方面美苏等国势力不断向英联邦成员国渗透。1969年美国对英联邦主要成员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印度的直接投资超过了英国。随着苏联对印度的渗透，英国在印度的影响已退居第3位。1973年1月1日英国正式加入欧洲共同体后，帝国特惠制也被共同体的洛美协定所取代，英镑区的影响和范围大大缩小。

英联邦成员国到1984年时共有49个，其中亚洲国家8个，非洲国家15个，美洲国家12个，大洋洲国家12个，欧洲国家2个，美洲、大洋洲的英联邦成员国占总数的一半。原成员国中爱尔兰于1949年退出，南非联邦1961年退出，巴基斯坦也于1972年退出。

（黄安年）

## 7. 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

日本在经济恢复的基础上，从50年代中期起大体花了不到20年时间，基本上实现了国民经济现代化，从一个落后的工业国一跃而为资本主义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号经济大国。这个只占世界陆地面积0.3%的岛国，其国民生产总值已经占到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大约十分之一。

日本政府在解决战后初期的经济困难时实行了“倾斜生产方式”，即重点增产方针。在资金、原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集中力量恢复和发展作为能源最大来源的煤炭的生产，同时发展钢铁生产，从而带动了整个工矿业和农

业生产的恢复，产生了良性连锁反应。美国占领当局实行了民主改革，消除了封建因素，也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前提条件。美国还向日本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特别是在侵朝战争期间，日本接受的“特需”共计 22.2 亿美元。“特需”不仅为日本经济提供销售市场，而且获得大量外汇。在这以后，日本增加原料和技术的进口，更新设备，刺激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到 1955 年，除对外贸易外，国民经济以及工农业生产的一些主要经济指标全面恢复或超过了战前最高水平。1956 年度的经济白皮书，在回顾这段十年历程，展望日本经济的未来以后写了如下一段话：“现在已不再是‘战后’。我们现在面临着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局面。在恢复中求发展的时代已经结束。今后的发展要靠实现现代化。”日本社会上顿时广泛流行着“现在已不再是‘战后’”的一语。

但是，这时的日本经济与欧美国家相比还很落后。1955 年度的国民生产总值刚到 240 亿美元，等于美国的十五分之一，西德的二分之一。人均国民收入只有 220 美元，在西方世界中名列第 35 位。在产业结构方面，第一类产业的就业者比率占全体就业者的 40%。出口结构也多依赖于纤维杂货等轻工业品来获得外汇，依赖低工资倾销产品。所以，这时日本还不能说是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只能说是“中进国”。

日本经济在 10 年恢复的基础上，从 1956 年起进入了以重工业、化学工业为中心，大量增加设备投资，进行固定资本更新和技术革命，实现工业现代化的阶段，人们通常讲的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就是指这个时期而言。在这一时期，日本以旺盛的设备投资热为中心，出现了三次经济繁荣高潮。

1955 年底，第一个由内阁决定的计划《经济自立五年计划》问世，这是以充分就业和经济自立为基本的目标计划。1957 年底，对这个计划进行了修订，制定了《新长期经济计划》。这些计划已不再是战后几年中实行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经济政策，而是试图执行一种有中期展望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投资热潮，尤其民间设备投资的增长率连续保持着高水平，从 1955 年的 8.6% 提高到 1956 年的 38.7% 和 1957 年的 18.3%，繁荣期持续了 31 个月，这次繁荣史称“神武景气”。这是高速增长时期的第一个高峰。

从 1958 年下半年起又出现了投资热潮。民间设备投资的增长率在 1959 年为 17%，1960 年为 41%，1961 年为 37%，出现了繁荣期持续 42 个月的所谓“岩户景气”。这是高速增长时期的第二个高峰。随着第二次投资热的出现，池田内阁雄心勃勃地提出了《国民经济倍增计划》，它又推动了更大规模的投资热。在此其间，日本的经济力量迅速增强，技术革命和消费革命也有了长期发展，大大推进了现代化。1961 年 7 月日本政府制定了《促进自由化计划》，并在 1962 年内，对包括石油、煤等在内的产品的 88% 实现了贸易汇兑自由化。1964 年 8 月，日本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

这些贸易汇兑自由化政策，反映了日本经济已发展到相当水平。所以，它在1964年10月有能力承办第18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1965年日本遭到了战后第五次经济危机的冲击。但从1965年底至1970年6月，又出现了长达56个月的所谓“伊奘诺景气”。这一期间民间设备投资的增长率连续保持高水平，其中1966年至1969年一直在21.3%~27.3%间，这是高速增长时期的第三个高峰，也是战后最长的繁荣期。从1966年到1970年的五年里，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超过10%，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1.6%，超过了“神武景气”和“岩户景气”。这次高峰的特点是持续繁荣和国际收支顺差同时出现。日本以重工业、化学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在迅速发展的基础上，急剧扩大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

到70年代初，日本主要工业品产量、出口贸易、黄金外汇储备都跃居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位或第三位。1973年，日本生铁产量达9000多万吨，粗钢超过1亿吨，出口贸易总额达368亿美元以上。1972年，黄金外汇储备达164.8亿美元，仅次于西德。

总之，从5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经济以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的速度向前发展。在1955年至1973年间，日本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9.8%，这个速度比西德、法国近快一倍，比英国、美国快两倍。因而，它在近20年的高速增长时期，提高了它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地位。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1960年超过加拿大，居于资本主义世界第五位，到1966年赶上法国，1967年超过英国，1968年又超过西德，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不仅在国民生产总值方面，同时在生产手段、劳动力质量、经营管理、经济结构、消费结构等方面也都大体赶上或甚至超过欧美先进国家。

从上述看出，高速增长使日本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了经济大国，而高速增长的关键就在于企业进行了旺盛的设备投资，具备了利用新技术的先进设备，因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日本之所以能够连续不断地积极地进行设备投资，是有它内外条件的。

第一，由于二战期间技术开发的空白和战争破坏，日本经济起飞时其技术仍大大落后于欧美国家，因此，日本企业竞相引进欧美新技术，增加利润的机会很多。

第二，充分发挥了政府的职能。在高速增长时期，政府提出了一系列适当的经济计划，同时在各方面进行行政指导，避免企业进行不必要的投资。同时，银行充分发挥了设备投资方面的重要作用。

第三，国际形势发展对日本很有利。日本是加工贸易国，能源和矿物资源几乎全部靠进口，然后加工成工业成品出口。而在高速增长时期，日本能够稳定、低廉地进口中东地区的石油等矿物资源。同时世界经济未曾出现战前那样严重的危机，世界贸易增长率大幅度地提高。

第四，日本长期处于和平环境，政局相对稳定。同时，日本历届政府利

用安保条约，把日本置于美国军事保护之下。从 50 年代末以来日本军费开支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1% 以下。正是由于这种核保护伞使日本得以集中全国人力、财力，在经济发展单行轨道上迅跑。

进入 70 年代后，由于日本整个工业技术基本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因此引进国外现成的先进技术促进本国技术革新的余地大大缩小，这就直接削弱了设备投资的推动力。尤其 1973 年石油危机之后，有利于设备投资、迅速发展经济的内外条件大部消失，日本再也未出现过高速增长时期的那种“奇迹”。

日本为了继续保持经济大国的领先地位，必须改变以往“加工贸易立国”的战略，要有一个适应新时期的战略转变即向“科学技术立国”战略过渡。从过去那种“在欧美土地上培育出来的优良技术引进、加以改造的‘收获型技术’转变为发挥创造性的‘播种、培育型技术’”，即从“模仿和追随的文明开化时代”迈向“首创和领先的文明开拓时代”。这就是日本提出的所谓“第三次远航”。但是究竟这次远航能否把日本经济大船引向预定的目的，有待历史作出新的结论。

（金相春）

## 8. 肯尼迪与约翰逊时期的美国

在 1960 年的美国大选中，民主党获胜。肯尼迪 作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入主白宫。1963 年 12 月肯尼迪遇刺身亡后，约翰逊继任总统，1965 年连任至 1969 年。

肯尼迪指责共和党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削弱了美国的防务。他上台后，在增加国防预算、扩充军备的同时，一改艾森豪威尔的“大规模报复”战略，鼓吹“灵活反应”战略。

“灵活反应”战略要求在大力发展导弹、核武器的同时，加紧扩充常规地面部队，并加强它的机动性，尤其强调“特种部队”灵活地、进行多种选择地打多种战争的作用。肯尼迪把越南南方作为“特种战争”的实验场，但遭到的是一连串的失败。

肯尼迪—约翰逊政府交替运用武装侵略与和平渗透的方式向外扩张。1961 年 4 月组织雇佣军武装入侵古巴，1965 年出兵入侵多米尼加，逐步扩大侵越战争，无一不暴露出其帝国主义本性的狰狞面目。出于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的需要，美国政府于 1961 年 3 月成立了“援助”不发达国家的“和

---

肯尼迪，1917 年生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一个富豪家庭，1940 年毕业于哈佛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在海军服役。1946 年当选为众议员，1952 年当选为参议员。

平队”。“和平队”在派驻国从事教育、农业、卫生、企业管理等项工作，其成员无孔不入，广泛搜集并及时向美国政府提供各种情报、意见与建议。1961年3月，肯尼迪宣布一项新的“援助拉丁美洲”的计划即“争取进步联盟”，声称要提供200亿美元援助，促进拉美国家的土改和工业化。同年8月，在乌拉圭召开的美洲国家会议上通过了这个计划。美洲人民把这个计划称为“殖民落后联盟”。

在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美国遇到了种种挑战。西欧各国随着经济的恢复与发展，逐渐趋于联合，摆脱在经济、外交上受制于美国的局面。美元的霸权地位也走向衰落。由于战后美国海外军事开支、对外“援助”以及国外投资逐年增多，美国黄金大量外流，黄金储备在资本主义世界所占的比重由1949年的70.9%降到1961年的41.2%。同期内共同市场六国的黄金储备由4.8%增加到26.4%，英国由3.9%增加到5.6%。1960年10月17日，伦敦金融市场长期稳定的黄金价格上涨，出现了战后第一次抛售美元的风潮。此后，世界各地金融市场上的黄金价格也直线上升。肯尼迪上台后，曾提出一个应付国际支付和黄金外流危机的“行动计划”，扬言要在1963年内达到收支平衡。肯尼迪的这一目标非但没有达到，在他1963年12月遇刺身亡后留给美国政府的遗产中，仅当年前两个季度的国际收支赤字就达59亿美元，远远超过他接任前的1960年全年的39亿美元。约翰逊上台后，越南战争“逐步升级”，黄金外流更趋严重，终于导致了美元和黄金等同地位的垮台。

美国政府在国内也受到人民革命运动的冲击。60年代初，美国黑人占总人口的11%，约有两千万。其中的99%属于低收入的穷苦阶层。他们只能在一些技术要求不高，需笨重体力劳动的行业中偶然找到就业机会，其失业率远远高于白人，失业后没有可靠的生活保障。这些黑人往往聚居在一起，居住区内由于市政管理不善，疾病流行，社会犯罪严重。这种状况激起了有觉悟的黑人积极参加有明确政治要求的斗争。

1960年2月，北卡罗莱纳州的黑人掀起了一个要求取消餐桌旁种族歧视的“入座运动”。许多州的黑人群起响应，迫使全国十四个州和南方二十八个城市的许多商号取消了餐桌旁的种族隔离制度。1961年5月，为抗议种族隔离政策，十三名黑人和白人青年从纽约乘汽车到南方去，专在禁止黑人进入候车室的汽车站上停留。接着一批又一批的黑人和白人支持这一斗争，形成席卷全国的“自由乘客”运动。期间黑人和同情黑人的白人与白人种族主义者进行斗争，发生了流血冲突，直到联邦政府出面干预才告平息。1963年为纪念林肯签署的《解放宣言》生效一百周年，七个黑人组织共同发起了

---

和平队隶属于国务院，其成员多来自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在经过仔细审查后，接受特种训练。他们除去掌握一定的专业技术外，还懂得派往国的官方语言及当地一两种方言。和平队大多被派往非洲，加纳是接受和平队的第一个国家。

有二十多万黑人和白人参加的向华盛顿“自由进军”的运动。

1965年2月21日，著名黑人领袖马尔克姆·艾克斯在纽约市哈莱姆区的黑人集会上发表演说时被白人种族主义者杀害。黑人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形式自此转趋激烈，有些地方发展成武装抗暴斗争。1968年4月4日，主张非暴力的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被杀害，又成为激起美国黑人斗争的一颗引爆弹。

约翰逊政府扩大侵越战争后，国内人民的反战运动此起彼伏。青年学生活跃在反战运动的最前线，他们最初采取课余演讲会的形式，以后又发展到游行示威、烧毁征兵证、拒服兵役，拦截运载侵越美军和物资的军车，没有警察将人群驱散，军车就不能开动。美国专栏作家斯·艾尔索普当时评论说，越南战争是（美国）一百年来人们意见分歧最大的战争。

美国政府为了缓和矛盾、稳定社会秩序，采取了一些类似“新政”的政府干预经济的措施。这就是肯尼迪标榜的“新边疆”和约翰逊鼓吹的“伟大社会”纲领。

1960年7月15日，肯尼迪在接受民主党候选人提名的演说中指出，美国正站在“新边疆的边缘”。1961年在提交国会的国情咨文中，肯尼迪哀叹，美国这个“世界上力量最雄厚的工业国，其经济增长速度却是最落后的”，鼓吹要“扭转颓势”。

1961年2月2日，肯尼迪向国会提出经济复苏和增长的咨文，国会根据这一咨文通过了一些相应的立法。这些措施，对加速美国经济复苏起了一些促进作用，但对于当时的结构性失业却无济于事。为了改变美国在设备更新和开发新技术方面落后于西欧、日本和苏联的不利状况，1962年肯尼迪促请国会通过了相应的法案，以期使企业能够聚集资金用以更新设备，并开发利用新技术。美国政府还亲自插足尖端技术领域，1961年5月25日，肯尼迪提出要在十年内实现登月计划，以期改变在航天领域里落后于苏联的状况。

在扩大社会福利方面，肯尼迪还提请国会批准了以解决老年人保险为目的的城镇保健及有关教育方面的立法。肯尼迪在“给全国人民提供体面的住房”的目标下，提请国会批准增加并扩大对城市规划的援助，为此建立了内阁一级的住房和城市发展部。

美国黑人的斗争，也促使美国政府考虑并解决民权立法的问题。1963年6月19日，肯尼迪向国会提出一个新的民权法案，由国会通过后，1964年7月2日由约翰逊签署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七个民权法案。虽然这个法案的内容与黑人的斗争目标尚有距离，并且法律的规定并不完全等于实施，但这个法案在黑人斗争史上还是有其一定的进步意义和影响的。

约翰逊继任总统后，在国内政策上继续实施肯尼迪的新边疆计划。在1964年提交国会的国情咨文中，约翰逊宣布要“无条件地向美国的贫困宣

战”。经 1964 年 8 月 26 日的民主党代表大会认可，将“伟大社会”作为民主党当年大选中的竞选纲领。

1965 年约翰逊在其第二任期开始后，积极推行以“伟大社会”闻名的施政纲领。在他提请国会批准的法案中，包括有发展经济、社会福利和救济、发展教育的立法。其后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又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立法。

但是，约翰逊政府为刺激资本家更新设备而减少税收同为扩大社会福利而取财于税收的措施势同水火，两者不会兼得。到了约翰逊执政的后两年，侵越军费直线上升，“伟大社会”计划也寿终正寝了。

1968 年美国在国内外激烈的动荡中迎来了大选。执政八年的民主党又离开白宫让位于共和党。

(柳舒)

## 9. 尼克松时期的美国

1968 年 11 月 5 日，共和党人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当选为美国总统，1969 年 1 月 20 日宣誓就职，他正是在美国内政和外交陷于重重困境之时走马上任的。

60 年代中期以来，美国通货膨胀恶性发展，出现了经济停滞状态，失业率迅速增长，造成了人民群众的普遍不满。为制止通货膨胀的日趋恶化，尼克松一上台，便提出了“和通货膨胀作斗争”的口号，并在 1969 年 4 月 14 日公布了所谓“姑且一试”计划，企图通过采取紧缩货币的措施以控制货币的流通量。这一计划非但未能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反而导致了高达 28 亿美元的巨额财政赤字，结果在美国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五次经济危机，“滞涨”这一新的社会病在美国出现了，这使尼克松政府受到社会广泛的批评，使共和党陷于被动地位。

为对付此等局面，尼克松于 1971 年 8 月 15 日，通过电视向全国发表讲话，宣布实行旨在解决失业、通货膨胀和美元危机以稳定经济的“新经济政策”。其主要内容有：冻结物价、房租和工资等 90 天；削减国会开支；停止外国中央银行以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进口商品需缴纳 10% 的附加税等。这一政策严重损害了美国劳动者的切身利益，所以，被人称之为“罗宾汉—反常态—劫贫济富”的政策，同时，也遭到了其他国家的抵制和反对。结果在“新经济政策”实施的第二个阶段，美国政府不得不将“冻结”改为“管制”和限制物价上涨，被迫取消了进口商品加收 10% 附加税的规定。“新经济政策”尽管曾使美国经济一度有所回升，但它并不是解决“滞涨”问题的灵丹妙药，在尼克松的整个任内，这一问题始终困扰着他而无力扭转。由于长期通货膨胀的影响，“美元作为西方世界标准交换媒介的地位已经丧失”，“金元帝国”的大厦开始倾覆了。

尼克松政府除了面对严重的经济问题而束手无策外，还承受着一系列复杂、棘手的社会问题的压力。

60年代的美国被人们称为是“一个幻想破灭、愤怒和恐惧的年代，是乱糟糟的十年”。这主要表现在人们，尤其是青年一代对美国式的文明丧失信心而造成的精神空虚和堕落；社会犯罪率不断上升，暴力事件层出不穷，使人们普遍缺乏安全感；离婚率和非婚生子女人数增加，使传统家庭趋于解体，由此而产生一系列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宗教狂热日盛，各种教派五花八门，企图通过皈依上帝以求“避难”。丰裕的物质享受和极度的精神贫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加之黑人起来要求民权的斗争也构成了对美国社会的一大冲击力量。所有这一切对历史传统和现实的挑战，尼克松政府也是无力应付并从根本上加以解决的。

60年代中后期，美国进步学生要求改革现行教育制度的斗争与黑人群众反对种族歧视、要求实现平等的民主权利的斗争结合起来，发展成为一股拥有广泛社会基础的反对美国扩大侵越战争的政治力量。人们纷纷走上街头，示威游行，抗议统治集团向越南增派新的兵力，不少青年人还拒绝应征，为一场非正义的战争而去屠杀越南人民。面对这种强大的人民反战运动，加之美军在越南南方屡遭挫折，尼克松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尽早结束这场旷日持久而无望的战争，因为这也关系到他自己的政治前途。但为了维护美国的利益和“面子”，他要达到的目标是所谓“体面的和平”，所以，在向世界舆论和美国民众作和平亮相的同时，又继续和扩大对越南北方等地的狂轰滥炸，造成了印度支那人民的巨大伤亡。结果，这也使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进一步高涨，甚至曾参加过越南战争的美国士兵也加入其中。这充分说明，广大美国人民是反对垄断资本集团和政府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强大的社会压力，是尼克松政府最终放弃继续侵略越南的政策，结束这场长达12年之久的战争的重要因素。

尼克松在位期间，美国的外交政策也进行了重大调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美国的霸权地位受到了强大的挑战并日益走向衰落，这就迫使美国不得不改变在世界伸手过长的老做法，首当其冲的是从亚洲收缩它的战略力量，以便集中力量与苏联主要在欧洲抗衡和争夺。1969年7月25日，尼克松在关岛对记者发表谈话，阐述了美国对亚洲的新政策。其主要内容有三点：第一，美国将恪守条约所承担的义务，在亚洲继续发挥作用；第二，如果美国的盟国或对美国利益至关重要的国家受到核国家的威胁时，美国将提供保护；第三，对亚洲的事务，美国赞成并希望由亚洲国家自己处理以摆脱亚洲盟国对美国的依赖，再蹈越南战争的复辙。这一政策，后来被人们称之为“尼克松主义”。不久，在此基础上尼克松又进一步提出了所谓“和平的新战略”，即以“伙伴关系，实力和谈判”为支柱的美国全球战略。美国公开承认其在战后那种家长式发号施令的时代已成过去，它的战略目标是以苏、美、西欧、中国和日本世界五大力量为中心的相互制约关系，



以维持全球均势，从而使美国的既得利益得以保持和巩固。尼克松主义的提出，标志美国对外政策的一次重大收缩性调整。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长时期内，对华奉行的是遏制和孤立的政策。随着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和它在亚洲的力量收缩，中国力量的不断壮大和在国际事务中地位的重要性，中苏关系的破裂和恶化以及美苏争霸的激烈角逐，使尼克松政府必须正视它与中国的关系问题。

早在尼克松上台之前，他就认识到美国不可能长久地将中国——这一世界大国孤立于国际事务之外。他刚上台后不久，就曾指示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起草一份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并寻求与中国政府的接触。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飞抵北京，为尼克松访华作准备。7月15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公告，宣布尼克松应邀将于1972年5月以前访问中国。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抵达北京，当天与毛泽东主席会见，“就中美关系和国际事务认真、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在访问期间，周恩来总理同尼克松就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及双方关心的其它问题进行了会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声明两国将本着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处理国家间的关系，并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建立霸权的努力；关于台湾问题，美方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并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尼克松此行访华和上海公报的发表揭开了中美关系史新的一页，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两国关系的继续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美国根据其全球战略的总构想，在与中国改善关系的同时，也在积极谋求与苏联关系的缓和，以“谈判”代替“对抗”；另一方面，由于中美关系的新突破，苏联也感受到某种压力，因此也希望改善他与美国的关系。1972年5月22日至30日，尼克松访问了莫斯科，同勃列日涅夫签署了《苏美联合公报》，东西方关系遂进入“缓和”阶段。

1972年尼克松再次被共和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11月7日，他获得了破记录的61.3%选票，但由于不少美国民众对政治的冷漠，参加投票的只占55%。尼克松在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而蝉联总统，开始信心十足地进入了他的第二届任期。但就在转年春天，“水门事件”的烽烟日盛，扰得他心神不宁，把他逼到了难以摆脱的窘境。

1972年6月17日，有五人潜入设在华盛顿的民主党总部所在地——水门公寓进行窃听等非法活动而被捕，其中一人为“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官员。事后不久，尼克松曾两次向全国发表声明，否认政府与此事有关，企图进行掩盖。经过调查确认，“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和白宫都与此事关系重大，为此，成立了一个专门负责调查水门事件的钦文委员会，同时还披露了尼克松政府进行的许多非法活动的事实。为进一步遮掩真相以保全自己，尼克松经过多次尝试失败后，指使代理司法部长伯克悍然解除了特别检查官考克斯的职务，这一事件在历史上被称为“星期六夜晚大屠杀”。此举在美

国公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激起了公愤，使欲盖弥彰的尼克松更加陷于被动的地位，他被迫交出了“水门事件”发生后不几天的一次谈话录音带，但其中一段长达 18 分钟的关键性内容已被洗掉，对此，尼克松根本无法圆满解释。众议院司法委员会遂开始考虑对尼克松进行弹劾的问题，在进一步调查和多次“交锋”过后，以“在水门事件中阻碍司法活动和滥用总统权力”为由，正式决定了对他的弹劾。正在此举尚未施行之时，1974 年 8 月 8 日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辞职的总统，尼克松通过电视向全国发表了辞职演说，翌日，辞职正式生效，副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宣誓就任美国第 38 届总统。

(吴崇诰)

## 10. 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和经济滞胀

二战结束迄今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虽然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经济生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富裕，但由于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并未消除，遂使资本主义固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不断出现。

战后的经济危机是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居于统治地位，资本的高度国际化以及商品和资本的国际流向不均衡等条件下发生的，因此各国经济危机的次数、快慢、程度不尽相同，而时间上大体一致、周期基本相等的危机有三次。

第一次，发生于 1957 年至 1958 年。在这次危机之前，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已爆发了程度不等的经济危机。美国在 1948 年 8 月至 1949 年 10 月首先发生，15 个月内工业生产下降幅度达 10.1%，失业人数 492 万人，失业率为 7.9%。日本在战后初期忙于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没有发生危机，只在朝鲜战争结束军事订货减少以后，才于 1953 年至 1954 年发生了第一次经济危机，持续 8 个月，工业生产下降 5%，失业人数达 68 万。西欧各国也在经济恢复的 1951 年至 1952 年发生了第一次经济危机。英国 1951 年 7 月至 1952 年 8 月工业生产下降 23.6%，法国从 1952 年 2 月连续 12 个月内工业生产下降 9.5%，德国危机较短。在此以后，依靠设备更新，增加投资，资本主义各国经济逐步走向高涨。不久市场与需求之间的矛盾不断尖锐化，终于爆发了战后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这次危机于 3 月首先开始于美国，到 1958 年 4 月达到最高潮，工业生产下降 13.5%，其中钢铁产量下降 51%，小汽车下降 48%，并波及金融领域，工业股票下降 15%，国际收支逆差达 33.5 亿美元，黄金外流 23 亿美元，最高失业率达 7.5%。日本的危机也很严重，工业生产持续下降 11 个月，下降幅度达 10.7%，全国失业人数最高达 92 万人。联邦德国从 1958 年 2 月到 4 月工业生产下降达 3.1%。法国从 1958 年 4 月到 1959 年 2 月，工业生产下降达 4.6%，最高失业人数达 17.9 万人。英国从 1957 年 10 月至 1958 年 10 月，制造业产量下降达 3.6%，最高失业人

数达 60.9 万人。这次危机使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下降了 5%，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失业总人数达 1000 万人。由于主要依靠赤字财政政策、扩大政府开支以及金融调节等手段，危机才得以度过。

在从 5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初的高速增长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也未中断过，不过主要在各国单独进行，尚未蔓延成为世界性的危机。这期间美国曾出现两次，一次在 1960 年 2 月到 1961 年 2 月，工业生产下降 8.6%，失业人数达 500 万，失业率为 7.1%。经过 8 年的增长以后到 1969 年 10 月至 1970 年 11 月又发生了第二次，工业生产下降 8.1%，失业人数达 503 万，失业率为 6%。法国发生于 1964 年 5 月至 1965 年 1 月，工业生产下降 5.5%，失业人数为 7.6 万人。联邦德国也发生两次，一次在 1966 年 4 月至 1967 年 6 月，工业生产下降 7.6%；一次在 1971 年 3 月至 12 月，工业生产下降 8.1%。

第二次世界性经济危机发生于 1973 年至 1975 年，范围广，程度深，是战后最严重的一次。这次危机首先表现为商品滞销、库存激增。1974 年 8 月美国库存滞销商品价值高达 1,392 亿美元。9 月，日本库存普通钢材 676.7 万吨，联邦德国库存小汽车一百万辆。接着是工业生产下降，美国下降 13.8%，日本下降 20.8%，联邦德国下降 12.3%，法国下降 16.3%，英国下降 11.2%。危机蔓延到金融领域，金价猛涨、信用紧缩，纽约股票跌落 41.4%，东京跌落 34%，伦敦、巴黎均跌落 48.4%。各国失业率都很高，美国为 9.2%，日本失业人数达 132 万人，各国失业总人数在 1975 年超过 1500 万。危机伴随以通货膨胀，物价大幅度上涨，1974 年与 1973 年相比，美国消费物价上涨 15.3%，日本 24.2%，英国 15.6%，法国 11.3%。危机使大批企业破产，其中美国达 14.988 家，日本仅 1976 年就达 15.641 家。

第三次经济危机发生于 1979 年至 1982 年。这是战后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三年）的一次。危机首先爆发于英国，1980 年蔓延到美国等，概况如下表：

	工业生 产下降 幅度(%)	国民生产 总值下降 幅度(%)	企业倒闭 数(万)	最高失 业率%	消费物价上涨 幅度(%)		持续时 间(月)
美国	11.8	3.0	2.53	10.8	13.5	10.4	34
日本	4.1	0.3	1.71	2.5	8.0	4.9	12
联邦德国	12.2	3.5	1.19	8.5	5.9	5.3	33
法国	7.4	1.6	2.04	8.2	13.3	13.8	3年左右
英国	14.8	3.5	1.20	12.5	11.	8.6	41

与战前相比，战后以来的经济危机有以下特点：第一，危机的深度、社

会后果不如战前严重，工业生产下降幅度轻，危机破坏力减弱。其原因有国家的反危机措施，科技革命导致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出现，固定资本更新速度加快，国民经济军事化政策，以及企业的计划性和组织程度提高等。以前发生危机时，失业工人流浪街头、饥寒交迫、处境艰难，而战后的失业者能得到救济补助，生活状况大为改善，罢工大大减少。第二，从危机、萧条、复苏到高涨的经济周期略有延长。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经济周期平均为 8 年，而战后平均约 11 年。第三，同期性与非同期性交替存在。第四，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战前发生危机时资本家急于推销存货，物价总是下跌的，战后由于政府推行通货膨胀政策，以及垄断资本维持和提高垄断价格，物价呈上涨趋势。

70 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经济出现了“滞胀”，这是增长缓慢、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相交织的一种资本主义经济症状。产生的根源主要在于，在物质上和价值上保持一定比例、协调发展的经济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失衡或失调。这种结构性失衡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表现不一，有的表现为能源危机，有的表现为通货膨胀，有的表现为传统性生产部门的衰落。80 年代以来又有新的表现，涉及更多的领域，如财政收支出现严重逆差，外贸收支不平衡，公私债台高筑等。“滞胀”迄今已发生两次，一次是在第二次世界经济危机以后，当时西方国家的经济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在危机过后继之高涨。第二次发生在 1980 年至 1982 年世界经济危机以后。滞胀的主要特点：一是长期性。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时间一般比较短，少则几个月，最长也不过三年多，而结构性失衡的滞胀时间则需要多年，如 1973 年开始的能源危机，持续达 10 年，高通货膨胀从 1974 年算起也达 10 年之久。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早已存在，1979 年达 402 亿美元，1981 年又扩大政府支出以刺激经济，缓和经济危机，财政赤字上升达 517 亿美元，1985 年更突破 2000 亿美元。高失业率也成为西方的常态。第二次世界经济危机过后，失业不但没有缓和，反而由危机时的 7%，增至 9%。第三次世界经济危机发生后失业率高达 11.5%，危机过后仍未好转，只得用减少工作时间，提前退休等办法来解决。其次，在商品供求关系上或表现为生产过剩，或表现为生产不足。再次往往突出表现在某些领域、某些部门、某些环节，然后影响其它。再次，滞胀的原因各国不尽相同，解决的对策也不尽然一致。滞胀以来，西方经济保持低增长率，1972 年至 1981 年，西欧的经济增长率为 2.6%，低于美国的 2.9% 和日本的 4.8%。“滞胀”的各种症状又能彼此相连、互相促进，致使危机加深，难寻出路。

（王文定）

## 第六章 60 年代以来的苏联、东欧

### 1. “经互会”的发展和变化

1949 年 1 月出现在国际舞台上的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是苏联和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发起结成的地区性经济互助、技术合作、交流经验的国际组织。1962 年后，“经互会”成员国增多，地域扩大，变成了世界性的国际经济集团。它的活动对成员国经济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促进作用，对国际事务产生很大的影响，也为苏联同美国竞争提供有利的保证。因而，1974 年联合国大会给予经互会以观察员的资格，1975 年经互会又在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中获得咨询地位。

经互会诞生于战后初期的“冷战”年代。当时苏联和东欧国家都有迫切的愿望要求加强经济联系和合作，以回击“马歇尔计划”，打破英、美西方国家的遏制政策，巩固社会主义阵地。1945 年至 1949 年间，缔结了苏波、苏捷、苏保、苏匈、苏罗等一系列双边经济贸易协定，推动了各国经济恢复发展，促进了“经互会”的建立。

在上述基础上经过协商，于 1949 年 1 月 5 日至 8 日，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六国政府代表在莫斯科举行经济会议，讨论了六国间经济合作问题。鉴于美英等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和禁运政策，会议决定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同年 4 月，六国代表又在莫斯科举行经互会第一次委员会会议，宣告“经互会”正式成立。其宗旨和基本任务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各成员国之间进行经济互助、技术合作、交流经验、共同发展经济。

“经互会”依据任务的需要，设立的主要机构有：

（1）经济互助委员会会议。这是“经互会”最高权力机构，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例会。会议轮流在各成员国首都举行，由东道国代表团团长担任会议主席。（截止于 1985 年 6 月已举行例会和非例会 40 次）

（2）执行委员会。这是执行和管理机构，由各成员国派一名副总理组成，每季度至少开一次会，主席由成员国代表依照国家名称的俄文字母顺序轮流担任，任期一年。

（3）各种合作委员会。这是根据“经互会”委员会会议的决定设立，受执委会的领导，综合研究和解决成员国多边的经济和科技合作的重大问题。目前已设立计划、科技合作、物资技术供应和机器制造等合作委员会。

（4）常设委员会。这是执委会所属机构，由各成员国指派部门领导人为首的代表团组成，负责制定合作的措施，草拟多边合作协定，每年开会两次。现已设立经济、统计、外贸、财政、电力、化学、农业、和平利用原子能等 22 个常设委员会。

（5）秘书处。这是“经互会”的执行和行政机构，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设秘书一人，由经互会委员会会议任命，副秘书长若干人，由执委会会议任命。

“经互会”总部设在莫斯科。现在，“经互会”出版两种机关刊物：《“经互会”成员国经济合作》（月刊）和《“经互会”成员国统计年鉴》。

“经互会”是由建立之初的欧洲地区性经济组织发展为世界性国防经济组织。1949年2月阿尔巴尼亚，1950年9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先后加入了“经互会”。1962年“经互会”第十六次会议对章程做了第一次修改，规定非欧洲国家也可加入经互会，非成员国可以应邀参加经互会一些机构的活动。此后，又有蒙古（1962年6月）、古巴（1972年7月）、越南（1978年6月）相继参加“经互会”。但是，1961年12月在华沙举行“经互会”第十五次会议时，没有邀请阿尔巴尼亚。从此，阿退出了“经互会”。目前，经互会共有10个成员国。从1964年9月起，南斯拉夫在专门协定的基础上参加“经互会”一些机构工作。阿富汗、埃塞俄比亚、朝鲜、安哥拉、老挝、莫桑比克、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尼加拉瓜等国的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参加“经互会”活动。我国在1956年至1961年间曾以观察员身份列席“经互会”例行会议。近年来，我国同“经互会”成员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和往来逐渐加强和增多。

“经互会”的主要活动是定期举行委员会和执委会会议，或者根据需要不定期召开成员国的最高级会议、党的领导人会议、党的代表会议，共同研讨合作的重要问题。“经互会”内部经济合作方式在不断发展变化。苏联在“经互会”中起着左右主宰的作用。

“经互会”成立至50年代中期以前，苏联与东欧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和技术合作主要通过双边关系，在流通领域内进行，只限于贸易换货。它们之间的主要活动是研究扩大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额问题，组织成员国科学技术合作，对成员国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提出解决的建议。

5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进入60年代以来，“经互会”内的合作就扩大到生产领域，扩大到多边经济关系，合作方式也有了新的发展。1959年12月，在索菲亚举行的第十二次“经互会”会议，通过了“经互会章程”。1962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经互会”成员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经苏联提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国际分工的基本原则》，作为制订各成员国经济合作远景计划的基础。1969年勃列日涅夫等苏联领导集团提出所谓“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的方针，得到“经互会”第二十三次非例行会议所认可，并决定着手拟定“经互会”成员国进一步发展经济合作和科技合作的措施，“发展有效而稳定的国际生产专业化和协作”，成立“经互会”投资银行。1971年7月，“经互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加深和完善“经互会”成员国的合作和发展他们的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的综合纲要》，规定各成员国在15年至20年内分阶段实现生产、科技、外贸和货币金融“一体化”。根据“一体化”计划建立起一系列“经济合作组织”，如：联合工业组织、国际钢铁工业合作组织、滚珠轴承工业合作组织、铁路合作组织、国际科技情报中心

等。在“一体化”计划下，“经互会”成员国加强了国民经济计划的协调，自1954年起至今已协调6个五年计划，目前正在协调1986年至1990年期间的国民经济计划。同时，“经互会”还积极发展生产专业化和合作，到1985年成员国共签订多边生产专业化与协作的合同和协定150多项，双边协定1000余项。

70年代中期开始发展起来的合作方式是共同投资建设联合项目，苏联从中受益最多，东欧国家要承受相当多人力、资金和物资的负担。1975年，“经互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1976—1980年的“经互会”成员国多边“一体化”措施协调计划》，规定各成员国联合投资10个项目，其中8个项目是在苏联领土上。预算投资90亿“集体外汇”转帐卢布，由苏联和东欧国家各承担半数，东欧国家还要承担劳力1.5万人。建成后，在苏联的项目所有权归苏联，东欧国家只是按投资份额从苏联得到相应数量的产品。1979年4月，苏与波、匈、捷签署关于在苏境内共同建设赫麦利尼茨基原子能发电站的协定，1983年经互会又决定签署在苏境内合建克里沃罗日耶矿山选矿联合企业的多边协定。这都有利于成员国经济建设，尤其是对苏联作用更大更直接。

70年代以来，“经互会”成员国间进行着密切的科技合作，共同协商科技政策，编制科技预测，制订科技研究计划，协调科研工作。仅“经互会”科技合作委员会制订的各国间1976—1980—1990年科技合作基本方针中就涉及182个科技问题。目前，各成员国正共同研制到2000年科技进步综合纲要。

“经互会”成员国之间正不断加强多边和双边的对外贸易。随着经济“一体化”活动的增多，各国间贸易也迅速增加。1983年各国间贸易额达2850亿卢布，比1982年增长8.1%。多数成员国的对外贸易是在“经互会”内进行，其中对苏贸易占各国外贸总额的比例相当大。仅以1983年为例，各成员国在“经互会”内的贸易额占这些国家外贸总额的58.6%，其中，蒙古占97.2%、古巴占83.1%、保占76.8%、捷占71.9%，而对苏贸易额占外贸总额的比例，蒙古是85%、保是57.7%、古巴是57.6%，罗最少也占22%。

“经互会”是战后欧洲出现的第一个经济合作组织。它的存在以及所开展的一切经济合作活动，极大地促进了苏联和东欧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使苏联与东欧各国经济发展水平日益接近，同西方国家的差距也在缩小。“经互会”成员国都已被列入世界发达国家。占世界人口10%的经互会国家，工业产值已占世界总产值的三分之一左右。但是，在“经互会”各国中，苏联经济和技术仍占优势。80年代初的生产总值中，苏联就占70%。石油和能源，苏分别占90%和50%。因此，在经济和技术合作中必然以苏联为主导。苏联积极推行的经济“一体化”计划，造成各成员国经济上对苏联的依赖，特别是原料和燃料，诸如电力、石油、木材、硬煤等。1975年后，苏联不断提高价格并减少对东欧国家的供应，致使其他成员国一些企业开工

不足，生产受到影响。各成员国同苏联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分歧。各国为了维护自主和独立，重视发展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多边经济政治关系。“经互会”的发展将不断遇到新的问题。

(常凤崑)

## 2. 华沙条约组织的变化

华沙条约组织(简称“华约组织”)是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相抗衡的军事集团之一。华约组织建立初期在反对帝国主义，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捍卫世界和平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同时，它也成为苏联安全的屏障以及从政治、军事上控制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工具。1954年10月，巴黎协定签订，联邦德国被吸收加入北约组织。苏联和东欧国家谴责“巴黎协定”破坏了战后关于对德国的国际协定，并于1954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有苏联、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民主德国、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八国代表参加的“欧洲和平与安全”会议。会议郑重宣布，如果巴黎协定批准生效，八国将在组织武装力量和联合司令部方面采取共同措施。西方国家一意孤行，批准巴黎协定生效，实现了美国武装西德的计划，最终形成以美国为主宰，以西德军队为骨干的西方政治军事集团，加剧了东西方的对立。

苏联和东欧七国于1955年5月11日至14日又在波兰首都华沙召开第二次保障欧洲和平与安全会议，正式缔结《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即《华沙条约》。根据条约组成了与北约组织相对抗的军事政治同盟——“华沙条约组织”。《华沙条约》共十一款，其中明确规定要以“互相尊重它们的主权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处理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共同致力于“国际和平与安全”，要“以和平方式解决一切争端”；如果缔约国遭到它国或集团的武装进攻，其他缔约国要以一切他认为必要的方式，包括使用武装部队，给予援助。条约规定有效期为20年，但缔约国在条约期满前一年内不提出声明予以废止，条约将自动延期10年。华约组织是美苏对抗的产物，将一直存在到北约组织解散。

华约组织的机构是依据形势与任务的需要而设置的。它的主要机构有：

1. 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它是华约组织最高决策机构，负责协商与决定缔约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外交等重要问题，由各成员国党的第一书记、总理、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组成。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两次，轮流在各缔约国首都举行(实际上，会议多在莫斯科举行)。

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下设常设委员会和联合秘书处，都设在莫斯科。常设委员会负责对华约组织的外交政策提出建议，由各国外长或国防部长参加；



联合秘书处是执行机构，由各国派代表组成。秘书处还下设有装备和后勤两个委员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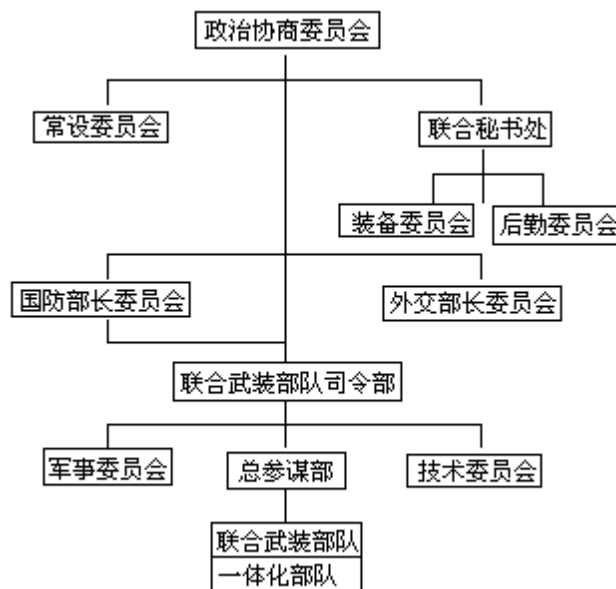
2. 联合武装部队司令部。它设在莫斯科，是军事指挥机构，负责加强华约组织的国防能力，改进联合部队的训练，提高战备程度，由各国派一名将军为常驻代表。总司令历来由苏联国防部长或副部长兼任。司令部下设联合武装部队军事委员会（1969 年增设）、技术委员会（1969 年成立）和总参谋部。

3. 国防部长委员会。1966 年 3 月设立。它是最高军事机构，负责研究共同的军事问题，由各国国防部长和联合部队总司令、总参谋长组成。国防部长委员会主席一直由苏联国防部长担任。

4. 外交部长委员会。1976 年 10 月成立。它负责协调各缔约国的对外政策。

以上组织机构的关系，见 175 页表。

华约组织成立以来，和“经互会”一样，长期处在苏联控制之下，完全按照苏联同美国进行争夺的需要来协调活动。华约组织的主要机构均设在苏联首都莫斯科，其主要领导职务都由苏军将领担任。苏联常以华约组织联合司令部的名义向各成员国军事机关和部队派“代表”、“顾问”、“观察员”，甚至直接干涉别国内政。1968 年 8 月，苏联就以华约组织的名义出兵侵占捷克斯洛伐克。随后苏联同东欧成员国签订驻军协定。据资料统计，苏联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匈牙利等国的驻军达 30 个陆军师和 4 个航空集团军。配备有主战坦克、火炮、飞机和核弹头导弹等武器。



由于苏联的控制，特别是派兵侵捷之后，华约组织内部矛盾和斗争非常激烈。早在 1961 年，同苏联关系紧张的阿尔巴尼亚就已经拒绝参加“经互会”和华约组织的活动，于 1968 年 3 月宣布退出华约组织。罗马尼亚在履

行其对华约组织所承担义务的同时，坚决捍卫自己的主权立场。在罗马尼亚的要求下，苏军于1958年7月就已全部撤出罗境。苏侵捷后，罗马尼亚大国民会议立即发表声明：“华约组织不能以任何理由，在任何情况下和以任何形式对某一社会主义国家采取军事行动。”罗马尼亚军队只参加华约参谋人员的演习，而拒不参加实兵演习。罗马尼亚拒绝华约军队在其境内举行军事演习。

我国从1962年起也未再派观察员参加华约组织会议。

苏联为了实现在世界范围的战略目标，同美抗衡，进一步加强对华约组织的领导，协调缔约国的军事和外交政策。1969年3月以来，在苏联的提议下，华约组织新成立了国防部长委员会、联合部队军事委员会、技术委员会、外长委员会等机构。苏联还通过华约组织各机构各种会议，大力推行“军事一体化”方针，统一各成员国的军事建设计划，统一军事理论、战略思想和军事政策。华约组织先后组建了两支武装部队。一支是联合武装部队，由各成员国拨出一部分军队联合组成，其中波兰2个师，匈牙利4个师，捷克斯洛伐克8个师，民主德国6个师，保加利亚3个师，苏联若干个师；另一支是“一体化”部队，是在70年代苏联推行军事“一体化”后，在联合武装部队之外，由苏军与波、匈、捷、保、民主德国的一部分军队组成的，直接由华约武装部队司令部指挥。这支部队已由海军发展到空军，包括苏、保黑海联合舰队，苏、波、东德波罗的海联合舰队，苏、波、捷、匈、保、民主德国“一体化”空军和波、捷、匈、东德“一体化”空军。这两支武装实际上掌握在苏联手手中。华约武装力量，经常不断在缔约国境内举行“战斗情谊”、“盾牌”、“联盟”、“十月风暴”等名目繁多的军事演习。1981年3月，华约部队就曾在波兰领土上举行过代号为“联盟——81”的演习。在波兰国内局势动荡的年代，苏军在波境内和周围，单独或同波军一起举行多次规模不等的军事演习。

1983年1月，在布拉格召开的华约组织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了《华沙条约国政治宣言》，建议华约和北约组织成员国间签订一项不使用武力和保持和平关系条约，彼此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及常规武器。同年10月，作为对付美国在西欧北约国家部署中程导弹的措施，苏、捷、东德三国同时宣布，苏在东德和捷做部署战术导弹的准备工作。1984年华约组织外长委员会又强调，华约成员国不谋求军事优势，但也不允许别人取得对他们的优势，要求美国停止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建议进行多边磋商。但是，时至今日，欧洲导弹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

1985年4月，华约成员国最高领导人日夫科夫（保）、雅鲁泽尔斯基（波）、昂纳克（东德）、胡萨克（捷）、齐奥塞斯库（罗）、卡达尔（匈）和戈尔巴乔夫（苏）在华沙举行会议，签署关于华约延期20年（到期还可顺延10年）的议定书。会议发表公报，明确提出，延长华约组织有效期是出于确保盟国的安全和它们在国际事务中的紧密合作的需要，只要北约组织继续存

在，华约组织就要加强自己的同盟。公报充分表明华约组织与北约组织相抗衡的性质，表明两大政治军事集团将长期对峙下去。

(常凤崑)

### 3.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

列·勃列日涅夫执政(1964年至1982年)后，强调要继续执行赫鲁晓夫制定的二十大、二十二大路线，但把主要精力放在消除赫鲁晓夫改革的后遗症上，希望平息人民的不满。

1965年，苏联决定取消经济区和国民经济委员会，恢复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国的专业部。全苏农业部从下放的农场回到了莫斯科，各加盟共和国的农业部也都回到了各自的首府城市。缩小处女地的面积，玉米的种植面积也大幅度地降了下来，农民对种植有了选择的自由。选举制度上遭人忌恨的改革，即党章上关于中央委员会及州党委员会的成员，在每次改选中必须更换1/3人选的规定，很快就被取消了。为了消除赫鲁晓夫单方面裁减部队和压缩军事预算造成的影响，军队建设又有所加强。在赫鲁晓夫时期处于无权地位的克格勃机构，这时也恢复了相当的实力。鉴于人们对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不满，勃列日涅夫开始降低调子，报刊常以肯定的口吻提到斯大林，为斯大林“半恢复名誉”。

1965年苏共中央三月全会通过了发展农业的紧急措施，主要有：给集体农庄、国营农场更多的经济自主权，国家只规定收购计划的指标，其余均由农庄、农场自由决定；降低农产品收购计划指标；提高农产品价格；取消对私人副业的限制；在国营农场实行经济核算制；政府加强化肥和农业机械器的生产，以支援农业。

经过1965年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以及解决赫鲁晓夫各项改革遗留的问题，苏联整个经济有了明显的好转，农业生产开始缓慢增长，谷物收获量于1967年达到1.65亿吨，1970年又增到1.8亿吨。畜牧业的发展也稳定了。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在经济改革方面作了一定的努力。1965年9月，柯西金在苏共中央全会上作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工业生产经济刺激》的报告，全会决定进行经济改革，实行“新经济体制”，其主要原则是物质刺激，采取的主要措施有：企业实行全面的经济核算，以产品销售额和利润额作为评价企业的标准；扩大企业自主权，公布了规定企业权利的《国营企业条例》；国家通过价格、奖金、贷款和利润等手段进行经济刺激等等。从1966年起，“新体制”开始试验、推广。到1970年，实行“新体制”的企业达到4.2万个，其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93%，利润占95%，这表明新经济体制的改革已基本完成。

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曾大力提倡“集体领导”，即由他同部长会议主席

柯西金、最高苏维埃主席波德戈尔内“三驾马车”共同掌权。但不久，勃列日涅夫频繁地干预经济事务、军事工作和外交活动，并不断撤换领导干部，把“支持自己的人”提拔到领导岗位。1977年波德戈尔内被解职后，勃列日涅夫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党政大权逐渐集中于他一人之手。

勃列日涅夫鉴于赫鲁晓夫“自由化”引起的威胁，加强了政治、思想控制，频繁召开各种“加强思想工作”的会议，对“犯罪者”、“政治犯”的处理更加严厉了，克格勃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庞大的组织网。

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即60年代中期，东欧一些国家独立自主的倾向增强，先后进行经济改革，以摆脱因照搬苏联模式而带来的问题。1968年1月，杜布切克出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后，在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全面改革，对苏则强调“主权、平等、互相尊重”。勃列日涅夫抛出了“有限主权论”，说如果共产主义在某个盟国受到威胁，其他共产党国家就有权、甚至有义务干涉。根据这种理论，苏联于1968年8月利用“华约”名义，调动苏军和盟国部分武装力量，出兵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

勃列日涅夫时期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苏联政府在与中国接壤的蒙古和苏联边境大量增兵，威胁中国安全。1969年3月，苏军侵入中国领土珍宝岛，8月又侵入中国新疆铁列克提地区，制造流血事件。70年代，中苏之间仍是僵持对立的局面。在苏联加紧对我国威胁的情况下，1950年签订的中苏友好条约名存实亡，1979年我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不延长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决议》。80年代以来，中苏关系开始有所缓和。

苏联和西方的关系，勃列日涅夫在执政前半期，继续执行苏共二十大制定的和平共处外交路线，和西方搞缓和，取得了一些进展。1972年5月美苏签署了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限制反弹道导弹条约等多项军备控制协议。苏联与西欧的关系有了改善。1970年8月，苏联和联邦德国签订了两国互不使用武力条约。1971年9月，苏、美、英、法关于西柏林问题的《四方协定》在柏林签字，四方保证，不用武力而用和平手段解决西柏林地区的争端。苏联发展了同西方国家的贸易经济关系，苏美贸易从1965年8900多万美元增至1975年的15亿美元，苏联从西方获得的贷款达200亿美元，利用了西方的资金和技术。

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前半期，苏联的经济发展较快。据苏联统计，苏联的国民收入，1965年为美国的59%，1975年升为美国的67%（西方的估计数字要低些）。70年代初，苏联的战略核武器数量超过了美国，在质量上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苏美核力量和整个军事力量达到了基本平衡，并且朝着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

70年代中期，勃列日涅夫认为，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自己的变化，苏联“掌握了国际政治的主动权”。因此，苏联在实际上修改了缓和政策，开始推行进攻性的国际战略。苏联加紧扩充军备，同美国争夺军事优势，1977年开始在欧洲，后来又在亚洲部署SS—20导弹，夺得了在这两个地区

的中程核武器优势。

苏联利用民族独立运动的复杂形势和西方力量在世界范围的收缩，加紧向第三世界进行扩张，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1975年，苏联支持古巴出兵安哥拉。60年代初，安哥拉人民在反葡萄牙殖民统治的斗争中，形成了三个民族解放组织，1975年安哥拉独立后爆发了内战，苏联支持其中一派击溃了其他两派，乘机进入安哥拉的军政部门。1977年和1978年，两次支持被扎伊尔打跑的叛乱分子入侵扎伊尔。1977年苏联又插手非洲之角战争，终于取得了埃塞俄比亚的一些军事基地，便于他控制红海南端的出海口。1978年12月，苏联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乘机取得了越南的金兰湾、岬港和柬埔寨的磅逊港等重要军事基地的使用权。1979年12月苏联直接出兵阿富汗。苏联还向拉丁美洲进行渗透和扩张，通过尼加拉瓜政府向中美洲各国游击队提供武器，美国则支持与尼加拉瓜不和的一些国家，使中美洲局势动荡，不得安宁。这时期，苏联在亚非拉兴建了40多个海空军基地，在国外驻扎军队和军事人员达75万人之多。

勃列日涅夫的进攻性对外战略给苏联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苏联推行霸权主义，必然遭到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的坚决反对，也造成了东西方关系的紧张。西欧、日本等国，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也反对苏联推行霸权主义；欧美各国对苏联采取经济制裁，使苏联得不到西方的资金、技术、战略商品和农产品。苏联企图取代美国独霸世界，必然遭到美国的坚决反对，引起美苏之间的激烈争夺。里根政府采取重振军备的方针，迫使苏联背上了军备竞赛的沉重负担。为了夺取军事优势，苏联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据西方估计，苏联每年的军费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2%到14%，占财政总开支的30%以上。苏联60%的优秀科学家、工程师集中于军事部门，这是导致苏联70年代以来经济停滞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种种因素的牵制，进入80年代以来，苏联在世界各地的进攻势头有所收缩，美苏争夺的态势逐步呈现互有攻守、各有得失的僵持局面。

(严志梁)

#### 4. “布拉克之春”

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东欧国家一样在政治、经济体制上完全照搬苏联模式脱离捷克实际，因而在政治、经济生活中出现许多问题。60年代初，经济遇到了严重困难。为了克服经济困难，捷共领导人诺沃提尼于1967年全面推行“新经济体制”。但实际的结果不仅没有根本解决困难，反而造成经济发展比例失调，市场供应不足，人民生活提高缓慢，群众不满情绪日增。党内的一些干部看到体制上的弊病，要求深入进行改革。

1967年10月和12月，捷共中央接连召开中央全会，会上以杜布切克为

首的改革派与诺沃提尼集团斗争激烈。在 1968 年 1 月全会上，解除了诺沃提尼的捷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保留了他的总统职务，杜布切克任捷共第一书记。从此，以杜布切克为首的改革派掌握了领导权，开始加速政治、经济的全面改革。

2 月，捷共中央拟定了一份“行动纲领”，作为新领导的施政纲领，全面提出了政治经济改革的方案。“行动纲领”主要内容有：主张不要以党代政，党不应成为社会万能的管理者；发扬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彻底贯彻新经济体制；执行独立的外交政策等。3 月 28 日至 4 月 4 日，捷共中央举行全会，全会作了三个重大决定：提名斯沃博达为总统；通过了捷共“行动纲领”，决心走捷克斯洛伐克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提出了政治经济改革的设想；改组中央领导机构，诺沃提尼等一些保守派退出主席团，一些改革派进入中央领导机构。这次全会对改革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由于捷克斯洛伐克政治、经济生活中许多问题与苏联有关，因而，群众随着改革的进展对苏联的不满日增。一些报刊中批评苏联的言论越来越多，当局已很难控制这股反苏潮流，捷苏关系紧张起来。同时，随着改革的深入进行，捷克斯洛伐克明显地表现出要摆脱苏联的控制和苏联模式的束缚、争取独立自主的倾向。苏共领导指责改革运动是“反苏的”，越出了社会主义民主的范围。苏联担心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运动会在东欧其他国家引起连锁反应，造成华约集团的分裂，也担心捷克斯洛伐克会和西方加强联系，从而失去这个地处欧洲中心并有发达的重工业和丰富铀矿资源的战略要地。因此，苏联对捷共领导越加施加压力，各种形式的干涉接踵而至。

5 月 4 日，以杜布切克为首的捷党政代表团应邀访苏。会谈中，苏方尖锐地批评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和局势发展情况，要求捷方采取严厉手段对付改革势力。5 月 17 日，苏联总理柯西金和国防部长格列奇科访捷，宣布要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进行“参谋人员训练”的军事演习，捷共领导人认为这只是少数部队在指定地点进行演习，便同意了。实际上是苏联为武装入侵作具体的准备。

这时，捷共加快了改革的步伐，5 月 29 日至 6 月 1 日，捷共举行中央全会，停止了诺沃提尼等人的党籍，审查他们的问题。全会期间，苏军以演习为名开进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接着波、匈、东德的军队也开进境内。演习本应 6 月末结束，但苏军用种种借口拖延撤军，引起群众的不满和担心。7 月初，苏、波、匈、保、东德联名向捷共发了一封最后通牒式的信，这封信是对捷共内政的严重干涉，捷共中央通过了态度坚决的复信。8 月 3 日，捷与苏、波、匈、保、东德在布拉迪斯拉发举行会谈，会后发表了一个内容空洞的联合声明。

8 月 20 日，苏《消息报》宣传西德“复仇主义势力”今夏以来活动频繁，西德正在制定进攻邻国的方案，企图转移捷克斯洛伐克和世界人民的视线，掩盖其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当日夜 11 时，苏、波、保、匈、东德五国

军队从三个方向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同时，一架苏联民航机飞到布拉格国际机场，发出信号说飞机发生故障，要求紧急降落，但是，从飞机下来的是几十名苏军突击队员，他们迅速占领机场。接着，装着坦克和装甲车的空降部队巨型运输机一架接着一架降落，迅速开进市内，占领了市内主要据点。此时，捷共中央主席团正在开会讨论捷共 14 大筹备工作。得到苏军入侵消息后，主席团立即拟出一份公告，指责苏军这一行动违反了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原则，破坏了国际法的准则。

21 日凌晨，杜布切克等捷共主要领导人被苏军绑架到苏联，企图由捷共中亲苏分子成立一个“工农革命政府”，遭到斯沃博达总统的坚决拒绝。8 月 23 日，苏联邀请斯沃博达到苏谈判，会谈中双方争论十分激烈，谈判相持不下，苏联向捷共领导人一再施加压力，并在捷共领导人中进行拉拢、分化瓦解工作，同时，不断在布拉格等地制造流血事件，加强军事镇压。最后捷共被迫在会谈公报上签了字。公报把苏军入侵说成是因为帝国主义加紧策划反对社会主义国家阴谋，五国军队才“暂时”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境内。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从入侵一开始就用各种形式对五国军队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反抗，公报发表后，布拉格人民举行游行示威，人们高呼“我们不愿屈膝求生”，“你们有坦克，我们有真理”。10 月 16 日，苏联迫使捷共在《苏军暂时留驻捷克斯洛伐克的协定》上签了字。1969 年 4 月，杜布切克被撤掉第一书记职务，由胡萨克接任，其他改革派人物也大多被清洗，大约有 50 万捷共党员被开除党籍，许多人受到迫害。布拉格之春作为一场改革运动，被来自克里姆林宫的严寒摧残了。

布拉格之春是捷克斯洛伐克企图摆脱苏联束缚的一场改革运动，由于过去在政治、经济上一直受苏联控制，存在的许多问题与苏联有着重要关系。随着改革深入，捷苏矛盾日趋尖锐。苏联的入侵是为了本身利益而企图继续控制捷克斯洛伐克。同时也是为了稳住“社会主义大家庭”这个战略利益，如果捷克斯洛伐克“脱离大家庭”，就可能出现后继者，这对苏联是个致命打击。因而，勃列日涅夫抛出了所谓“有限主权论”，粗暴干涉别国内政。

《真理报》1968 年 9 月 26 日文章中说“每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不能够同社会主义世界的利益，同世界革命运动的利益对立起来，任何削弱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行为都直接影响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它们对此不能不关心”。这种霸权主义论调是对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警告。

（刘士田）

## 5. 民主德国的发展

民主德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60 年代前，建立了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主体、实行中央集权管理的国民经济体系；60 年代以来，坚持在改

革中求进步、调整中求发展，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稳步提高。

战后民主德国实行生产资料国有化政策，没收垄断资本家的厂矿，把银行、交通运输和邮电部门收归国有，建立国营企业，1950年，国营企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所占比重达56.8%。

1952年开始组建农业生产合作社，1953年开始建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起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60年代初，全国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国营和集体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统治地位。

按照1949年宪法规定确立了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中央机关通过下达生产计划的办法管理企业，企业按照国家规定的指标进行生产，由于照搬苏联的经验，造成一些不良的后果：一是片面发展重工业，实行高积累，致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二是强制推行合作化，引起个体农民、商人和手工业者的敌对情绪；三是实行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影响了地方和企业的生产积极性，降低了劳动生产率。

政策的失误使民主德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同联邦德国相比差距日益明显，许多人逃往国外。1953年5月，部长会议决定增加税收、提高劳动定额以解决资金短缺、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6月17日，柏林一些工人举行了罢工，反对提高劳动定额，进而提出了改善生活、重新统一祖国、言论自由等要求。影响立即波及全国，270个地方发生了骚乱，30万人参加。政府在苏军坦克的帮助下制止了这场运动。

“六·一七”事件集中反映了当时所存在的问题。然而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以后的几年内，经济发展速度显著减缓，消费品严重短缺，外逃人数继续增加，被迫修筑“柏林墙”来阻止人口外流。从1949年9月至1961年8月，共有270万人逃到西德。劳动力日益减少使民主德国依靠高投入发展经济的政策受到影响，“七年计划”（1959—1965）到1962年不得不中断。在这种形势下，统一社会党“六大”（1963年1月）提出了根本改革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体制的方案，从1964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逐步推行。

新经济体制的实施标志着民主德国发展新时期的开始。其内容主要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利用经济手段管理企业，实行新的工业品价格体系，改革银行体制和投资方法。新经济体制有效地克服了旧体制的弊端，促进了经济的发展。1967年，民主德国的工业产量名列世界第八位，1966年至1970年，工业生产增长了33%。

新经济体制的实施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如国家对企业经营缺乏宏观控制，企业单纯追逐利润，国民经济的整体规划和长远目标无法实现。从1971年起，重新实行一切经济活动由国家制定的国民经济计划来平衡和调节的计划管理体制。但不是简单地回到50年代的状况，在加强统一领导的同时，保留了新经济体制时期许多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

70年代后期，民主德国再次对经济体制进行了调整，改组和新建了联合企业，确立了部与联合企业两级管理的体制。截止到1981年初，建立联合



企业一百五十七个，集中了工业中职工总数的 99%，大型联合企业已成为经济的组织和管理的基礎。

在这种体制下，各部的职责是编制经济计划，领导所属企业，联合企业是生产的综合体，它联合几十家专业企业，拥有自己的科研、生产和销售系统，按照国家需要进行生产。农业也实行了集中化和专业化，建立了跨合作社的联合组织。工农联合企业的建立也取得了进展。

新管理体制符合民主德国的国情，保证了“在高速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提高效益、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方针的贯彻执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精减了办事机构和管理层次，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第二，中央各部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和国际经济动向制定符合本部门发展的计划并通过所属企业贯彻执行；第三，联合企业拥有雄厚的力量，有利于采用新技术革命成果，提高劳动生产率。1981年至1985年，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经济仍然以平均每年4%以上的速度增长，同期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年增长率为2—3%。如今，民主德国已发展成为世界先进国家，人民生活水平在社会主义国家中首屈一指。

民主德国的外交政策同其他东欧国家基本一致。宪法规定：“民主德国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永远地、坚定不移地同苏联结成联盟”。同苏联的关系最为密切，境内驻有苏联军队；经济上实行“生产的计划协调和专业分工”，对苏贸易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35%以上；在战后所有重大国际问题上从未反驳过苏联。

同联邦德国的关系是民主德国所面临的特殊问题，也是重大的国际问题。由于战后东西方的对立，两个德国的关系长期处于僵持状态。1963年1月，民主德国放弃了重新统一德国的主张。勃兰特提出“新东方政策”后，两国关系有了实质性改善。1972年缔结了两国关系基础条约，彼此承认是主权国家，相互建立睦邻关系，翌年九月一起加入了联合国，双方交往日益扩大。

70年代以来，民主德国同西方的接触不断增加，贸易和科学文化交流有一定发展。80年代同我国关系有很大改善，1986年10月，国务委员会主席、统一社会党总书记昂纳克访问了中国。1987年6月，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访问了民主德国。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刘学锋）

## 6. 匈牙利的经济体制改革

匈牙利在50年代初开始社会主义建设时，基本上照搬了苏联的模式。1956年匈牙利事件爆发，反映了人们对苏联模式的怀疑和不满。这一事件使

匈牙利党政领导人开始注意经济问题，认识到片面发展重工业和追求“高速度”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失调，导致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

1957年，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对经济改革进行了初步探讨，制定了改善经济管理制度的基本方针。改革首先从农业着手。针对工农业比例的严重失调、农业发展缓慢的局面，党和政府调整了农业政策，取消了农产品的义务交售制，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并对农业实行财政补贴。国家对农业的投资，从50年代前期的13.8%提高到1965年的19.5%。同时采取自愿互利和说服教育的原则，重新进行农业合作化运动，1961年基本上再次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国营农场和农业合作社可由自己制定生产计划，决定产品销售，国家取消了对它们的指令性计划，改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手段来进行调节。

匈牙利政府的这些措施，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发展起来。60年代初，匈牙利粮食还不能自给，到1965年已能自给有余。匈牙利政府坚持和深化农业改革，它准许和鼓励合作社社员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小块自留地生产。改革使匈牙利农产品的出口逐年增加。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粮食产量和肉类产量，匈牙利居经互会欧洲国家的首位，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匈牙利的市场繁荣和人民生活安定。

在农业政策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匈牙利着手进行以工业为主的经济体制全面改革。1966年，作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1966年至1967年，全国选择一批企业进行改革的试点，以培训干部，取得经验。1968年开始在全国推行新经济体制。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把国民经济计划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中央对经济的领导同扩大企业的自主权结合起来；把经济管理中的行政手段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改革在以下三方面进行：

(1) 在计划方面：除了一些重要部门和产品仍由国家下达指标外，基本上取消了中央各部向企业下达指令性指标的制度。企业根据国家的计划、市场的需要和企业的条件自行制定生产、经营计划。为了使企业的生产、经营符合国家的要求，国家及时把国民经济计划的内容通报企业，并运用利润、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手段加以调节。

(2) 在经济调节方面：核心是价格问题。匈牙利实行三种价格，即固定价格、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实行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是为了促进企业间的竞争，加快技术进步和提高效率。此外，国家又通过税收制度和浮动工资制度把企业经营成果同企业和每个劳动者的经济利益结合起来。

(3) 在组织制度方面：改革的目的是减少层次，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强调党主要“从政治上领导”，党、政分开，各级党组织的书记都不兼行政第一把手。由于涉及人事安排，在1980年前只作了一些局部调整，在近年来的扩大改革中才有较大调整。

从改革开始到1972年，改革进行得较顺利。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刺激了各方面的积极性，经济发展较快。从1973年起，

国际条件起了一些变化，世界市场比价的调整造成了匈牙利经济的损失。改革也因缺乏经验、制度不完全而在国内引起一些反对的议论，致使 1973 年至 1978 年间改革的步骤有所停顿和收缩。面对着困难，匈牙利的党政领导没有退缩，而是坚持改革道路，并扩大了改革范围。从 1979 年起，采取了一些新措施，最引人注目的是，普遍采用“竞争性”的价格制度、使“第二经济”合法化以及进行行政机构的改革。

所谓竞争性价格制度就是使产品价格逐步做到能真实地反映经济成本，改变过去由国家向消费者和工厂提供大量补贴，造成价格和世界市场脱节的现象。在旧的制度下，生产价格被各种各样的税收和补贴歪曲了，结果是，缺乏效能的企业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却反而得到保护；而赢利的企业往往遭殃，因为它们的所谓“暴利”被国家用特别税收取走了。实行竞争性价格制度的结果，正象有人说的：“把我们的企业从暖房中取了出来，移植在露天里了。”当然，实现这一变化需要相当长的过渡时间，为了保证人民的生活稳定，匈牙利政府对与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消费品的价格，控制还是比较严的，也不是一下子把所有的补贴都取消。

所谓“第二经济”，也称为“辅助经济”，即职工和其他成员在业余时间从事能为社会创造财富的生产、修理和其它服务性劳动。如医生、律师、建筑工、厨师、裁缝等人，多半已经有了职业，但在业余时间提供服务。据专家估计，匈牙利大约有 300 万至 400 万的工资收入者和 100 万至 150 万的养老金领取者从事各种辅助经济活动，完成的工作量相当于社会劳动投入的 18—20%。他们向消费者收费比国营部门高得多，这既说明他们本身的效率，也说明社会的内在需要。仅以近几年的新建住房看，有 40—45%是由业余建筑队建造的。政府鼓励这种“辅助经济”，因为它提供了运转不灵的国营系统无法提供的重要服务，创造了社会财富，同时它还是多余劳动力的吸收器。

在行政机构的改革方面，匈牙利将 17 个部合并成 13 个，精简机关人员 10%；改变了过去对企业进行合并、集中的做法，而是采取了解散托拉斯等措施，鼓励各部门成立中小型企业。

为了促进小型工商企业的发展，匈牙利从 1982 年起实施修改后的合作社法律。此法律允许人民群众用自己的财产在农业以外的领域里组建“小规模合作社”，从事生产和其它有益于社会的活动。法律规定，这种合作社须有 15 人以上的发起人，成员最多不得超过 100 人，领导班子由社内产生。国家给予它“法人”地位。此法律还允许成立由 5 人以上组成的“合作社式的专业小组”，尤其是在工业（及建筑业）和自来水、煤气、电等公共事业方面，进行方便群众生活的活动，它进行自主性的经营，但不是“法人”。在农业方面，法律允许在国营农业和合作社农业的框框内成立“农业专业小组”，由 5 户以上自愿结合而成，经营自主，但它也不是“法人”。从 1982 年以来，个体企业受到积极的支持和鼓励。经营不善的小型工商企业，可以

租给个人经营。对私人小企业雇工的条件也放宽了，过去规定雇工不得超过5人，现在放宽到30人。

匈牙利经过了近三十年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工农业生产大大发展，市场活跃，人民生活大为改善。近年来受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匈牙利经济也遇到许多困难，出现了一些问题，目前正在解决和深化改革之中。

(严志梁)

## 7. 南斯拉夫的自治道路

在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南斯拉夫走着一条独特的道路。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还在建国初期就遇到了国内外的巨大压力。情报局的错误处置使南斯拉夫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乘机颠覆渗透；在国内，因为照搬苏联的模式、脱离实际、采用强制性的农业集体化遭到失败，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工作遇到重重困难。但铁托和南斯拉夫共产党通过不断实践，使南斯拉夫走上了一条以自治为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自治道路经历了较长的实践过程，有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年——1953年初，这是自治道路的初始阶段。

1949年，南斯拉夫国内出现了自治萌芽。这一年底，国内大约有两百家企业出现了试验性的工人委员会。1950年6月27日，国民议会通过了《关于劳动集体管理国营经济企业和高级经济协会的基本法》，简称“工人自治法”。这个法令的核心思想，被南斯拉夫人民称之为“把工厂交给工人管理”。根据这项法令，生产资料作为社会财产，由工人代表全社会来进行管理，工人通过工人委员会行使职权。法令公布以后，工人委员会由试点而扩大到所有国营企业。1951年底，又颁布了《国民经济计划管理法》，将原来指令性的国家计划改为由企业自己按市场经济来制定“社会计划”。1953年1月13日，国民议会又通过《关于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的基础与联邦国家权力机关的基础的根本法》，简称“根本法”。“根本法”宣布国家一切权力属于劳动人民，将自治的范围逐步向文教卫生等事业部门扩展。通过这一阶段一系列的法令与措施，奠定了南斯拉夫自治道路模式的基础，以后的发展都由此衍化而来。

第二阶段：1954年——1963年，被称作“工人自治”阶段。工人委员会的权力逐步扩大，国家管理机关的权力相应缩小。1957年和1961年，还先后进行了两次经济改革，取消了统一的工资标准和固定工资制，使企业职工的收入开始直接取决于企业的收入水平。

---

1952年，南斯拉夫共产党更名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简称南共联盟，沿用至今。

第三阶段：1964年——1973年，也被称作“社会自治”阶段。

1965年，南斯拉夫颁布了关于社会服务部门的法律地位基本法，具体规定在文化、教育、科学和社会福利事业各方面实行自治，南斯拉夫的自治制度由工人自治进入到社会自治的发展阶段，开始了政治体制全面改革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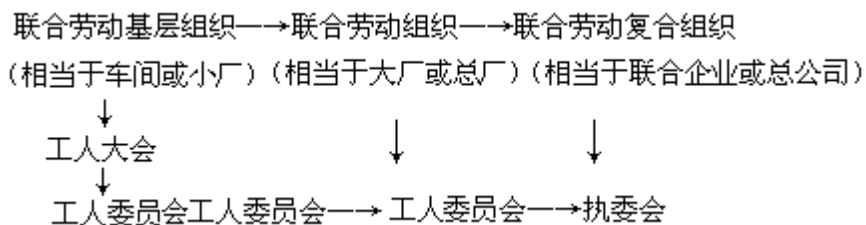
第四阶段：1974年至今，自治制度的巩固与完善阶段。

南斯拉夫制定的1974年宪法和1976年公布的《联合劳动法》，规定在各个经济部门普遍建立联合劳动组织，并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南斯拉夫在各个领域的自治制度。

1980年5月4日，铁托同志去世。南共联盟表示要坚定地沿着铁托的道路继续前进，同时，开始酝酿和讨论如何纠正自治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弊端。1981年，南斯拉夫开始实行稳定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以进一步完善自治制度。

南斯拉夫自治道路的理论奠基人和领导者是南斯拉夫人民的著名领导人铁托与卡德尔等人。40年代末期，在南斯拉夫向何处去的关键时刻，他们通宵达旦地钻研马列著作，联系南斯拉夫国情，经过几十年的艰苦探索与实践，制定了这条以社会主义自治为中心和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这条自治道路的核心，概括地讲：就是在经济领域中，实行自由联合劳动；在社会政治领域，实行劳动人民直接参加社会事务管理的代表团制。

先看自由联合劳动：它指的是劳动同资金、生产资料的联合，生产资料直接由联合起来的劳动者管理，劳动成果由劳动者根据社会的利益进行分配。南斯拉夫这种劳动者的联合劳动与管理分为三级（见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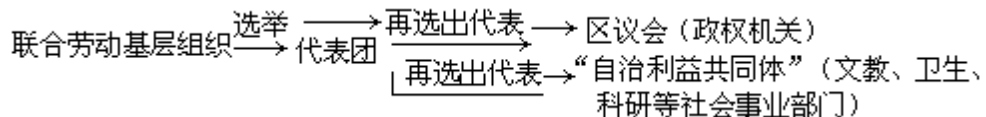
在这里，联合劳动基层组织是最基本的生产单位和权力机构，通过工人大会选出工人委员会对企业进行综合管理，经理和厂长都由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向社会招聘。联合劳动组织和联合劳动复合组织也设有工人委员会，由下一层组织选出的代表组成。这种联合劳动体制体现了南斯拉夫宪法所规定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劳动者有权使用社会资金从事劳动，与其他劳动者相联合，并拥有管理社会资金的权力。

再看代表团制：根据南斯拉夫1974年新宪法，南斯拉夫各级议会由代

---

：爱德华·卡德尔（1910—1979），南共著名理论家，曾任南斯拉夫党政要职。曾主持制定南共联盟纲领，南斯拉夫宪法及一些基本法令，主要著作有《社会主义自治政治制度的发展方向》等。为纪念他对自治制度的杰出贡献，在他的家乡斯洛文尼亚，建有“自治理论和实践中心”研究所。

议制改为代表团制。代表团制的具体作法举企业为例来说，每一个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用公民直接、无记名方式选出自己参加政权工作和社会活动的代表团，从代表团中推举出区议会代表候选人，再由全体选民投票选出参加议会的代表。总之，议会代表（相当于议员）必须从基层代表团中选出。同时，南斯拉夫的自治关系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文教、卫生、科研、体育等部门都建立了“自治利益共同体”，这些“自治利益共同体”也都是基层组织派出代表团来共同参与管理的。（参见图）



通过这种代表团制，南斯拉夫进一步扩大了政治民主化，使人民能直接参与国家方针大计的决策，行使管理各种社会事务的权力。

自治道路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勃勃生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南斯拉夫是欧洲经济最不发达的农业国家之一。今天，已经发展成为具有现代化水平、中等发达程度的工业——农业国。1945年至1980年，南斯拉夫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达6%以上，人均收入由1945年的100多美元增加到1981年的2789美元，排名当年世界第36位！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大幅度提高。在南斯拉夫斯洛文尼亚共和国首府卢布尔雅那市，平均每2.7人就拥有一辆小汽车。南斯拉夫从1963年起，实行每周五天（42小时）工作制。从1950年到1963年间，从平均每580人一名医生增加到每270人有一名医生，每人平均住房面积从8平方米增加到15平方米，……。近四十年的实践，证明了社会主义自治道路为南斯拉夫的历史谱写了光辉篇章，它率先突破了苏联模式，成为社会主义各国改革的先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

不过，进入80年代以来，在自治过程中存在于南斯拉夫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一些问题逐渐显露出来。主要表现为：负债严重，1981年共欠外债212亿美元，相当于21年前的471倍；通货膨胀；失业增多；农业发展缓慢；地方民族主义与自由化倾向严重。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经济上计划体制过于分散，缺乏全局性的规划指导；政治上中央权力过份削弱，无法形成有力的全面领导。南共联盟和南斯拉夫政府正在为克服困难而努力，他们认为这些问题并不是自治制度造成的，而只是说明了自治制度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南斯拉夫仍将坚定不移地在自治道路上走下去。

（吴潮）

## 8. 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后，以苏共二十七大（1986年2月—3月）为标志，苏联的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既包括经济体制改革，也还有社会其它领域的各种改革。

在苏联实行改革，是客观现实的需要。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曾对苏联的经济体制进行过不同程度的调整和改革，但由于没有从根本上触动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加之思想、理论上准备不足，某些措施不当等多种因素，改革的收效不大，更未能深入下去。如果说在1965年至1975年的十年间，苏联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比美国快一倍的话，那么，在1975年至1985年的近十年间，由于苏联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苏联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只比美国快30%，国民收入的绝对量实际上只相当于美国的一半多一点（苏联官方统计称约占67%）。苏美之间经济实力的差距、特别是科技发展水平上的差距越来越大，严重影响了苏联在同美国争夺中的实力地位。面对美国科技日益进步、特别是“星球大战”计划的严重挑战，加速经济发展已成为苏联最为迫切的政治问题。同时，中国、东欧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所取得的进展，也使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新一代领导人进一步增强了改革的紧迫感。

经济体制改革是苏联实现加速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正如戈尔巴乔夫所指出，加速发展的办法就是要在“科技进步、经济结构改革、采取有效经营管理形式和劳动刺激形式基础上实行生产的全面集约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任务，归纳起来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1）改变中央计划过分集中、统得过死的状况，扩大企业生产和经营自主权；（2）打破地区、部门之间的条块分割的局面，建立多种经济联系的综合体，提高经济效益；（3）重视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的作用；（4）克服分配中的平均主义；（5）改变党政不分，反对官僚主义，发扬政治民主，引导劳动人民参加国家管理和决策。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实施改革的时间还很短，到目前为止，基本可分为两个阶段：1985年3月到1986年底，是改革试验的起步阶段。1985年，苏共中央四月全会，提出加速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经济体制的构想，苏共二十七大正式确定了加速社会经济发展和根本改革经济机制的基本方针。这以后，苏共陆续通过一系列决议，不断扩大改革试点范围，利用舆论工具大力宣传改革的迫切性和重要意义，在组织上撤换了一批抵制或不适应改革的干部，为全面改革作了初步准备。

从1987年1月起，根据苏联党政领导机构通过的各项决议，改革由试验转为全面铺开，使改革进入一个新阶段。同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从思想上和组织上为改革作了进一步的动员。

现在，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的状况是：

在管理的组织机构方面，把一些相互关系比较密切的经济部门分别组成经济综合体，在苏联部长会议中建立管理各类相关部门的常设机构，如国家

农工委员会、机器制造管理局、燃料动力综合体管理局、计算和信息委员会、国家建设委员会和国家对外经济委员会等，以便实行国民经济的综合管理。

在工业、商业领域，从普遍扩大自主权逐步转向实行全面经济核算、自筹资金的新经营管理方法，并要求在各企业内部积极推广车间、工段和作业队的集体承包制。

在农业领域，为提高工作效率，合并原来的农业部和果品蔬菜部等六个部委，在其基础上成立苏联国家农工委员会实行统一管理。为扩大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自主权，国家根据具体条件为农庄和农场规定五年计划期间每年向国家交售粮食和其它重要农产品的固定数额，超计划的一切以及土豆、水果和蔬菜在计划内的30%自行处理。在生产中，推行多种形式的集体承包制，发挥集体经济的积极作用。

在科技领域，改革组织管理，如加强科研工作的综合规划和远景规划，把大部分同生产脱节的研究机构编入科学——生产联合公司或生产联合公司，建立跨部门的科技综合体等，以便于集中人力、物力攻克重要科技项目。同时，还改革了科技人员的工资结构和拉开等级，从而使他们的收入能与劳动成果相适应。

在外贸领域，决定自1987年起，授权21个部和主管部门及70个大型联合公司、企业直接经营进出口业务，它们还将分别设立自己的经济核算外贸公司。苏联政府还准备将这一权利逐步授予其它具备相应条件的部门和企业。

苏联政府于1987年2月公布了“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草案”，并在全国开展讨论，这是一项重大措施。根据这一法律，经济基本环节的经营管理条件和方法将发生根本变革，它把计划原则同完全经济核算、自主权和责任心结合在一起，规定了企业实行民主管理的一些具体措施。同时，政府对集体所有制的城乡合作社采取积极扶持的政策，并为其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此外，苏联还改变了过去对个体劳动的种种限制政策，于1986年制订了“个体劳动法”，在服务行业和生产领域放宽对个体劳动的限制。

苏联在推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还强调在社会一切领域包括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报告中说，关于政治体制如何改，还只是拟定了一个总的框框和主要的轮廓。目前涉及的内容主要是：

第一，强调进一步民主化，提倡公开性原则，鼓励群众对苏联党和政府实行监督和批评。戈尔巴乔夫认为，扩大公开性是个政治问题，是“干部心理改造的起点”，不讲公开原则，没有也不可能有民主和群众的政治创造性，群众也不可能参加管理。为此，苏联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前提下，开始允许党和地方报刊揭露社会的消极方面，并定时向全国通报中央政治局及其它高级会议的有关内容，听取和接受群众的意见。

第二，针对苏联政治生活中的种种弊病，特别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官僚主义、消极怠工等问题大力整顿。首先，调整了各级领导班子，撤换了一些不



称职的干部。其次，提出改变党政不分的状况。戈尔巴乔夫说：“党实行政治领导，确定发展的总前景，规定生活的社会领域、经济领域和精神领域中的主要任务，处理干部的挑选和配备工作，实行总的监督。至于解决具体的经济问题和社会文化问题的途径和办法，则每个管理机关、劳动集体和经济干部都有作出选择的广泛自由。”

第三，提出要加强人民的社会主义自治，发挥在党领导下的苏维埃、工会、共青团、合作社等一切群众团体或组织的作用。戈尔巴乔夫指出“只有在人民自己切实地管理自己的事务，只有在千百万人投入政治生活的时候，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得到顺利发展”。为此，苏联党和政府采取了一些完善选举制度的措施，使政治生活开始向进一步民主化的方向迈进。

苏联经过两年多的改革试验，特别是通过大力整顿劳动纪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86年的国民收入和工业产值的增长率取得了1979年以来的最好成绩。但是苏联的改革还刚刚开始不久，遇到的困难和阻力又十分巨大，国内社会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惰性根深蒂固，一些干部又担心改革会失去既得利益和特权，加之国际上美国通过军备竞赛遏制苏联经济的发展，这些条件决定了苏联改革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不过，改革已成为苏联社会发展的主导方面，如果取得进展，那不仅对苏联本身，也将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乃至国际局势发生巨大的影响。

（孟祥青）

## 第七章 60 年代以来的第三世界

### 1. 非洲的觉醒

60 年代是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空前高涨的年代。战前，非洲只有埃塞俄比亚、埃及、利比里亚三个形式上独立的国家。50 年代，北非的利比亚、苏丹、突尼斯，摩洛哥和西非的加纳、几内亚获得独立。到了 60 年代，民族独立运动的风暴席卷了整个非洲大陆，非洲沸腾了，非洲人民站起来了！

非洲人民饱受殖民主义的残酷剥削和统治，被称为“黑暗大陆”。非洲各族人民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之间民族矛盾的激化是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发展的根本原因。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中国的解放、亚洲各国的独立、苏伊士运河战争对殖民者的沉重打击，都彻底戳穿了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这对非洲人民是极大的鼓舞，各种民族主义政党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也涌现出一大批民族主义革命家。

加纳（原黄金海岸）的恩克鲁玛是著名的泛非主义者，1945 年在伦敦主持过第五届世界泛非会议，长期致力于非洲大陆的统一和独立，1949 年在加纳成立了人民大会党。几内亚的塞古·杜尔曾领导法属西非的工会运动，1947 年创建了几内亚民主党。塞内加尔的桑戈尔是享有国际声誉的黑人学者，参加过法国抵抗运动。1948 年他退出法国社会党，创建塞内加尔民主集团，后改名为进步联盟。肯雅塔领导的肯尼亚非洲人民联盟，尼雷尔领导的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卢蒙巴领导的刚果民族运动党在 50 年代都有新的发展。他们比战前的非洲民族主义者更加激进，主张立即实现完全的自治，重视群众运动和建立群众性的政治组织。战前，非洲只有 8 个民族主义政党，1955 年发展到 40 个，1961 年猛增到 147 个。这些以争取独立为政纲的政党，主要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知识分子的利益，也反映广大工人、农民的愿望，爱国的封建贵族、部落上层分子也能接受他们的政纲。

殖民主义者面对新的形势采取两种对策。一种是顽固地坚持老殖民主义残酷镇压的政策，另一种是采用新殖民主义政策。英国实行“宪法改革”、“分阶段独立”、“分而治之”，妄图通过代理人或顾问，通过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继续维持其殖民利益。法国戴高乐宣布用“法兰西共同体”取代“法兰西联邦”，规定原法属殖民地可以在“共同体”内享有内政和经济的自主权，其国防和外交仍由法国控制，法国总统是“共同体”的最高首脑。美国在非洲没有直接进行统治的殖民地，它打着支持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旗号，通过经济、文化渗透和外交途经达到取代老殖民主义者的目的。

针对上述不同情况，非洲各国民族独立运动的道路便分为武装斗争和非武装斗争两种类型。前者主要发生在法属、比属、葡属和南部非洲白人种族主义统治地区；后者则发生在英属非洲及 1958 年后的法属非洲。

加纳、几内亚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先独立的两个国家。他们的独立有着

深远的国际影响。恩克鲁玛用“非暴力的积极行动”发动总罢工，通过选举参加政府，进而建立自治的“责任政府”，最后迫使英国同意加纳于1957年3月在英联邦内独立，1960年正式成立共和国。塞古·杜尔领导的几内亚民主党发动群众、扩大影响，在领地议会选举中获得成就，建立了半自治政府。按照戴高乐宪法在1958年9月就是否参加“共同体”举行公民投票，结果否定共同体，10月2日成立了几内亚共和国。

1960年非洲有17个国家宣布独立，除一国外都加入了联合国。这一年被称为“非洲年”。其中，扎伊尔的独立（6月20日）在国际上引起极大反响。扎伊尔当时称为刚果（利），地处非洲心脏，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大的国家，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其中80%又集中在加丹加省（今沙巴省）。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制造原子弹所需的铀就主要来自这里。卢蒙巴领导的刚果共和国成立不到一个月，便遭到比利时殖民者的武装入侵，还伙同英法制造加丹加省和开赛省的分裂，扶植傀儡冲伯上台。卢蒙巴向联合国求援，7月14日美国以联合国军的名义，出兵占领刚果，粗暴干涉刚果内政，卢蒙巴与美国矛盾激化，美国遂策划军事政变推翻卢蒙巴，并假手冲伯集团将他杀害。从1961年9月到1963年初，新老殖民主义者为了争夺刚果进行了三次火并，最后是美国占了上风。1964年扎伊尔人民掀起了爱国武装斗争，但是遭到失败。1965年11月军人蒙博托接管政权，宣布成立第二共和国，扎伊尔政局才逐步稳定。

60年代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发展的趋势是从西非、中非向东非和南非蔓延，“非洲年”后，又有15个国家宣告独立。1963年桑给巴尔独立后，人民起义又推翻了素丹的封建统治，于1964年4月26日与坦噶尼喀共和国一起组成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在尼雷尔总统领导下，坚持自力更生的建国方针，1967年发表了著名的“阿鲁沙宣言”，多次粉碎了反革命的颠覆阴谋，捍卫了民族独立。到1968年，非洲的独立国家已达41个，约占非洲总面积的84%、总人口的88%。昔日“黑暗大陆”的面貌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新独立的非洲国家都十分重视国际团结与合作。1958年12月、1960年1月、1981年3月先后召开了三届全非人民大会，1961年还组成了“蒙罗维

---

喀麦隆（1月1日）、多哥（4月27日）、刚果（利）（现名扎伊尔6月30日）、马达加斯（6月26日）、索马里（7月1日）、达荷美（8月1日）、尼日尔（8月3日）、上沃尔特（8月5日）、象牙海岸（8月7日）、乍得（8月11日）、中非（8月13日）、刚果（布）（8月15日）、加蓬（8月17日）、塞内加尔（8月20日）、马里（9月22日）、尼日利亚（10月1日）、毛里塔尼亚（11月28日）。

塞拉利昂（1961年4月27日）、坦噶尼喀（1961年12月9日）、阿尔及利亚（1962年7月5日）、布隆迪（1962年7月1日）、卢旺达（1962年7月1日）、乌干达（1962年10月9日）、肯尼亚（1963年12月12日）、桑给巴尔（1963年12月10日）、马拉维（1964年10月24日）、冈比亚（1965年2月18日）、博茨瓦纳（1966年9月30日）、莱索托（1966年10月4日）、毛里求斯（1968年3月12日）、斯威士兰（1968年9月6日）、赤道几内亚（1968年10月12日）。

亚集团”和“卡萨布兰卡集团”。这两个不同的国家联合体为了尽快消除分歧,经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的调解,29个独立国家发表了以团结为重的“拉各斯宪章”。1963年5月,31个非洲独立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亚的斯亚贝巴建立了“非洲统一组织”,通过了《非洲统一组织宪章》。非洲国家通过这个统一战线组织,在政治、外交、经济、文化、防务各方面进行了广泛的互助与合作。“非统”的最高机构是非洲国家首脑会议,每年至少开会一次,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研究如何支援未独立地区的解放斗争,如何维持各国边界现状,调解纠纷等。所以,“非统”组织的建立是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非洲国家独立后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发展民族经济,改变殖民统治遗留下来的落后的经济基础和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各国发展民族经济的道路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宣布走非洲社会主义的道路(如加纳、几内亚、坦桑尼亚等);有的继续走自由资本主义的道路(如象牙海岸、喀麦隆等);有的实行有计划的自由资本主义(加蓬、马拉维、肯尼亚等);有的则将非洲社会主义与有计划的自由资本主义相结合(如埃及等)。

非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在60年代形成高潮,形成了很多派别:有纳赛尔、本·贝拉主张的伊斯兰社会主义;有恩克鲁玛、杜尔、尼雷尔等人主张的非洲式社会主义;有桑戈尔、布尔吉巴等人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有恩古瓦比、内图等人主张的“科学社会主义”。不论是哪一种社会主义,究其实质,都是激进的民族主义。在实践中,主要是发展民族经济和维护民族的权益。它反映了非洲人民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厌恶与憎恨,以及对独立发展的新社会制度的憧憬。但是,它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不同,它维护非洲传统的观念和传统的社会制度,继承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改良主义,反对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并带有“乌托邦”的色彩。正因如此,它在实践中也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失败和挫折。

(张象)

## 2. 不结盟运动的兴起

不结盟运动的兴起是世界民族解放运动胜利的产物。大批新兴国家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到1961年,有42个国家先后独立。独立后的新兴国家,面临着严重的斗争任务。老殖民主义者不甘心失败,伺机反扑。新殖民主义者也以各种方式从政治、经济、军事上对新兴国家进行控制、干涉、颠覆,甚至武装入侵。两个超级大国为争夺世界霸权,对新兴国家的独立主权威胁日益增大。在这种形势下,广大新独立国家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维护民族独立和主权,主张团结互助,发扬“万隆精神”,以和平共处、不结盟取代“冷战”和“对抗”。

早在 1956 年 7 月，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和埃及总统纳赛尔、印度总理尼赫鲁就发表联合声明；拥护和平共处原则，坚持民族独立和反对参加对立的军事集团，主张在各国之间开展经济文化合作并建立平等友好关系，提出了不结盟的主张。此后，他们又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加纳总统恩克鲁玛进行会谈，决定共同发起不结盟运动。1961 年 2 月至 4 月，铁托访问非洲 9 国，建议各不结盟国家举行首脑会议，这对第一次不结盟国家会议起了关键作用。在铁托和纳赛尔的努力下，同年 6 月，在开罗召开了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筹备会议，有 20 个国家参加。规定了参加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的五项标准：它的政策应当是在和平共处和不结盟基础上的独立政策；它应当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它不应当是任何会使它卷入大国冲突的集体军事联盟的成员国；它不应当是同某大国缔结的双边联盟的参加国；它的国家领土应当有在它同意下建立的外国军事基地。这次会议为不结盟运动进行了充分的酝酿和准备。

1961 年 9 月 1 日至 6 日，第一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在贝尔格莱德举行。25 个国家（除南斯拉夫外，亚非拉三大洲 24 国）参加了会议。其中 15 个国家是亚非会议参加国。出席会议的除铁托、纳赛尔和尼赫鲁外，还有与会国政府重要领导人。他们是不结盟运动的创始国，代表了世界 10 亿人口。会议通过了《不结盟国家的国家或政府首脑宣言》和《关于战争的危险和呼吁和平的声明》，不结盟运动从此正式形成。

不结盟运动主要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是定期召开各种会议，主要是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自 1961 年成立以来，已召开过 7 次国家首脑会议。（见 206 页一览表）自 1970 年起，首脑会议制度化，每三年举行一次。除此，不结盟国家外长也不定期举行会议，为首脑会议的召开作准备并就重大国际问题进行协商。1973 年第四次首脑会议还决定成立协调局，由 17 个成员国（后增加到 25 个）组成。

不结盟运动国家首脑会议一览表

次	时间	出席国	地点	主要内容
一	1961年9月 1—6日	25国	贝尔格莱德 (南斯拉夫)	会议通过《不结盟国家的国家和政府首脑宣言》、《关于战争的危險和呼吁和平的声明》标志着不结盟运动的正式形成。
二	1964年10 月5—10日	47国	开罗(埃及)	会议通过《和平和国际合作纲领》指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是国际紧张局热和冲突的一个基根源”
三	1970年9月 3—10日	54国	卢萨卡(赞比亚)	会议通过关于和平、独立、发展、合作和国际民主化的《卢萨卡宣言》和《关于不结盟和经济发展宣言》，标志由反对美帝国主义发展为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
四	1973年9月 5—9日	75国	阿尔及尔 (阿尔及利亚)	会议通过《政治宣言》、《经济宣言》、《经济合作行动纲领》、《关于民族解放斗争的宣言》和其它十九项宣言和决议。首次提出“反对霸权主义”充分肯定77国集团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口号。
五	1976年8月 16—19日	85国	科伦坡(斯里兰卡)	会议通过《政治宣言》、《经济宣言》及其它决议，强调和第三世界国家一起在经济领域深入开展反对两霸斗争。
六	1979年9月 3—9日	93国	哈瓦那(古巴)	会议通过宣言强调不结盟运动的团结，坚持反帝、反霸、非集团的原则，抵制了古巴企图让韩桑林政权窃取柬埔寨合法席位的阴谋。
七	1983年3月 7—12日	99国	新德里(印度)	会议通过《政治宣言》、《经济宣言》、《集体自力更生宣言》等文件，重申不结盟运动的精髓是反帝、反新老殖民主义、反霸权主义的斗争。
八	1986年9月 1—7日		哈拉雷(津巴布韦)	会议通过了《政治宣言》、《经济宣言》、要求立即实现纳米比亚独立特别呼吁书、哈拉雷裁军呼吁书等文件。《政治宣言》要求大国停止军备竞赛，遣责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经济宣言》要求调查国际经济关系，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和农业形势，主张合作解决债务问题等。

不结盟运动兴起以来，组织形式逐步完善，运动规模不断扩大，到 80

年代初已有 101 个国家参加这一运动，包括了第三世界的大部分国家。

不结盟运动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起着巨大的作用：其一，推动民族解放运动深入发展，加速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崩溃，不结盟运动在历次国家首脑会议的宣言中，始终坚持“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是国际紧张局势和冲突的基本根源”这一鲜明立场。并通过宣言和决议声援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提出援助的措施，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了反对和废除殖民主义的光辉思想，鼓舞和推动了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新老殖民主义。自不结盟运动发起至今，世界上又有 50 多个国家赢得独立。不结盟运动是加速世界殖民体系崩溃的强大国际政治力量。其二，沉重打击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大大提高第三世界国家的国际地位。随着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不结盟运动自 70 年代以来把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作为重要任务。1970 年第三次首脑会议谴责“超级大国的恐怖均势”；1973 年第 4 次首脑会议则进一步号召不结盟国家“通过有效地行使反对霸权的国家主权来巩固它们的独立”，“拒绝任何形式的奴役和依附，任何干涉和压力”，第一次提出“反对霸权主义”的原则。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还多次通过决议要求两个超级大国率先裁减军备，建立印度洋、地中海和拉美和平区。1983 年第 7 次首脑会议还通过了要求外国军队撤出阿富汗和柬埔寨的决议，矛头直指大小霸权主义者。不结盟运动在反对霸权主义的同时还为国际关系民主化而斗争，主张联合国“向全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坚持要求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目前发展中国家已占联合国成员国一半以上，改变了受少数大国操纵的局面。不结盟运动的发展沉重打击了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促进了第三世界国家国际地位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两个超级大国为中心的世界政治格局。

其三，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作出巨大努力。

不结盟运动从成立之日起，就把经济领域的斗争作为中心内容之一。1964 年第 2 次首脑会议就提出建立“新的公正的经济秩序”的主张，1973 年第 4 次首脑会议将正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作为不结盟运动行动纲领，在后两次首脑会议上又进一步提出具体构想。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不结盟国家日益认识到“没有经济独立就没有政治独立”，经济问题在不结盟运动的议事日程上地位日益突出。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提出发展中国家集体自力更生的思想，十分重视南南合作。在近几年首脑会议上都有专门的“经济宣言”，提出经济领域斗争的目标。不结盟运动的开展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发展南南合作作出重要贡献。

不结盟运动面临的问题：第一，来自超级大国的干扰和压力。不结盟运动从兴起之日起就受到一些西方国家的恶毒攻击和反对，它被诬蔑“为共产主义效劳”，是实行“多数暴政”，并通过施加政治经济压力，使这一运动采取“亲西方方针”。美国则一贯利用不结盟国家间的分歧和纠纷来破坏不结盟国家的团结。苏联认为不结盟运动是“五花八门”的大杂烩，对不结盟

运动坚持反霸斗争、把美苏“相提并论”、“把世界分为富国和穷国”都十分不满，它指使古巴在第6次首脑会议上大搞分裂活动，企图使不结盟运动变成苏联的政治工具。两个超级大国的干扰破坏损害了不结盟队伍的团结，给这一运动的发展造成极大困难。

第二，不结盟国家内部的矛盾。

由于不结盟国家有着不同的历史和政治经济状况，有些国家还存在着领土、边界、民族、宗教等方面的纷争，往往被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利用来进行分裂第三世界国家，造成这些国家的矛盾，甚至演成长期军事冲突。例如两伊战争、巴勒斯坦地区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矛盾等都是历史遗留问题，这些矛盾如不能妥善处理，不仅会影响不结盟队伍内部的团结，还会阻碍运动的健康发展。因此，不结盟国家是否能够通过和平谈判协商解决成员国内部的矛盾和纷争，顾全不结盟国家的独立、发展、团结、合作的大局，是不结盟运动排除外部干扰，保证运动向纵深发展的重要前提。

第三，不结盟国家的经济困难。不结盟运动成员国的经济发展层次不一，许多国家至今保持单一形态的经济结构，有的在经济上还受控于西方国家，多数国家经济十分落后。造成此况原因除了历史上殖民主义长期掠夺剥削的结果，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不平等经济关系阻挠破坏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独立也是重要原因。尤其是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各种手段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经济危机，更使其经济状况恶化。超级大国往往乘机利用经济手段，施加政治压力，破坏不结盟国家间的团结合作，对西方负债的不结盟国家为缓解经济困难被迫在某些国际问题上表现动摇。因此，不结盟国家经济水平的提高以及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是巩固和发展不结盟运动的迫切任务。

(赵菊玲)

### 3. 印度支那抗美战争

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是六七十年代国际事务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整个亚非拉反帝反殖斗争最激烈的地区之一。

1954年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结束后，法国军队撤出印度支那。美国代表未在《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上签字，只是在会议上发表声明，承诺“美国将不使用威胁或武力”破坏印度支那的和平。但是，美国染指印度支那的野心是掩盖不住的。早在1954年4月7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就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把印支三国比作一排竖起的多米诺骨牌，认为只要碰倒了第一块，那么最后一块也会很快地倒下。在印度支那，只要有一个国家革命成功，整个印度支那就会改变局势。而印度支那“落入共产党人之手”，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地位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



为了使对三国的控制披上合法的外衣，美国于 1954 年 9 月建立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把柬埔寨、老挝和南越划入缔约国的保护范围。美国政府还通过“军援”、“经援”、扶植傀儡政权、派出军事顾问等手段向印支三国渗透，镇压各国人民的斗争。

《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规定，在 1956 年 7 月内，越南北、南两地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举行选举。但是美国扶植的吴庭艳集团，拒绝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历次提出的、旨在和平统一祖国的一切合理建议，从 1955 年底开始切断了通过临时军事分界线自由来往的联系，并在 1956 年 2 月非法举行单独选举。美、吴集团公开破坏日内瓦协定，把南越变为美国侵略印支三国的基地。

在老挝，美国无视日内瓦协定关于老挝内政不容干涉的规定，公然支持老挝右派反动集团发动内战，使老挝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柬埔寨，美国利用一切手段妄图收买或颠覆坚持中立、不结盟政策的西哈努克政府。

但是，印支三国人民共同战斗，使美帝妄图将新殖民主义枷锁加到三国人民头上的阴谋难以得逞。尤其是在越南南方，1960 年 12 月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后，武装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

1961 年 1 月肯尼迪上台后，为了策划新的战争，派遣副总统约翰逊于 1961 年 5 月亲赴南越，约翰逊在回国后向肯尼迪报告说，“我们打算作出重大努力支持东南亚的自由力量以对付共产党目前在该地区的扩张，还是把这个地区丢掉，这是美国最终必须作出的决定——而时间是至为重要的。”随后，受美国政府的委派，加利福尼亚斯坦福研究所主任斯特利到越南实地考察，拟定了在十八个月内“平定”越南南方的“斯特利计划。”

肯尼迪鼓吹所谓“灵活反应”战略，大力发展特种部队，把越南南方作为特种战争——即由美国出钱、出枪、出顾问，驱使当地雇佣军为美国卖命、镇压当地人民革命运动——的实验场。但是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下，武装斗争如火如荼地发展，使特种战争的重要支柱之一“战略村”计划遭到失败。为了隔断南越人民武装同人民的联系，美、吴集团妄图把边沿地区的八十万到一百万农村人口强迁到集中营式的“战略村”去。这个计划一开始就遇到人民的反抗，凡建立了“战略村”的地方，农民纷纷进行斗争。在边样“战略村”，美、吴集团花了 30 万元，企图把 5000 人赶进去，但结果只迁入了 500 个老人和小孩。人们还和游击队配合，捣毁“战略村”，使“战略村”变成打击敌人的“战斗乡”。

“特种战争”未使美国达到预期的目的，美国就将罪责归咎于吴庭艳集团，实行换马术，于 1963 年 11 月策动军事政变，杀死吴庭艳及其弟吴庭儒。但替换走狗的把戏仍无济于事，当时越南南方已有 79% 的乡、3/4 的土地和 1/2 的人口获得解放。

老挝人民团结在爱国战线的周围，英勇战斗，解放区日益扩大，并和越南国土相联，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可以通过老挝解放区取得北方同胞的援助。为了阻止越、老人民相互支援，美国加紧了对老挝的侵略。美国驻老挝的军事顾问自1961年4月20日起脱掉便衣伪装公开参战。老挝爱国战线的武装力量到1961年底解放了全国土地的60%和全国人口的将近一半。老挝各派政治力量的对比也急剧发生变化，中派力量日渐加强、壮大。迫于形势，美国及其傀儡同意接受西哈努克亲王的倡议于1961年5月召开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会议文件确认了老挝独立和中立的国际地位。但美国肆意破坏日内瓦协定，于1963年春策划暗杀了老挝中派力量的领袖贵宁·奔舍那等人，挟制富马首相改组民族团结政府。但美帝的干涉更加激起了老挝人民的爱国武装斗争的高涨。

自1964年5月17日起，美机不断轰炸老挝解放区。1964年8月2日和4日，美帝军舰两次侵入越南领海北部湾，进行军事挑衅，并于8月5日出动飞机轰炸越南北方的义安、鸿基和清化地区。8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庄严声明指出“美帝国主义跨出了‘战争边缘’，走上了扩大印度支那战争的第一步。”越南人民是中国人民亲如手足的兄弟，中国人民作为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中国领土作为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有力地支援了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

美帝将战火烧到越南北方，并没有挽救它在南方的失败，北方军民不断痛歼入侵的美国飞机，一边战斗一边生产，充分保证了南方军民的物资供应。南方军民也不断袭击美军机场、美军宿舍，在战场上遭到残败的美、伪集团军队，龟缩到据点里都不安宁。

约翰逊政府把赌注越下越大，它抛弃了肯尼迪的“特种战争”战略，竟于1965年3月17日派遣海军陆战队在岬港登陆，美国地面部队自此开始直接参加越南战争，走上了“逐步升级”的战争道路——即扩大战争和加强战争威胁，并在扩大战争的步伐中施以“核讹诈”。

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给越南的抗美救国战争以巨大的支持和声援。约翰逊政府便企图用“和谈”的花招来得到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1965年4月7日，约翰逊第一次表示愿意“和谈”，但越南政府要求把美军全部撤离越南作为和平谈判的先决条件。1967年6月，约翰逊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美国新泽西州的葛拉斯堡罗会谈后，美、越双方才原则上同意会谈。1968年5月，双方在巴黎开始谈判。

1968年1月29日夜—2月4日，南越人民武装发动了强大的春节攻势，给予美军和西贡集团以沉重的打击。伪总统府、美国大使馆、几十个敌占省会、重要城镇和军事基地，都遭到人民武装的袭击。六天中共歼敌五万多人（其中美军一万多人）。瓦解敌伪军二十万，击毁敌机一千五百多架，击毁敌军车四千多辆，击沉或击毁军舰、炮艇五十艘。使美军遭到侵越战争以来的最大的一次打击。到1968年6月25日，越南北方击落美机共三千架。

尼克松 1969 年 1 月上台后，采取战争越南化的政策。在同南越伪总统阮文绍在关岛会晤后，决定从越南大幅度撤军的同时，辅以对越南北方暂停轰炸，但在港口布雷，妄图以此压越南政府就范。尼克松政府软硬兼施，均不能摆脱侵越困境，依然陷在越南战争中不能自拔，只有铤而走险。

尼克松政府虽然于 1969 年 7 月在保证承认柬埔寨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前提下同柬复交，但旋即将战火烧到柬埔寨，美军和南越伪军以袭击南越人民武装庇护所为名，不断侵入柬埔寨境内。1970 年 3 月 18 日美国竟策动柬埔寨的朗诺——施里马达集团发动政变，推翻了坚持中立、不结盟政策的西哈努克政府。这一行径，遭到国内人民和世界舆论的谴责。

正在苏联访问的西哈努克亲王在政变发生的当天按原定计划到中国访问，随后又在北京组织了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原活动在国内的以波尔布特、乔森潘为首的柬埔寨共产党（红色高棉）武装力量也加入民族团结政府，形成抗美救国战争统一战线。

为了在共同的抗美救国战争中协同作战，越南南北双方及柬埔寨、老挝三国四方领导人于 1970 年 4 月举行了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本着各国的解放和防卫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的原则，各方保证将按照有关方面的愿望，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尽一切努力相互支持。”从此，三国人民在抗击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团结在一起，将抗美救国斗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美国国内人民的反战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尤其是 1971 年美国报纸刊露了五角大楼关于侵越战争的秘密文件后，人民的反战情绪更加激烈。

尼克松为了赢得 1972 年的大选，将侵越美军由他上台时的 547,000 人撤退到只剩下 27,000 人（1972 年 8 月），并在选举前散布对巴黎和谈持乐观态度的言论。结果，1973 年 1 月 27 日签署了结束越南战争的《巴黎协定》。但美国继续用“印度支那人打印度支那人”的方针扶植三国的傀儡政权。

在此情况下，柬埔寨民族解放武装力量于 1975 年春向朗诺政权发动总攻，4 月 17 日解放金边，建立起“民主柬埔寨”的新国家。越南军民在取得“西原战役”胜利后，发动了“胡志明战役”，4 月 30 日解放西贡。老挝的万象政府在美国撤军后先是与爱国武装力量签订停火协定，1974 年 4 月成立以富马亲王为首相的民族联合政府，1975 年 5 月老挝普遍开展夺权斗争，成立各级人民政权，12 月 1 日宣布废除君主制，建立起以苏发努冯为主席，凯击·丰威汉为总理的人民民主共和国。

（柳舒）

#### 4. 第三次中东战争

当越南战争进行最激烈的时候，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了。1967 年 6 月 5

日，以色列悍然发动对埃及、约旦和叙利亚的武装侵略，所以这次战争又称“六、五”战争。

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后，中东各国人民在埃及人民英勇斗争鼓舞下，不断掀起反帝斗争高潮。进入60年代后，巴勒斯坦人民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活动有了很大的发展。1964年5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建立，8月决定建立巴勒斯坦解放军。亚西尔·阿拉法特领导的“法塔赫”（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简称）从1965年就开始了武装斗争。到1967年，巴勒斯坦解放军已发展到1万5千人，成为一支战斗劲旅。这些斗争，使阿拉伯各国人民受到锻炼，给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有力的打击。其次是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在中东的争夺更加激烈，它们在中东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妄图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一举夺得中东的霸权，遂于1957年1月抛出艾森豪威尔主义。但是，埃及、约旦、叙利亚、沙特阿拉伯等大多数中东国家坚决拒绝接受，使艾森豪威尔主义遭到破产。

苏联则扮成阿拉伯人民的“天然盟友”，以经济、军事援助为手段，向中东渗透。1958年12月，苏联同埃及签订了援助阿斯旺水坝建设的协定，向埃及贷款四亿卢布。到了60年代，苏联趁美国深陷越南战争之机，大肆向中东扩张势力，抢夺地盘。苏联向埃及出售军火，派遣专家，控制了埃及的要害部门。苏联还同叙利亚、伊拉克签订了军援协定，在这两国取得多种权益。

美国对苏联在中东的步步进逼深感不安。约翰逊总统惊呼：“苏联在这个战略地区扩充势力，威胁着我们在欧洲的地位。”（《约翰逊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94页）为了对付苏联的扩张，美国加紧武装和支持以色列，作为它抗衡苏联与称霸中东的得力工具。1967年3月到5月，美国给以色列输送了400辆坦克，250架新式飞机，还抽调1000多名空军“志愿人员”去加强以色列空军。以色列野心更加膨胀。

以色列不甘心在第二次中东战争中的失败，又急于摆脱6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经济不景气的困扰，因此疯狂扩军备战，企图从发动对外侵略战争中寻找出路。

1967年5月21日，埃及宣布封锁亚喀巴湾，不准以色列船只和为以色列运送战略物资的外国船只通过蒂朗海峡。封锁海峡是埃及主权。然而以色列却以此为借口，叫嚷要用军事力量打开亚喀巴湾。阿拉伯国家纷纷表示，坚决支援埃及，反对以色列侵略。国际形势对埃及十分有利，双方力量对比，阿拉伯国家占很大优势。但由于纳赛尔相信了苏联大使转告的美国关于以色列不会发动进攻的保证，对以色列的侵略阴谋麻痹大意，疏于防备，造成被动。

1967年6月5日，以色列出动全部空军，对埃及、叙利亚、约旦的机场和战略要地轮番轰炸。几小时之内，三国就有数百架飞机在地面被炸毁，许多导弹基地和雷达站遭破坏。以色列取得制空权后，陆军随即席卷西奈半岛

和约旦河西岸。开战后五小时，柯西金利用苏美之间的“热线”向约翰逊表示苏联无意同美国在中东发生战争，愿为中东停火而努力。接着美苏在安理会先后炮制了“立即实现停火”和“限期停火”的决议。约旦在7日，埃及和叙利亚在8日被迫接受停火。9日，以色列一面宣布同意停火，一面对叙利亚发动全面进攻。10日，以色列在占领了戈兰高地和通往大马士革的几条重要公路后，才停止了进攻。

仅仅六天战争，以色列就以较小的代价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耶路撒冷旧城，从而霸占了整个巴勒斯坦，还侵占了埃及的西奈半岛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总共6.5万平方公里。近一百万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被赶出家园，沦为难民。

11月22日，美苏操纵联合国通过英国的中东问题提案，即242号决议。决议不分侵略者和被侵略者，只提出“以色列武装部队从占领的土地上撤退”，在中东建立“公正和持久的和平”。决议要求确保苏伊士运河和亚喀巴湾的“通航自由”，公正解决“难民”问题。

“六·五”战争后，阿以矛盾更加尖锐。1967年的第四次阿拉伯首脑会议确立了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统一立场，即不承认、不和解、不谈判。战争使难民问题扩大了。涌入黎巴嫩、叙利亚、约旦等国的难民大大增加，遂使这些国家的内外矛盾加剧，形成阿以冲突的新“热点”，使巴勒斯坦问题愈益扩大化和复杂化。

苏联为了保全在阿拉伯世界的面子，宣布与以色列断交，再次声称支持阿拉伯国家。但同时又竭力压制阿拉伯人民报仇雪恨的民族情绪，伙同美国制造中东“不战不和”的僵局，而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则被抛在一边。阿拉伯国家是不战不和局面的最大受害者。停战后的中东局势孕育着再次爆发战争的严重因素。

（王文庆）

## 5. 第四次中东战争

1967年“六·五”战争使埃、约、叙三国遭受严重损失，阿拉伯国家的反美情绪普遍高涨。埃及和叙利亚军民强烈要求雪洗“六·五”战争的耻辱，收复失地。但是，美国和苏联为了各自的利益都极力在中东制造一种“不战不和”的局面，限制阿拉伯国家用正义的战争手段收复失地，阻止阿以双方通过谈判真正解决问题。其目的是他们利用中东的紧张局势来加强对中东各国的控制，趁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这种局势给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在埃及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来维持巨额军费开支。而苏联则利用埃及等国战败后的困难处境和急于复仇的心情，通过增加“援助”，加强了它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和政治地位，大批苏联军事人员随着武器装备，被派往这些国家的军

事部门。当时在埃及，从最高统帅部直到营连基层单位均有苏联顾问，负责埃及军队的装备和训练。

这种局面遭到了阿拉伯各国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坚决反对。1970年10月，萨达特继任埃及总统。他提出首要任务是解放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为了打破中东的僵持状态，1971年2月，萨达特提出了一项和平倡议，表示埃及愿意与以色列媾和，并为重新开放运河问题作出临时安排，其条件是以色列撤出1967年侵占的领土。同时，萨达特还作好以武力收复失地的准备。为此从1971年10月到1972年4月，萨达特三次访问苏联。他向苏联政府表明，埃及无法容忍“不战不和”的局面继续下去，希望苏联履行诺言，向埃及运送武器。但是，苏联当时正热衷于同美国搞政治交易，宣称要在中东实现所谓“军事缓和”，这表明苏美要继续在中东维持“不战不和”的局面。这个声明使埃及对苏联的希望完全破灭。此后埃苏两国关系急剧恶化。萨达特决心排除苏联的干扰，积极准备对以的自卫还击战争，收复被侵略者占领的家园。为此埃及政府采取的第一个重大措施就是驱逐苏联军事专家。1972年7月18日，埃及政府正式宣布结束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在埃及的使命，并接管苏联在埃及建立的一切军事设施。萨达特这一勇敢的行动，为埃及取得行动自由扫除了障碍。

埃及采取的第二个措施是，1973年1月邀请阿拉伯前线国家的军事领导人共同商量，拟订对抗以色列的作战计划，并成立了埃及、叙利亚武装部队联合委员会。埃及还积极争取阿拉伯产油国的支持，就使用“石油武器”问题，各国领导人之间进行了磋商。

经过认真周密的准备，埃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人民，终于违背了两个超级大国的意愿发动了打击以色列侵略者的正义斗争。1973年10月6日，埃及集中了8万军队、300架飞机、4,000门大炮及火箭发射器向运河东岸的以军阵地发动了猛攻。仅仅经过10小时的战斗，埃及就突破了被以色列吹嘘为“坚不可摧”的“巴列夫防线”，成功地登上了被以色列占领长达6年之久的运河东岸。一周后，埃及军队扫除了以色列在运河东岸的最后一个据点。与此同时，叙利亚军队在戈兰高地向以军发起了全面进攻，收复了许多失地。巴勒斯坦突击队则在以色列占领区成功地开辟了第三战场，牵制以军的力量有效地配合了埃叙前线的战斗。许多阿拉伯前线国家纷纷派出军队参加战斗或提供经济援助，阿拉伯产油国也运用石油武器，对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实行石油禁运。所以在战争初期，埃叙在军事上是取得重大胜利的。

但是从14日起，以色列依靠美国大规模的军事援助，在西奈前线向埃军进行疯狂反扑。10月16日，以色列军队从埃军防线薄弱地点突破进入西岸的埃军后方，切断了埃军的供应线，战局开始对埃及不利。10月10日苏美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一项关于中东问题的决议，要求在中东交战的双方立即实现就地停火。该决议（第三三八号决议）22日获得通过。当天晚上，埃及接受了“就地停火”决议，随后叙利亚也宣布接受停火决议。以色列虽

然在 22 日宣布接受停火，但直到 24 日才真正停火。故第四次中东战争，亦称“十月战争”。

以后的两年内，经过一系列的谈判，埃及、叙利亚和以色列双方达成了两个脱离军事接触的协议。埃及收复了苏伊士运河东岸 28—30 公里宽的狭长地带。叙利亚收复了戈兰高地的部分地区。在埃、叙和以色列军队之间建立的缓冲区，由联合国部队驻扎。但是以色列仍然占领着西奈 87.5% 的地区。

虽然十月战争没能使埃及等国收复失地的愿望得以实现，但它仍具有重大意义。首先是埃叙等国人民勇敢地冲破了超级大国的束缚和控制，推动了第三世界国家反帝、反殖、反霸的斗争。其次，阿拉伯人民打破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洗刷了“六·五”战争中蒙受的耻辱，振奋了民族精神。另外，这场战争后，以色列长时间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

十月战争后，埃苏关系进一步恶化。埃及急需武器得不到苏联的及时补充，依赖苏联的支持，收复失地，已经完全绝望。而美国政府却充当了阿以之间的调停人。特别是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为此进行了有名的中东“穿梭外交”，在继续支持以色列的同时，对以色列也施加适当的压力，让它接受了脱离接触的协议，以谋求改善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1974 年 2 月和 6 月埃及和叙利亚先后与美国恢复了在“六·五”战争中中断绝的外交关系。此后，埃及政府正式改变了过去的“联苏、反美、抗以”的方针。而采取了“亲美、抗苏、和以”的方针。1977 年 11 日，萨达特第一次访问了以色列，从此埃及和以色列直接进行和平谈判。在美国政府斡旋下，埃以两国于 1978 年 9 月在戴维营签署了《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的纲要》和《关于签订埃以和平条约的纲要》两个文件。1980 年 2 月 24 日，埃及和以色列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尽管埃以和解在阿拉伯世界中引起了许多争论，而且事实上也不可能消除以色列和阿拉伯人民之间的根本矛盾，但是它使埃及收复了西奈半岛，可以集中资金用于经济建设，这为埃及进行和平建设创造了条件。同时，中东的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也由此发生巨大变化。阿拉伯联盟成员国除少数几个国家之外，绝大多数都批评埃及与以色列搞缓和，并决定对埃及实行外交、经济制裁。这样，中东地区的主要矛盾-阿拉伯与以色列之间的矛盾不但没有解决，而且阿拉伯国家之间又产生了新的矛盾。中东地区的动荡局势仍然在继续着。

(王黎)

## 6. 葡属非洲的解放与非洲面貌的巨变

70 年代的非洲最突出的事件是一系列葡属殖民地获得独立。葡萄牙长达 500 年之久的殖民统治，使安哥拉、几内亚比绍与佛得角群岛、马德拉群岛、

圣多美与普林西比岛成为非洲最黑暗、最悲惨的人间地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里仍然有罪恶的奴隶贩卖。莫桑比克每年要把十万“劳工”卖给南非和罗得西亚的矿井从事奴隶劳动，能够回来的不到 1/3。强迫劳动制度是葡萄牙殖民统治的基础。安哥拉人口的死亡率为 40%，婴儿的死亡率为 60%，40%的人患热带病和软骨病，98%的人是文盲。

1960 年 3 月，安哥拉北部各城镇爆发了起义。1961 年 2 月 4 日，罗安达一些爱国青年袭击了监狱、电台、警察局，从此揭开了安哥拉武装斗争的序幕。殖民当局在几天之内就屠杀了 3000 多人，激起了人民更加坚决的抵抗。在短短的三个月内，整个罗安达-马兰热铁路线以北地区都燃起了武装斗争的烈火。农民也纷纷参加游击队，在“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领导下的游击队发展到 2 万多人，活动遍及全国十五个州中的九个州，并在北部和中部森林山区中建立了根据地。1962 年以霍尔敦·罗伯托为首的安哥拉人民联盟成立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总部设在扎伊尔首都金沙萨，它所领导的武装力量称安哥拉民族解放军，主要依靠北部的巴刚果族。1966 年 3 月，以萨文比为首的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在东南部莫希科肖的穆安盖地区，主要依靠奥维姆本杜族形成第三支爱国武装力量，开辟了新的游击根据地。60 年代末，人民武装力量控制了全国 1/3 的土地，解放了 100 多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 1/5，迫使葡萄牙不得不从北部和东部的许多军事据点撤退。

在几内亚比绍，以阿朱卡尔·卡布拉尔为首的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总结了 1959 年比绍码头工人大罢工血的教训，决定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葡萄牙的殖民统治。1963 年 1 月 23 日，人民游击队在热巴河以南的蒂特市向殖民军发起进攻，一年内就控制了南部富饶的稻米产区。1964 年春，葡萄牙调集“精锐部队”进攻解放区，解放区军民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扫荡”。1968 年 5 月至 1969 年 2 月，边界保卫战胜利后，爱国武装力量发展到一万余人，解放了 2/3 以上的土地和 1/2 的人口。1973 年 9 月 24 日在马迪纳-博埃解放区举行第一届全国人民议会，几内亚比绍共和国宣告成立。

在莫桑比克，1962 年 6 月 25 日，莫桑比克解放阵线领导下的游击队在德尔加多角省的沙伊镇打响了武装斗争的第一枪。游击队在北部农村建立根据地，粉碎了殖民当局“要在一年内结束莫桑比克战争”的狂妄计划。1970 年 5 月，解放区军民粉碎了敌人最大规模的一次“扫荡”，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1972 年 7 月，爱国武装力量渡过赞比西河，进入敌人战略和经济的中心地区，解放了大片土地，显示了莫桑比克人民有能力建立起一个独立自主的新国家。

1969 年 3 月，统治葡萄牙达 37 年之久的独裁者萨拉查被迫下台，让位于卡埃塔诺。卡埃塔诺政权又被 1974 年 4 月 25 日的军事政变所推翻。新政权提出要与解放运动“和平谈判”，同时，继续对三国解放区进行空袭和武力威胁。葡属殖民地人民一面谈判，一面继续坚持武装斗争。殖民军斗志涣散，厌战反战情绪强烈，有两千名殖民军发表公报拒绝同爱国武装力量作



战。另一方面也有一小撮极端的殖民主义分子于9月7日在洛伦索马贵斯发动叛乱。在这种形势下，葡政府于8月26日被迫与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代表团达成协议，宣布于1974年9月10日在法律上承认几内亚(比绍)共和国，并全部撤出葡军。12月19日又达成协议，规定佛得角群岛于1975年7月5日独立。1974年9月7日，葡政府与莫桑比克解放阵线签署了关于莫桑比克于1975年6月25日正式独立的协议。1974年11月25日，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解放运动与葡政府达成协议，决定在1975年7月12日独立。安哥拉三派爱国组织实现了联合，1975年1月15日与葡萄牙达成“阿沃尔协议”，宣布安哥拉于该年11月11日独立。

葡属非洲殖民地人民的胜利对南部非洲和其他未独立地区的人民是有力的鼓舞和支持。非洲边沿地区的一些小国和岛国也纷纷宣布独立，如科摩尔(1975.7.6)、塞舌尔群岛(1976.6.29)、吉布提(1977.6.27)。在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统治下的纳米比亚(西南非洲)，1960年成立了西南非洲人民组织，1966年8月26日领导人民用长矛、弓箭和陈旧的步枪开始了武装斗争，受到联合国的支持，这一天被定为“纳米比亚日”。

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和非洲民族联盟于1966年4月29日在锡诺亚开始了反对史密斯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武装斗争，活动范围遍及津巴布韦的东部、东北部和西部的广大地区。1974年后，史密斯政权一面从国外招募雇佣军来镇压，一面又玩弄和平谈判的骗局，表示愿通过和谈“逐步实现多数人的统治”。在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的压力下，1979年9月至12月，英国主持召开了伦敦制宪会议，达成和平协议。1980年2月举行大选，民族联盟领袖穆加贝获胜，4月18日宣布成立津巴布韦共和国。至此，非洲独立国家已达50个，除纳米比亚和南非外，整个大陆都获得了独立和解放。非洲的政治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但是，在霸权主义激烈争夺的历史条件下，非洲人民前进的道路十分曲折。安哥拉三派爱国武装力量在葡萄牙移交政权后，因受外国势力的挑拨离间，矛盾迅速激化。苏联支持下的“人运”，于1975年11月11日在罗安达宣布成立人民共和国，内图就任总统。同日，受美国支持的“解阵”和受西欧支持的“安盟”也宣布成立人民共和国，三派武装冲突扩大为内战。1976年10月内图访苏签订了“苏安友好合作条约”，苏联将大批军事顾问、专家、二万名古巴军队运往安哥拉支持“人运”扩大内战，击溃了北方的“解阵”，将南方的“安盟”部队赶出城市。

苏联还以安哥拉为基地，于1977年3月和1978年5月两次派遣雇佣军和古巴军队入侵扎伊尔的沙巴省。1977年7月至1978年3月又派古巴军队参与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之间的边界战争。这些事件说明，摆脱了殖民统治的非洲国家还需要再接再厉，与霸权主义进行不懈的斗争，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

(张象)

## 7. 南非人民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

自从白人殖民主义者踏上南非这块土地起，就对当地人民实行种族歧视与种族压迫政策。殖民当局逐渐以立法形式将其作为一种基本国策固定下来。南非人民不断掀起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60年代发展到了高潮。

南非种族制度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从1910年联邦建立到1948年马兰政府上台这一期间内，颁布了一些种族主义法律，规定黑人在工业中只能从事劳动条件差、劳动强度大、报酬又很低的工作。1937年的“工业调整法”又规定，黑人工人只能算仆人，不能享受工人待遇。在农业中，1931年“土人劳役合同法”规定：黑人佃农一年中必须有六个月为地主无偿劳动，而在另外四个月中也可由地主任意支配，只需支付一般工资，若佃农不履行义务处以鞭笞。1931年“土著土地法”和1936年“土著赎购土地法”规定，非洲人只能在划定的保留地内占有土地。同时政治上禁止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进入各级政府，剥夺其集会和结社出版的自由，殖民政府可以不经审讯而随意监禁和逮捕黑人。

1948年马兰以“种族隔离”为竞选纲领上台执政后，又有数百项种族歧视法令被公布。主要内容有：（一）进一步实施1931年“土著土地法”规定的保留地制度，结果一千五百万黑人只占全国土地面积的12.6%，而且多是贫瘠土地，三百七十万白人却占有全国土地的87.4%。（二）在保留地以外地区实行特定住区制度。1950年和1957年特定住区法规定，在城市工作的非洲人只能居住在离开市中心几公里以外的特定地区。（三）1952年实施的通行证制度规定：年满16岁的非白人必须随身携带通行证，共60多种，若缺少任何一种，就遭监禁或罚款。（四）1950年颁布“镇压共产主义”条例：禁止共产党人在公共团体和工会中任职，凡反政府的党派、团体、出版物或个人均为非法；1962年“一般法修正案”规定：参加罢市、张贴政治标语及谴责当局者，均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死刑。（五）1953年“班图教育法”，在教育上对黑人实行歧视。

战前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下，南非人民曾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反种族主义的斗争，该组织成立于1912年，20年代发展为全国性组织。

二战后，南非人民的斗争有了新特点。首先规模更大，参加人数更多，不仅黑人，而且有色人种甚至白人都参加了斗争。其次工人阶级成为斗争的主力，领导力量得到加强。除非洲人国民大会外，战后又产生了白人民主人士大会、有色人大会（1952年成立）及泛非主义者大会（1959年成立）等一系列反种族主义和争取民族解放的进步组织。1950年6月26日，在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下，十万人参加了示威游行，这一天被定为“南非自由日”。1955年6月25日至6月26日非洲人国民大会、印度人大会、有色人大会等

组织在克利普敦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共同斗争纲领《自由宪章》，提出人民管理国家、民族平等、反对种族歧视、耕者有其田、一切资源银行和垄断企业转归全体人民所有，代表了民主力量的共同要求。

60年代，南非人民反对种族主义斗争进入高潮。1960年非洲人国民大会等组织兴起了反通行证法运动，1960年3月21日数万名非洲人在约翰内斯堡附近的沙佩维尔和开普敦附近的兰加等地集会，烧毁通行证，遭到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血腥屠杀，造成震惊世界的沙佩维尔惨案。这激起了南非人民的愤怒反抗，全国各地先后有五十多万人参加罢工。同年6月开普敦东部地区人民又发动了反对班图自治法的武装起义，参加的农民达一百三十余万。到1961年5月，南非全国90%以上居民参加总罢工抗议和抵制所谓“南非共和国”的成立。同年南非人民中出现了武装斗争组织“民族之矛”和“波戈”，领导群众开展武装斗争。1967年，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同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组成“联合军事司令部”，协调反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武装斗争。因此60年代南非人民反抗种族主义斗争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斗争方式的改变，开始了武装斗争。

70年代以后，南非人民反对种族主义统治的斗争继续发展。1976年6月，约翰内斯堡市郊黑人住区索韦托学生举行大规模示威，抗议当局强行推行荷兰语教学，遭到镇压，造成惨案。于是8月间索韦托地区十多万非洲工人罢工抗议当局暴行。同时70年代也出现了新的反种族主义组织，1978年4月成立了阿扎尼亚人民组织，提出“黑人觉醒哲学为指导思想”，主张建立一个不分种族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阿扎尼亚，只吸收黑人成员。到了80年代，随着津巴布韦独立，南非人民斗争又有了新发展，并且出现了“城市游击队”等进行暴力斗争。

南非当局所执行的反动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也受到世界上一切坚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及国际组织的反对，特别是第三世界人民在联合国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南非种族主义者。1963年11月22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消除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宣言，1965年12月又通过了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宣言。公约规定：在国际范围内消除一切侵犯人权，妨碍国家间和平友好关系的种族歧视。并设立了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同时联合国还采取了许多具体制裁南非种族主义者的措施。首先对南非实行武器禁运；其次政治上呼吁各国断绝与南非的外交关系；第三实行经济制裁。虽然在执行上遇到种种困难，但对南非人民反种族主义的斗争，仍然是有力的支持。

（李丽娟）

## 8. 拉美国家维护二百哩海洋权的斗争

反对海洋霸权主义，是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的又一

个重要方面。拉丁美洲国家带头兴起了维护二百哩海洋权的斗争，在 70 年代初的短短几年内发展成为世界规模的反对海洋霸权的斗争。

几个世纪以来，辽阔的海洋一直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争夺角逐的场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也把争夺海洋作为他们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军舰在世界各大洋横冲直撞，对各地区国家进行恐吓和威胁，他们派遣强大的“渔船队”和“科研船”对别国近海渔业和海底资源进行猖狂的掠夺。他们竭力鼓吹“公海自由”，妄图把各国的领海和管辖范围限制在三哩或十二哩以内，说什么领海和管辖区大了，公海就小了。

关于领海范围问题，从来没有任何公认的国际法的统一规定。1930 年海牙国际法编纂会议上提出的三哩的领海宽度，这是帝国主义国家企图强加给别国的，许多国家根本没有接受。各沿海国可以根据本国自然条件的具体情况，考虑到本国的民族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需要，合理地确定自己适当宽度的领海，并在领海以外划定适当范围的专属经济区或专属渔区。

拉美的智利和秘鲁最先在 1947 年宣布 200 哩的领海范围。1952 年智利、秘鲁和厄瓜多尔通过了《圣地亚哥宣言》，重申 200 海哩领海权的立场。到 60 年代末，先后有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巴西、多米尼加、委内瑞拉等九国宣布 200 哩领海权。1970 年斗争进入高潮，拉美国家多次举行海洋法会议，参加国从 1 月份的 3 个国家，增加到 5 月份的 9 个国家，8 月份又扩大到 21 个国家，分别通过了《关于海洋法的蒙得维的亚宣言》和《拉丁美洲国家关于海洋法的宣言》，显示了拉美国家保卫 200 哩领海权的决心。1971 年 1 月，拉美 9 个最先宣布 200 哩领海权的国家举行利马会议，表示要为“消灭海洋殖民主义”采取共同行动。1972 年 6 月，9 个加勒比海国家发表《圣多明各宣言》，主张各国有权在领海外划定一个不超过 200 哩的承袭海，沿海国在这一海域内有对自然资源“行使主权的权利”。拉美国家的这一斗争得到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纷纷响应。

在四面濒临海洋的非洲大陆，反对海洋霸权的斗争也蓬勃兴起。1971 年到 1973 年先后有塞拉利昂、尼日利亚、刚果、坦桑尼亚、马尔加什、几内亚、毛里塔尼亚、摩洛哥等十多个国家宣布扩大自己的领海或捕鱼区范围。1973 年第十届非洲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通过了《非洲统一组织关于海洋法问题的宣言》，庄严宣告，非洲国家有权建立最大限度为 200 哩的专属经济区或管辖范围。1972 年阿尔及利亚提出了“使地中海变成和平湖”的建议，要求超级大国从地中海撤出舰队，撤除军事基地，得到了地中海沿岸国家的普遍支持。

在亚洲，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于 1971 年 11 月提出了“建立印度洋和平区”的倡议，强烈要求两霸把印度洋上的军事力量撤走，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印度洋沿岸国家的支持。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针对两霸妄图使马六甲海峡变为“国际化”的阴谋，在 1971 年联合宣布三国对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共同管辖，指出马六甲海峡“不是国际性海峡”。1973

年9月第四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通过关于海洋法的宣言和决议，承认各沿海国在200哩的领海内的管辖权。第三世界的正义斗争也得到第二世界有些国家的支持。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新西兰和法国等已公开表示支持200哩经济区的主张。整个世界约有一百几十个国家参加到这一场反对超级大国海洋霸权的战斗行列中来。

联合国曾于1958年2月至4月和1960年3月至4月在日内瓦举行过第一、二次海洋法会议。但是第一次海洋法会议通过的《日内瓦海洋法四公约》，没有反映发展中国家和人民维护主权、保护自然资源、发展民族经济的愿望。两次会议都规定领海宽度为12哩，有利于帝国主义推行海洋霸权。为了改变此状况，1969年2月在发展中国家的倡议下，成立“联合国和平利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床洋底委员会”（简称“联合国海底委员会”），有90多个成员国。从1971年起海底委员会为第三次海洋法会议进行筹备工作。1973年12月3日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举行第一期会议，在联合国总部开幕，145个国家与会。苏美曾以“时机不成熟”为借口，千方百计阻挠会议的召开，所以这次海洋会议的召开本身标志着世界规模的反对海洋霸权斗争的新的重大发展。在会上苏美成为众矢之的，十分孤立。在这种形势下，苏美一反常态，装出赞同建立200哩经济区的样子。同时他们又提出经济区问题应与领海、海峡通行、捕鱼、科研等问题“一揽子”解决，妄图通过所谓的“通行自由”、“捕鱼自由”、“科研自由”等借口，最终阻挠解决200哩海洋权的问题。经过9年共11期会议的斗争与协商，1982年12月10日在牙买加的蒙特哥湾举行的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最后会议上签署了海洋法公约。其中包括领海和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公海等17个部分，规定每个国家有权确定其领海宽度，专属经济区宽度为200哩等内容。到1984年12月9日止，已有159个国家和地区在公约上签字。该公约的产生是拉美各国和广大第三世界反对海洋霸权和改革不合理的旧海洋法制度的重大胜利。

（张象、薛小平）

## 9. 阿富汗民族解放战争

苏联入侵阿富汗是第三世界国家进入80年代年后遭到威胁的第一个严重事件。它还影响到整个国际关系的格局。阿富汗人民由此开始了持久的民族解放斗争。阿富汗地理位置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历史上曾是印度、伊朗、中亚间商道的枢纽。阿富汗建国于18世纪中叶，自1919年独立以来，一直是个封建王国，至1973年查希尔王朝被推翻，才实行共和制，国名改为阿富汗共和国。阿富汗是个多民族国家，又是穆斯林国家。阿富汗人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他们为争取独立，自19世纪30年代以后，曾进行过三次抗英

斗争，终于击败了英国侵略者。

阿富汗是个落后的农牧业国家，主要依靠外国援助维持国计民生。长期以来，它同时接受苏联和美国的援助，苏联的援助最多，从 50 年代中期到 1978 年 4 月，苏联提供了 18 亿美元援助。1973 年 7 月 17 日，一批亲苏的人民民主党军官在苏联支持下发动政变，杀死达乌德，成立革命委员会，由塔拉基担任主席兼总理，改国名为阿富汗民主共和国。苏联派遣了 5000 名顾问到阿富汗，严密控制了政府各部门和部队连级以上单位。1978 年 9 月，美国助理国务卿哈罗德·桑德斯同阿富汗副总理兼外长阿明举行会谈。这时，人民民主党由于内争而分裂为以卡尔迈勒为首的“旗帜派”和以塔拉基为首的“人民派”。不久，“旗帜派”的头目被迫流亡到苏联东欧。1979 年 9 月，阿明杀死塔拉基夺取政权。

阿明夺权后，国内局势更加动乱，人民的反政府武装斗争遍及全国，政府对局势难以控制。苏联非常重视阿富汗的战略地位，为了防止对阿富汗失控，确保喀布尔有一个稳固的亲苏政权，决定直接出兵。

1979 年 4、5 月份，苏联就在苏阿边境大量增兵。12 月初开始，苏联空运三个营的兵力，控制了喀布尔北面的巴格拉姆空军机场。12 月 8 日，苏联安 12 型和 22 型运输机把一队苏军运至喀布尔，驻喀布尔的 4 个阿富汗师已被派驻外地，喀布尔实际上已在苏军控制之下。12 月 24 日夜间开始，苏军被大批运进喀布尔，到 26 日，阿富汗的苏军骤增至近万人。为了麻痹阿富汗军队，入侵前几天，在喀布尔北面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苏以“维修检查”为名从阿富汗军官手中“暂时接管”了通讯线路。在一些地方，苏又借口对阿富汗坦克进行装备以适应冬季气候使用，控制了这些坦克，使它们无法抵御苏军侵略。27 日晚 7 时，苏军用炸药炸了阿富汗邮电局，使通讯联络完全停顿。7 点半，苏军分兵三路开始行动，一路直奔广播电台，一路开往革命委员会主席官邸，一路进攻阿明所住的旧王宫“达鲁拉曼”，很快攻破王宫，阿明被击毙。卡尔迈勒随苏军回国，担任了苏联傀儡政府的首脑。

苏联入侵阿富汗是苏争霸全球战略中的重大部署。苏联占领阿富汗就在战略上把它的战略重点欧洲和亚太地区连接起来，使苏联可以把阿富汗作为南下的桥头堡，进而控制从波斯湾通向苏伊士运河、马六甲海峡和好望角的三大航道。波斯湾油田每年有近十亿吨石油通过三大航道运到西方国家和世界各地，这对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是个严重的威胁。

苏联入侵阿富汗是它对外扩张的一次严重升级，它所侵略的对象由过去的“大家庭”成员发展到第三世界的一个不结盟国家。它所采取的手段，由过去的使用雇佣军队发展到自己直接出兵。它所达到的目的，由过去在别国扶植一个亲苏政权发展到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军事占领，并把它作为一个跳板，准备进一步扩张。苏联入侵阿富汗的严重性正是在这里。

苏军入侵后，数以万计的十多支穆斯林武装率先奋起抵抗。许多爱国军官也纷纷倒戈，投向穆斯林游击队。在赫拉特和喀布尔周围地区等地，政府

军同苏联侵略军发生过武装冲突，喀布尔及全国各地不断爆发反侵略示威活动。1981年，阿富汗全国形成多达30—40个抵抗组织，拥有10万人队伍。两年多来打死打伤苏军1万多人，击毁坦克、装甲车辆200多辆，运输车800多辆，火炮100多门。苏军依靠军事上优势地位，对东部、东北和东南地区游击队不断发动大规模进攻和围剿，但都以失败而告终。阿富汗人民的斗争迫使苏军采取守势，龟缩在一些省会、大城市和战略要地。游击队逐步建立起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建立自己的政权。在斗争中，游击队改善了武器装备，缴获了大批武器装备自己，有了高射炮、反坦克火箭筒和少量防空导弹。各派抵抗组织之间的协调和团结有了加强，1980年3月，5个抵抗组织组成了“解放阿富汗伊斯兰联盟”，并派代表出席伊斯兰国家外长会议和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揭露苏联的罪行，宣传阿富汗人民的斗争。1981年6月，这5个抵抗组织和伊斯兰党一起组成“阿富汗圣战者伊斯兰联盟”，在战斗中互相配合。

近几年来，抵抗力量在敌强我弱形势下，坚持斗争，越战越强，队伍不断扩大，装备有较大改善，士气一直高昂，抵抗力量已经基本上控制了农村，建立了许多根据地，他们控制的地区占全国总面积的80%左右，同时加强了对城市的袭扰，尤其对首都喀布尔的袭扰尤为频繁。虽然抵抗力量组织派系林立，但各派之间能够联合对敌，共同斗争。1986年7月，成立了阿富汗北部7省游击队联合抵抗最高指挥部，这是游击队按地区实行联合作战的第一个军事指挥机构。阿富汗抵抗力量在国内外人民支持下，正在团结战斗中前进，不断地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苏联入侵阿富汗后，遭到绝大多数国家的反对。1980年1月，联合国大会举行第6届紧急特别会议，以104票对18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富汗局势及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的决议案，要求苏军立即撤出阿富汗。同年举行的第35届联大再次通过要求苏联撤军的决议案，到目前为止，历届联大都通过了相似的决议。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北欧国家外长会议等国际会议也都发表宣言和决议，谴责苏军侵略阿富汗要求苏联从阿富汗撤军。我国政府于1979年12月30日也发表声明，要求苏联立即停止对阿富汗的侵略，撤出一切武装部队。作为阿富汗邻国，巴基斯坦政府为了谋求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从1982年起派外长与卡尔迈勒政权外长在日内瓦举行了8轮间接会谈，双方只在互不干涉、国际保证和难民遣返三个方面基本达成协议，而撤军问题却悬而未决。

苏军入侵初期，曾打算速战速决，由于阿富汗人民英勇斗争，苏军攻势受挫，虽一再增兵，仍无济于事。苏联在国际上十分孤立，国内也背了包袱，侵略阿富汗6年来，在阿富汗驻军12万人，死伤2万多人，每年耗费20多亿美元，只能控制阿富汗国土20%、人口40%。苏军士气低落，国内也有不满言论和行动。

自1985年以来，苏联大肆宣传它愿意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1986年10

月末前，苏联从阿富汗撤走 8000 名士兵和一些武器装备，还邀请了一些外国记者去参观。国际社会认为，苏联的行动只是一种姿态，其侵占阿富汗基本政策未变。首先，苏军加紧了军事镇压步伐，有时甚至越入巴基斯坦境内追击游击队，并且在军事上对巴基斯坦加大压力。其次，1985 年末改组了卡尔迈勒政权，1986 年 5 月，又让情报局头子纳吉布拉取代卡尔迈勒。

苏联对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表现出积极姿态，主要目的为了缓和来自各方的压力，改善它在第三世界的形象，减轻国际社会对它的谴责，巩固对阿富汗的占领。正如我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 1986 年 7 月 30 日指出的，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关键在于苏联尽快从阿富汗撤军。

(刘士田)

## 10. 两伊战争

1980 年 9 月爆发的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的大规模武装冲突，是一次持续时间很长的战争。它反映了第三世界本身所存在的问题。

两伊长期存在着边界纠纷、民族矛盾和宗教分歧。边界纠纷是历史遗留问题，为此曾导致多次武装冲突。两伊的边界线长达 1280 公里，其中陆地边界长 1100 多公里，基本上是根据 1913 年奥斯曼帝国（当时伊拉克是该帝国的一个行省）同伊朗签订的君士坦丁堡协议确定的。南部长约 100 公里的阿拉伯河是两国的界河，这段边界原以该河伊朗一侧的浅水线为界，河流主权属伊拉克。根据 1914 年双方划界委员会会谈纪要和 1937 年签订的边界条约，双方同意在霍拉姆沙赫尔和阿巴丹两段（共约 11 公里）以该河深水线为界。1969 年，伊朗曾单方面宣布废除 1937 年两国关于阿拉伯河通航的协定，并阵兵伊拉克边界，两伊关系趋于紧张。1975 年 3 月，在阿尔及利亚的斡旋下，两国就边界问题签署了“阿尔及尔协议”，决定在 1913 年君士坦丁堡协议和 1914 年会谈纪要的基础上划定两国陆界，按阿拉伯河主航道中心线划定两国河界，至此两伊关系逐渐缓和。

逊尼派和什叶派是伊斯兰教中的两大派别。伊朗全国 95% 的居民是什叶派教徒；伊拉克的什叶派教徒虽占人口的一半以上，但它却是个由逊尼派掌权的国家。1979 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什叶派领袖霍梅尼上台执政后，主张向全世界“输出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革命”，号召“所有伊斯兰国家……在真主的旗帜下，成立一个大伊斯兰政府，征服全世界”，并公开表示支持伊拉克的什叶派穆斯林“进行伊斯兰革命”，建立“伊斯兰共和国”。霍梅尼发誓要推翻伊拉克萨达姆的复兴党政权，把伊拉克领导人抛进“历史垃圾堆”。伊拉克则支持伊朗的库尔德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自治运动。随着两国政治、宗教矛盾的迅速激化，边境武装冲突也逐渐升级。在两伊关系急剧恶化之际，矛盾又集中到边界问题上来。1980 年 4 月，伊拉克宣称要废除阿尔



及尔协议，收复 1971 年被伊朗占领的位于海湾入口处的三个岛屿。9 月 17 日，萨达姆总统宣布废除阿尔及尔协议，拥有阿拉伯河的全部主权。22 日，伊拉克出兵伊朗，两伊战争全面爆发。

这场战争从 1980 年 9 月爆发到 1983 年初，是伊拉克进攻、伊朗防守和反攻阶段。初期，伊拉克 10 万机械化部队凭借飞机大炮的优势，在近 1000 公里长的战线上攻入伊朗境内，占领了 22000 平方公里的土地。到 1980 年底，伊朗军队不仅挡住了伊拉克的攻势，而且于 1981 年 9 月开始组织反攻。1982 年 5 月 24 日伊朗收复了边界重镇霍拉姆沙赫尔后，两伊战争发生转折，主要战场已从伊朗逐渐转入伊拉克境内。1982 年 6 月，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宣布从伊朗撤回全部军队，随后又单方面宣布停火，并准备在伊拉克根本权利得到承认的基础上同伊朗谈判。但是，伊朗军队却于同年 7 月越过阿拉伯河对伊拉克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作战，伊拉克军队顽强固守，遏阻了伊朗军队的多次进攻。

1983 年 2 月以后，两伊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从 1983 年 2 月至 1984 年 2 月，伊朗先后发动了 6 次代号为“曙光”的攻势。伊拉克军队采取前线固守和袭击后方的战术，挡住了伊朗军队的进攻，并迫使伊朗军队退回巴士拉以东的阵地。双方在绵延 1000 多公里的战线上打打停停，两伊战争转入僵持状态。至此，伊朗占领了伊拉克南部纵深 4—10 公里，面积约 700 平方公里的土地，伊拉克仍占据着伊朗西北部的部分军事要地。

1984 年 5 月以来，战争出现升级趋势。1984 年 10 月，伊朗在距巴格达东北 113 公里的地区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进攻，被伊拉克军队击退，数以万计的伊朗人战死。1986 年 2 月 9 日，伊朗为纪念革命 7 周年，出动 10 万兵力，在南线的阿拉伯河岸和巴士拉以东地区发动了代号为“曙光-8”的大规模进攻，使两伊战争再度升级。两伊为打破欲进不能、欲谈不成的僵局，除进行大规模的地面攻势外，还发动了“油轮战”和“袭城战”等。先是彼此袭击对方的油田设施，以破坏其经济命脉，尔后又大规模地袭击进出对方港口的油船。随着两伊战争的升级，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等支持伊拉克的国家也成了伊朗袭击的目标。与此同时，双方袭击的目标进一步扩大，伊朗曾袭击了包括中国商船在内的外国船只，伊拉克最近在波斯湾还曾误袭了美国护卫舰“斯塔克”号。在“油轮战”中，大量外国船只在海湾地区遭到攻击，仅 1984 年双方袭击并得到证实的油船即达 67 艘。两伊在继续袭击波斯湾油船的同时，开始袭击对方的城市，从而展开了“袭城战”。自 1987 年 1 月 9 日伊朗在南线发动代号“卡尔巴拉-5”的新攻势以来的 22 天里，伊拉克飞机轰炸了伊朗的 28 个城市。2 月 12 日两伊“袭城战”再度升级，12 日至 13 日，伊拉克 8 次空袭德黑兰，这是自两伊开战以来最高的袭城记录。同时，伊朗也向巴格达发射了地对地导弹，并用远程大炮每天向巴士拉等边界城市袭击。持续了近 7 年的两伊战争，目前仍在继续，纵观战局，双方都难于在短期内迅速打败对手取得最后胜利，战争仍将处于僵持状态。

旷日持久的战争，给两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数十万士兵战死疆场，大量石油设施毁于战火，生产急剧下降导致工人大批失业，1986年伊朗有380万人失业，其失业率高达26%。据报道，从1980年9月战争爆发到1985年底，双方军费开支以及石油收入和工业生产方面的损失估计共达4160多亿美元。长期战争使两伊都负债累累。

这场战争使海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由于海湾地区石油资源与苏、美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切身利益直接有关，他们对战争都十分关注。为此，他们通过外交途径积极活动，并以各种渠道向交战双方输送军火，以图形势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海湾地区是苏联南下战略的重要目标，两伊战争发生后，苏联乘机向该地区渗透，并伺机扩张进而实现其迂回包抄西欧的战略。美国也趁机扩大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以抗衡苏联。战争开始后，卡特政府即申明美国派兵到海湾地区不是为了威胁伊拉克和伊朗，而是为了阻止苏联可能入侵这个战略地区。1980年10月在两伊激战时，美国迅速增加它在海湾及其周围的军事力量，其中包括3个航空母舰战斗群，1800名海军陆战队，舰载飞机200架，舰只总数达37艘。此后，美国不断在海湾地区增强军事力量，到1987年12月，美国共有46艘舰只、2.4万人的兵力驻在海湾地区。加上其他西方国家和苏联的军舰，外国在海湾的各类舰只达90多艘。两伊战争不结束，海湾局势难以恢复平静，而且大有国际化的危险。

国际社会始终密切关注两伊战争。1980年9月28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479号决议，要求两伊立即停止进一步使用武力，和平解决争端。伊斯兰会议组织、不结盟运动、阿拉伯联盟等国际组织，也曾进行过多次调解，但迄今为止都未取得成果。伊拉克不断呼吁伊朗响应国际间的和平调解活动，伊朗则坚持停火的3个条件：伊拉克军队全部撤出伊朗；支付1500亿美元的战争赔款；萨达姆下台并作为“战争罪犯”受到惩罚。1987年7月20日，联合国安理会又通过了要求两伊停火的598号决议，接着派秘书长赴两伊调解。伊拉克表示接受决议，伊朗则坚持要首先明确发动战争的责任者，然后才能停火。预计停火难以实现，两伊战争仍将持续下去。

(王义恩)

## 第八章 60年代以来的国际关系

### 1. 东西方关系与柏林危机

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际政治格局出现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局面。由于第三世界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崛起；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分化；由于帝国主义阵营的分裂，国际关系格局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在纵横交叉的复杂格局中，以美苏对立为核心的东西方关系，仍然是国际关系中的要害问题，是世界不安定的主要根源。东西方矛盾是孕育世界战争的主要危险。美苏争夺的重点在欧洲，分别控制着“北约”与“华约”两大军事集团。德国是双方对峙的前沿阵地。德国问题，尤其是柏林问题是东西方关系的集中反映。

1958年11月至1962年末发生的第二次柏林危机，既反映了新形势下东西方关系的特点，也表明了东西方关系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柏林危机发生有着深刻的背景。1954年，由于西欧经济和政治联合的需要，法国最终采取了与西德和解的政策。西德加入北约后，加剧了东西方的对立。1955年7月，美、苏、英、法四国首脑举行了日内瓦会议，德国问题虽是主要议题之一，但未取得任何积极成果。会后，苏联采取重大行动，排除了德国统一的可能性，转而采取两个德国的政策。1955年9月，苏联与西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接着和民主德国签订了两国关系条约，把民主德国当作一个德意志主权国家。1955年5月，华约组织建立。东西方关系进一步紧张。1955年6月，美国和西德签订互助条约，美向西德运送大量武器装备。1956年3月，西德修改宪法，允许政府有“重新武装权”。1957年5月，西德总理阿登纳要求用原子武器武装国防军。美国势力在中欧得到加强，对苏联和东欧形成严重威胁。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混乱。1956年6月，波兰发生动乱；同年10至11月，匈牙利发生了反革命暴乱。苏联企图通过解决柏林问题来稳住对东欧的控制。另外，苏联于1957年8月，成功试射了第一枚洲际导弹，同年10月，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赫鲁晓夫认为美苏之间已出现了利于自己的“导弹差距”，遂开始了一系列冒险行动。

第二次柏林危机始于1958年末。这年11月27日，苏联向西方三国发出照会，提出把西柏林变为“独立政治单位”和“自由城市”。照会称，在以后的六个月中，西方到柏林的通道不作变更，如果在这一期间仍达不成一项协议，苏联将单独和民主德国签订条约，放弃占领权和撤出武装部队。西方国家认为，如果苏联和民主德国签订条约，四国占领柏林的法律地位就会失效，西方国家还将不得不面对承认民主德国这一现实。对此，西方作出强烈反应。美英法三国于12月14日的一项声明中，表示“决心维护它们在柏林的地位和权利以及自由进入柏林的权利”，苏联单方面废除义务以及由苏

占区的德国机构来取代苏联政府是“不能接受的”。北约其他成员国也采取了同样立场。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于1959年1月10日提出召开一次最高级会议研究对德和约问题。美国于2月1日照会苏联政府，提出美国只准备参加外长会议。苏联在回复中重申要举行最高级会议，但让步说，如西方“未准备好参加最高级会议”，苏联同意举行外长会议。后外长会议订于5月10日举行，这表明苏联实际放弃了六个月期限，外长会议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1959年8月3日，美苏宣布两国领导人将进行互访。在赫鲁晓夫访美之前，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出访欧洲，分别会见了法、意、英、西德领导人，向他们说明他邀请苏联领导人不是要举行决定性的会谈，而只是为了试探的目的。1959年9月15日至27日，赫鲁晓夫访美，和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举行了会谈。在会谈中，赫鲁晓夫提出两国从其他国家撤走军队，拆除在外国领土上的军事基地。这意味着要求解散北约和华约组织。美国不肯放弃对西欧的控制权，提出不再继续试验核武器，并建立有效的国际监督，这实际上是要继续保持美国的核优势。会谈未取得进展，但使紧张的柏林危机得到缓解。美苏蜜月十分短暂，1960年5月1日，美U-2飞机在苏联领空被击落，使预定于5月在巴黎举行的美、苏、英、法四国首脑会议搁浅，两国关系又趋紧张。

进入1961年，柏林危机再度激化。1960年，民主德国有二十万人逃往西方，其中十五万人通过西柏林这一途径。1961年1月至2月，民主德国外逃人数超过三万；3月至4月，外逃人数达四万。外逃人数的剧增使民主德国经济处于困难局面。1961年6月，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在维也纳举行会晤，讨论了西柏林、裁军和两国关系等问题。赫鲁晓夫提出，除非在12月份就德国问题提出一项可行的条约，否则苏联就单独和民主德国签订和约，使柏林成为非军事化的自由城市。上述建议被西方称之为赫鲁晓夫的第二次最后通牒。肯尼迪对赫鲁晓夫建议的答复是：“那将是一个寒冷的冬天”。维也纳会议后，苏联决心和美国一比高低。7月，苏宣布停止红军复员，并增拨军费三十亿卢布。肯尼迪返回美国后即大力推行新的军备计划，并征召二十五万后备役军人。

1961年8月，双方开始摊牌。8月13日，适逢星期日，民主德国在西柏林工作的五万人回东柏林度假。民主德国在这一天沿东西柏林交界处筑起柏林墙，封锁了东西柏林交通，切断人员往来。此后，苏联继续向美国施加压力。赫鲁晓夫对来访的美国记者苏兹贝格说，他准备和肯尼迪建立个人接触，但必须以签订对德和约和柏林作为自由城市为前提。美驻苏大使认为赫鲁晓夫的这番话“意味着战争”。美国的态度也日渐强硬。8月18日，美国派1,500人的战斗部队由西德沿高速公路开赴西柏林，并派副总统约翰逊和克莱上将去西柏林打气。10月25日，两名身着文职人员制服的美国官员因为拒绝向民主德国警卫出示证件而被拒绝进入东柏林。这时，克莱将军决心以武力显示西方国家在柏林城的“占领权利”，他派出一支全副武装的分

队开赴柏林墙关卡，东柏林苏军也采取了同样行动。双方坦克在相距几十米的地方炮口对准对方。一时剑拔弩张，空气十分紧张。与此同时，两国又恢复了核试验，并进行了美苏核军备竞赛史上最密集的核爆炸。1961年至1962年期间，苏联共进行了七十四次核试验，比1949至1958年核试验总数（五十九）多十五次。美国在此期间共进行了九十七次核试验。双方炫耀武力，加紧进行精神战，使柏林危机达到高潮。

1962年，苏联改变战略，在柏林危机中引而不发，改而在加勒比海地区做文章，企图在加勒比海羞辱美国，使美国在柏林问题上让步。这种政策不久便导致了古巴导弹危机。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失败后，历时四年的柏林危机随之结束。

苏联在冒险政策遭到挫折和“导弹差距”的幻觉破灭后，开始寻求与美国和解。美国由于正在亚洲和中东地区推行侵略扩张政策，也不愿意再次和苏联进行尖锐对抗。两国遂在柏林危机后由全面对抗迅速走向全面和解和勾结，长期严峻对立的冷战局面有所缓和。1963年，两国签署了第一个核军备控制的双边协定——热线协定，接着又签订了维护核大国垄断地位的部分核禁试协定。柏林危机的结束也使东西德国分裂固定化。进入60年代中期后，西德旨在吞并民主德国的“东方政策”逐渐为以与东欧国家关系正常化为内容的“新东方政策”所替代。1971年9月3日，美、苏、英、法四国终于签订了“西柏林协定”。在协定中，苏联不再坚持取消西方国家在西柏林的占领制度，表示不再对西柏林进行限制和封锁。协定还规定西柏林不是西德的一部分，今后也不属西德管辖，但西德“缔结的国际协定和协议根据规定的手续可扩大应用于柏林西区”，西德“可以在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上代表柏林西区的利益”。1972年11月8日，东西德签署两德国关系基础条约。自此，战后使东西方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的德国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顾德欣）

## 2. 古巴危机与苏美关系

古巴危机亦称古巴导弹危机或加勒比海危机。1959年1月，古巴革命成功，美国为推翻古巴革命政权，于1961年4月17日，组织由古巴流亡分子组成的雇佣军在吉隆滩登陆入侵，结果遭到惨败。古巴政府为反对美国的威胁，进一步接近苏联。苏联力图通过援助全面控制古巴，使革命的古巴成为它与美国进行政治交易的筹码。赫鲁晓夫在第二次柏林危机中没有达到目的，他想通过在古巴部署导弹来增强苏联对美国的战略地位，为解决柏林问题向美国施加压力。1962年7月，古巴副总理劳尔·卡斯特罗访问苏联后，赫鲁晓夫以援助和保卫古巴为名，开始秘密地向古巴运送导弹和武装人员。

8月29日，美国U-2飞机在古巴西部上空拍照，发现地面有苏联建立

的萨姆导弹发射场。9月2日，苏联宣布已达成向古巴供应武器和提供技术专家的协定。4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发表声明说，美国不会容忍将进攻性的武器引入古巴，“如果确实是有这类武器，那就会出现最严重的问题了”。10月15日，美国发现了第一个苏联中程导弹基地的形迹。16日，肯尼迪组成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会，连续开会分析苏联意图，研究对策方案，进行军事行动部署。肯尼迪认为，如果苏联的行动得逞，美苏之间的力量对比就会改变，美国就会面对一个威胁性的既成事实。肯尼迪最后决定从封锁着手，但不排除以后升级为空袭或入侵。在此期间，苏联在古巴的中程导弹发射场迅速增加到六个，而赫鲁晓夫10月16日在莫斯科接见美国驻苏大使时仍否认古巴有进攻性导弹。肯尼迪在加紧调兵遣将的同时，照常参加国会竞选活动和外交活动，对在古巴的新发现秘而不宣。

10月22日晚七时，肯尼迪向全国发表《国家处于最紧急状态》的电视演说，公布了苏联在古巴构筑中程导弹发射场的秘密，提出了对古巴实行海上“隔离”等七项初步措施，要求苏联停止向古巴运送并撤走在那里的进攻性武器，接受联合国的就地视察。肯尼迪最后声色俱厉地说：“我们决不会选择投降或屈服的道路！”美苏对抗进一步加剧了。23日，美国政府公布了《禁止将进攻性武器运往古巴的公告》，24日上午十时公告生效，美国出动了183艘各种军舰封锁古巴海面，美国全部武装部队和海外驻军都程度不同地进入了戒备状态。美国迅速而强硬的行动弄得苏联措手不及。苏联政府于23日发表声明，指责美国的封锁是“海盗行为”，拒绝接受美国的条件。赫鲁晓夫在慌乱中连续于23日和24日给肯尼迪去信，信中未提在古巴的导弹问题，而要求举行苏美最高级会谈，以缓和紧张局势。肯尼迪两次当即回信，重申原来的立场，不同意举行最高级会谈。在美国的压力下，26日，赫鲁晓夫在给肯尼迪的一封私人信件中含糊地表示：假如美国同意不入侵古巴，他愿意在联合国的检查下把那些导弹撤走。27日情况又发生很大变化，当天上午，肯尼迪的安全班子开会草拟复信时，接到了赫鲁晓夫的一封公开信。这封信对前一天的信只字未提，而苏联撤走在古巴的导弹的条件却提高了——美国还必须撤走设在土耳其的丘辟特导弹。美国侦察机拍的最新照片表明，古巴的导弹发射场工程正在加速进行。美国的一架U-2飞机在古巴上空被萨姆导弹击落，驾驶员被击毙，另两架低空侦察机遭到地面炮火的袭击。在阿拉斯加上空飞行的一架美国U-2飞机误入苏联领空，返回时招来了一群苏联战斗机。这天空气十分紧张，危机达到了顶点，核战争的爆发比核时代的任何时候都更为接近。当天下午，肯尼迪发信赫鲁晓夫，对他当天的公开信避而不谈，对其前一天的私人信件，则按照美国政府的需要加以理解，然后给予肯定。与此同时，肯尼迪总统又派他弟弟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去苏联驻美使馆，将复信的附件面交多勃雷宁大使，并传话说：事态即将升级，除非总统立即收到通知说这些导弹将被撤走。还说：肯尼迪总统早就急切地想把在土耳其的导弹撤走，但是，美国不能在威胁的压力下作出撤走在土耳其

其的导弹的决定。

在美国的诱迫下，赫鲁晓夫 28 日复信肯尼迪，全部接受对方提出的条件，说他已经下令停止导弹基地的工程，导弹正在撤出，准许就地视察。肯尼迪对此感到“非常满意”，当天上午发表简短声明，欢迎赫鲁晓夫的“具有政治家风度的决定”。11 月 8 日至 11 日，苏联撤走了在古巴的四十二枚中程导弹。由于古巴政府反对就地视察，装运导弹和设备的苏联船只，在加勒比海上接受了美国海军和空军的计数、检查和途中的跟踪。11 月 20 日，肯尼迪对新闻界宣布：苏联在古巴的伊尔—28 轰炸机将在三十天内撤走，苏联在古巴的战斗人员也将在“适当时间内”撤走，“隔离”工作完结。古巴危机至此结束。

历时近三个月的古巴危机，对后来的国际局势产生了深刻影响。此后，苏联下决心全力发展导弹核武器和海军，到 60 年代末，基本上取得了同美国势均力敌的地位。古巴危机使美苏双方看到了他们之间的直接对抗将带来相互毁灭的严重后果，因此，他们在以后的争夺中，在涉及对方的切身利益时，彼此都有所克制，尽量避免迎头相撞。古巴危机后，苏联对外政策目标的轻重缓急次序有了较大的调整。苏联与美国在柏林和德国等问题上的争斗相对有了缓和。

随着美苏关系的缓和，双方都调整其全球战略。特别是到了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美国由战略攻势逐步转化为守势。苏联则在缓和的旗帜下，加强了战略攻势。70 年代中期形成了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进入 80 年代后，又呈现出互有攻守的僵持局面。

（彭瑞廷）

### 3. 美苏核均势与核军备控制谈判

核军备竞赛是美苏争夺世界霸权的重要手段。60 年代前是美国掌握核垄断与核优势的时期，60 年代以来美苏之间出现核均势，并展开激烈对抗。不论在前期还是后期，美苏有关核军备控制的谈判，却一直时断时续地在进行。谈判不是为了寻求裁减核军备的有效途径，而是试图控制核军备竞赛的进程，使之利于自己并限制对方。美苏在不同谈判时期追求的主要谈判目标有所不同，但维持或争夺核优势的实质始终没有变化。

在美国掌握核垄断和核优势时期（1945—1962），美苏核军备控制谈判的主要目标是寻求宣传利益。美国企图欺骗世界舆论，树立和平形象，以掩盖其推行冷战政策的侵略本质。苏联意在揭露美国，澄清是非，反击美国的侵略扩张政策。斗争的实质是保持还是打破美国的核垄断与核优势。在这一时期，美苏在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1946—1949）和联合国裁军委员会（1952—1959）内进行了两场马拉松式的核军备控制谈判。在此期间，美苏均提了

两个有代表性的建议。美国于 1946 年初提出“巴鲁克计划”，要求将所有原子武器和原子能材料控制在美国手里，这一计划为苏联所拒绝，美国借此大造舆论，宣传自己的“和平诚意”。1955 年美国总统一艾森豪威尔在日内瓦会议上提出损害苏联和东欧国家主权的“开放天空”计划，要求东西方国家提交所有军事设施蓝图并“开放天空”，在本国国土上给予对方飞机进行空中侦察的各种便利。这个计划提出的目的在于使苏联难堪，使美国获取政治上和宣传上的利益。苏联第一个代表性建议是 1946 年 9 月提出的全面裁军计划，此建议要求全面禁止核武器。当时，美国掌握核垄断，它既不会全部、也不会部分禁止或销毁核武器。苏联提出建议的目的在于打出全面裁军的旗帜，揭下美国的和平假面具。苏联另一个代表性建议是“腊帕茨基”计划，此计划是在苏联支持下由波兰外长于 1957 年提出来的，目的在于揭露美国企图把原子武器引入中欧的侵略政策。在以后几年中，波兰三次重申了此计划，连续向美国发动和平攻势。与此同时，美苏加快了核军备发展的进程。1949 年苏联打破美国的核垄断后，两国核竞赛转入到扩大核弹头当量领域，1952 年和 1953 年，美苏先后爆炸了氢弹。50 年代中期，两国又转入核武器运载工具的竞赛，1957 年末和 1958 年初，苏美先后试制成功洲际导弹。

在维持核均势时期（1963—1979），美苏核军备控制谈判目标是制订双方可以遵循的维持核均势规范。美苏在这一期间寻求两类规范：一是共同限制别国，维持核大国的核垄断和核优势地位；二是彼此限制对方，维持双方核均势。1963 年的“部分核禁试条约”和 1968 年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美苏寻求第一类规范的产物，两次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是寻求第二类规范的产物。1963 年 7 月 25 日，美英苏三家代表在莫斯科签署了“部分核禁试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是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同时也禁止在爆炸后产生的放射性尘埃出现于其管辖或控制下进行这种爆炸的国家领土以外的核爆炸。当时美苏已进行了长达十余年，计三百三十六次大气层试验，两国技术均达到基本不需要这类试验的水平，而其他国家如不进行这类试验，则因无法改进技术而不能直接进行地下核试验，因此这项条约的目的在于限制他国（中国和法国），维持核大国的垄断地位。在美苏支持下，联合国于 1968 年 8 月通过“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此条约对无核国家作了严格规定和限制，对危及世界和平的核大国的核军备竞赛却未作任何规定，因此这是一个不平等的歧视性条约。

此后，双方开始寻求彼此限制对方，维持核均势的第二类规范。1969 年 11 月至 1972 年 5 月，双方进行了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SALT—I），最后缔结了关于反弹道导弹条约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临时协定等一系列条约和协定。临时协定规定从 1972 年 7 月起冻结双方洲际导弹数目，还规定了双方拥有潜射导弹和核潜艇数目。协定较严格地规定了两国核军备发展规范：在陆基导弹方面，美国已有数和限制数均为 1,054 件；苏联已有数和限制数分别为 1,398 件和 1,618 件。在潜射导弹方面，美国已有数和限



制数分别为 656 件和 710 件；苏联已有数为 456 件，限制数为 950 件。

为了较为长期地制订限制对方、维持均势的规范，美苏于 1972 年 11 月至 1979 年 6 月进行了长达七年之久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SALT—II），最后签订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由于 1972 年以来苏联在分导多弹头导弹方面的发展，“条约”规定双方战略武器总限额均为 2,250 件。在此限额内，还规定了四个分项限额；分导多弹头运载工具不得超过 1,320 件，分导多弹头洲际导弹和潜射导弹不超过 1,200 件，多弹头洲际导弹不超过 820 件，重型洲际导弹不超过 308 件。此条约使双方的战略均势达到更高水平。

美苏迄今共签订了十七个多边或双边核军备控制条约或协定，其中十六个是在这一时期签订的。美苏寻求规范利益的实质是为了寻求利于自身的发展，寻求自身优势。核均势同传统的欧洲均势不同，核均势主要表现在受到对方核打击后仍有进行全面核报复并使对方遭受毁灭性打击的能力。建筑在使对方能够进行核报复“恐怖”基础上的平衡，即“恐怖平衡”，是“核均势”的重要特征。“恐怖平衡”所产生的不安全感以及美苏争霸野心，会迫使双方继续寻求核优势。

80 年代是美苏核军备谈判的激烈对抗时期。70 年代末，美国逐渐从侵越战争失败和国内政治创伤打击下恢复过来。面对苏联核武器质量的迅速改进和发展，美国开始进行战略调整，里根上台后，这一调整基本完成。美国调整后的核战略内容主要是重建对苏核优势，以强硬的姿态和灵活的手段与苏联争夺核优势与世界霸权。在这种战略指导下，美国增拨大量军费，全力推行战略武器现代化计划与战略防御计划。苏联由于正处于利用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从数量和质量上发展自己战略武器的过渡期，又由于国内政治和经济困难，故力争在近期避免不利于自己的核对抗，但苏联并没有放弃谋求核优势的意图，也增拨了大量军费，加紧外空武器研究。美苏大力发展核武器和外空武器，使 80 年代美苏核军备控制处在一个激烈、严峻的对抗时期。双方在这一时期核军备控制谈判的主要目标是寻求优势利益。

这一时期双方有两场重要谈判，一场是欧洲中程武器会谈，一场是一揽子核军备控制谈判。欧洲中程武器会谈始于 1981 年 11 月，终于 1983 年 11 月，双方都想通过这场谈判来确定自己的欧洲中程武器优势。在谈判中，美国的代表性建议是“零点方案”，此方案要求苏拆除全部 SS—20 和 SS—5 陆基中程导弹，在这一前提下，美国不在欧洲部署新式中程武器。当时，苏联已在欧洲部分部署此类武器 800 件，其中 SS—20 160 件。此方案要取消苏联已经取得的欧洲中程武器，苏联当然不能接受。事实上，美国提出这一建议的真实意图是寻找充足的借口使自己能据 1979 年北约理事会双重决议部署 572 件新式中程武器。苏联的代表性建议是“冻结方案”，目的是要求美国承认欧洲中程武器优势现状。双方对立的立场使这场谈判破裂，这是自从 1963 年以来美苏第一次完全失败的核军备控制谈判。

1985年3月至今，美苏又进行了一揽子核军备控制谈判，在谈判期间，美苏首脑进行了日内瓦与冰岛两次会晤。在一揽子核军备控制谈判中，焦点是外空武器问题。美国总统里根于1983年3月提出战略防御倡议，拟在本世纪前部署多层次综合防御系统。美国企图以此置苏联于战略被动地位，使自己取得全面核优势。苏联虽研制太空武器起步较早并在某些项目上处于领先地位，但在通讯、管理、指挥系统方面落后于美国。在一场新的外空武器竞赛中，由于美国具有资金和技术优势，苏联在短期内很难处于有利地位。因此，苏联参加一揽子谈判的目标是阻止美国实施战略防御计划。这场谈判的实质是美国谋求外空武器优势和苏联阻止美国取得这种优势之争。在一揽子谈判中，最重要的谈判是1986年10月的冰岛首脑会晤。在这次会晤中，苏联在不影响自己陆基导弹优势的情况下，在战略武器和中程武器问题上做了让步，诸如同意双方把战略武器削减50%，美国“前沿基地系统”不计入战略武器限额，建议彻底销毁美苏在欧洲的中程武器等。苏联做出让步是要换取美国在外空武器上让步，苏联提出，美国在十年内只能在实验室内进行战略防御系统研究。美国坚持有在空间进行各种试验的权利。双方在战略防御计划这个谈判焦点上，没有共同语言，双方在会谈中无法解开这个死结。今后，双方可能就战略武器和中程武器达成协议，但在外空武器问题上的斗争将会长期存在下去。

（顾德欣）

#### 4. 联合国的发展和变化

联合国是国际政治斗争的舞台，国际关系的变化往往能在联合国中得到反映。由于第三世界的兴起，一大批中小国家加入联合国，从而使联合国的成分发生变化。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是51个，1946年至1949年接纳了32个新会员国，其中半数以上是亚非拉国家。60年代接纳了43个，全部是第三世界国家。70年代，民族独立运动的浪潮从亚非拉波及到大洋洲的斐济、西萨摩亚等国，1970年至1980年接纳的33个新会员国中，除两个德国外，都是第三世界国家。到1985年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时，共有会员国159个，第三世界国家占2/3，占有明显的优势。1961年后联合国的三任秘书长是吴丹（缅甸人，1961—1971）、瓦尔德海姆（奥地利人，1972—1981）、德奎利亚尔（秘鲁人，1982年任职）。其中两位是来自第三世界国家。

随着联合国成份的变化，第三世界国家在联合国中的作用显著加强。1960年12月第十五届联大以压倒多数通过了43个亚非国家倡议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要求“迅速和无条件地结束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及其一切表现”。1961年第十六届联大还成立了“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来实现这一宣言。到60年代末，联合国托管下的11处领土，除美国托管的

太平洋群岛外，都获得独立。受联合国关注的 74 处非自治领土也纷纷独立。南非统治下的西南非洲拒绝联合国监督，1966 年联大决议终止南非的委任统治权，声明由联合国管理。1968 年按该地人民的愿望更名为纳米比亚。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是联合国发生变化的另一重要表现。

早在 1949 年 10 月，毛主席就宣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1950 年 1 月，周恩来外长又发表严正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代表留在联合国安理会是非法的，并主张将其从安全理事会开除出去。”在 50 年代，美国以时机不宜为借口，阻止把中国代表权问题列入议程。60 年代，美国又把恢复我合法权利的问题列为需 2/3 多数通过的“重要问题”。到 1971 年，美国除抛出一个“重要问题”提案外，还提出一个“双重代表权”提案，企图继续制造“两个中国”。但是，到了 70 年代，大国强权政治毕竟已无法阻挡历史的前进。1971 年 10 月 25 日，第 26 届联大以 76 票赞成、35 票反对、17 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 23 国要求恢复我在联合国合法权利，并立即驱逐蒋帮的提案。这一事实有力地说明了联合国内部力量对比的变化，说明大国任意摆布小国的局面已一去不复返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在联合国庄严宣布，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属于第三世界。

由于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努力，使联合国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不断加强。他们以联合国为阵地，开展打破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维护民族权益的斗争。1964 年在日内瓦召开了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简称贸发会议）上，亚非拉（还有南斯拉夫）77 个国家组成“七十七国集团”（不久就发展为 125 个），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斗争。1974 年联合国又根据第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的建议，召开了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通过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两个文件。后来通过的《国际法原则宣言》、《海洋法公约草案》等文件也都反映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愿望。

70 年代后，第三世界国家冲破大国的阻挠，使联大通过了一系列有利于反对侵略、维护世界和平、反对种族主义的提案。如关于同南罗得西亚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断绝一切关系；关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获得联合国观察员地位；关于宣布以色列为“种族主义”；关于终止南非种族主义当局出席联大的资格、并制裁南非等提案。1979 年第 34 届联大以 91 票对 21 票的压倒多数通过决议，谴责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要求外国军队撤出柬埔寨的提案。1980 年 1 月特别联大紧急会议又以 104 票对 18 票的绝对多数通过要求苏军撤出阿富汗的决议，使侵略者受到了巨大的政治压力。联合国还日益成为中小国家伸张国际正义的讲坛。

总之，在联合国四十多年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虽然有过严重的失误，但

总的来看，由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努力，它在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外国军事侵略和占领；促进国际经济、技术和文化合作；推动改革不公正的国际经济关系；维护人权、妇女地位和社会福利；解决人口、粮食问题；防止犯罪等各个方面，作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它的积极作用是应该充分肯定的。还应该指出的是，由于某些大国不能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甚至不惜为了一己私利而滥用否决权，这就使得联合国的局限性还将继续存在下去。可以预见，未来联合国的发展道路仍将是十分曲折的。

（黄若迟）

## 5. 南南合作与南北对话

促进经济发展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独立之后所面临的紧迫任务，也是一个全球性的战略问题。发展中国家从 60 年代起积极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而斗争，使发展问题引起全世界人民的关注。联合国努力促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对话，以求问题有所解决。

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大都位于南半球，发达的工业国家多半位于北半球，因此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谈判，便被称为“南北对话”或“南北谈判”，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被称为“南南合作”。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大都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不少国家还很贫穷，而发达国家都是世界上较为富裕的国家，所以“南”和“北”的关系体现了战后直至目前世界上一直存在的“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关系。

世界划分成“南方”和“北方”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在历史上，南方国家大多曾是北方国家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在漫长的殖民时代，由于殖民者按照自己的需要强加于殖民地的不平等分工，使殖民地经济结构畸型化，成为宗主国的农业附庸和原料基地，经济上的严重依附便构成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关系的主要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殖民地先后摆脱宗主国的统治，成为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他们的国民经济发展不断加快，尤其是六七十年代，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的平均增长速度超过了发达国家。然而，由于长期形成的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内部经济结构单一化，工农业落后，不少国家的国民经济部门严重依靠对外贸易来运转，以出口原料和经济作物向发达国家换取工业制成品和粮食。至今，占世界人口 76% 的发展中国家，仅拥有资本主义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 20%，而发达国家人口占 24%，国民生产总值却占 80%。“穷国”与“富国”间的差距非但没有缩小，还有扩大之势。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也离不开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所需石油的 75%、主要农业经济产品和矿产原料的 60%，要依靠发展中国家供应，而且发展中国家也是发达国家工业制成品的

主要销售市场。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与稳定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联系愈来愈紧密，据估计，发展中国家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每下降 3%，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增长速度便要下降 1%。60 年代以来，随着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政治地位的不断提高，他们纷纷要求改变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多数发达国家也意识到改善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关系对其自身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1961 年，不结盟国家第一次首脑会议便呼吁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合作，要求废除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交换，稳定原料和初级产品的价格。1964 年 3 月第一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提出改变国际贸易格局的主张，要求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增加进口，订立国际商品协定以稳定原料出口价格，实行单方面关税优惠等，并要求发达国家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和贷款，以改善他们的贸易条件。同年六月，在第一届贸发会议上联合行动的发展中国家发表了《七十七国联合宣言》，主张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从而组成“七十七国集团”，它标志着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领域斗争中由分散走向联合。

70 年代初爆发的石油危机震惊了全球。1973 年，石油输出国组织取得提高石油价格的胜利（即“石油武器”），使全世界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不容忽视，从而促进了南北对话的开始，揭开了在国际经济领域破旧立新的序幕。1974 年 4 月第六届特别联大通过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第一次鲜明地树起了改革旧的国际经济关系，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旗帜。这场斗争的基本内容是：第一，维护国家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反对跨国公司的控制和掠夺；第二，改革旧的国际商品贸易制度，开展国际贸易领域的反剥削、反垄断、反转嫁危机的斗争；第三，改革旧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减、免、缓发展中国家沉重的债务负担；第四，反对帝国主义的技术垄断，争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技术转让；第五，加强国际经济结构改革，提高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生产贸易中的地位；第六，加强南南经济合作，以集体自力更生推动民族经济发展。

特别联大的呼吁得到法国等西方国家的响应，建议通过“南北对话”来代替“南北对抗”。1975 年 12 月，由法国总统德斯坦倡议，在巴黎召开有 19 个发展中国家、7 个工业国家以及欧洲共同体参加的“关于合作与发展的国际会议”。这是第一次全球性的“南北对话”会议。1977 年 5 月，该会议在巴黎再次举行，前后继续了将近两年。由于工业国家只顾商讨他们极为关心的石油问题，双方在不少重大问题上分歧重重，会议没有取得多大成果。

尽管世界性的“南北对话”未能取得进展，然而在 70 年代中，发展中国家在各种国际会议和组织中，与工业国家展开各种谈判，在某些局部的合作中取得了一定成效。欧洲共同体国家与非洲、加勒比、太平洋地区国家先后签订的三个“洛美协定”便是一个实例。1975 年 2 月 28 日，欧洲共同体九国同非加太地区四十六国的代表在多哥首都洛美签署了第一个《洛美协定》，并于 1979 年 10 月 31 日和 1984 年 12 月 8 日又两次续订，最后参加

签署的共同体成员国增加为十国，非加太国家增至六十五国。第一个《洛美协定》规定，非加太国家出口的全部工业品和 95% 的农产品可以不受限制地免税进入共同体市场，共同体国家的商品进入非加太国家享受最惠国待遇。协定制订了“稳定出口收入制度”，非加太国家的主要农矿产品因跌价或灾害所遭受的出口收入损失，由共同体给予补偿。协定还规定，共同体在五年内向非加太国家提供四十六亿五千万美元的财政援助。后两项协定的主要内容则是扩大上述条款的应用范围，增加共同体对非加太国家的财政援助等等。《洛美协定》的制订和实施，体现了“南北对话”与合作的发展。

为了进一步推动“南北对话”，发展中国家于 1979 年提出在联合国范围内发动一轮新的全球性谈判，全面综合地讨论南北经济关系。1981 年 10 月，在墨西哥和奥地利等十一国的倡议下，在墨西哥坎昆城举行了“关于合作与发展”的国际会议。这是第一次“南北对话”的最高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十四个发展中国家和八个发达国家的首脑，他们就南北关系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会议肯定了早日举行全球谈判的必要性。但是由于美国的反对，会议未取得预期的效果。

80 年代以来，西方发生严重经济危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形势急剧恶化。由于美国等国推行高利率使负债最高的拉美国家爆发债务危机；国际石油市场的供过于求使油价下跌；以美国为代表的少数发达国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压低原料价格和高利率等政策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与困难，使发展中国家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南北对话陷入僵局。发展中国家在斗争中认识到，要推动南北谈判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首先要立足于自力更生，改革本国旧的经济结构，加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从内部寻找动力并最后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赖。所以，自 80 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开始逐步转向加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贸易和经济合作。

1979 年 2 月，“七十七国集团”在“阿鲁沙”会议上通过了《争取集体自力更生和关于谈判的纲要的阿鲁沙纲领》，它将不结盟国家在 1970 年卢萨卡会议上首次提出的“集体自力更生”的主张正式确立为“南南合作”的指导性纲领。1981 年 5 月，“七十七国集团”的加拉加斯会议通过了《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的行动纲领》（即加拉加斯行动纲领），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在贸易、技术、农业、能源和财政等方面加强合作的具体方案和措施。1982 年 2 月，包括中国在内的四十多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在新德里举行会议，称之为“新德里磋商”。会议讨论了如何促进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以及协调发展中国家关于南北关系的立场问题。1983 年第七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通过的《经济宣言》和《经济合作行动纲领》又提出一系列加强合作的具体措施。

80 年代“南南合作”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各类合作组织不断发展壮大。至 1984 年底，发展中国家已建立区域性、半区域性组织近三十个，原料生产和输出国组织三十多个，货币金融组织近二十个，这些组织的参加国约占

发展中国家总数的 70% 以上。合作的形式更加灵活、多样，不仅有贸易、金融、合资经营、劳务等方面的合作，而且在技术合作方面，也出现了职业培训、提供专家、技术转让；在金融方面，发展中国家正积极筹建南方银行等等。同时，“南南合作”已显示出从区域性合作向全球合作发展的趋势。“南南合作”取得的成就日益显著，1970 年至 1980 年发展中国家内部贸易年平均增长率达 30%，在世界贸易中心所占比重从 3.5% 提高到 7.5%；1973 年至 1981 年间，石油输出国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官方财政援助达 710 亿美元。此外在农业、能源等合作方面也取得很大进展。

“南南合作”还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比如，有些发展中国家间存在领土纠纷、民族矛盾或宗教差异等，影响合作的发展。但是“南南合作”符合世界发展的趋势，它必将在斗争中不断巩固、前进，有力地推动南北对话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郝克露）

## 6. 世界人民争取持久和平的斗争

战争与和平问题，直接关系到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历来就是国际政治的重大问题，防止战争、维护和平是世界各国人民长期为之奋斗的崇高目标，也是当今世界全球性的两大战略问题之一。战后四十多年，全球性的和平局面虽然得以维持，但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性依然存在。战后发生的近 200 起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使许多国家和地区战火依旧，动乱频仍。特别是核大战的阴影始终笼罩着战后的国际形势。人类面临的战争威胁不仅没有减轻，反而在继续增长。

战后初期，世界和平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它凭借着在战争中迅速膨胀起来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以及对原子弹所占有的垄断地位，登上了资本主义霸主的宝座，并急于称霸全世界。“冷战”政策的出笼，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相继爆发，遍布世界的军事基地和军事集团的建立，使国际局势骤然紧张。美国取代战败的德、日、意法西斯成为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苏联战后也是大国，曾经是保卫世界和平的主要力量。但是，随着苏联经济、军事实力的增强，它成为另一个超级大国，推行霸权主义政策，逐步走上了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至此，美苏争霸就成为对当今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两个超级大国对世界霸权的争夺遍及全球各个角落，他们在欧洲各自控制着庞大的军事集团，集结重兵，部署和不断更新各种武器装备，剑拔弩张地相互对峙，使欧洲形势持续紧张。与此同时，他们在第三世界各地展开对战略资源、战略要地、战略通道的激烈争夺，形成当今国际局势中的许多“热点”。更具威胁的是，美苏各自以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军费开支，建立起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常规武器库和核武器库，双方所拥有的核打主力

量，占到世界核武器总数的 97%，早已达到超饱和、超杀伤的地步，足以将地球毁灭许多次。进入 80 年代以来，双方争夺进一步加剧，里根政府在全面振兴美国实力的同时，以强硬姿态同苏联展开全面对抗，双方争夺的领域从陆地、海洋、天空一直扩展到外层空间，两个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使战争因素在发展。但是，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战后世界历史的发展说明，如果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那么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我们对世界和平的前景持乐观态度的依据是：

首先，反对战争、维护和平已经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在有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和对核武器的危害有了充分认识之后，世界各国人民，包括美苏两国人民的和平意识深入人心。由人民群众直接发动的反战和平运动高潮迭起，其规模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1981 年、1983 年、1986 年出现了三次大的高涨。这种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肤色、年龄、职业，也不论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政治观点、意识形态而共同进行的斗争，表达了全体人民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真诚愿望，反映了世界范围的人心向背，是制约战争的真正强大的“威慑力量”。

其次，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发展民族经济，繁荣世界经济已经成为一股强大的世界性潮流。发展需要和平，事物的这种内在逻辑推动着各国政府和人民积极投身于维护和平的事业。广大发展中国家虽然取得政治独立，但尚未摆脱贫困落后的状态，许多国家仍然面临着粮食匮乏、资金短缺、能源枯竭、债务沉重、贸易条件恶化的重重危机。70 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济长期处于停滞或低速增长的困境，苦于高赤字、高利率、高失业的困扰，也面临着再发展的任务。而社会主义国家一般都处在他们发展的初级阶段，如果不加快自身经济发展，就无从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特别是面临科技领域中出现的新的革命，如果不抓住机会、迎接挑战，就会在当前和未来的竞争中落伍或被甩得更远。这种形势不仅适用于世界上广大的中小国家，同样也适用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因此，发展经济几乎成为世界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各类国家所共同关注的中心任务。要发展就必须争得一个和平建设的国际环境；要发展就必须把有限的资金投入经济文化建设，而不是用于扩军备战；要发展就必须加强对外经济和文化联系，缓和地区和国际紧张局势。所有这一切就汇聚成一股维护世界和平的强大潮流，制约着战争因素的增长。

再次，第三世界的崛起和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关系格局和力量对比。第三世界的历史地位和当前维护国家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任务，决定了他们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最可靠、最基本的力量。第三世界有近 130 多个国家，拥有 30 多亿人口，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利用自己丰富的资源，扼守许多战略要地和战略通道，作为反霸斗争的强有力的手段。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和政治团



结，尽管波折较多，但总的趋势是日益发展并多次挫败了霸权主义的阴谋。如拉美孔塔多拉集团对中美洲冲突的斡旋，阿拉伯国家对两伊战争的调停，东盟国家对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努力，使“热点”地区的紧张局势有所缓和，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社会主义中国做为第三世界的一员，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改革开放、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发展友好往来的方针，在稳定亚太局势、维护全球和平的斗争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此外，发达国家的大多数，东西欧各国与日本都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尽管他们都在两个集团政治中，但他们也是不愿意打仗的。目前他们又都处在两强相争的夹缝之中，日益增长着共同的危机感。他们强烈要求美苏坐下来谈判，削减双方部署在欧洲和世界各地的核武器，敦促美苏率先大幅度裁减军备。同时，他们又都不断地发展着同美苏的离心倾向，走中立自保、联合自强的道路。他们谋求东西欧的缓和，并积极推进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对话与合作，在缓和东西、南北关系和国际紧张局势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除了表现为世界各国人民为和平事业所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斗争外，还包括世界战略格局向多极化的演变和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相互渗透趋势的发展。世界政治和战略格局经过 60 年代的动荡、分化和改组，呈现出了三个世界的划分、五大力量中心和大三角关系这样一些多层次、多侧面、多角度的多极化政治局面。世界战略格局的这种多极化趋势，从根本上来说，是世界各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产物，又是作为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它大大削弱了两霸对世界事务的影响和控制，推动了国际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增强了国际角逐中的平衡与缓冲因素，有利于世界局势的稳定和世界和平的维护。与此同时，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的日益深化，已成为当代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和制约战争的重要因素。战后生产国际化的发展，国际分工的加深，使整个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造成了经济利益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国与国之间经济调节机制的日益完善，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可能加强政治上的协调性，减少了经济危机转化为政治危机并导致彼此间战争的可能性。同时，在广泛参与国际分工基础上各国经济联系的加强，使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增加了。国际经济相互依存和一体化趋势已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之争，成为不可逆转的世界性潮流，并对国际政治、世界和平的形势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美苏军备竞赛的确有把世界拖入一场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險。但是，由于他们双方都拥有“确保相互摧毁”的能力，这种建立在核均势上的“恐怖平衡”，在客观上又制约着他们发动战争。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苏共 27 大上宣称：“核武器孕育着一场龙卷风，它将使人类从地球表面上消失”；里根也承认，核战争中没有胜利者。正是基于对

核武器毁灭威力和双方势均力敌的核威慑力量的认识，所以美苏在激烈争夺中又处处小心，对抗不放弃对话，紧张又伴随缓和，以避免矛盾激化迎头相撞。两国领导人现在已开始意识到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最近美苏在限制中程核武器会谈方面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正是在这样一种认识的推动下达成的。但这并不是说，世界和平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主要是由两个超级大国的“核恐怖平衡”来决定的。离开了世界人民反对战争威胁、争取持久和平的斗争，离开了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世界和平是不可能得到根本保障的。

（江凌飞）

### 第三编 当代科学文化

#### 第九章 当代科学技术革命

##### 1. 能源利用的新发展

在能源利用方面原子能的使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原子能的使用是与战前原子核物理学的成就及战争期间对新式武器的研制相联系的。在原子核物理学的飞速发展中,1934年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发现用中子轰击铀可造成核裂变,1938年德国科学家哈恩等人继续中子轰击铀的试验,发现核裂变的链式反应。根据爱因斯坦质能关系式( $E = mc^2$ ),意味着伴随原子核的裂变或聚变将有大量的能量放出,引起一些科学家设想利用这种能量。第二次大战期间对原子能在军事上的实际应用加紧进行研究。1941年12月,美国决定研制原子弹,组织了庞大的“曼哈顿工程”。1942年,费米所领导的科学家实验小组在美国芝加哥大学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座核反应堆,实现了利用石墨进行有控制的核链式反应,为人类利用原子能开辟了途径。1945年美国制造原子弹成功。当年8月,美国空军把两颗原子弹投到了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战后,美苏两国在继续研制核武器的同时,也研究原子能的和平利用。1951年美国建成一个小型增殖反应堆,首次用实验证明原子能可以发电。1954年,苏联建成一座5000千瓦的轻水核电站。到1985年底为止,世界上已经批准投入使用的核反应堆有374座,全世界核发电量约占世界总发电量的六分之一。核发电量比例最大的法国,1985年发电量的64.8%来自核电站。估计到本世纪末全世界将有一半以上的电站要靠原子能发电,这是一场新的能源革命。核动力作为一种新型能源,正在航空、航海、航天等各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核电站以铀为燃料,铀矿在陆地上分布很不平衡,易为少数国家垄断。但科学家发现,在海水中铀的储量约达40亿吨。1986年,世界上第一座用海水提炼铀的工厂在日本投产,年产10吨铀,为利用海水中的铀迈出了第一步。

1952年11月1日,美国爆炸了第一颗氢弹,这是原子核物理学的又一新突破,是目前已实现的人工热核反应。热核反应是在极高温下轻原子核聚变的过程,并放出巨大的能量,所使用的原料是氘。氢弹爆炸成功后,科学家加紧研究可控制的热核反应,至今已有几种方法可使氘氚的等离子体升温至一亿摄氏度,但还没有找到一种理想的控制方法。有的采用托克马克环形装置进行等离子体的磁控制;还有的应用惯性控制,即用激光之类的脉冲能量来压缩和加热。这些都处于研究试验阶段,一旦研究成功,就能从海水中的重氢(氘)获得无限丰富的新能源——热核能。

除了核能外其它能源也迅速被开发利用,最突出的是石油。战后,在许

多领域中石油代替了煤的地位。石油的开采和消费量增长极快。到 70 年代末，世界石油消耗量每年接近 230 亿桶，约占已探明储量 6700 亿桶的 3%。到下个世纪初，石油资源即将枯竭。第三世界产油国为了捍卫石油资源和主权，在 60 年代成立了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973 年的“石油危机”促使各国加紧研究可利用新的能源。

由于汽车要消耗大量石油，所以许多国家在研究汽车节能的同时，多方面研究代替石油的汽车燃料，巴西使用以甘蔗为原料的酒精代替汽油。1974 年巴西酒精在汽车燃料消费中占 1.2%，1980 年占 15.6%，1983 年已上升到 23.6%。美国则研究用玉米制酒精代替石油。此外，一些国家还研究从油料植物中提取汽车燃料。用氢气驱动汽车可消除污染，如何用水制取廉价的氢气，已成为科学家注意研究的项目。

在充分利用水力发电的同时，风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又重新研究设计新式风车，用来发电。仅美国加里福尼亚州到 1983 年底，各农场就安装了风力发电机 4600 台，总发电能力达到 300 千瓦。

在海洋能的开发利用方面，除研究利用培植巨型海藻制取燃料外，主要是用海洋能发电，已取得成果的是波力（海浪）发电、潮汐发电。已提出方案的还有水流发电，即利用上层海水与深层海水的温差发电。近年又有科学家注意到江河与海水交界处淡水和咸水间渗透压力差所产生的能量，专家们称它为“盐能”，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太阳能除直接用于太阳灶、太阳能热水器、引入室内取暖、用光纤纤维将阳光引入巨大建筑物或地下建筑照明外，主要用于发电。目前利用太阳能发电大体有两种：一种是用太阳能将水加热成蒸汽，推动发电机发电；一种是用光电池将阳光转化成电能。1981 年至 1983 年，光电池的生产增加了近三倍，1983 年的发电量约 18000 千瓦，成本至少每五年减少一半。太阳能电池可用于航天器、电子计算机、灯塔、……，并有人试验用于驱动汽车及轻型飞机。虽然太阳能发电目前成本较高，但发展仍很迅速。在欧洲共同体区域里，1985 年利用太阳能代替石油的数量为 100 万吨，预计 2000 年将达到 600 至 800 万吨。

地热通过温泉、间歇泉和火山散发出来，除直接用于房屋取暖、农用暖房供热、供应热水等以外，也用于发电。自 70 年代中期以来，地热能源的使用每年扩大 10% 以上。1983 年，全世界已有 12 个国家 135 个试验性地热发电站，发电能力达 318 万千瓦以上，其中美国 128.4 万千瓦。以上海洋能、太阳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都有巨大的潜力。

（伊智慧）

## 2. 微电子技术的发展及应用

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先导之一是电子计算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减少计算弹道的时间，适应战争需要，美国工程师莫希莱于 1942 年提出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初始方案。1945 年底，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取名“电子数值积分机和自动计算机”，简称 KNIAC，它比机电式计算机的计算速度快一千倍，为每秒五千次。但该机存在存储量小，程序外插等缺点。美籍匈牙利著名数学家冯·诺伊曼对此进行了重大改进，1945 年，他设计出一个全新的存储程序通用电子计算机方案“离散变量自动电子计算机”，简称 EDIAC 方案，人称冯·诺伊曼机。该机把十进制改为二进制，把“程序外插”改为“程序内存”，使全部运算成为真正的自动过程。它是目前一切电子计算机设计的基础，是电子计算机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所以，冯·诺伊曼被称为现代计算机的奠基人。

电子元件也在不断更新。晶体管、数字系统、半导体集成电路的相继出现，为电子元件微型化奠定了基础。50 年代中期，发明平面型晶体管；1958 年制成集成电路；1967 年出现大规模集成电路；1978 年又出现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目前的发展方兴未艾。集成电路的出现，促使电子计算机不断更新换代：第一代（1946—1957），电子元件采用电子管，运算速度为每秒几千次到几万次；第二代（1957—1964），电子元件是晶体管，运算速度为每秒几万次以上，体积、重量和耗电量较小，可靠性强；第三代（1964—1970），为集成电路计算机，运算速度为每秒达千万次，实现了通用化、系列化和标准化，出现大型机和小型机；第四代（1970—1978），使用大规模集成电路，运算速度达每秒几亿次以上，并出现运算速度每秒几百万次至上亿次的巨型机和全套电路在一块硅片上的微型机。第五代计算机采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正不断取得重大进展，运算速度将达到每秒一万亿次。

70 年代之后最令人瞩目的是微电子技术的发展，这是一个以大规模集成电路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新技术领域。它是指在半导体材料芯片上通过细微加工制作电子电路，是从晶体管开始的固体元件微型化电子技术的总称。集成电路及其应用技术和生产的产品总称为广义的微电子技术。它是衡量一个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重要尺度，执 80 年代世界科技之牛耳。微电子技术的主要产品是微型电子计算机，微型电子计算机的核心是微处理机，它由单片或几片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组成。到现在为止，微处机经历了四位、八位、十六位、三十二位等四代，目前已向系统化发展，并和大型电子计算机结合为完整的系统。

微电子技术是当前世界上新兴“新技术革命”的核心，其产品具有体积小、重量轻、耗电少、可靠性强、价格便宜、使用方便等优点，其应用已广泛渗透到人类生活和社会生产的各方领域。

首先，促使生产自动化。利用电子计算机按照某种标准的状态或最佳值进行“过程控制”，使整个生产过程或者科学实验过程自动化。电脑和机床

相结合，创造出数控机床、多工序自动数控机床、机器人等。各种工作机械和仪器仪表及机械设备内部安装电脑，提高了灵活性，扩展了功能。目前最令人瞩目的是机器人，它是一种“完全能够自我控制的电子、电气及机械的综合装置”，装有各种微机、电脑，具有人工智能，它可以代替人在高温、剧毒、高空、深水等各种危险环境中工作。日本富士通法诺克工厂建成一座用计算机控制、用机器人制造机器人的工厂，用一百台机器人，月产机器人一百台，数控机床二百五十台。总之，微电子技术应用于生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工作效率和产品质量，降低了成本，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其次，促使管理现代化。将微电子技术应用于企业经济管理和科学技术管理；用于信息或资料处理和服务；用于辅助的设计和教学；用于机器翻译和自动排字等，进行数据处理和信息贮存。目前在许多发达国家的政府部门，宇航、通讯、交通、邮电、建筑工程、银行、医疗卫生等部门都建立了各种类型的数据处理系统。利用计算机检索文献和情报等，提高决策科学性，确定最优化计划，使管理现代化。

最后，促使家庭自动化。利用微电子技术给家庭提供各种信息服务项目，包括电子新闻报纸、电子购货、计算机辅助教育等，目前空调机、洗衣机、微波炉、电冰箱等家用电器设备已采用微处机。在家中安置由电视、电话和简易键盘组成的计算机终端，接入计算机网络，与工作单位、电视台、图书馆、情报所、银行、商店等联成网络，这样就可以在家里进行工作、学习、社会活动和娱乐活动。这就是当今世界上所谓H A（家庭自动化）革命，或“家庭电子化时代”。微电子技术使家庭与计算机相联系，形成信息的社会化，也使社会信息化。

目前，微电子技术已进入社会化、普及化阶段。它渗透到工、农、商、交通运输、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涌进工厂、机关、家庭等各个角落。它不仅改变了生产结构和产业结构，提高了生产率和经济效率，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使人类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思想意识观念发生极其深刻的变化。微电子技术的开发方兴未艾，它必将在人类社会中显示出无穷的威力。

（刘金光）

### 3. 航天技术的发展

航天事业的发展是当代科技史上的大事，是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标志之一。

火箭是航天事业必不可少的运载工具，是人类通往太空的阶梯。火箭的进步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时期。中国是最早发明和使用简单火箭的国家，宋朝的军队就曾使用过一种用竹筒作为外壳的火箭。从 13 世纪开始，火箭从中

国传到国外，经过不断改进，多次用于战争。本世纪 30 年代，德国科学家奥伯特和布劳恩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枚军用火箭。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又推出了先进的 V——2 火箭，它能从欧洲大陆，一直打到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国占有了德国的火箭研究专家、技术人员，以及先进的技术资料和生产设备，并各自开始研制用于发射导弹的中、远程运载火箭。苏联和美国在本世纪 50 年代后期，先后成功地发射了洲际弹道导弹，火箭发射达到了高度的技术水平，从而为人造卫星提供了有力的运载工具。

1957 年 10 月 4 日，苏联发射了历史上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伴星一号”，创造了宇航事业伟大的开端。“伴星一号”重 83.6 公斤，直径 58 厘米，每 96 分钟环行地球一周。它的外形是一个铝合金的圆球，伸出四根象鞭子一样长长的天线，内部装有两台无线电发报机，不断发出电子信号。“伴星一号”本身没有特殊的科学价值，运行的时间也比较短暂，92 天后即陨入大气层，化作了流星。但是，它的诞生意味着卫星发射技术的重大突破，意味着卫星时代的到来。在今天，人造卫星已广泛应用于各种科学领域，这对我们更加清楚地了解地球，进行气象预测和军事侦察，以及传播国际长途通讯等等，具有重大的作用。

我国的宇航事业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1970 年 4 月 20 日，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东方红一号”是一个球形的多面体，重 173 公斤，直径 1 米，绕地球一周 114 分钟，卫星上的无线电设备，从太空向全世界播送《东方红》的乐曲。“东方红一号”的发射标志着我国宇航事业的开端。从 1970 年开始到现在，我国已经成功地发射了 17 颗人造卫星。1975 年，我国掌握了卫星回收技术。目前，我国的运载火箭技术十分先进，已经开始为世界各国承担发射卫星的任务。

宇宙飞船是人造卫星的进一步发展，在体积和功能上都产生了质的飞跃。1961 年 4 月 12 日，苏联发射了“东方一号”宇宙飞船，飞船中载有苏联空军少校、宇航员加加林。“东方一号”飞船环绕地球飞行了 108 分钟，安全返回地面，加加林成了第一个飞上太空的宇航员。1965 年 3 月 18 日，苏联宇航员列昂诺夫走出“上升二号”飞船的座舱，进行了人类第一次太空漫步。1963 年 6 月，世界上第一名女宇航员、苏联的捷列什科娃也单独乘坐“东方六号”飞船，飞上了茫茫太空。美国在这方面也不甘示弱，1965 年 6 月，美国宇航员怀特走出飞船座舱，成为第一个在太空漫步的美国人。

本世纪宇航事业的高潮，是在 1969 年 4 月 20 日，美国由“土星五号”火箭发射的“阿波罗十一号”宇宙飞船，在月球表面登陆。飞船登月部分停在月球表面一片被称为“宁静海”的平原上，上面载有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和艾德宁。格林威治标准时 4 月 21 日 3 点 51 分，飞船的舱门打开了。阿姆斯特朗身穿笨重臃肿的宇航服，头戴硕大的球形盔帽，小心翼翼地爬出舱门，他在舱门外的小平台上呆立了几分钟，注视着这从未所见的月面荒凉景色。然后他伸出左脚，沿着扶梯下来。每下一步他都停顿一下，仿佛是在适

应月球上特殊的环境，九级扶梯走了 3 分钟之久。

4 点零 7 分，阿姆斯特朗用左脚试着轻轻触及月球表面的土壤，开始时有点犹豫，接着鼓起了勇气，把右脚也踏上了月面。这样，月球表面松软如粉的土壤上，就留下了人类第一双脚印。这双脚印相当大，长 30 厘米，宽 15 厘米，在厚厚的土壤上压出了清晰的鞋底沟纹。“我现在走出登月舱了，”阿姆斯特朗自豪地说：“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为了这一双脚印，在 10 年时间，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计划花费了 250 亿美元，动员了 400 万工作人员参加。

阿姆斯特朗走上月面 18 分钟后，艾德宁也踏上了月面。他们在月球上布置了三项科学实验设施，拍摄了月岩和周围的景色，收集了 22 公斤土壤和岩石样品，逗留了 2 小时 31 分钟后返回飞船。这一天，全世界有几亿人坐在电视机前，观看了这历史性的一幕。

航天飞机的出现是宇航事业的又一个里程碑。航天飞机的研制始于 70 年代初，1981 年 4 月 12 日，美国第一架航天飞机航行成功。航天飞机具有更为优越的性能和经济便利的特点。它容量大，不仅可以容纳数名宇航员，而且货舱里可以装载各种卫星、飞船，也可以回收、维修在太空中运行的卫星和飞船。它还具有稳定、受震小的特点，使普通人上天也成为可能。到 1986 年为止，美国已经有 56 次航天飞机先后上天。由于航天飞机的这些优点，因此它的出现为人类开发宇宙提供了可能。科学家们已经开始研究人类向太空移民、发展太空工业、建立太空医院等事业的可能性。科学家们设想用月球上蕴藏的矿物作为主要材料，在地球和月球之间建造移民基地。每一基地大约容纳 10000 人左右，自给自足，还可以吸收太阳的能量，转化为电力，源源不断地供给地球上的人类。太空工厂可以在太空失重的情况下，生产出某些地球上难于生产的工业品，同样，太空医院也可以利用太空无菌条件，制造出某些地球上很难制造的药品，更有效地医治某些病人。总之，航天事业为人类的未来提供了美好的前景。

(阿海)

#### 4. 遗传工程与生物工程

生物工程是从现代生物学研究而发展起来的新兴技术领域，它是一门应用生物科学和工程学的原理来加工生物材料的综合性技术。

生物工程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已有 110 年的历史，经历了诞生—飞跃—再飞跃的三个阶段。1667 年荷兰商人列文虎克发现了微生物，为生物界增添了一个新领域。1857 年至 1876 年法国化学家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发现了酵母(微生物)，并说明了发酵过程。他进而把研究对象扩展到细菌，由此建立了微生物学。巴斯德的发现不仅对以前的发酵食品加工过程给予科



学的解释，也为以后新的发酵过程的发现提供了理论基础，促使生物学原理和工程学原理相结合，因此，巴斯德被称为生物工程之父。生物工程由此而诞生了。

以青霉素工业生产为标志的深层通气培养法的建立表示了生物工程发展的第一次飞跃。1929年，英国科学家弗雷明发现青霉具有生产青霉素的能力及青霉素的疗效后，在世界大战中需求量迅速增大。1943年英、美合作研究开发了深层通气培养法，实现了青霉素的工业化生产。其后，又继续发现了链霉素、四环素等新的抗生物质，因而发展成为抗菌素工业。当时生物工程核心的发酵工程已从昔日以厌氧发酵为主的工艺跃入深层通气发酵为主的工艺。1959年，日本田道制药公司的千畑一郎博士成功地将固定化氨基酰化酶用于DL-氨基酸的光学拆分上，实现了酶连续反应的工业化。这是世界上固定化酶工业化应用的开端，也是这一阶段生物工程的又一个突出成就，它使60年代初兴起的酶工程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分子生物学也在发展，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提出了DNA的双螺旋结构模型。与此同时，科学家们发现细胞中的“质粒”是能在细菌染色体外进行自我繁殖的细胞质因子，可以说这就是基因操作的起点。随着新质粒的不断发现，质粒分离提纯技术的日臻完善，质粒作为外源基因运载作用的充分显示，加之1970年前后DNA限制性内切酶和连接酶的发现，生物工程的新飞跃开始了。这次是以遗传工程为核心的飞跃。遗传工程是生物工程的四大体系之一（其它三个体系是：细胞工程、酶工程和发酵工程）。这种工程，是把生物的遗传物质（主要是DNA分子）分离提取出来，或人工合成一个DNA分子，用巧妙的人工方法，在生物体外对遗传物质拼接组合，然后再把它放进某生物的细胞内，从而改变其遗传物质的结构和某些遗传特性，使它定向地产生符合人类需要的新的生物物种、类型。197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斯坦利·科恩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博耶等人，对基因重组技术的发明成为生物工程第二次飞跃的标志。1975年，英国的米尔斯特用淋巴细胞和癌细胞融合，形成杂交瘤，产生单克隆抗体，在此后的短短几年中，遗传工程浪潮席卷全世界，各种基因产物，如人胰岛素、生长激素、疫苗等相继发现。

生物工程主要应用在医药、食品、化学、农业、能源、环境净化和采矿等工业领域。

生物工程具有传统工业和传统技术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首先，它是生物来源的材料为加工对象，因此不受资源的限制；其次，它的反应过程是在常温常压下进行的，又可以实行生产过程的连续化，缩短生产周期，节约能源，降低成本，减少环境污染；再次，能解决传统技术或常规方法所难以解决的许多重大问题，如遗传病的诊断和治疗，新生物能源的开发等；还有它可按照人类的意愿创建新物种，适应多方面的需要；最后是投资少，效益大。所以，生物工程的重大突破，将会迎来一个以生物工程为主导的工业新时期。

(贾锡萍)

## 5. 化学和新材料科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化学的发展有许多新的特点。首先，体系的多元化和综合化。现代自然科学各门类的分割、交错和组合正在改变传统化学分为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四大部分的旧体系。战前开始出现的量子化学、结构化学、电化学、高分子化学、核化学只是到了战后才相对独立。生物化学虽然历史较长，但作为化学的一大部分而日益受到重视却在战后。新的边缘化学，如半导体化学、激光化学、计算机化学、星际化学、地球化学、海洋化学等纷纷兴起，达数十种之多。化学的许多世袭领地被其它学科占领，它们似乎正在“走出化学”，但化学向其它学科的渗透又使大量本来不属于化学的内容具有了化学意义，它们正在“走进化学”。

其二，科学先行，理论的指导作用加强，化学进一步由经验性、描述性向推理性、创造性方向发展。长期以来，化学的发展主要依靠原有实验、生产经验的积累和对大自然赐予现成物质宏观的描述，虽然本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曾引发了化学对物质微观结构及内部运动规律认识的突破，但化学反应的复杂性（一个主反应往往同时兼有若干个副反应）、瞬时性和微观运动量子化计算的困难使化学在理论水平上仍然落后于数学和物理学。战后化学的发展使它真正成为一门有系统严密理论、能够精确计算的科学。一方面，许多早为人们熟悉的物质由于理论研究的进展而导致应用上的突破，如锗、硅等晶体结构和硼、磷等元素得失电子的理论推动了第一支晶体管的产生，开始了一次次的信息革命；各种新化学键（分子或晶体中原子间的结合力）的发现和键参数的量化使“惰气不惰”（已制出几百种惰性元素的化合物），并使大多数金属元素都能和有机集团结合（已制出几十万种化合物），从而开辟了对化工、材料和生物工程极有意义的金属有机化学。另一方面，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人们的主要精力转向了自然界本不存在的新元素的创造和新化合物的合成。战前，元素周期表的最后一个元素是天然的 92 号铀，1940 年和战后，在核理论指导下，陆续造出一系列超铀元素，周期表已延伸至 109 号。化合物的例子，最突出的莫过于高分子化工了。高分子指分子量可达五万至几十万的有机大分子。最初发现线型高分子的链式结构并找到聚合途径是战前不久的事。战后，石油化工的迅猛发展，使以石油分馏产品为主要原料的高分子化学形成了区别于一般有机化学的独立理论体系。以三大合成（塑料、合成纤维、合成橡胶）为主体，包括染料、医药等业的高分子化工在六七十年代进入大发展的新时期，预示着人类生产活动和衣食住行的根本变化。1982 年，全世界三大合成产品已达 8133 万吨，其中塑料 6283 万吨（包括各种工程塑料，如强度比钢高五倍的代金属塑料，在二百余度高温下正常

工作的塑料，导电导磁塑料等），合成橡胶 822 万吨（1962 年开始，产量超过天然橡胶），合成纤维 1028 万吨（品种过万，80 年代产量与棉花相等）。一系列充当光导纤维、离子交换树脂、分离膜、胶粘剂、涂层剂、液晶的高分子品种不断问世。1950 年，人们知道的单一物质有一百万种，今天则超过了八百万种，化学家正以每天平均一千种的速度合成着新化合物。他们可以按照要求，把一个高分子割断、打结或插上分支。化学和材料科学正经历着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过渡。

其三，纵深发展的微观研究和研究手段的不断完善互相促进，使化学在更高的层次上达到“三化”（自动化、计算机化、标准化）“三高”（高灵敏度、高准确度、高速度）的要求。现代综合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研究手段的发展使化学各领域的微观研究成为可能，而愈益精细的微观研究又要求研究手段的不断更新。战后，单纯的化学方法又有新的创造，但主要是依靠现代物理光、磁、电、放射技术提供的仪器手段。现在，超痕量分析已达 ppt（亿分之一），甚至可在  $10^{19}$  这个庞大数目中检测一个杂质原子，电子探针已能观察到材料中的原子，与计算机联机的分析仪器能自动采集处理、即刻展示各种数据，而电子计算机依据量子化学理论编排的程序已能计算较为复杂的原子、分子的内部运动、绘制各种电子云图、追踪在毫微秒（ $10^{-12}$  秒）到微微秒（ $10^{-9}$  秒）时间内进行反应的能量转移过程。

化学的新发展导致材料科学的进步，为新技术革命和其它自然科学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当前各种材料约四十万种，从化学组成上看，包括金属材料（钢、有色金属、合金等）、无机非金属材料（硅酸盐及特种陶瓷—极纯细的碳、氮、硼化物等）、有机高分子材料以及它们的复合材料（如金属陶瓷、玻璃纤维增强的塑料、碳纤维增强的金属等，是材料发展的方向）；从性能用途看，包括充任骨架、壳体的结构材料和因具某种特定的光、电、声、磁或生物功能而有特殊用途的功能材料。战后，传统旧材料的改造和新材料的研制都是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的综合成果，而现代以信息技术为主导，包括能源、生物工程、航天、海洋开发等在内的新技术群又必须仰赖各种新材料作自己的骨肉。在能源技术方面，核电站除需要极纯的核燃料外还要有耐高温、耐辐射、耐腐蚀的结构材料；太阳能发电和光解、电解水制氢的理论和技术问题已经解决，关键是寻找价廉耐用、能高效率实现光电转换、光化转换的功能材料；为节约现有能源、提高热效率，已经制出了可代替合金做燃气轮机、内燃机的结构陶瓷材料；不经过机械能、直接由热能转换为电能的磁流体发电材料也在研制中。在航天技术方面，能承受高温、高压、射线的航天飞机、导弹的外蒙皮和端头材料、火箭的喷管、喉口材料不断涌现。在信息技术方面，科学家们继续探索新的光导纤维、激光器、半导体、信息记录、传感器敏感材料等。在生物医学方面，高分子合成材料大显身手，研制了可代替人的某些器官工作的脏器（心肾等）、管道（血管、气管、食道等）和功能薄膜材料达数百种。

当今引起各国研制竞争的超导材料，是一类无电阻、因而能进行无损耗输电（目前实际损失率约为 30%）的材料，由于它能形成高电流密度和高磁场，可用来制造增大输出量二十倍、重量减至十分之一的电机，可使磁流体发电、高能加速器、受控热核反应装置、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磁悬浮列车的设计根本改观。但自 1911 年发现在绝对温度 4K（- 269 ）下的水银具有超导性以来，人们寻找在较高温度下能够工作的超导材料的业绩一直不大，至 1973 年，才提高到 23.2K（- 250 ），但仍需在液氮环境中工作，实用价值甚微。1987 年初，我国科学家连续三次打破世界记录，将特种合金材料组成的超导体转变温度提高到 100K 以上，日本、美国、苏联、西欧也不断创造着新记录，常温超导的实现将会引起物理学的新革命。

（董大业）

## 6. 环境问题与环境科学

环境问题由来已久。早在农业文明时期，就存在土地破坏现象，工业革命开始后，又产生了污染问题。不过这时人类活动所引起的自然环境的变化和变化了的自然环境对人的影响还比较小，问题也是局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由于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人类改造自然的手段迅速增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不利影响也随之明显。全球性的大气污染、水土污染以及土壤侵蚀和资源衰竭是当代世界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

人类的生产活动对环境的污染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工业产生过程中排放的废水、废气、废渣和农业上使用农药、化肥等对大气、水、土壤、食品污染；二是在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中产生的污染；三是核武器试验释放的放射性尘埃造成的污染。从 60 年代开始，污染问题变得极为严重，仅美国每年排放的废水就有 38 亿吨，废气达 2.6 亿吨。污染几乎遍及世界各个角落，连南极都未能幸免。污染问题一度成为许多国家的社会公害，因污染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的事件屡有发生。如 1952 年英国伦敦因大气污染造成的烟雾事件导致 4000 人死亡；1963 年至 1968 年，日本神通川两岸居民 128 人因饮用受镉污染的河水而患骨痛病死去。此外还有汞污染引起的水俣病，氟污染引起的氟骨症，石油气引起的光化学烟雾事件等，都是因为工业“三废”中含有大量的有毒化学物质造成的人体病变，目前癌症发病率增多同环境污染有直接关系，已确认的致癌物质有 1000 余种。

工业废水对河流和湖泊的破坏尤为严重。1966 年苏联在贝加尔湖畔建造了几个工厂，每年向湖中排放污水 6000 万立方米，使该湖几乎成为“死海”。世界上许多著名的河、湖大多曾遭此厄运。酸雨造成的损失实在无法估量，它使土壤有机质减少，变得日益贫脊，建筑物加速风化，动植物的生长也因酸雨而受到影响。

生态平衡的破坏近年来才引起人们重视。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包括砍伐森林、垦荒造成的土地沙漠化、水土流失，以及城市交通建设用地，使土地资源大幅度减小。尼泊尔森林由于滥砍乱伐每年减少 4.33%。塞内加尔土地因为单一经济作物的种植而日益沙漠化。巴西、印尼的热带雨林因掠夺性的开发而逐年消失。目前地球的森林覆盖率仅为 20.7%，正在以每年 2000 万公顷的速度减少，沙漠化面积已达 30%，还在以每年 600 万公顷的速度增加。1957 年至 1980 年，我国平均每年占用耕地 2200 万亩，一方面农田面积缩小，另一方面人口却迅速增加，如今人均占有耕地已不足一亩，土地破坏导致粮食生产无法满足生活需要已成为令人忧虑的问题。野生动植物资源由于生存环境的破坏和环境污染的影响，平均每天有一个物种消亡。最后需要指出，近代以来的工业发展是建立在大量消耗不可再生的资源基础之上的，不仅在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中产生了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而且人类将面临资源枯竭的问题，以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石油为例，依照目前的开采速度，地球上的石油只能维持到 21 世纪中期。

人类与其生活环境之间的平衡的破坏，环境污染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妨碍，唤起了世界性的环境保护运动。60 年代起，西方国家的人民群众首先发出了保护地球的呼声，从此以后世界各国普遍重视和加强了对环境的治理和研究。美国在 1969 年建立环境委员会。其他国家也纷纷设立专门管理机构，制定了保护环境、控制污染的法律。1972 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呼吁各国政府和人民遵循大会制定的 26 项原则，采取明智行动，为使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能够在—个比较符合人类需要和希望的环境中过较好的生活而努力保护和改善环境。80 年代以来，以保护环境为宗旨的“绿党”在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崛起，标志着环境保护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环境保护运动的推动下，环境科学应运而生。

环境科学是从本世纪 50 年代开始逐渐形成的一门独立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环境的质量及其保护和改善。就其内容而言，目前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环境状况的调查和环境质量的评价；污染物质在自然环境中的转移、循环和积累；环境污染物的处理；环境区域规划的研究；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环境监测和分析技术的研究等。主要是应用现代科学成果和各种技术手段，对人类活动引起的大气、水、土地、生物环境问题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为环境保护和生产的合理发展提供依据。

环境科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涉及化学、生物学、物理学、地学、医学、工程学等领域的知识和技术。生态学是环境科学的基础理论，它告诉人们：在自然界，生物之间总是维持着某种平衡，个别物种的繁殖或消亡总是影响到其它物种的变化，环境的变化会影响整个生态系统。环境研究还涉及到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方面的问题，因为环境问题的产生、环境的保护和治理是与社会条件分不开的。战后环境问题日趋严重的主要原因是生产规模的

迅速扩大和人口的急剧增长，所以人类必须自觉地调节自身的行为以保证所引起的环境变化不致于危及种族的生存。

环境科学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环境保护工作，使某些严重恶化的环境得到治理。然而环境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方面是由于目前科学技术的水平还无法避免生产过程中造成的污染；另一方面是由于当代社会条件限制着大规模的综合治理和资源的合理利用。解决环境问题，建立人类生存和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新的平衡有赖于科学技术的充分发展和社会制度基本完善，需要人类的共同努力。

(刘学锋)

## 7. 系统论 控制论 信息论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向着整体化、综合化发展，便产生了具有综合特性的横向科学理论——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

系统论是研究客观现实系统共同的特征、本质、原理和规律的科学。其产生是有着深远的思想渊源和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的，并为社会发展的要求所推动。古代人类对世界的整体认识具有一种朴素的系统思想。近代科学的三大发现：能量守恒定律、细胞学和进化论，揭示了客观世界的普遍联系，对古代朴素的系统思想进行了扬弃。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理论的诞生，在社会科学领域发展了系统思想。这些理论都为系统论的产生提供了思想基础。但是19世纪的科学水平限制了独立的系统理论的形成。20世纪把“系统”作为研究对象的新学科的出现，如管理学、科学学、系统工程、信息论和控制论等和数学领域中运筹学、模糊数学的发展以及电子计算机的诞生和应用，都为系统论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现代科学技术基础。同时，现代化组织管理问题日益突出，成为推动系统科学研究的强大社会动力。

系统论创史人贝塔朗菲(1901—1972)是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1945年贝塔朗菲在《德国哲学周刊》第18期上发表了《关于普通系统论》。1954年以贝塔朗菲为首，包括经济学家、生物学家和生理学家等成立了“普通系统论学会”，从而使系统论得以发展。1968年贝塔朗菲出版了《普通系统论的基础、发展和应用》一书，全面阐述其系统论的思想。1969年比利时物理学家普里高津提出“耗散结构”学说；1976年联邦德国科学家哈肯提出“协同学”学说；苏联学者乌也莫夫提出参量型系统理论，使贝塔朗菲的系统论在深度和广度上有了发展。

系统论产生的实践基础是系统工程的兴起。系统工程就是把对象作为系统来处理组织管理技术。美国贝尔电话公司于1940年首创了系统工程学这个名词。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国际掀起“系统热”的浪潮，因为二战后系统工程学在军事、经济和科研等组织管理方面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目

前系统工程学日益发展，它的应用范围也不断深入和扩大。

控制论是研究有组织系统的控制和通讯的科学。20 世纪以来，控制论作为一门科学，在具有一定的社会条件、理论渊源和技术前提下逐渐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科学家们对武器的研制，为控制论的产生提供了社会条件。数学和物理学中那些研究必然性和偶然性关系的学科，生命科学的发展和计算机科学、逻辑学的发展，成为控制论的理论渊源。控制论产生的技术前提表现在人们制造的各种各样的自动控制装置上，如从中国古代的指南车到近代人类发明的许多机械设备中的稳速装置。

控制论的创始人，美国数学家维纳（N. Wiener, 1894 - 1964）1948 年出版了《控制论（或“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讯的科学”）》一书，标志着控制论的诞生，从此控制论迅速发展起来。从 40 年代末到 50 年代，称为经典控制论时期，主要研究单变量的自动控制；60 年代称为现代控制论时期，从单变量控制发展到多变量控制，从单纯的自动调节进展到最优控制；从 70 年代到现在，被称为大系统理论时期即所要控制的是整个体系的总的性能指标，往往具有规模庞大、结构复杂、功能综合、因素众多的特点。

目前，控制论已形成以理论控制论为中心的四大分支：工程控制论、生物控制论、社会控制论和智能控制论。其作为横跨技术系统、生物系统、社会系统和思维系统的一门横断科学，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发挥越来越巨大的作用。

信息论是一门应用数理统计方法研究信息处理和信息传递的科学。其产生于通信科学。近代电在通信上的应用，给人类通信方式带来根本性变革，为信息论的产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本世纪 40 年代，雷达、电子计算机等新的通信工具相继出现，使通信技术迅速发展，要求迫切解决一系列信息问题。

信息论的创始人是美国的数学家申农，1948 年和 1949 年先后发表了关于信源和信道特性的两篇权威性论文——《通信的数学理论》和《在噪音中的通信》，为现代信息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维纳从控制和通信的角度研究信息问题，提出“维纳的滤波理论”，为信息论成为控制论的一种基础理论作出贡献。

信息论诞生以后，大体上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应用于多种学科和技术领域，另一个则是不断地丰富、完善和发展它本身的理论体系。它经历了狭义信息论、一般信息论和广义信息论的不同发展阶段。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论的发展必将取得巨大进展，并且在人类社会实践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贾锡萍）

## 第十章 当代哲学社会科学

### 1. 战后苏联的哲学、社会科学

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不久，于 1947 年至 1951 年，开展了许多次有关哲学、语言学、政治经济学等问题的讨论。这些讨论对纠正社会科学中的一些错误观点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个人崇拜给理论思想造成的影响，也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

从 30 年代中期到 50 年代初期，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越来越受到个人崇拜的阻碍。1956 年 2 月，在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谴责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同年 6 月 30 日苏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揭露了个人崇拜的实质及其原因，号召人们肃清个人崇拜在各个领域的影响。

由于个人崇拜的影响，苏联的学术界存在着严重的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社会科学研究脱离了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教条主义和书呆子习气很浓。社会科学工作者们不是致力于研究生活本身和科学发展所提出的迫切的新问题，而常常是去解释已经众所周知的原理和理论，评论和颂扬斯大林的演说。

破除个人崇拜，肃清个人崇拜在学术领域的影响，使苏联学术界的思想大大活跃起来。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发挥了主动性、创造性，开始研究实际生活中提出来的一系列问题，如共产主义社会关系的形成问题、共产主义精神生活问题，关于人、人的自由和幸福、个性的全面发展问题等。一些专门的学科，如形式逻辑、美学、理论学、科学无神论的理论和历史等从哲学认识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

苏联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开始加强与外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交往，积极参加有关哲学和社会学问题的国际会议。1957 年，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加入了国际哲学协会联合会。1958 年，苏联成立了社会学协会，这个协会也加入了国际社会学协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国际会议上所作的报告，论述了当代一些迫切的哲学和社会学问题，如“社会科学和社会生活”、“社会学和政治”、“当代世界的人道主义”、“人道主义和科学”、“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人是哲学研究的对象”、“19 世纪社会变化的规律性”等等。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加强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和控制。1967 年 8 月，苏共中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发展社会科学和提高社会科学在共产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的措施》的决议，要求各科研机构、党组织以及在哲学、经济学、科学共产主义、史学、法学、美学、教育学、心理学以及其它社会科学领域工作的科学家，在研究各种重大的理论问题的同时，开展对资产阶级哲学、社会科学系统的严肃的批判，揭露对各种史实的捏造。决议指定苏共中



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负责协调党史科学领域的全部科研工作；决议还委托政府有关部门及科学院筹建科学情报研究所。

在 1967 年纪念十月革命 50 周年时，勃列日涅夫在报告中抛弃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1959 年）上关于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的提法，认为苏联只是“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到安德罗波夫执政时，又把发达社会主义的“建成论”改为“起点论”。苏共领导人这些观点的改变，反映了苏联对社会主义实践的认识更加切合实际，认识更深化。这些观点的改变，也影响了苏联理论界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课题。

六七十年代，苏联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发挥集体的力量，推行集体写作的方式，编写了一系列有巨大影响的著作。

在哲学方面，出版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历史·列宁阶段》（1973 年），该书详细阐述了唯物辩证法在列宁著作以及 20 年代到今天苏联哲学家著作中的全面发展，同时批判了资产阶级哲学家对唯物辩证法的歪曲的解释。《实践与认识》（1973 年）一书探讨了一系列重要问题，如哲学中反映原则和实践原则的相互作用，科技革命是实践和认识统一的特殊表现形式等。探讨历史唯物主义各种问题的著作有《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认识和活动的理论》（1972 年）、《社会发展和辩证法》（1974 年）等。

在科学共产主义领域，苏联学者研究的是成熟的社会主义及其向共产主义社会转变的理论问题。

苏联学者在经济学领域集中力量分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的各种特点，研究经济结构完善化的问题。编出的一系列著作有《经济百科全书·政治经济学》4 卷集（1972 年）、《科学技术进步和发达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经济学概论》、《发达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1973 年）、《发达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的社会经济问题》（1974 年）等等。批判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著作有《现代垄断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2 卷集（1971 年）、《现代资本主义：新现象和新矛盾》（1972 年）、《帝国主义的思想政治流派》（1975 年）。研究与科技革命有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著作有《人—科学—技术》（1973 年），该书由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学者集体编写，在第 15 届世界哲学会议上获得好评。还出版了《发达社会主义和科技革命》的专题丛书。

在历史学方面，对重要问题的综合性研究大大加强了。苏联史学家以集体方式编写了一系列综合性的巨著：《苏联通史》12 卷集；《1939—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共 12 卷，总编委员会主任为 A. A. 格列奇科元帅；《苏联对外政策史》2 卷本，b. H. 波诺马廖夫、A. A. 葛罗米柯、B. M. 赫沃斯托夫主编；多卷本的《苏共党史》；总编委员会主任为茹科夫院士的《世界通史》增补本和波诺马廖夫院士主编的多卷本的《国际工人运动·理论和历史问题》等正在编写、出版之中。

另外还出版了一系列综合性的文学史和文学理论著作，如《苏联多民族文学史》7 卷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形式问题》2 卷本、《社会主

义现实主义发展的现阶段》。1974年的列宁奖金授予M. A.赫拉波琴科院士的著作《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学的发展》。

社会科学各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为编写一系列新的教科书和教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苏联的高等院校得到了以下新教材：《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O.B.库西宁院士主编；《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理》，.B.康斯坦丁诺夫院士主编；《科学共产主义》，. . .费多谢耶夫主编；《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一阶段》，鲁米扬采夫院士主编。

近年来，苏联社会科学正在大力研究的课题有：人口学和劳动资源问题；环境保护的社会经济问题和法律问题；农业的社会经济问题等等。由于这些都是综合性的问题，所以苏共中央号召科学界人士一致努力，搞好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密切配合，完成综合性课题的研究任务。

(严志梁)

## 2. “西方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些知识分子面对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新形势，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能解答新时代带来的新问题，试图“重新探讨”和“发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从而形成一股以哲学思考为主要特征的社会思潮。

匈牙利共产党人卢卡奇于1923年发表了《历史和阶级意识》论文集，系统论述这一观点，他被称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最早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名称的，是捷克第一任总统马萨里克，而最先给卢卡奇等人所代表的那股思潮冠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名称的，则是于1955年发表《辩证法的历险》一书的法国现象学—存在主义者梅劳—庞蒂。所以，只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股思潮才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名流行开来。

“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很多，可分为两种思潮四大流派：即人本主义的（或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属于前一思潮的主要流派有以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和以萨特、梅劳—庞蒂等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属于后一思潮的有以德拉沃尔佩和科莱蒂为代表的“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后三个流派都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应当“暴露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根源”，以“青年马克思”去反对“成年马克思”；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则主张“马克思主义的非黑格尔化”。前者在本世纪五六十年代达到全盛，之后，由后者取代。

“西方马克思主义”既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观点上也有很多分歧。其基本观点可概括如下：

第一，强调总体性和意识革命，集中于文化批判。卢卡奇提出总体性观念，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资产阶级科学的关键之所在。据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专政是一种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心理等方面的“总体专政”，应用“总体革命”来推翻资本主义。他们还提出“总体性社会主义”的设想，认为社会主义不仅必须增加物质和服务的数量来消灭穷困，而且要改变生存的性质，改变人的需要和对需要的满足。他们还普遍认为，必须重新估价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结构同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形成过程之间的关系，马尔库塞尤其强调这种“意识革命”。还有人坚持“日常生活批判”应成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心。这样，“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把焦点集中在“文化”这样一些更宽泛、更偏向上层建筑“顶层”的概念上。

第二，揭示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马尔库塞认为，科技的进步，使劳动的机械化、自动化日臻完备，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这一切改变了劳动者的思想意识，工人阶级被融合进了资本主义制度，由此导出社会主义的非无产阶级基础的论点。“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传统理论家则认为，随着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已发生深刻的变化，体力劳动者减少，非体力劳动者增多。非生产性工人，特别是科学家在生产中的作用愈益重要。这样，有技术的、受科学训练的工人就在工人阶级内部形成一个新工人阶级，他们必将成为未来社会主义革命的真正核心，而学生正越来越成为这种新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和潜在先锋部分。

第三，对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和国家理论提出批评，对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和作用进行了探讨。众所周知，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基石之一。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由于科学技术成为当代社会的主要生产力，机器已代替了个别产品决定着生产率，剩余价值理论混淆了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关系，妨碍工人阶级斗争深入开展，所以，不能作为完整的剥削理论。他们还根本否认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存在。阿尔都塞认为马列经典著作只是给予国家一否定性的分界线和定义，列宁和葛兰西虽曾试图超越这一否定性的定义，但没有成功。法兰克福学派的右翼代表则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平息了阶级冲突，从而使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修正成为必要。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成为过时的了。

第四，如何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们认为，由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不仅资产阶级掌握着一切军事和警察权力，掌握着“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领导权”，而且工人阶级中也流行着改良主义的思潮，所以武装夺权不可能被提到议事日程上。但垄断资本主义却使“来自下面的革命”具有可能性，即在夺取政治权力之前先夺取局部经济权力。他们将此视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唯一可能的道路。

第五，“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的代表人，根本否认有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把辩证法归结为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局限于人类历史和社会领域，根本否定自然辩证法，只有葛兰西认为辩证法也适用于自然。“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则否认马克思辩证法同黑格尔辩证法之间有任何连续性。“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唯物主义也基本持否定态度，主要是否认经济要素的首要性。在认识论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几乎都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在于两者是构成同一现实的辩证过程的不同方面，思维并不是对存在的反映。他们还否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异化”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探讨的一个核心范畴。卢卡奇最早奠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基础。后来随着1932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公开发表，很多人进行“异化”理论的研究。他们得出结论：异化理论比《资本论》的经济学更能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只有异化理论才能说明人类历史发展中的矛盾。

综上所述，“西方马克思主义”反映的是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世界观，并含有相当成份的无政府主义，是一股“左”的激进主义思潮。他们用一种极其艰深、晦涩、深奥无比和完全学究气的语言，来阐述用以修正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他们脱离实际，思想悲观，将马克思同恩格斯、列宁完全对立起来；既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感到失望，又在主观上希望同反共分子划清界限；既怀着对未来社会的美好而朦胧的憧憬主张彻底摧毁压抑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现存的一切，又主张进行一种没有无产阶级的“革命”。但是，不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和说明是否准确，有无谬误，它至少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新的解释，是我们了解资本主义现实本质的一面镜子。他们提出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恰恰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几个最薄弱环节。他们对已发生深刻变化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各种探索，留给我们许多有价值的启示，为人们从整体上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带来了许多有启发性的信息。

（刘金光）

### 3. 存在主义

又称“生存主义”或“实存主义”，现代西方最为流行、影响最大的哲学派别和哲学思潮之一，属于主观唯心主义。存在主义的鼻祖是19世纪的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但在当时影响不大，几乎无人问津。20世纪20年代，存在主义首先在德国发展起来，成为一个哲学流派，出现了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等代表人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存在主义的中心逐渐转到了法国，涌现出当代最著名的存在主义代表萨特及马塞尔等一批存在主义者。

二次大战后，存在主义席卷西方世界，在欧洲的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家，在美国、日本及拉丁美洲各国广为传播。它不仅作为一个理论上的哲学派别，而且通过小说、戏剧、诗歌等多种形式，在西方国家产生了相当大的社会影响。

存在主义把人的存在作为自己哲学研究的出发点和目的，认为“存在先于本质”，人的存在是最根本、最积极的存在，人以外的存在是被动的、消极的存在。但是存在主义所说的人的存在并非是社会存在，它所说的人是“社会领域中的个别的人”即脱离了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孤立的个人，所说的存在是人的主观性即人的主观精神和意志的存在。存在主义者宣布人的本质和人的其他一切都是由这种存在自行创造的，“人不外是由自己造成的东西”。由此可见，存在主义在物质和意识的关系这个哲学基本问题上，认为个人的意识是第一性的，“自我”是一切存在的核心，没有人的“自我”就没有世界一切事物。所以它是主观唯心主义派别。

存在主义散布不可知论和对人生的极端悲观主义。在存在主义者看来，主观意识之外的世界上的一切没有任何规律，是杂乱的、偶然出现的东西，只能被人们依靠主观意识当作现象来描述，绝对不可能把握和认识。自然和社会环境总是和人敌对的，人被无缘无故抛到这个世界上来，找不到人之所以存在的任何理由，人生永远是一个未知数，充满了孤独、苦闷、痛苦、恐惧，必然归宿只是死亡，所以人只不过是一种“注定死亡的存在”，人生毫无意义。有些存在主义者还乞灵于宗教，宣扬“受苦的人类只有在宗教中才能找到希望和解脱”。

存在主义标榜尊重人的尊严，维护人性，竭力鼓吹人的自由、独立和价值，因而颇具吸引力和迷惑力。但是存在主义认为人不受任何客观必然性的制约，他人的存在就是对自己自由的侵犯，“别人就是地狱”，“尊重别人的自由”不过是“一句空话”，人应该摆脱社会性，保持人格的独立，“自己设计自己”，“自己选择自己”，“自己创造自己的人生价值”。存在主义的自由观是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表现，它以自我为中心，把个人凌驾于他人、集体和社会之上，幻想绝对自由，为所欲为，自我奋斗。这种自由观建立在主观唯心主义基础之上，丝毫没有看到人的自由不是不顾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只有认识规律，克服盲目性，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取得自由。

存在主义者一般反对社会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是“荒谬的信仰”，攻击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造成了“野蛮和混乱”，“仇恨和残忍”。但萨特等一些存在主义者宣称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有许多“相同之处”，不过有“缺陷”，应该用存在主义“补充”和“修正”马克思主义。他们曲解马克思主义离开了“人道主义”，抛弃了对人的研究，理论脱离了实践，已经“概念化和走极端”，认为只有存在主义特别是它的“人学”，才能使马克思主义重新获得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哲学

体系，存在主义者所说的“补充”和“修正”实质上是要用存在主义改造、代替和消灭马克思主义。

存在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它是西方资本主义全面危机时代的产物。资本主义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以后，各种矛盾日益激化，导致爆发了两次空前残酷的世界大战，资产阶级曾大力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化为幻影，人的价值、人的尊严被任意践踏。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各阶级的政治、经济及思想状况发生了复杂的变化，为存在主义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一次大战后，妄图称霸世界的德国一落千丈沦为战败国，国内经济混乱，出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资产阶级元气大伤而悲观失望，知识分子和小市民看不到前途而苦闷彷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战败投降，被德国法西斯占领，人的生存和价值失去保障，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小市民无法解释民族危机的真正根源，找不到摆脱厄运的出路，这些条件使德国和法国先后成为存在主义的中心。此外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使人们的物质生活相对丰富，但人越来越成为机械的附庸，似乎进入了一个不可捉摸的世界，被盲目性控制而无能为力，人们的精神生活极度贫乏，产生了反对控制、要求自由的情绪，为存在主义传播提供了基础。

存在主义是资产阶级悲观落后，又不甘心灭亡，企图垂死挣扎的精神状态的体现，也以扭曲的形式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反抗资本主义的愿望。它的自由观曾经在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过程中起到积极作用，有的存在主义者如萨特在政治上有许多进步表现。但是存在主义作为一种资产阶级哲学体系，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不科学的，在实践上不仅不能给人们指出正确的道路，相反可以被资产阶级利用，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

（杨宁一）

#### 4. 法兰克福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的特点是把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相结合，强调人性的斗争和解放。

1968年5月13日，巴黎大约有80万学生、工人和教师走上街头，他们共同高举着一幅10多米长的标语：“学生、教师和工人团结起来”，肩并着肩，高唱《国际歌》，高呼口号，浩浩荡荡拥向巴黎市中心，在巴黎警察总部和最高法院门前示威，这就是法国被称为“五月风暴”的革命运动的高潮。在这次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斗争中，法兰克福学派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学生们以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说作为这次斗争的主要理论旗号，并把这个学派的一个著名人物马尔库塞看成是自己的“精神领袖”。法兰克福学派由此成了60年代和70年代西方最流行的社会思潮之一。

早在魏玛共和国时代，在德国的法兰克福城，1932年出现了一所由富裕的谷物商捐助成立的社会研究所。它在形式上隶属于法兰克福大学，实际上却是独立的。社会研究所的头一任所长是一位属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历史学家，他力图把社会研究所办成一个“西方的和东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联结点”。30年代，霍克海默出任第二任所长，聚集一批人从事社会哲学研究，提出“批判的社会理论”的主张，逐渐形成了一个学派。纳粹上台后，由于他们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而被迫辗转国外，最后定居美国。

60年代和7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马尔库塞。他出生于一个犹太家庭，青年时代即参加革命，曾是德国十一月革命时的士兵委员会成员。1964年，他出版《单向的人》一书，影响甚大，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经典性著作。

法兰克福学派最重要的理论主张是它的社会批判理论。他们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已使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采用高生产、高消费、高福利的政策来取得社会的安定，麻痹人们的反抗意识，以种种新的控制形式加强了对人的奴役和对人性的压抑，因此有着两大不可救药的病症。首先是社会“单向性”的病症。由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工业社会不仅能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控制与操纵社会的生产与物质的一切过程，而且加强了对人的心理、意识、思维的操纵，使人们彻底屈从于社会总体的需要。于是，社会中原有的一切对立、矛盾的因素消失了，一切社会关系变成了技术性的关系，社会变成了“单向的”社会，而人也失去了对社会的“否定”意识，变成了“单向的人”。其二是社会具有一种“攻击性”，它肆无忌惮、冷酷无情地对人进行不断的攻击与摧残，战争、杀戮、恐怖、暴行是它的具体表现。

法兰克福学派对症下药，在它猛烈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病症的药方上，第一味药就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他们认为，弗洛伊德呼吁道德改革和减轻社会压抑，立志用精神分析去克服个人与社会相冲突的主张，正好与马克思通过经济政治制度的变革去创建一个新社会的理想殊途同归；正如精神分析学是一种冲突的心理学一样，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冲突的社会学，两者都提出了一种新的人道主义理想，并为人性的全面的综合研究开辟了光明的前景。根据这一观点，马尔库塞提出了人性解放论。他把人性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生的本能，如爱、团结、正义和理性等；一类是死的本能，或破坏的本能，如贪婪、利己主义等。当代社会力图压抑人的生的本能，而助长破坏的本能。因此，马尔库塞认为目前最关键的就是要让人性获得完全的解放。他宣称：“今天为生活而斗争，为爱情而斗争，就是一种政治斗争。”他还为人们勾勒了一个没有压制、没有冲突的未来社会的轮廓，一个完完全全的乌托邦。

法兰克福学派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新探索，他们对社会弊端的批判也不乏针砭的深刻，但他们在探索的方向上出现了错误的倾向，因而在现实斗

争中碰了壁。但它起码是一种有益的尝试，起码对其他马克思主义者起到了借鉴的作用。

(阿海)

## 5. 结构主义

本世纪 60 年代，法国思想界发生了巨大变化，结构主义取代存在主义在思想界占据了统治地位，随后其影响又扩展到英、美和其他国家，成为当代西方世界的一股重要思潮。和存在主义不同的是，结构主义不是一种哲学流派，而是由结构主义方法联系起来的一种广泛的思想潮流，包括结构主义语言学、结构主义社会学、结构主义历史学、结构主义文艺理论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象法兰克福学派一样，结构主义也早在 20 世纪初就诞生了，它的思想先驱，是瑞士的语言学家索绪尔。索绪尔曾经是巴黎大学和日内瓦大学的语言学教授，并从 1906 年起主持日内瓦大学的印欧语法讲座，他在多年的语言学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新的语言学理论，始称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体系结构，语言的特点在于它并不是由语言和意义所构成，而是由语言和意义之间构成的一种网络，成为一种语言体系、结构。本世纪以来，结构主义语言学在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基础不断发展，分别出现了布拉格学派、美国学派和哥本哈根学派等不同学术派别，把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观点大加发挥。60 年代开始，一批法国学者借用结构主义语言学中的基本观点，进行社会科学的研究，分别在人类学、历史哲学、文艺理论、精神分析等方面取得了瞩目的成就，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思潮由此崛起。

结构主义认为，人们所认识的社会现象是杂乱的和缺乏秩序的，要达到有秩序的认识就要掌握现象的结构。但是，认识现象的结构又不能通过经验的概括达到，只能通过理论模式去认识。当我们面临一个对象时，我们可以先提出一个假定的结构，或者从别的学科中借用一个模式，看它能不能说明所研究的对象；如果可以说明，则通过这个模式就说明了现象的结构。结构主义把结构看成是一种成分之间的关系，并把结构区分为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结构主义所重视的是深层结构，即不能用经验和感觉把握的东西。所谓“结构”一词，通常所指的就是事物的深层结构。

60 年代和 70 年代，结构主义领袖式的人物是法国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正是列维—斯特劳斯首先把结构主义作为方法从语言学研究中运用到了社会现象的研究中，因此他对于结构主义形成为一种有影响的思潮起到了重要作用。1962 年，列维—斯特劳斯发表《野蛮人的心灵》一书，猛烈抨击萨特在 1960 年出版的《辩证理性批判》一书，在法国引起轰动，标志着结构主义正式登上了法国的思想舞台。



列斯—斯特劳斯主要运用结构主义方法研究人的行为方式、社会现象和社会意义，尤其注重对人类原始亲族关系和神话的研究。他认为，人类原始的亲族关系是比较稳定的、不受外界的影响，因而是一种“原型的”结构，这种“原型”结构深刻地反映在现代社会之中——现代社会现象，包括现代生活方式、婚姻家庭关系，都具有原始亲族关系的结构，无不是这一原型结构的形式变化。列维—斯特劳斯还在著作中明确地阐述了结构的意义和结构研究的方法，他的思想代表了结构主义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的一般特征。

结构主义思潮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法国共产党员、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阿尔杜塞，他创导了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强调对经典著作的结构分析。在 60 年代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热潮中，阿尔杜塞的观点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70 年代以后，结构主义又进一步繁衍出“后结构主义”，或称“解构主义”、“消解哲学”，结构主义的影响越来越大，至今影响着西方各种社会科学的发展。

和战后西方主要哲学流派、社会思潮相比，结构主义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思潮，它的流行，是西方经济开始得到稳定、保守思想逐渐抬头的潜台词，它置社会矛盾、冲突于度外，醉心于探索事物内部结构的和谐与稳定，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稳定的状况十分合拍，这也正是结构主义思潮诞生和发展的原因。

(阿海)

## 6. 当代西方的新史学

战后西方史学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与战前相比，有许多新的特点。

首先，在史学理论上向传统史学观点提出了挑战。传统史学是实证主义（或经验主义）史学，19 世纪德国史学家兰克提倡“照条史实”，重视史料研究，为西方传统史学奠定了基础。战后的新史学则主张要进行跨学科研究。法国的年鉴学派呈众多新史学流派的代表，在西方有较大的影响。该派得名于所办的历史杂志，1946 年该杂志定名为《经济、社会、文化年鉴》，他们引进了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学理论，反对只研究历史大事件，而主张跨学科进行研究，提倡研究历史的全貌，注重社会经济结构的分析，并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1949 年布罗代尔发表《腓力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一书，从地理、生态、气候、经济、社会、政治、思想、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反映了 16 世纪地中海的全貌，成为年鉴学派的代表作。1950 年在巴黎举行的第九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提倡进行人口史、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等多学科的合作研究。

其次，新史学研究范围扩大，课题多种多样。战前的史学主要研究上层人物和高级的文化活动，战后在英美兴起的新社会史学和新政治史学则注重社会中普通人集团的历史作用，提出要写“由下向上看的历史”，或“底层的历史”。1963年英国史学家汤普逊发表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是新社会史学的代表作。在美国，社会史家还提出要研究村镇、家庭的历史。

过去的西方史学家都受“欧洲中心论”的思想束缚，很少研究亚非拉的历史。战后，随着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第三世界的兴起，以及西欧的衰落，“欧洲中心论”的历史观念发生了严重的动摇。英美等国有关亚非拉国家的专史相继问世。英国出版了多卷本的《剑桥非洲史》、《剑桥印度史》、《剑桥中国史》等著作，反映了英国史学研究的新水平。美国研究非洲史的专业队伍，在50年代中期只有十人，到70年代中期已发展到600多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组织非洲学者花费了十多年的时间，编写了八卷本的《非洲通史》，可谓前所未有的壮举。

其三，广泛应用各种新的史学研究方法和手段。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发展，数量分析的方法被应用于历史研究，特别是应用于经济史的研究，出现了计量史学。1957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康拉德和迈联合著的《内战前南部奴隶制经济学》，是第一部计量史学的代表作。60年代和70年代，在美国涌现出一大批计量史学著作，如本森著《杰克逊民主主义的概念》（1961）、福格尔和恩格尔曼合著的《苦难时代，美国奴隶制经济》（1974）等。他们的特点是，并不重视对历史过程的描述和进行理论分析，只着重于用电子计算机大量收集、整理各种复杂的统计资料，然后用统计学、数学原理对数据进行分析，制作数理模型，用以说明历史现象。这种方法很快在西方各国流行，为年鉴学派、新社会学派、新政治学派所采用。1972年美国出版了《历史学数量方法研究丛书》，1980年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第十五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决定成立专门探讨历史数量方法的国际委员会。可见，这种方法已受到国际的普遍重视。

虽然比较研究的方法早已有之，著名史学家施本格勒、汤因比都曾使用这种方法进行研究，但在战后它又有了新的发展，形成了十分流行的比较史学。这与战后的国际政治格局及国际关系的更加密切有关。1958年美国出版了国际性的季刊《社会和历史的比较研究》，二十多年内发表了来自世界各国的700多篇文章。比较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有国家之间的、各文明体系间的比较，也有人物、事件、制度、观点的比较，有周期的横向比较，也有前后的纵向比较，有宏观比较，也有微观比较。美国学者布莱克、沃勒斯等人用此方法研究现代化历史和“世界体系理论”，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从利用口头史料发展而来的口碑史学在战后也有很大发展。据1966年统计，美国已有60多个研究口述历史的机构，出版了《口述历史评论》杂志，这种方法多用于企业家家族史，城市史和地方史的研究之中。

还应该指出的是，尽管西方史学流派繁多，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五花八

门，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始终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受到越来越多的史学家的承认，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盛行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张象、黄若迟）

## 7. 人口问题和人口学

人口学是研究人口发展过程的重要内容，探讨人类社会共有的和各个社会形态特有的人口规律的社会科学。人口学的研究对象和性质决定了人口学的研究方法。具体有：人口统计与人口调查；生命表与生育率表；人口预测与人口规划；人口数学模型等。随着人口研究的发展与深入，出现许多新的分支学科，如：人口经济学、人口社会学与人口地理学等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口学已有了一定的发展。值得提出的是，近代英国人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发表了第一部名为《人口原理》的较为系统的人口专著；1919年，惠普尔所著《人口统计》中首先将建立人口学学科体系提上日程；1927年召开第一次国际人口学会议，开创了人口学研究的新局面。二战以后，许多学者寻求解决日益突出的人口问题的答案，各种理论应运而生。主要有：追随马尔萨斯的“人口爆炸论”，以美国保罗·凡·伊尔里奇的《人口爆炸》（1970）为代表；力求解决人口“不足”或“过剩”的“适度人口论”，代表作是法国阿·索维的《人口通论》。

人口过程充满各种矛盾，贯穿人口过程的始终。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逐渐激化，成为人口问题。人口问题主要是指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不相适应，人口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比例失调而产生的矛盾。

二战以后，世界人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高速增长。对人口发展史的简单回顾可证明这一点。自人类诞生之日起至19世纪初，经过几百万年的时间世界人口才达到10亿；一个半世纪后到1930年增加到20亿；此后用30年时间到1960年便达到30亿；后又仅用15年时间到1975年达到40亿；而世界人口仅用12年到1987年7月11日突破了50亿大关。由此可见，世界人口问题已成为当代人类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人口的急剧增长给各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带来了一系列极其复杂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所以，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宣布：1987年7月11日为世界“50亿人口日”，以提醒人类做好人口控制工作，争取人类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当前，世界存在着如下几个比较突出的人口问题。

（一）世界人口的年龄构成问题。根据联合国测定，全世界少年人口的比例在逐渐下降，老年人口所占的比例则将上升。到本世纪末，少年人口将下降到30.4%，老年人口上升到6.6%。同时，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发展也有很大差异。1980年，发达地区少年人口所占比例是23%，老年人口是11.4%，属于“老年型”；而发展中地区则分别是40%和

3.8%，属于“年轻型”。人口老化给发达国家经济带来了不利的影响。老年人的增多使领取退休金的人口比例增大，加重了社会经济负担；工人年龄老化造成劳动力紧张的后果。发展中国家的“年轻化”使非劳动人口的数量占较大比例，造成供养人口增加，还意味着这些国家必须在学校、医疗设施和其它改善生活水平的方面花费大量的物力财力，从而限制了生产性投资的进一步增加，加重了这些国家的经济负担，饥饿、疾病、文盲增加的出现成为不可避免。

#### （二）世界各地迅速城市化所导致的人口问题。

世界的城市人口，据联合国测定，1980年18亿弱，本世纪末将达到约30亿。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从1980年的40%增加到2000年的48%。从各地区看，预计到2000年发展中地区的城市人口将超过发达地区近2倍。同时，城市向着巨大化发展。人口在400万以上的大城市目前全世界约有40个左右，2000年大约要增加一倍。人口在1000万以上的巨大城市，1980年是7个，到2000年估计有22个。以发展中国家最为显著。1970年至1980年新跨入400万人口以上的14个大都市中，有11个属于发展中地区。2000年22个人口在1000万以上的巨大城市中，有18个将分布在发展中地区。城市化带来的最严重的问题是，农村人口大规模地向城市移动，使农村人口构成和城市相比，青年组的人口比例少，而少年和老年组的人口比例大，影响了农业发展；交通拥挤和环境污染；住房紧张和失业率、犯罪率上升。

#### （三）国际人口流动变化造成的问题。

70年代中期以来，北美与大洋洲等传统的移民接受国与欧洲各国采取了限制接受范围的政策。移民中发展中国家移民占多数，如美国是81%，加拿大56.5%。同时，西南亚的产油国进行开发而大量接受外国劳动力，1975年180万，1980年达280万，主要也是发展中国家的移民。但最重要的是剧增的发展中国家的难民迁移，1983年难民在各洲的人数分别是：亚洲510万、非洲270万、大洋洲33万、北美140万、南美33万、欧洲58万。可见难民迁移主要是在发展中国家之间流动。这就给接受定居国在经济等方面造成一定困难。因此，难民问题将成为国际上越来越严重的问题。

目前，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已认识到控制人口增长的重要性，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并收到一定效果。全球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已从高峰期的20%下降到目前的17%，但是，还未脱离高速增长。因此，对人口发展前景采取乐观或悲观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充分认识到人类面临着严重的人口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寻求正确的途径去解决这些问题。

（贾锡萍）

## 第十一章 当代文学艺术

### 1. 战后的苏联文学艺术

战后苏联文学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取得了惊人的成绩。

苏联卫国战争结束后，到 50 年代中期，苏联人民在战争中的英雄业绩继续是文学作品的主要题材。法捷耶夫以文献材料为基础写成了长篇小说《青年近卫军》（1945 年，增订版 1951 年），塑造了在苏维埃政权下成长的青年一代优秀代表的形象。波列沃依的小说《真正的人》（1946 年），也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歌颂了苏联人为祖国献身的百折不挠的精神。在 40 年代末 50 年代初，塑造了城乡先进劳动者的优秀小说有巴甫连科的《幸福》（1947 年）、阿扎耶夫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1948 年）、尼古拉耶娃的《收获》（1950 年）、柯切托夫的《茹尔宾一家》（1952 年）等。这时期描绘十月革命前后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的作品有费定的三部曲的头二部《早年的欢乐》（1945 年）和《不平凡的夏天》（1947—1948 年），革拉特科夫的自传性三部曲《童年的故事》（1949 年）、《自由人》（1950 年）和《荒乱的年代》（1954 年）。列昂诺夫的长篇《俄罗斯森林》（1953 年）通过一个正直的林学家和他对手之间的斗争，号召人们要坚持自己的正确的信念。小说既有复杂细腻的心理分析，又富于哲理，暴露了个人主义者精神世界的贫乏，触及了人生目的的探索。

在战后初期，联共（布）中央鉴于文学创作中出现了不问政治、无思想性、趋奉唯美主义和个人主义等倾向，作出了《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等 4 项决议（1946—1948 年），中央书记日丹诺夫相应地作了报告。这些决议和报告的目的是要提高社会主义文艺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强调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在正确反映现实中的作用。但方式简单，对文艺界某些人士和作品的批评不够实事求是，因此产生了不好的作用。从 30 年代末开始，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逐渐形成，也给文学带来了不良影响。

1953 年斯大林逝世。1956 年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时期的个人崇拜，使苏联社会生活发生剧烈的动荡，也在文学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和紧张的探索。文艺工作者中间，既有思想活跃的一面，也有思想混乱的一面。有人提出过去在文艺工作中的行政干预过多，对艺术规律重视不够，喜欢歌功颂德，回避生活中的困难和矛盾；也有人全部否定斯大林时期苏共对文艺的领导以及 30 年来文艺方面取得的成就，要求所谓的“创作自由”。从 50 年代中期到 60 年代中期，文艺作品的倾向不一。

从 50 年代中期开始，为过去在肃反扩大化和历次批判运动中受害的一批文艺界人士恢复了名誉。在“积极干预生活”的口号下，文学中出现了一些比较真实地反映现实的作品，揭露了社会中各种矛盾和冲突，如奥维奇金的农村特写《区里的日常生活》（1952—1956 年）、尼古拉耶娃的《征途

中的战斗》（1957年）等，其中包括因揭露过多或调子低沉而引起争论或批评的爱伦堡的《解冻》（1954—1956年）、杜金采夫的《不是单靠面包》等。这时也出现了一些反对过去那种粉饰的描写、但又走到另一极端，即充满悲观、怀疑的小说，如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1957年国外出版），该小说在西方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认为是一本了不起的好书，帕斯捷尔纳克在1958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金，在苏联，人们把它视为否定十月革命的小说。柯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1968年）正是对这股揭露浪潮进行争辩的作品。

在反映卫国战争题材的作品中，出现“非英雄化”和表现所谓“战壕真实”的倾向。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1957年），注意到普通人的命运，它的调子虽然有些低沉，却表现出俄罗斯士兵在经受了难以忍受的折磨之后仍旧保持坚毅不屈的精神。巴克兰诺夫的《一寸土》（1959年）则渲染战争的残酷，流露出和平主义的调子。

索尔仁尼琴在苏共二十二大以后发表了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2年），一时间引出了一批所谓“集中营文学”作品。此时还出现一些丑化斯大林及其领导下的苏联社会的作品，如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焦尔金游地府》（1962年）。

1964年10月，苏共中央全会决定由勃列日涅夫担任第一书记，但继续贯彻苏共二十大、二十二大的路线。在文艺政策上，力求平息不同的意见，加强控制，提出“既反对抹黑，也反对粉饰”的要求。勃列日涅夫时期，文艺界总的倾向是：强调写正面人物，写“时代的真实”和“生活中的美”，提倡“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

这时期，以战争为题材的作品，在内容上不限于写个别战争场面，而是写范围广、线索多的战争全过程，被称为战争的“全景文学”。如西蒙诺夫的三部曲《生者与死者》、《军人不是天生的》和《最后的夏天》（1970—1971年）；恰可夫斯基的五卷本巨著《围困》（1968—1975年），长达180万字，描写列宁格勒保卫战的全过程。受到评论家重视的战争题材小说还有：邦达列夫的长篇《热的雪》（1969年）；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1969年）等，这些作品不再描写战争的残酷，而是塑造富于牺牲精神和高尚道德品质的英雄。

这时期还出现了以经济改革为题材的作品。科尔巴托夫的中篇小说《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1969年）、格列曼的《奖金》（1975年）等塑造了“现代企业新领导人”和“当代英雄”的形象，他们是经济改革的实干家，往往能用铁腕扭转生产经营上的亏损局面。柯列斯尼科夫的长篇三部曲《供阿尔图宁用的同位素》（1974年）、《阿尔图宁作出了决心》（1976年）和《培养部长的学校》（1977年）塑造的“当代英雄”，不仅富有父辈的优良传统，有工人阶级的崇高品德和革命精神，而且又有科技革命时代的管理才能。

以道德问题为题材的作品在这时期日益占据重要地位。苏共领导提倡这种题材，要求作家“努力去反映人的优秀品质——人的原则性、诚实和深厚的感情”。但大多数作品带有揭露的性质，反映出苏联近 20 多年来社会风气的败坏。拉斯普京的中篇小说《活着，可要记住》（1974 年）因尖锐地提出了道德标准问题而受到重视。有一些作品，因揭露阴暗面过多而引起争论。如特里丰诺夫的小说《滨河街公寓》（1976 年），展示了苏联社会中玩弄权术、施展两面派计谋的人如何登上权力的宝座。又如李帕托夫的小说《伊戈尔·萨沃维奇》（1977 年），描写一个依靠父母、裙带关系的“幸运儿”，如何飞黄腾达，过着“奢侈豪华，令人神往的生活”。

战后苏联的艺术也有出色的成就。它不遗余力地重视古典作品的演出。苏联的芭蕾舞一直保持着举世闻名的水平。战后著名的芭蕾舞剧有普罗高菲耶夫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恰恰图良的《斯巴达克》等。最著名的芭蕾舞蹈家为乌兰诺娃，她曾获得列宁奖金、四次获得苏联国家奖金、两次荣获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称号。著名的歌剧作品有普罗高菲耶夫的《战争与和平》、H.沙包林的《十二月党人》。交响乐有肖斯塔科维奇的《1905 年》。

苏联的电影也大力把苏联和世界文学名著搬上银幕，如格拉西莫夫的《静静的顿河》、罗沙尔的《苦难的历程》、尤特凯维奇的《奥赛罗》、科齐采夫的《唐吉珂德》等。反映苏联当代人生活中矛盾、冲突的影片有 M.什维采尔的《陌生的亲人》、米洛涅尔的《查列契大街上的春天》等。

苏联公共建筑物的华丽建筑艺术同表演艺术一样，用以显示国家的力量。1949 年至 1953 年建立的列宁山上的莫斯科大学是雄伟壮美的建筑群，建筑师为 A. B.鲁特涅夫、C. E.切尔尼雪夫、B. A.阿勃罗西莫夫，总设计师为 B. H.诺索诺夫。苏联的雕刻家 B. 宾楚克创作了列宁雕像纪念碑（在克里姆林宫内）；B.莫希娜、A.吉巴尔尼科夫、E.武切吉奇等雕刻家为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等著名文学家塑造了不朽的纪念像。

（严志梁）

## 2. 当代欧美文学艺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文学艺术的发展呈现出异常复杂和丰富的状态。本世纪初发展起来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艺术掀起了新的高潮。现代主义文学艺术是西方现代化文艺的主要潮流，以反对理性、否定传统和追求艺术表现新形式作为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精神灾难，也进一步打击了西方的资产阶级文化传统，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在否定文化传统、反理性和追求形式主义表现方法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战后初期，存在主义哲学在法国流行一时。存在主义哲学反映了人们在

残酷的战争之后的悲观失望心理，强调个人在世界中的生存地位和生存状态。存在主义哲学同时也影响到法国战后初期的文学和美术，产生了存在主义文学和美术。存在主义文学和哲学一样，也是以描绘人在世界中的孤独无援感、荒诞感作为思想内容的。存在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是法国著名哲学家和文学家让—保罗·萨特。1938年，萨特的长篇小说《恶心》出版，引起很大反响，发行了40万册，一般就以这一年作为存在主义文学的起点。萨特一生除了哲学著述外还创作了大量的小说和剧本，在世界文学中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善于在作品中通过文学形象，富有表现力地反映他的哲学观念。萨特的一生，还是追求真理和正义的一生，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积极参加抵抗运动，长期以来自称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同路人。1980年他逝世的时候，我国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称他为“人类进步的朋友”，认为“萨特是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

存在主义美术的代表人物是法国艺术家吉阿科麦蒂。吉阿科麦蒂的雕塑作品，人物细长干枯，面目模糊不清，充分反映了人在世界中孤立无援的悲观状态。

50年代，在美国和英国，分别诞生了被称为“垮掉的一代”和“愤怒的青年”的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垮掉的一代”文学主要以诗歌作品为主，它反映了战后美国青年对资本主义社会感到幻灭后追求刺激以麻醉自己以及反对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垮掉的一代”文学的代表人物是美国诗人艾伦·金斯伯格，他的代表作品长诗《嚎叫》以疯狂的态度和惠特曼式的粗犷风格，反映了对现实社会的激烈批判和对吸毒、同性恋等怪诞行径的鼓吹。“垮掉的一代”文学具有十分明显的颓废倾向。“愤怒的青年”文学以戏剧作品成就为大。英国青年作家奥斯本的戏剧《愤怒的回顾》是“愤怒的青年”文学的代表作品，它反映了英国青年对当代无产阶级命运的思考。但是，思考的结果是感到深深的绝望，因而对社会和其他人都产生了极大的愤怒。

50年代和60年代，在法国和其他国家，出现了一种新的戏剧形式，通常称为“荒诞派戏剧”。1953年，法国作家塞缪尔·贝克特的戏剧作品《等待戈多》在巴黎首演，取得了很大成功，连续演出达400场之多。《等待戈多》描写两个肮脏的流浪汉等待一个莫名其妙的名叫戈多的人的故事，以不合逻辑的、怪诞的故事情节，表达人在世界中的荒诞感与陌生感。评论家们根据《等待戈多》及类似作品的特色，将其统称为“荒诞派戏剧”。“荒诞”一词在哲学上指的是个人与其生存环境的脱节。“荒诞派戏剧”认为这个社会与人都已无可救药，因此要表现这种无可救药的可笑状态。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影响最大的戏剧流派。

60年代，美国出现了“黑色幽默”文学。“黑色幽默”文学主要以小说的成就为大，它也和“荒诞派戏剧”一样，表达的是人的无望和悲惨的地位。但是“黑色幽默”文学用的手法却是嘲弄式的幽默，让你发笑，但又在笑声中感受到命运的悲惨。美国作家约瑟夫·海勒的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1961



年)是最著名的“黑色幽默”作品。小说通过一个飞行员在美国空军中的荒唐经历,深刻地揭露了军队中的种种丑恶现象,具有强烈的反战倾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的艺术中心由欧洲移向美国。战后初期,由于残酷的战争的影响,艺术家们纷纷在纯粹的艺术形式中寄托不安的心灵,因此艺术也越来越严重地倾向于抽象。从40年代到50年代末,抽象艺术在美国占据了绝对优势。这一时期,最著名的抽象艺术家是美国的杰克逊·波洛克(1912—1956年)。波洛克的绘画是抽象艺术的一种极端发展,作画的方式和材料都完全超越了传统绘画的概念,通常他把一张尺幅巨大的画布钉在地上,他手提颜料桶,围着画布疾走,并将颜料不断地滴落、泼溅在画布上,乍看上去仿佛在跳一种疯狂的舞蹈。不仅如此,波洛克有时还用棍子、铲子、刀子作工具,或者在颜色中渗杂沙子、碎玻璃和线头。美术界通常把波洛克的绘画称为“行动画派”。“行动画派”的出现,标志着西方艺术领域形式主义的极度泛滥。

从50年代末开始,一种称为波普艺术的艺术样式逐渐流行起来,到60年代取代抽象艺术成为最重要的艺术流派。波普艺术也称流行艺术,大众艺术,“波普”一词就是流行、大众化的意思。波普艺术通常以一些现成品作为艺术表现材料,表达艺术家对社会的看法。著名的波普艺术家有美国的罗伯特·芬生柏,他的作品中就经常有一些旧衣服、旧照、路牌、废纸或老式收音机等等。波普艺术力图通过这种艺术形式,打破实物与艺术之间的界限,填平艺术与生活之间的沟壑,但是往往由于他们对艺术形式的破坏,而使作品失去了艺术意义。例如有一件著名的“波普艺术品”是数排整齐排列着的可口可乐瓶子,它只是表明画家对社会中可口可乐瓶子的充溢产生的敏感而已,除了新奇之外,并没有什么艺术价值可言。

60年代以后,各种各样的现代艺术流派纷纷崛起,令人眼花缭乱,艺术已不再具有任何审美意义和现实意义,走上了以新奇的形式为唯一表达目的歧路。

70年代,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在欧美世界逐渐趋向式微。此后,由于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相对稳定和繁荣,保守主义思想又逐渐占据了西方意识形态的中心地位,文学艺术也逐渐趋向传统和平静。70年代以后的西方文学,一方面原来那些惊世骇俗的现代主义流派纷纷成为正统,失去了原来现代主义意义上的反传统的急进势头;另一方面,传统的文学也吸收了许多现代主义的因素,重新获得了发展。同样,70年代以后的美术也日趋传统,当代西方占统治地位的是一种被称为新浪漫主义的绘画。美国画家安德鲁·怀斯是这种绘画流派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技法上保守而写实,感情细腻,画面上充满了传统的人道精神和人情味,其中《克里斯蒂娜的庄园》一画已成为当代世界名作。

50年代开始,摇滚音乐成为西方流行音乐的主角。摇滚音乐是一种揉合黑人音乐与美国南方乡村音乐特色而成的新音乐,节奏强烈,对青少年具有

巨大的吸引力。当时，最著名的摇滚音乐歌星名叫埃尔维斯·普莱斯利，他创造了摇滚音乐演出的张狂台风，演唱时大幅度扭动身体，因此获得了“猫王”的称号。60年代，由四名英国青年组成的披头士（又译甲壳虫）摇滚乐队把摇滚音乐推上了受到狂热欢迎的顶峰。以约翰·列农为首的披头士乐队成员个个相貌英俊，演唱风格别具一格，博得大多数西方青年的狂热拥戴，甚至大多数中老年人也喜欢听他们唱的歌曲。但是，60年代后期，随着西方社会的动荡和青年造反运动的勃兴，摇滚音乐日益变得粗野和淫秽，内容大都鼓吹暴力、吸毒和淫乱。到70年代以后，以摇滚音乐中派生出来的迪斯科音乐逐渐成为流行音乐的主流。迪斯科音乐以每分钟125拍的固定节奏，编排出一种相对稳定、赏心悦目的舞曲，让人们在这种音乐中跳舞感到身心愉悦。70年代末，欧美的迪斯科狂热达到了高峰，1978年美国有3600万成年人和青年到20000家夜总会去跳了迪斯科舞。迪斯科音乐的盛行也反映了当代西方人民的一种审美倾向：自娱自乐，自我满足。

（阿海）

### 3. 当代亚非拉文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在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当代亚非拉文学便具有与战前文学不同的新特点。尽管有着各种不同的流派和倾向，但反帝、反殖是它们的基本主题。多数作品是反映民族的觉醒，表达殖民地人民改变自己民族命运的强烈愿望，揭露和抨击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罪恶，歌颂为民族解放献身的英雄。印度尼西亚的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阿布杜尔·慕依斯，巴基斯坦的纳迪姆·卡斯米，喀麦隆的莱奥波尔·奥约诺、蒙哥·贝乔，塞内加尔的桑贝尔·乌斯曼，尼日利亚的钦努阿·阿契贝，阿尔及利亚的穆罕默德·狄布，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危地马拉的安赫尔·阿斯图利亚斯，智利的巴勃罗·聂鲁达，巴西的若热·亚马多等都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

桑贝尔·乌斯曼（1923—）是塞内加尔的小说家。他的作品大部分是反映西非人民在殖民统治下的悲惨生活，被人们称之为代表非洲人民向殖民主义提出控诉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在成名作《祖国，我可爱的人民》（1957年）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当代非洲青年知识分子的形象——乌玛尔，小说描写乌玛尔为使乡民摆脱殖民者的剥削，组建农民自办土产合作社，但却惨遭殖民者的杀害。作者无情地揭露和抨击了殖民者的凶狠残暴，歌颂了非洲一代新人为人民事业而英勇献身的精神。乌斯曼其它主要的作品还有《黑色码头工》、《神的儿女》和尚未全部完成的三部曲《哈尔马坦》等。

加西亚·马尔克斯（1928—）是哥伦比亚著名作家。198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他的成名作《百年孤独》（1967年）以加勒比海岸小镇

马贡多为背景，描述了农民布恩迪亚一家七代的生活和命运。小说运用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再现了哥伦比亚人民在侵略者和独裁者蹂躏之下痛苦挣扎的情景，对帝国主义者、独裁者和封建教会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嘲讽。其它主要作品还有《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家长的没落》和《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等。

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1925—）印度尼西亚作家，曾在 50 年代末两次访问过中国。他的长篇巨著四部曲《人世间》（1980）、《万国之子》（1980）、《足迹》（1985）和《玻璃屋》前三部的相继问世轰动了国际文坛。作者在这四部曲中，以印尼近代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提木托·阿迪·苏里约为原型，塑造了明克这个印尼土著青年形象，通过对其成长、觉醒、斗争和失败的描写，反映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印尼民族的觉醒过程，无情地抨击了残酷的殖民主义制度。其它主要作品有《追捕》、《游击队之家》和《被摧残的人们》等。

在当代亚非拉文坛上不少作家，既从事创作，又直接参加反帝反殖斗争，巴勒斯坦的格桑·卡纳法尼，塞内加尔的塞达·桑戈尔，莫桑比克的多斯·桑托斯等人是这方面的典型。

有些文学作品是以表现鲜明的民族、民主倾向和对世界和平的向往为特征，实际上也是与反帝反殖的主题相联系。印度的克里南·钱达尔和拉吉·安纳德，埃及的拉赫曼、阿斯·谢尔卡维和塔哈·候赛因，尼日利亚的沃里·索因卡等，就是如此。克里希南·钱达尔（1914—1977）是印度乌尔都语作家。以短篇小说最为著名，共写了 400 多篇短篇小说，汇集成 22 部集子。短篇小说集《我们是野蛮人》（1947 年）以 1947 年印巴分治前后所发生的一场宗教派别流血冲突事件为背景，真实地描写了这一历史悲剧，揭示了殖民主义统治是导致这场悲剧的根源。其它主要的作品有短篇小说《三个流氓》、《大梵的儿子》、《无花果树》和《红心王后》等。

当代亚非拉文学的另一特点是无产阶级文学在成长，并成为世界无产阶级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中既有描写无产阶级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斗争和歌颂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作品，也有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歌颂新时代，描写新人新生活的作品。例如朝鲜诗人赵基天（1913—1951），代表作长篇叙事诗《白头山》（1947）描写了在金日成领导下的一支抗日游击队与日本侵略者进行的英勇斗争，赞颂了抗日将士的革命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其它主要诗作还有抒情诗《图们江》、《土地之歌》、《燃烧的街道上》和《朝鲜在战斗》等，1951 年作者在祖国解放战争中牺牲。李箕永（1895—1973）是另一位朝鲜名作家，他的长篇小说三部曲《图们江》（1954—1961）反映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朝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的革命斗争，长篇小说《土地》（1949—1960）描写了朝鲜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过，其它主要作品有《故乡》和《开辟》等。

另外，在当代亚非拉国家中还涌现出许多受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对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国家表示赞同和好感的作家。他们不但热情介绍和真诚颂扬马列主义，并在其创作中有不同程度的反映。这些作家中的主要代表有泰国的西巫拉帕，莫桑比克的多斯·桑托斯和苏丹的穆罕默德·凯尔等。

当代亚非拉文学的第三个特点是许多作家熔西方现代派表现手法与其民族特色于一炉，创作出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新文学，为亚非拉文学的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东西方文化交往日趋频繁，产生了相互渗透融合之势。不少作家在继承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有意识地借鉴西方现代派的艺术表现技巧，从而出现了文学的空前繁荣，产生了影响较大的文学流派和许多优秀的作家。

魔幻现实主义自 60 年代以来风靡整个拉美文坛，是一个新兴文学流派。该流派的创作以现实为基础，在叙述中折入神奇而怪诞的人物、情节或各种超自然的现象，给人一种似非而是的感受，以达到“揭示存在于人与人、人与周围环境之间的神秘关系”的目的。许多拉美作家为取得“魔幻”的效果，大量采用了夸张隐喻、时空颠倒、象征暗示等艺术手法，把古老的印第安神话传说与拉美的现实交织在一起，曲折地反映了现实的严酷。该流派的代表作是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其他主要作家有危地马拉的阿斯图里亚斯、墨西哥的鲁尔弗和富思特斯、智利的多诺索、阿根廷的博尔赫斯和科塔萨尔、委内瑞拉的彼特里和古巴的卡彭铁尔等。

除上述拉美作家外，以色列的约瑟夫·阿格农、尼日利亚的沃里·索因卡和埃及的剧作家陶菲格·哈基姆都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尼日利亚剧作家小说家沃里·索因卡（1934—）1985 年当选为国际戏剧学会主席，1986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索因卡在创作内容上着意表现发生在当代非洲的新旧势力、传统意识和现代思想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找寻调解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的出路。在艺术技巧上，他把西方戏剧艺术和非洲的民间文艺、传统音乐、舞蹈等巧妙地结合起来，开创了用英语表演西非现代戏剧的先河，影响了一大批非洲戏剧家。其主要作品有剧本《泥泽地的居民》、《裘罗教士的考验》、《雄师与宝石》、《森林舞蹈》、《良种》、《路》、《康吉的收获》、《杰罗变形记》和《反常季节》等，长篇小说有《解释者》。

总之，战后亚非拉文坛涌现出大量的优秀作家和作品，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尽管存在着不同的倾向和流派，但都表现出鲜明的民族民主倾向。它们在保存和继承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采用了西方新的创作方法和艺术技巧，使东西方文化进一步交流，逐步形成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新文学。这种文学已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它必将为亚非拉文学的繁荣、为世界文学和人类文化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刘平炎）

### 资料表一

#### 美国和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比较

	1950年	1960年	1965年	1970年	1975年	1980年	1982年
	(1975年价格)					(1978年价格)	(1981年价格)
美国商务部计算							
国民生产总值 (亿美元)							
美国	6570	9020	11430	13370	14890	23690	29260
苏联	2180	3940	5040	6610	7860	12630	15870
苏联为美国%	33	44	44	49	53	53	54
按人口平均国民 生产 总值(美元)							
美国	4315	4993	5882	6523	6972	10406	12587
苏联	1213	1838	2182	2722	3088	4756	5878
苏联为美国%	28	37	37	42	44	46	47
苏联中央统计局 计算							
国民收入, 苏联 为美国% —	31	约 60	59	65 以上	67	67	...

### 资料表二

#### 西方七国主要经济指标增长率 (1982—1984年)

国别	实际国民生产总值 (%)			失业率 (%)			消费物价 (%)		
	1982年	1983年	1984年	1982年	1983年	1984年	1982年	1983年	1984年
美国	-2.1	3.7	6.8	9.7	9.6	7.5	6.1	3.2	4.3
日本	3.2	3.0	5.8	2.4	2.7	2.7	2.7	1.8	2.1
联邦德国	-1.0	1.3	2.5	5.9	7.3	7.4	5.3	3.3	2.3
法国	1.6	0.5	1.8	8.7	8.8	9.6	12.0	9.5	8.1
英国	2.3	2.5	2.0	12.0	13.1	13.5	8.6	4.6	5.1
意大利	-0.3	-1.5	3.0	4.8	5.3	5.6	16.5	14.7	10.7
加拿大	-4.2	3.0	4.3	11.0	11.9	11.3	10.8	5.8	4.6

资料来源：美国《总统经济报告》1985年。

### 资料表三

####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大公司数

	1955年	1960年	1965年	1970年	1975年	1980年	1983年
美国：10亿美元以上公司	22	28	47	107	160	230	234
100亿美元以上公司	—	1	2	2	9	19	25
英国：10亿美元以上公司	4	5	6	16	29	65	52
100亿美元以上公司	—	—	1	1	2	4	6
联邦德国：10亿美元以上公司			7—	13—	28—	414	373
100亿美元以上公司							
日本：10亿美元以上公司			5	21	53	8	98
100亿美元以上公司			—	—	—	74	7

资料来源：美国《幸福》有关年份各期。

### 资料表四

美苏军事力量对比 1985 年 7 月

项 目	美 国	苏 联
总兵力	215 万人	530 万人
洲际弹道导弹	1026 枚	1398 枚
潜射弹道导弹	640 枚	979 枚
中程轰炸机	61 架	500 架
远程轰炸机	263 架	170 架
师	16 个	215 个
主战坦克	13432 辆	52600 辆
作战飞机	3700 架	8730 架
主要水面作战舰只	200 艘	289 艘
弹道导弹潜艇	37 艘	77 艘
潜 艇	101 艘	371 艘
攻击潜艇	95 艘	203 艘
航空母舰	14 艘	6 艘

资料表五

北约和华约军事力量对比

	北约		华约	
	现有实力注	增援后的实力注	现有实力注	增援后的实力注
总兵力 (含海军) 师 (或相当于师)	260 万 88	450 万 115	400 万 115	600 万 192
主战坦克 (主炮 90 毫米和 90 毫米以上)	13470	17730	26900	46230
反坦克制导武器发射架 (数人操作或车载)	12340	19170	18400	35400
火炮和迫击炮 (口径 100 毫米和 100 毫米以上, 含多管火箭炮)	11000	14700	19900	38800
装甲输送车、步兵战斗车和其它装甲车辆	33000	39580	53000	94800
攻击直升机	560	900	1135	1175
运输和支援直升机	1960	6000	1180	1375



